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6.6.6
2016年第23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杨绛

(1911~2016)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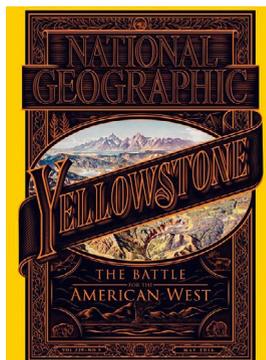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 1005-3603
CN 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 元



《新科学家》2016.5.28

睡一个好觉

要想一夜好梦，必须要关注三个问题：几点睡的？睡了多久？感觉如何？美国 35% 的成年人每日睡眠在 7 小时以下，英国的成年人平均睡眠时长则是 6.8 小时。8 小时睡眠制并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但研究普遍认为健康人体每日睡眠应至少维持在 7 小时。太少的睡眠会导致情绪不稳，判断力不佳，影响免疫系统和食欲，引起代谢性疾病和诸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心理健康问题。此外，熟悉的睡眠环境、适合器官休息的环境温度都是保证良好睡眠质量的客观因素。



1 / 《国家地理》2016.5

黄石国家公园的困境

作为美国的第一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不仅是一个公园，而且是一个从 140 年前就开始和野生生态系统进行和平谈判的历史符号。面对从旧时代开始的商业偷猎、破坏，来自西部地区的抢劫、政府的忽视以及越来越多不受控的旅游需求，公园原有的珍贵生态系统正面临新的威胁。在人类有秩序管理的荒野和自然环境中，野生动物被迫遵守人类的规则，而其中某些规则是有悖于自然生存法则的。

3 / 《纽约客》2016.5.30

失败的秘密行动

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投入巨资的索罗斯最近险遭一场“秘密调查”袭击，主使者是保守派活动人士詹姆斯·奥基弗。他伪装身份向索罗斯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致电，以图给索罗斯设局，却因忘记挂好电话而暴露了身份和行动计划。奥基弗于 2010 年创立的组织 Project Veritas 以揭露真相为目标，常通过秘密侦探或给目标设置圈套来获取信息，其伪装与欺骗的方法饱受各方质疑。他们自 2014 年起开始涉入政治竞选领域。据悉其匿名资助者中有来自保守派的政治力量。

2 / 《展望》2016.6

留在欧盟好

有关 6 月 23 日英国是否会留在欧盟的公投，无论结果如何，对欧洲都将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对英国来说，无论是未来经济局势、财政政策、货币地位、移民政策等各方面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弊大于利。对于欧洲而言，英国脱离欧盟是对欧洲乃至西方民主价值体系的破坏，也会动摇其他成员国和整个欧盟的稳定。但也有人认为英国方面有两个潜在的安全性益处：疏离《欧洲人权公约》的制约和控制来自欧盟成员国的移民数量。

4 / 《新闻周刊》2016.6.3

“敏感警告”

近些年，半数多的美国大学都树立了言论准则，有“微侵略”或“仇恨言论”性质的用语和话题会因触发“敏感警告”而遭禁止。“特朗普”“种族歧视”和“性骚扰”是近期引发“敏感警告”的高频关键词。为学生提供安全空间、使其免受刺耳或伤害性言论的侵扰是否利大于弊？质疑声认为这种方式在尺度上有违言论自由，也非大学教育的目的，学生们应面对现实世界的暗面，培养起对异见的包容，以及在面临刺激、挑战和威胁时勇于维护自己的思维和应对能力。



P28

封面故事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杨绛 (1911 ~ 2016)

- 34 家庭与学校：江南才女的成长
- 42 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牛津往事
- 48 归国之后：现实与选择
- 54 杨绛在“文革”：我的堂吉诃德
- 60 用最难的学问忘却最深的痛苦
- 68 凭理智来领会世界



P84 时事：血检女王：从传奇到骗局

社会

- 时事：奥巴马访广岛，何以起风波？ 78
 时事：血检女王：从传奇到骗局 84
 热点：“减招”风波与教育公平 94
 调查：陈满冤案：稻草叠加的力量 98
 调查：山西少年的非正常死亡 108

经济

- 市场分析：明星股东们的造富运动 74
 收藏：寻常大院内的中国美术传奇 114
 商业：德国宝沃演绎“老兵归来” 118

文化

- 话题：《破产姐妹》以及年轻人的成功 122
 戏剧：戏剧人赵立新：演员中的知识分子 124
 专访：塔霍：“哥德堡”和人生的变奏曲 129
 电影：“我们对历史说实话，就是对现在说实话” 132
 建筑：威尼斯现场：从预制到VR全息设计，具有民主品质的建筑？ 136
 设计：死亡之衣 142
 时尚：时间的针脚 146

- 科学：波特祖母的生物钟 154
 书评：埃博拉病毒：无情的生命“黑板擦” 162
 书与人：《素食主义者》：在布克奖中胜出的韩国文学 164

专栏

- 苗千：穿越微观与宏观的光 158
 张斌：软实力的硬博弈 160
 宋晓军：奥巴马的“亚洲行”是一笔战略遗产 161
 朱伟：刘心武：更自由扇动文学的翅膀⁽⁴⁾ 166

(本期封面图片：选自《我们仨》)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19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0
天下	10	好东西	24
理财与消费	16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18		

2016年第23期，总第889期，2016年6月6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翔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晴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龚融 Gong Rong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a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美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阿润 A Run 邢宇 Xing Yu 孟佳 Meng Jia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尤帆 You Fan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 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楼兰
- 3 · 一汽大众
- 41 · 必益教育
- 67 · 智联招聘
- 73 · WWF
- 113 · 周刊征订
- 120~121 · 野生救援
- 157 · 书店广告
- 封三 · 力度形象
- 封底 · 斯沃琪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网红，泡沫之巅

热闹了好一阵子的网红，已经上升到“网红经济”的高度，研讨不断。但直到今天，通过这期杂志才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虽然有投资人指出，美国90%的网红都不赚钱，风投赌的更多是媒体形式转变的趋势和方向，还没上升到有明确的商业价值判断，但我相信，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平台和电子商务市场、有着最大的人口基数和最爱模仿跟风的我们这里，事情就会起变化。目前投资人看中的是，网红带来流量，流量带来变现，这真是一个好生意，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会有人大赚其钱。不过，隐隐的，似乎也觉得这模式的高潮差不多也就如此了，前路究竟能走多远，还看不清。

上海 樊清远

规划专家的尴尬

到上海某名牌高校培训期间，一位规划专家讲到他参加过很多城市的总体规划评审，但多数情况下无法表态，只是“原则肯定，细节建议，拿包走人”。对此，专家解释道：“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但眼下的城市规划，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地行政长官，他们定的主调，任何专家是没法更改的。只是，规划正式付诸实施前，怕难以服众，总要变着法子拉大旗充虎皮。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只能给人当幌子用。”

令专家们尴尬的不光是他们拿出违心的评审意见，更多的是这些总体规划实施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来自民间的诘问声。在笔者所在的城市，不到20年的时间，城市三任领导各自做出三轮大的总体规划修编，编制单位均来自国家几家顶级设计院。前来做详细规划图的，却是些参加工作不久的见习生。每天，见习生们忙着应付各级领导，到实地查勘的时间极短，更谈不上到民间收集意见。评审会上，他们拿出的“权威方案”，基本上与领导专家的构思“不谋而合”，自然会“顺利通过”。即使是这些没多少实践经验的见习生，也看得出城市问题所在，明白正确的方案该怎么做，但和专家一样，他们没有表态权。之所以选他们来做规划，主要原因是“听话”。专家还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案例：某大型设计院中标一家城市的总体规划，由于没按地方领导意图行事，被几次推倒重来。院领导又过于坚持原则，结果几位专家辛苦一年多，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讨不到。最后被迫打官司，胜诉之后仍没拿到钱。

在一些地方，为了彰显地方政府的权威，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通过评审后，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将

修编后的成果确定下来，规定继任者不得随意更改。但这些没经科学论证的规划，本身漏洞百出，难以经受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遭到淘汰，是自然而然的事。所谓法律的权威，更是沦为一大笑柄。

对朝令夕改的规划，老百姓形容它们是“鬼话”。“鬼话”又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始作俑者并不傻，也非不尊重专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很多时候，为追求GDP的增长，城区的工业园肆意扩张，只要投资商看中的土地，常常不顾百姓利益，不惜牺牲环境，随意修改规划给予满足。

城市总体规划事关一个地方的百年大计，是一个地方最长远的核心利益所在，一旦出现失误，其直接和间接损失难以估量。城市规划专家们面临的尴尬，其实也是评审体制的尴尬。专家的遭遇告诉我们：一方面，城市规划立法势在必行，但不能停留在表面，而必须对不合理规划的制定者进行追责问责；另一方面，制定规划之时，要让专家真正拥有话语权，要倡导全民参与，引进社会监督，确保方案尽可能科学合理，减少人为失误。

湖南 一读者

大数据时代的就业率

朋友小浦打来电话，让我和她去参加就业培训会，想来周末也无事，就痛快地答应了。老实说我是有工作的，但这种单纯“凑人数”的培训会，跟着小浦同学已经参加了很多次，有职业技能类的、心理素质类的、创业培训类的，老师的质量参差不齐，甚至还动员大家去卖保健品，不过大部分还是拍几张照片就草草了事，大家都明白这是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培训会必须凑够人数，在场的没有谁真正要找工作，基本都是来帮朋友完成人数“指标”。这样的培训对于满足老

百姓实际就业需要，我觉得效果实在是不会太差。

小浦负责一个辖区的失业再就业工作，每月主要的职责就是报表，汇报辖区内的失业人数、就业人数等等，听上去像是个轻松的活，可做起来却难上加难，没有点造假技术和动员能力绝对无法胜任。首先是要完成领导分配的失业指标，为下一步工作做好铺垫。学生时代我就一直纳闷，电视上播出的失业率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如果离职，企业出于各方面考虑，即使是裁员也都会让我们以“个人原因”、“家庭原因”提出离职申请，这种辞职方式是一分钱失业金也领不到的，就没必要去劳动局登记，更没人知道我们是否失业。那失业数据从何而来呢？原来小浦每月都要上报失业人数、失业家庭的相关信息，而且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她要权衡领导的要求，根据自己辖区的人口数量还有过往数据，有针对性地“精准”造假，许多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失业”了，用来给党和国家制定各项政策，提供重要依据的“大数据”，就是这么个前世今生。

再有就是如何达到“就业率”，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对大学生的就业情况非常重视，可那些毕业的大学生什么时候就业，有没有就业，就业后又工作了多久，是很难及时掌握有效信息的。这样，小浦又要联系我们辖区内的大学生，先想办法让他们先“失业”，然后再拿着每个人

的信息表，求商家在表上盖章，表示此大学生已经在我们这上班了，这就是“被就业”，辛苦一番总算完成上级领导分配的就业指标，又要为下个月任务量战战兢兢地发愁。更逗的是，目前国家正在红红火火地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辖区“大学生创业情况”又成为了一项新的考核指标，不过任务量重于泰山，真实性轻于鸿毛。小浦的任务是60人……

说句实在话，我认为国家为了老百姓能有个事做、有点活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是许多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我们每个街道、每个社区都有专门负责失业、就业管理工作的人员。可不知为什么，许多良好的初衷一到基层，就变了样子，充斥着难以完成的任务、空中楼阁的指标，最后大家也只能依靠造假来蒙混过关。打开电视，上面公布了上个季度我省喜人的就业情况，又有好多大学生通过创业，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仔细想想，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今天在熔炉里炼的是我们的“数据”和良心。

沈阳 续言

“刷”还是不“刷”？

朋友最近很烦心。儿子所在的小学组织开展了一次家庭作业评优活动，儿子在作业上花了很大的工夫，自然希望得到好成绩。朋友一边鼓励儿子，一边也摩拳擦

掌，准备给儿子的作品投上几票。但足以让朋友尖叫的是，投票页面刚一开放，有些作品的票数就直线上升，是其他作品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情急之下，朋友赶紧发动亲朋好友投票，但是效果甚微。有人告诉他，那些高票其实并不是正常的投票，而是有专门的人在搞“刷票”，如果要想拿到好成绩，光靠自己发动投票那简直就是沧海一粟，必须得找人来“刷”。

既然如此，那就刷！朋友想，一方面可以帮助儿子的作品从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给儿子一个满意的答卷，鼓励儿子再接再厉；另一方面也尽一份当父亲的责任，再次赢得儿子的信任。当然，刷票需要花些钱。但是，想到为了儿子的荣誉和勇气，即便是花点钱也应该，在孩子的自己身上特别是教育上投资历来都是花钱的重点。可就在朋友打算联系刷票的时候，他又有些反悔：如果真的找人刷了个“第一名”，那有实质的意义吗？儿子会因此而信心倍增地学习吗？会觉得骄傲吗？

不一定啊，甚至恰恰适得其反。至此，朋友真正陷入两难境地，刷票不好，不刷票也不好，不知所措，甚至怕看见儿子，唯有心烦意乱。其实，类似的事情还真不少。在微信群，时不时会有朋友发来拉票信息，不是为上幼儿园的孩子投票，就是为上

小学的孩子投票，或者是社会上的种种评选，总之，现今的刷票实在是太多了。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上投票已成为一种潮流，网络投票有着受众面广、影响力大等诸多特点，已成为评选优秀等工作的主流平台。但网络投票有其适用性和自身的缺陷，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中，如果简单粗放地采用大众网络投票的方式，不仅不能评选出真正的优秀者和优秀作品，还会让刷票等造假行为和虚荣心过早地污染校园这片净土，既背离了评选的初衷，还违背了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

因此，即使需要利用网络平台投票，首先也要划定投票范围。校园投票最好是以学生、老师为主要对象，让最熟悉情况的师生投上富有含金量的一票。不要为了扩大影响力而轻易将其拓展至校园外，将校园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加入进来，甚至连毫不相关的陌生者也带着明确目的来进行简单投票，毫不知情、毫不负责的投票没有实质意义。其次，得把控过程。网络投票的好处是受众面广，但弊端就是容易引发刷票的造假行为。在设计之初，就应当限定每人每天每账号的投票量，取消恶意刷票者的参与资格，以此来避免水军作乱。

重庆 李利利



印度尼西亚 | 泥石流

2006年5月，印度尼西亚东部爪哇岛 Sidoarjo 地区由于一座石油天然气矿井爆发，其喷射的泥浆淹没了该岛上的一个村庄。图为2016年5月27日，幸存者聚在一起纪念该事件发生10周年。





法国 | 黑皮肤莎拉

(右图) 5月24日, 在法国阿尔勒附近的海滨圣玛丽小镇 (Saintes Maries de la Mer), 一名在镇中心“圣玛丽”教堂参加完仪式的吉卜赛女子手持保护神“黑皮肤莎拉”(Sara the Black) 的雕像在海边参加游行。每年5月下旬, 法国各地吉卜赛人聚集此地, 朝圣他们的保护神“黑皮肤莎拉”。根据传说, 莎拉跟耶稣门徒抹大拉的马利亚 (Mary Magdalene)、莎乐美马利亚 (Mary Salome) 和雅各马利亚 (Mary Jacobe), 在耶稣死后一起从埃及坐船到了今天的海滨圣玛丽, 莎拉是雅各马利亚的黑皮肤仆人。



苏格兰 | 摩托车集会

(左页上图) 5月27日, 摩托车爱好者聚集在苏格兰凯尔索参加摩托车集会。这场苏格兰全国摩托车集会吸引了苏格兰各地数百名摩托车爱好者参加。

印度 | 自卫训练

(左页下图) 5月26日, 印度诺伊达, 印度青年民兵在萨拉丝瓦帝庙儿童学校里参加自卫训练。





英国 | 布里斯托尔老域剧团

(左图) 5月25日, 英国布里斯托尔老域剧团 (Bristol Old Vic) 的一名女演员在化妆, 准备参加布里斯托尔老域剧团建团250周年纪念演出活动。

英国 | 水管工

(下图) 5月25日, 一名水管工在伦敦东区下水道内的工作照。19世纪60年代, 工程师巴扎尔加提爵士 (Sir Joseph Bazalgette) 在伦敦主持修成了纵横1000英里 (约1610公里) 的下水道网络。伦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完善下水道排污系统的城市。





栏目插图 | 范薇

官员落马房价涨

二线城市成为楼市上涨主力。安信证券做了个有趣的统计，全国32个二线城市，11个有相关领导落马的城市去年全年的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了38%。相较而言，没有主要领导落马的城市土地购置面积增长了1%。以房价观察，到今年4月，有相关领导落马城市的房价平均同比涨幅6.3%，其他21个城市房价平均同比涨幅4.5%。安信证券由此得出结论，反腐对阶段性土地供应的抑制是比较明显，且抑制期大约在4~6个季度。

黄金西运

自5月中旬，黄金不再闪光，从1270/盎司美元上方一路承压，连跌5日后，5月24日已跌至1220美元/盎司一线。美国4月新屋销售数据大幅向好，经济状况的改善，美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7月加息的概率为58%，9月加息的概率为68%，12月加息的概率为82%。此前，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不信任使黄金经历了一场西运“运动”，瑞士在4月出口了147.8吨黄金，约75吨都被卖到了英国。如今，预期逆转，黄金的支撑因素暂时消失。

印度制造

莫迪执政两年，印度制造业仍面临挑战。这里的工业区，三层的建筑中，大多数企业只占一层，机械设备也不多，许多设备都是转了好几手买来的，只能半自动或手工操作，为数寥寥的高科技自动化机械通常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翻新过的二手货。印度政府一直害怕让私营部门发展壮大，经过政府几十年的管制，印度根本不存在规模经济。当印度铁道部不久前重新授予私营部门制造机车的合同时，受益的是外国公司，印度本土的公共部门企业集团毫无竞争力。





重金砸首刷

信用卡用户争夺越来越简单粗暴，新发行的信用卡的首刷礼大多在 50 元以上。建行中国好声音联名信用卡，首刷获赠明星学员原唱 CD 及亲笔签名照片，高人气选手的签名和 CD 市场价上千元。光大和中信与京东的联名信用卡，首刷获 50 元等值积分，中行多种信用卡终身免年费，并获价值在百元以上礼品。不过首刷返奖的高额度催生了一批专业办卡户，网上“零成本”申请，月入近万元。

原来亏了 23%

因理财资金无需偿还、滚动发行，救市浮亏的证金公司正在调整负债结构，截至 2016 年一季度，对接证金公司的理财资金余额约 4600 亿元。理财成本年息 2.5%，意味着中短期内证金无减持压力。据招商证券测算，证金救市持仓现价整体浮亏 23%，其中，建筑业、农林牧渔、科研三个行业整体浮亏程度最高，超过 35%，房地产、金融、批发零售板块的浮亏相对较小。银行股中浦发、北京、南京、招行、兴业已实现浮盈。预计证金面向“高股息+低估值”的仓位调整仍将继续。

金融周期下半场

2012 年，政府的刺激措施还能使 GDP 提升 0.6 个百分点，2013 年提升 0.4 个百分点，2014 年 0.1 个百分点，2015 年至今几乎无效。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新常态”，而刺激措施的效果却越来越弱，多家投行总结：这是金融周期下半场的典型表现。对比海外如日本，在金融周期见顶之前经历的一个繁荣时段，年均经济增速为 6.7%，持续时间达 4 年（1987 ~ 1990），金融周期见顶后经历的一个复苏时期年均经济增速只有 1.8%，持续时间也缩短至 3 年（1995 ~ 1997）。

“别让华为跑了”

高房价如同征税。中国企业家中领袖级人物任正非表达了对深圳房价的忧虑后，一篇《别让华为跑了》的文章刷遍朋友圈。根据公开信息，华为已经开始从深圳的龙岗向东莞迁移了部分业务，2015 年华为终端（东莞）已成为东莞营收和纳税第一大户。深圳不能没有华为，今年 1 ~ 2 月，华为产值占龙岗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47% 以上，并且产值增速将近 40%，比全区水平高出将近 25 个百分点，若剔除华为，龙岗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则下降 14.3%。





远古少晴天

以欧洲核子研究组织为首的科学家日前在《自然》和《科学》两大期刊上发表论文指出，前工业革命时代的天空可能远远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万里无云，而是经常会被乌云所笼罩。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家直到最近才发现，树木释放出的某些特殊化学成分能够促使云团形成，其造云能力并不在火山喷发及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硫酸蒸汽之下。这意味着当前的气象预测结果很可能低估了前工业时代云层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对全球变暖的趋势也应重新考量。

好消息

性福密码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小组调查了 278 对新婚夫妇后发现，妻子的性格越是外向友善，夫妻间性生活的频率就越高，双方对婚姻关系也更满意。与之相对应，虽然通常认为男性是采取主动的一方，但丈夫的个性却对性生活频率没有影响。



忘名之交

你身边是否有一个总叫错你名字的亲友？别太介意，这并不意味他们在他们心里没有一席之地。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记错名字的情况在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中最常见，而从叫错的名字中，甚至可以推测出别人将你归为哪一类人。



坏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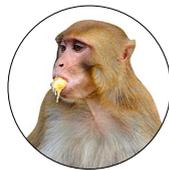
缺觉与抑郁

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小组在《睡眠医学》杂志上发出警告，即便是身体健康的年轻女性，如果因为经常熬夜而睡眠不足的话，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风险也会显著增加，并会变得更难获得愉悦感。而焦虑和抑郁也会反过来增加入睡难度。



爱之反害之

别在动物园里喂猴子了！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调查了摩洛哥国家公园中的两群野生猕猴后发现，那些接受游客喂食的猕猴同自然觅食的猕猴相比，更易脱毛变秃，体内应激激素水平更高，也更容易感染各种疾病。



一个人的灵魂中如果活跃着传统，他就有力量对抗转瞬即逝的东西，而只有智者才能单纯依靠自己去获得这种力量。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

今天，冰岛的人均书籍出版量居于全球各国之首。有些心理学家相信，在困难时期，文学以及其他文化资源能为人提供缓冲，带来慰藉。文学故事是抒发悲伤情绪的一种媒介，而悲伤情绪通过这种途径可得到化解。冰岛人当然认识到书面文字的价值，这也反映在一句冰岛俗语中：“赤脚走总比没有书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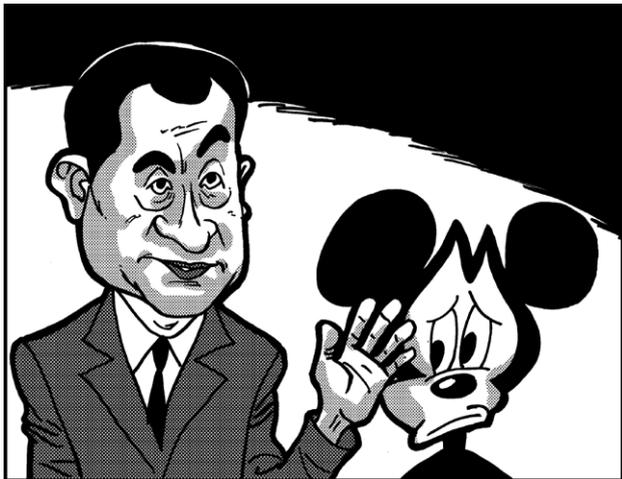
——埃里克·魏纳，《冰岛人幸福的真谛》

愚蠢的一致成了出没在小人物心头的鬼怪，受到小政客、小哲人、小教士的顶礼膜拜。如果强求一致，一个伟大的灵魂也会毫无作为。

——爱默生

我期待教学相长，并希望分享我与政府以及联合国一起工作的经验。

——安吉丽娜·朱莉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客座教授，为该校关于“妇女、和平和安全”的一个硕士课程授课



(插图 山羊胡)



单靠回忆生活，这不是人性的特点。就像各式各样的植物和任何一种生物，都需要土地的滋养和天上的光芒一再重新过滤，色泽才不至于消退，花萼才不至于凋零脱落，所以，即便是梦幻，这些看上去似乎超凡脱俗的梦幻，也需要某种感性的养料，需要娇嫩形象的辅助，否则，它们的血液就会凝结成块，它们的光泽就会黯淡。

——茨威格，《昨日之旅》



数字

2.2
万美元

据了解奥巴马总统计划的人说，他打算明年1月离任后和家人搬到华盛顿高档社区卡洛拉马的一个宅邸，知情人说，他将租下这个占地约762平方米、有9个卧室的房子。这座房子大约价值600万美元，月租金约2.2万美元。

27
公斤

中国每年的人均肉类消费达62公斤，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将其限制在27公斤左右。牛津大学学者马尔科·施普林曼指出，如果中国到2050年将人均每天红肉摄入量减少100克，就能将与食物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0亿吨以上。

6440
公里

Facebook、微软宣布将联合建设横跨大西洋的海底光缆，该联合项目名为Marea，线路从美国弗吉尼亚州到西班牙，全长约6440公里，共有八对光缆。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跨越大西洋容量最高的光缆。Facebook和微软的联合声明称，新光缆将有助于降低成本，加快带宽提升速度。

白姐

文 / 哲人二

图 / 谢驭飞



那时候的天空还是瓦蓝，水也清绿，能看得见对面远山的青黛；油菜花还不仅是一种观赏植物，田间也还有奔忙的蜜蜂和扑翅的蝴蝶。15岁那年的华子嘴里咬着一根草梗坐在池塘口那块青石上，从塘埂那头小步而来，束两条刷把辫、着一袭碎花布衣的白姐第一次出现在华子的视线里。朱唇皓齿埂上行人与螭首蛾眉水中倒影一下子撑开了华子很坚硬的想象力，素素净净的像极了他家院子里那株茉莉。待白姐的身影下了塘埂转过村口，坐在华子身边那条名叫“大腕”的黑狗吐着猩红的舌头，一直望着渐渐远去的背影居然一声未吭，很像突然莫名长长叹息一声的他自己。3个月后，华子和白姐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当他的目光尾随着白姐的时候，15岁少年的眸光如水心净如脂，浑不似20年后的现在，看人的目光里夹带着邪恶，如同白骨精眼中的唐三藏，转着心思琢磨如何烹饪这道长生不老菜。20年后的往事再回溯，其实我很明白那种初见的心态，尽管初次邂逅而感觉却是阔别经年，既有隔世的熟悉也有陌生。只是当时年纪过小，无法组织语言予以恰当的描述，只能化着一声落地无声的叹息。好在15岁的华子不是一个早熟的少年，否则的话，到了后来难免会苦涩盈腮。浓香溢齿般的情感世界向来不是青少年能够昂首挺胸轻易地走进去的。

不过，在我弄清楚白姐为什么被人称作白姐

的时候，那已经是学期过半。她家离我家并不远，只是人长得白净，打小便被街坊叫作白妮，甚至白妮都不是她的乳名。那些和她年纪不相上下的孩子便喊她白姐，“白姐”渐成其标签。白姐的表现一直很娴静，身上散着一种属于书卷气息的味道，再过了一年，与那些活力四射的女同学一起出现的场合，有神无形的墨香与脂粉气息糅合在一起，对于一些男生来说，便形成一种颇具冲击力的精神诱惑。诗歌与远方田野的机弦被青春期的躁动所触发，那是个诗歌时代，许多男孩子的忧郁有如夜色下的薄雾带着些许淡淡的缠绵。

在最后的关键那一学年白姐转校了。直到华子陆陆续续把当年一些伙伴的联系方式收集起来的时候，她在另外一个城市已经生活了20多年。就在那一年她生日的那天，华子过来要求我编辑祝福短信，于是我就说其实一直不喜欢上天总是以成长之名把我们的人生划分为多个年龄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不管经历了的那些幼稚还是成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样深怀感激，父母、亲朋、同事和同学，他们谁都不是我们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感恩有你，几十年的岁月里从未离弃。白姐很快回复说太假。在后来断断续续的联系中，她说当年初见时的我并不讨喜，好看的男孩总是集众人喜爱于一身让她深觉烦厌。我和白姐一直未相见，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相互不打扰便是最大的祝福。☑

慢驶

文 / 朱艺先

图 / 谢驭飞



从香港旅行回来后，Z说她印象最深的东西就是大街小巷满眼的繁体字。其他的所见所闻虽各有各的趣味，但似乎都远不如那些花花绿绿的字眼来得突出、鲜活、难以忘怀。我之所以相信她此言不假，是因为我发现在她洗出来的照片里确实没见着几张高楼大厦和高山流水，而小商铺的招牌、细黑边纯白底的路标、地铁里彩色马赛克墙上的站名倒是占了大半。我微皱着眉，一张张地翻看着Z这些只见其字不见其景的相片，Z则在一旁一脸满足地跟我乐此不疲地解释着这是在尖沙咀的哪个路口拍的、那是在金钟的哪个角落照的——此时此刻，她的表情看上去甚至比她讲翠华餐厅咖喱牛腩饭和澳大利亚牛奶公司炒蛋多士的时候还要享受得多。“‘慢驶’，尤其是‘慢驶’。”她说，“到处都是‘慢驶’这两个繁体字。”

“慢驶”这两个字，其实也就“驶”字有繁体的版本罢了，不过看她那么饶有兴味，我就没纠正她的口误。Z说，有天傍晚她正沿着太平山的步道散着步，眼前忽地现出了一片海市蜃楼般的苍茫景象，愣了好几秒之后，她才恍然意识到那其实是远方浩渺的海面，内心骤然间就涌出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之感，不禁哀起时光须臾、羨起海之无穷来。“但我一低头，

一下子就看到了下面一条环山路上印着的‘慢驶’两个字，有辆红色的士又恰好开了过去——你绝对想不到我当时是什么心情，我当时顿时就又安心了。”

我确实想象不到Z的心情，我只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耐心地听她又讲了好几个跟字啊词啊有关的小故事。趁她喝水的时候，我见缝插针地笑她真是严重缺乏务实意识，大老远跑到香港去竟然不专心购物，反倒把一堆没用的字儿当作纪念品拍了回来。对于我的这种论调，Z摆出的自然是一副颇不以为然的清高姿态。很显然，在她的眼里，这些随处可见的繁体字才是“东方之珠”最吸引她的地方。为了不伤和气，我便赶紧知趣地不再废话，任双方继续各执己见。其实，鉴于Z的作风向来有些老派，再加之以前在大学里读的又是中文系，所以她对字词之事怀抱着如此超于常人的敏感度倒也不足为奇了。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Z也承认她自己对繁体字的感情多多少少带着些叶公好龙的意味。“为什么这么说？”我问她。她一边整理着照片，一边告诉我，虽然她确实觉得繁体字看着更有气质，但如果真要让她拿笔写，她也有点嫌麻烦。“繁体字里面，我也就自己的名字写得溜。”Z一脸诚恳地说。■

小霸王

文 / 照日格图

图 / 谢驭飞



“小霸王”者，是在26岁狩猎时被刺客杀害的江东孙策，还是在桃花庄里因为刘太公的女儿被鲁智深强行“大保健”的周通？非也。是“它”，一款插卡式的游戏机。

玩iPad长大的小屁孩不会知道因为长期按游戏手柄上标着“A”的圆形键而形成茧子的右手大拇指是什么样；也不可能知道为了找《魂斗罗》传说中的水下关卡，一次次跳进水里牺牲的英勇精神是什么样；更不会知道有一种纯洁的友谊叫作“交换游戏卡”、那些20合1以上的卡会遭受多少群众雪白的眼睛。

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拥有“小霸王”。小镇“立新商店”对面那家没挂店名的小卖店里才有。玩一个小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你过生日。平时消费5毛，玩15分钟，然后顶着烈日一路小跑去学校。路上反复琢磨“街头霸王”四大高手的招数要怎么按才能保证百分百有效，商店老板如他家油条一样干瘪的儿子说的“憋”3秒，到底是多么痛的领悟。那胖子最无情，当我玩得尽兴时一句“时间到”便直接拔了游戏卡，电视屏幕上立马就出现了跳动的雪花，所有的成绩都功亏一篑。带同学去玩一款叫《雪人兄弟》的打雪球游戏，那时都快四年级结束了。我们实行了镇上最早的AA制，再热也不吃冰棍，再迟到也要玩上半个小时。比起游戏世界里的风生水起，现实里面对高年级的同学俯首献媚的苟

且就根本不值得一提。老师和好多同学都不知道，我们才是真正的霸王。

我的“小霸王”来得比青春痘和姗拉娜还要晚一些。初二那年，我打着学习五笔输入法的幌子从H市买到了标有一对拳击手套的“小霸王”，一天打游戏的纪录是18个小时。晚上等卧室里的爸妈睡了，把电视调成静音还可以玩一阵子。看着黑白电视上跳跃的那些小人，我和弟弟的世界立马就成了彩色的，真正黑白的是窗外的世界。叔叔家的两个儿子住“大城市”，到了暑假就想办法来跟我们一起走几个通关。通了关，还要比谁的耗时最少。家长也非素食主义，看出了所谓的学习机不过是升级版的游戏机而已，游戏卡都没来得及升级，依然是黄色的四方形。父母经常以游戏机插头烧坏了为由来给我们挖坑。谢天谢地，东北的冬天零下40摄氏度左右，我们拿着游戏机的插头跑出去往雪地上一扔，5分钟后拿进来继续。论英雄何须青梅煮酒，一个方向键和四个功能键便已足够。

近日见某青年，玩《逃离古庙》堪称高手。有一次递手机给我，曰，好汉不提当年勇。秒杀了简单的操作，我便如履平地，直至其手机没电。他向我行注目礼。我把他手机一扔，嘴里一声闷笑：不知道“小霸王”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对于打过《魂斗罗》通关的人，没有跑酷不是游戏。你们才是真正的1.0。☑

端盘子与赶名利场

文 / 南城织子

图 / 谢驭飞



最近我意识到了自己已升级为身在城乡结合部、心在巴黎时装周这类人的 2.0。具体事由如下：窗外，我的目光所及之处有一大片用来种植葡萄的果园，果园中央有座类似古堡的顶部为锯齿状的建筑。黎明之前，橙红色的云彩会以这排锯齿为起点，像红毯那样铺展开来，此时的棕榈叶会在尚待苏醒的、清幽的地中海海风中轻摇慢曳。每见如此景致，我都觉得我这儿比几百公里外的戛纳好看。

我这儿和戛纳都在南边，也就是法国人恨不得要将一年四分之一的“浪费”掉的那个去处，来这儿拍照的游客不是爱穿就是爱看比基尼。本乡和戛纳按面积来算都是镇，还同属一个气候区，可因为一个有几部电影，一个对艺术不来电，在全世界人民那儿受到的凉热就全然不同了。

至于我为什么说我这儿比戛纳好看，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可是一点儿也不沾。首先，我这儿的葡萄很是甘甜；再者，我这儿海边是大片大片的民居，生活气息浓厚，戛纳那儿是大片大片的酒店和商店，女人们的优雅都经过了拿捏。我这儿的美就好比未施粉黛的少女在咀嚼鲜嫩草莓，而戛纳之色就好比恐惧青春流逝的女人为了挽留一点儿鲜嫩而吮吸胶原蛋白口服液。

当然，有一点属酸葡萄心理的是，在戛纳红毯上追求拿捏得当的女人们是不用担心胶原蛋白价格的，她们永远都是全世界最新保养美容产品及技术的首批拥趸。地球在她们眼里就是一个村

儿，昨天在伦敦、今天待巴黎、明天去米兰、后天战纽约，走到哪儿秀到哪儿，买张头等舱机票就像敷张面膜般轻松上瘾。她们穿行于名利场，场外一路过关斩将，挤了进去，从此捂住虱子，身披华袍。

然而像我这样的穿着餐馆工作服的勤工俭学的姑娘们就不同了。我们的脸色时常惨淡、暗黄；餐馆生意好的时候，我们的脚底可能红紫、冒泡，或者变得硬邦邦的缺乏弹性；我们端一个小时的盘子才挣得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薪水。可是呢，尽管隔行如隔山，福利各自有，痛楚却总有相似。观众和媒体是她们的衣食父母，她们着华服、踩高跟，华服可能勒住她们本就纤细的腰，高跟则可能让她们当众滑倒；面对陌生人的目光，她们照样要打起 120 分精神来，就像餐馆服务员要牢记民以食为天，食客是驾临餐馆的上帝一样。她们卸了妆后，面色好看的概率也不大，因为作息安排同样不由自己。更重要的共同点是，她们买一张面膜时的心情可能与我们这些妞儿的一样：花一个小时的薪水，滋养一日的疲惫。端盘子和赶名利场，在这个事上，就像米饭和面食，都是用来充饥果腹的。说到这里，我嗅到了从体内散发出来的阿 Q 之气。☑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陪伴自行车

Infento Rides 是一款积木式组装自行车，散装的零件主要由铝合金组件和六角螺丝组成。它允许父母和孩子自由装卸单车上所有组件，并根据孩童的不同年龄段进行调整，不仅帮助开发儿童智力，也为家长省了不断更换装备的大笔开销。



爱老机器人

SILBOT 是一款概念性家用机器人，专用于帮助治疗痴呆老人。安装在机器人身上的摄像头和传感器与用户佩戴的智能手环相连接，通过感知患者的表情、动作及脉搏跳动等指标判断患者当下的情绪及身体状况，以此做出相应的情感回应和急救措施。



彩色便携音响

一向以小清新形象示人的 B&O PLAY Beolit 15 便携音箱带来了全新酷炫外观的黑色款，在它精巧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台动力强劲的发声机器。它配备蓝牙技术、True360 全方位声音解决方案，及长久的电池续航能力。



重力筷子

这款重力筷子 (Gravity Chopsticks), 头部采用木质 (天然木或胡桃木), 尾部则是铝制材料。由于铝的质量大于木头质量使得筷子尾端自然贴合桌面, 而筷子头部轻轻翘起, 这样就避免了没有筷架时造成的卫生隐患。



拯救“剁手党”的手环

这款来自 Intelligent Environments 公司的智能手环, 会在其配套的 APP 应用中与用户银行账户进行绑定, 以此对每笔支出进行智能检测。当用户的消费超出预设金额时, 它会以电击的方式进行惩戒和提醒。



实时翻译智能耳机

对于出国旅行的朋友来说, 一款兼具实时语音翻译的智能耳机将会成为行囊必备。Waverly Labs 公司新推出的一款名为 Pilot 的智能耳机能够实现多语种即时在线翻译, 为用户带来了极大便利。



能感知体温的透明眼镜

意大利设计师马泰奥·阿加特 (Matteo Agati) 的最新作品 HyperEthereal 是一款具有魔术效果的眼镜, 在佩戴数秒之后, 镜框便会在人脸上神奇消失。据悉, 镜框采用了前沿的聚碳酸酯材料制成。这种新型合成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热性, 能够在与皮肤接触 (如鼻梁位置) 的刹那间感知体表温度从而升温直至变成透明。

秘密与光线

Piaget “秘密与光线”系列中的白金手镯，祖母绿、蓝宝石、钻石和羽毛构成一个放射状的神秘图案，整个系列是对威尼斯和撒马尔罕等美丽历史名城的重新想象。



瓷质吊灯

Seletti 品牌的 Moresque 吊灯，独特之处在于灯体以精美的瓷器制作，表面装饰不同的色彩和图案，在任何家居环境中都是引人注目的存在。

蓝色铁丝

轻盈美丽的 Reginald 铁丝咖啡桌，镀蓝色环氧树脂的铁丝编织出一件使用方便的家具，形式与功能获得良好的结合。



曲线休闲椅

Hay 品牌的 Palissade 电镀钢板休闲椅属于室外家具，形式古典而且结构简单，椅面的曲线有着细微的变化，以保持身体的完美平衡。



珐琅彩绘

Chanel Mademoiselle Prive 珐琅彩绘腕表，37 毫米表壳搭配密集镶嵌的钻石，大明火制作的表盘图案来自香奈儿女士珍藏的乌木中国屏风。



彩印威尼斯

Dolce & Gabbana 品牌的 Mix Sicily 印花包袋用意大利的小牛皮制作，如同一幅充满夏日色彩的绘画，包袋上细致地彩印了威尼斯标志性的拱桥、运河和刚朵拉图案。

声音系统

Geneva 无线 L 型号“声音系统”播放器结构紧凑，实木上漆外壳中容纳了一对高音和低音扬声器，兼容电脑、平板和智能手机等蓝牙无线流媒体的全部音频。





(张艺兵摄)

杨绛 (摄于2005年)

杨绛

(1911 ~ 2016)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文 / 曾焱

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在杨绛先生的一生中，这样的设问她曾不止一次面对，并且也给了自己的回答。

死亡和灵魂的对话

1993年12月，杨绛助钱锺书选定《槐聚诗存》，埋首书房一个多月为他誊清了书稿。她在自己的“生平及创作大事记中”对此事有几句简单记述，写得淡淡，现在读来却让人感触：“我抄诗错字百出，锺书皆未校出。我二人皆老且病矣。”日期是1994年1月，杨绛第一次在记事中提及书斋之外现实衰老的逼近。

1994年杨绛83岁。自那以后，她开始不断面对身边亲人的生死病痛。两年间，她三姐闰康和大姐寿康先后去世。钱锺书因肺炎入院，之后一直卧床，再没有回到他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1995年冬，对两位老人最残酷最沉重的打击袭来：一向对父母照顾周全的女儿钱瑗突然病倒，查出是肺癌转脊椎癌，已经晚期。

钱锺书住院在南城，钱瑗在西山脚下。三人分居三处，杨绛独自牵挂照顾着两个病人，奔波于北京城的这条漫长对角线上。钱瑗病中，她每天为父女传话，将女儿写的文章读给钱锺书听。钱瑗去了以后，她在悲痛中还要设法向钱锺书隐瞒，装作女儿安好，这样支撑了四个月，才对钱锺书说了实话。

在我们采访中，熟悉杨绛先生的人对她最深的印象都是，先生任何时候见到都含蓄节制，举止拿捏恰到好处，从不示人以心绪不好的一面。但是得到钱瑗病危消息的那天，朋友吴学昭记述：“伟成等一群人走后，当时家中只杨绛一人。她与叶大姐通电话时失声痛哭。”

1997年早春，钱瑗去。1998年岁末，钱锺书去。87岁的杨绛，失去了生命中仅有的两个最亲的人，孤身一人怎么面对人世和死亡？

1999年，在精神和身体最伤痛的日子，她决意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把它作为精神的最后庇护所。这本对话录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饮鸩而死的当日，和他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苏格拉底在饮鸩致死前，对负责处理他丧事

的Crito说，你埋藏的是我的遗体，不是埋苏格拉底。

相信这些文字和思想，给了杨绛以“哲学的慰藉”。年近九旬的老人，用一年时间把这本对话录译完了。她自称不识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钱锺书年轻时候在给杨绛的信中曾说他的愿望：“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实际成为他们一家人的处世准则。他们尽可能远离政治，用无功利追逐的读书来抵挡人世的风风雨雨。现在，杨绛独居于失去人生至爱和陪伴的痛苦中，通过和苏格拉底的“笔谈”，为灵魂找到出口。她没有被悲痛击倒，决意一个人替“我们仨”，继续做做学问的愿望。

自译注《斐多》开始，从87岁到105岁，其他老人安享的晚年，在杨绛就是不停地阅读和工作。她看着瘦弱的身子，却有坚忍耐力，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也未必做到的事情：写出版散文集《从丙午到流亡》（2000）、《我们仨》（2003）、《走到人生边上》（2007），编订8卷本250万字《杨绛文集》（2004），为小说《洗澡》续写了《洗澡之后》（2014）……

杨绛虽然一直谦称，和钱锺书比，她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事实上，她的写作才华和深厚学养早就为学界所识。夏衍就曾跟人说：你们捧锺书，我捧杨绛。

杨绛和钱锺书结婚后，陪伴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后又游学法国巴黎。她没有正式上过学，只在巴黎大学注册过一个学位，想攻读法国文学，却因禀赋深厚，仍在西学体系中得到浸润和训练。1938年回国后，她很快就有了剧作家的成就。1943～1945年蛰居上海做大家族“灶下婢”期间，她挤出时间写来养家糊口的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都被搬上舞台，风靡上海文艺界。50年代她开始翻译巨著《堂吉珂德》，为此从头学习西班牙语；80～90年代出版的小说《洗澡》和散文集《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流传甚广。尤其《洗澡》，



(图片选自《听杨绛谈往事》)



1. 杨绛与钱锺书订婚后在苏州庙堂巷花园同全家合影。中坐者为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菱，后排左起：杨绛、钱锺书、姐夫何德奎（手牵长女笔瑜），三姐闰康、大姐寿康、八妹杨必、七妹杨葵、姐夫孙令衍、小弟保椒

2. 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时的杨绛

3. 小时候的钱瑗

描写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经受第一次思想改造的故事，1988年相继在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繁体版和简体版后，海内外好评鹊起，小说家施蛰存赞其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这样的杨绛先生，是钱锺书先生口中“最才的女”，但她为自己设定的角色首先还是“最贤的妻”。在“五七”干校时期，“文革”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至钱先生1998年去世，我们从各种文字中看到的杨绛先生，永远是那个张开瘦弱双臂，为家人挡住一切侵扰伤害的人。但她并非普通意义上那种家庭的贤内助，而是优美地平行于钱锺书人生坐标的一条辅线，以自己的学养，毕生助其完成煌煌巨学。

在生命最后一程，对她更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帮助三联书店定稿出版《钱锺书集》，另就是整理钱锺书生前的读书笔记和手稿，包括中文笔记、英文笔记和日札。钱锺书认为这些东西“没用了”，但杨绛不这么看，她觉得这些是他一生积累的知识，对其他学者做研究是有用处的，而保存手稿最好的方式是整理出版。

钱锺书的手稿装了几大麻袋，7万多张，多数是字迹已模糊的散页和纸片。杨绛戴镜逐页辨认，再仔细剪贴、分类和梳理，最后交到商务印书馆影印。

日复一日，她不懈不怠地，一个人在书桌前做着

这些繁重的工作，边整理边交出版。2015年底，《钱锺书手稿集》终于全部出齐，其中包括《容安馆札记》3卷，中文笔记20册，外文笔记48册。

钱锺书刚离去的时候，杨绛曾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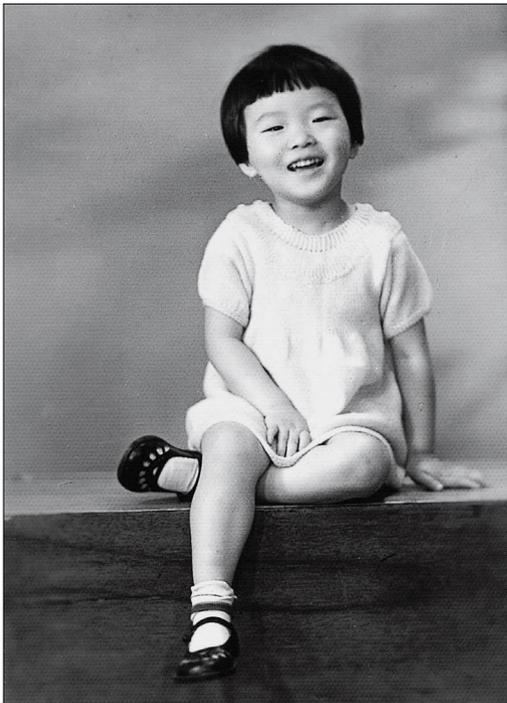
一位和她比较亲近的三联老编辑告诉本刊，2016年5月25日听到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有一种感觉，好像她就是把钱先生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打扫干净了，走了”。

“我们仨”的精神世界

“夜闻风雨声，耳始聋。《我们仨》改定题目，选定段落。”《我们仨》书稿快要完成的2002年8月19日那天，杨绛在大事记里写了这样一句。

2003年7月，SARS刚刚过去，《我们仨》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并立刻成为畅销书和话题书。它被评价为杨绛先生晚年最动人的作品，用平实语言讲述这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从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直到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亲情，让读者泪下，也思考一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图片选自《听杨绛谈往事》）



（图片选自《听杨绛谈往事》）

3

读者希望找到答案：漫长63年，是什么支撑这个家庭在社会巨变和政治动荡中始终保持精神和人格的完整，用读书来抵挡外面的风风雨雨，不被物质现实诱惑和侵扰？这可能也是这本书后来一直畅销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早读到书稿的是当时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她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冬晓”。董秀玉向本刊记者讲过读稿时的复杂感受：

2003年4月，杨先生打电话过来让她去家中取稿，那时距离董秀玉约请她“写写你们仨”已经过去了6年。书稿动笔的时候大约是1996年10月，钱先生和钱瑗都还在病中。最初设想他们仨各写一个章节，写女儿眼里的父母，丈夫眼里的妻子，妻子眼里的丈夫，还有父母心中的女儿。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一直到病重而不能进食才中断，之后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董秀玉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坐在客厅里，董秀玉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到一半，眼泪止不住了。杨先生还像平日一样，在一旁做自己的事情，中间只是偶尔走过来，摸摸她的头。董秀玉问：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先生说，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

《我们仨》（平装本）至今已加印51次，印数达

275万。5月25日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三联书店的库存瞬间售空，又加印56万册。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家的往事，对于读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我们仨》写完，就像杨绛当年在记事中所写，她日渐失去了正常听力。那以后的十来年，朋友们、编辑们再去看她，陪她说笑，就需要借助一点笔谈了。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记得，他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春节前或杨先生过生日会问候老人家，有时也跟编辑一起去家中拜访。知道先生听力不好，他会事先准备一叠卡片，把想问的事或想说的话写下来，见到杨先生，再一张一张拿给她看。

三里河的这套寓所是上世纪70年代末搬进去的，房间虽宽敞，却简单。后来小区由公家负责装修房屋，为每家阳台做封闭，杨先生却要求例外。她保留着水泥地、白粉墙、老家具，陈设不做一点改变。老朋友吴学昭在她的《听杨绛谈往事》中说：“这个寓所的里里外外留有太多美好的记忆，杨先生虽已把它当成临时栖身的客棧，仍不忍抹掉一点往日的痕迹。”

杨绛曾说她有幸生在一个和爱的父母家，又成立了一个和爱的小家庭，从未想到背叛。家庭和事业从未有过矛盾。

她曾形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eres*）。”而这个描述，对于她和钱锺书也是同样相契合的。

“我们仨”虽然失散了，杨先生还仍在他们的那个世界生活。三联的几位老编辑，也是杨绛在文章里说到的和她讨论灵魂问题的“年轻人”，都知道杨先生喜欢卡通玩具。钱先生和钱瑗走后，她们再去家中看杨先生就发现，她在卧室里放了三个卡通动物，分别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肖属相，日夜陪着她。2004年4月2日，93岁的杨绛写了一篇短文，以《不官不商有书香》为题发表在媒体上，帮助三联人保住了三联文化的书香传统。那年春节前，十几个三联编辑相约同去看望杨先生，商量送她的礼物就是一个卡通玩具。杨先生很开心，把卧室里三个卡通也抱出来，搂在怀里，和她嘴里的编辑“小朋友们”一起拍了张大合影。

走到人生边上

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2004年、2005年，杨绛先生和法国学者刘梅竹两次通信，回答对方在论文



（图片来源自《听杨绛谈往事》）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么？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么？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2011年，在杨绛百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曾想为她做寿。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曾任外文所副所长，因为工作关系，每年都要去家中看杨先生。他说，从前在外文所英美室，只有两位先生是民国前后生人，一位是杨绛，生于1911年7月17日；另一位是卞之琳，生于1911年12月8日。所里想要为两位百岁老人同庆，杨绛拒绝了，说我不做寿——每年朋友们要来陪她过生日，她也都会在电话里轻声地说，我不做寿，你们自己在家吃碗面吧。而卞之琳先生，

在百岁之前一个星期的12月2日，去世了。

陆建德说：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样，他们都不是追求理想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压力，他们的态度是永远保持自我特点，在压力下保持人格风度，“有时沉默，有时曲折，但振臂一呼不会是他们的选择”。

对于生与死的问题，杨绛既通达，又执着。“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所以百岁之后，她还要《走到人生边上》里想个明白。

晚年的杨绛先生，除了少数时候客人来访，日常陪伴身边生活的只是一个保姆。有每年都去三里河南沙沟钱宅探望她的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起，先生后来几年和客人聊天，喜欢讲的都是小时候的事。说其他事情，再大再小，她语气总是冲淡的，谈到小时候和父亲杨荫杭，就听得出来有格外一些感情在里面。

和她聊过天的人都留恋那种记忆，说杨先生讲话声音轻柔好听，稍带一点南方口音，不缓不急，但“会讲故事，活色生香”，和她写文章一样有味。她最常提起8岁那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那天，她和三姐路过现场的经历：早上她们坐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小去上课，看到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的学生，跑来跑去。等到下午放学的时候，那些学生就不让包车在马路上了，她和三姐就停在路边，坐车里看热闹，看学生们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一队过去，又一队过去。旗子上除了有“抵制日货”，还有“恋爱自由”。

杨绛先生跟去看她的人说：“五四”运动在现场的，如今大概只剩我一个了。

如今这“一个”也去了。5月27日上午，杨绛先生遗体在北京火化。和18年前钱先生去后一样，只有少数几个亲友相送，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们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字画，于生前已经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他藏书和手稿等物，也得归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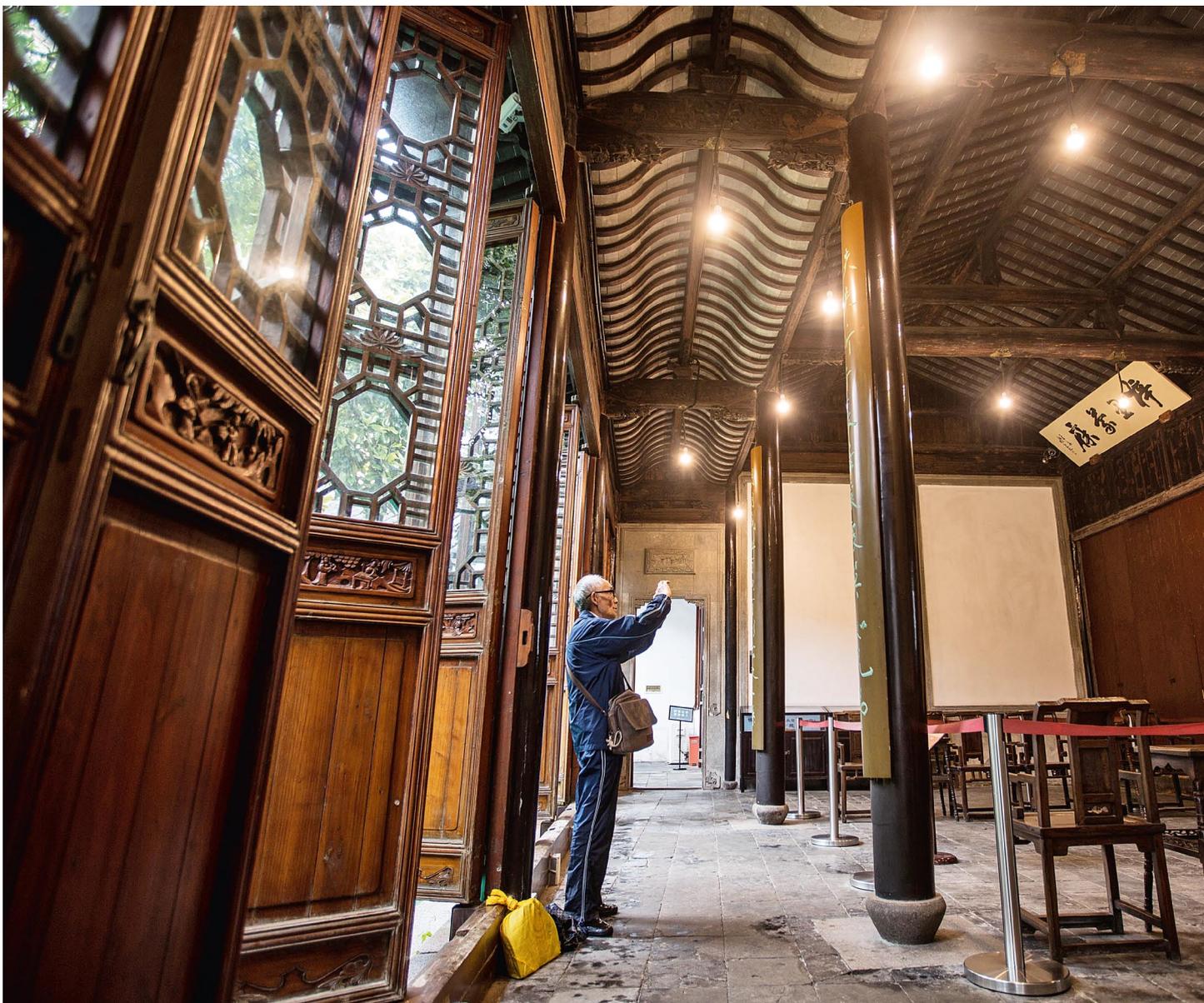
一位采访对象告诉本刊，杨先生生前见一位名望很高的学者死后极尽哀荣，曾对身边的人轻轻叹了一句：何必呢。

在她译注的柏拉图《斐多》中，苏格拉底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在人生的这个终极意义上，杨绛先生是真正的哲者。■

（感谢实习生王琪整理录音。参考书目：《斐多》《杂忆与杂写》《听杨绛谈往事》《我们仨》《我们的钱瑗》，三联书店；《杨绛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走到人生边上》，商务印书馆）

家庭与学校：江南才女的成长

记者 / 艾江涛 摄影 / 黄宇



“我若不是反满清‘革命激烈派’的女儿，很可能弃学革命。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



左图：钱锺书位于无锡七尺场的故居——绳武堂

右图：东吴大学遗址（今苏州大学校内）。1928~1932年杨绛曾就读于此

5月26日，车刚到无锡，潮湿闷热的空气迎面而来。从地铁2号线三阳广场站出来，穿过两条街巷，再走几百米，就是钱锺书在七尺场的故居——绳武堂。这座典型的江南庭院民居，处于四周高楼的夹峙之中，开放的两进屋舍中，除了牌匾楹联，只有少量钱锺书早年的著作与钱家包括杨绛的文字介绍。几个小时前，无锡钱镠研究会在这里举办了一个座谈会，纪念昨天去世的105岁的杨绛先生。81年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在这里结婚，随后踏上游学之路。这一幕，因为印象深刻，后来被钱锺书写入《围城》中，杨绛后来回忆：“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1935年8月13日，24岁的杨绛和钱锺书乘坐P&O公司的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英伦游学。前来送行的人中，除了杨绛的三姐闰康，还有两人在清华的师友温源宁与邵洵美。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两年后方考取庚款留英，因为这笔奖学金规定申请者必须先有两年社会工作经验；杨绛则还有一年才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为了随夫游学，她办了休学自费出国。

一个月前，两人在杨绛苏州庙堂巷的家中举办了婚礼。特别之处在于，两人的婚礼一半新式，一半旧式。杨家与钱家均为无锡的读书世家，只是在



左图：钱锺书77岁的堂侄女钱静汝现在居住在钱锺书故居后面的老宅里

右图：1948年7月，祖父百岁冥诞，钱锺书与杨绛回来后曾在故居的这间房子住过两晚，此后再未回来

近代欧风美雨、变革图存的时代氛围中，在思想做派上却颇有新旧之别。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先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学，是激烈的反满革命派，对孩子向来自由随和；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则是坚持体用之说的国学大师，生活中则是威严的旧式家长。因而，在杨家办完婚礼，当钱锺书小心翼翼地告诉岳父，在老家杨绛要行跪叩礼时，老爷子颇为不乐，认为那是前清废礼，中华民国没有这个礼。

好在，杨绛非常懂得体谅，之前她给钱锺书的信里曾写过：“现在吾两人快活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据说，钱基博看到此信后，对杨绛大为夸赞。

这个24岁的江南女孩，在今天看来，颇有不同

凡响之处。一方面，作为晚清革命派的后代，她接受了当时最完备的现代教育，大学所学为政治学专业，却始终不为当时涌动全国的革命风潮所动，性之所致，在清华园便和夫君确立了“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的志向；另一方面，她虽然出身大家族，却从无娇小姐的做派，处事干练，日后为钱锺书挡风遮雨，成为他笔下“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读书世家的新与旧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吴地素称“鱼米之乡”，山水动人，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据江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庄若江在一篇文章中的统计，在清朝



的114名文状元中，江苏一省即占49名，主要集中在无锡、苏州等苏南地区；即使在今天，无锡仍在全国院士最多的城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

在《无锡望族》一书中，庄若江粗略统计的望族数目即有36家，这些家族或为占据要津的官员，或为影响士林的大师。近代风气开化以来，他们多数接受了良好的中西教育，又成为近代民族工商界的核心，自由出入于官、学、商三界，在“门当户对”的观念下，又彼此结为姻亲，影响着整个地方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在无锡，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近代以面粉起家的荣家（荣毅仁）、经营纺织业的唐家（唐英年）、缫丝起家的薛家（薛福成）及游走在政学两界的杨家。据庄若江的考证，无锡杨家分为几支，一为从官宦到经商

的旗杆下杨家，一为读书办学的学前街杨家。后者代表为著名教育家杨模，戊戌变法前，他就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学堂之一——俟实学堂，钱基博、钱穆、杨荫杭等人都曾在这里上课。后来由于和当地米行的冲突，学前街杨家祖屋被烧去大半，逐渐败落。还有一支在留芳声巷的杨家，庄若江考证，与杨绛一家关系更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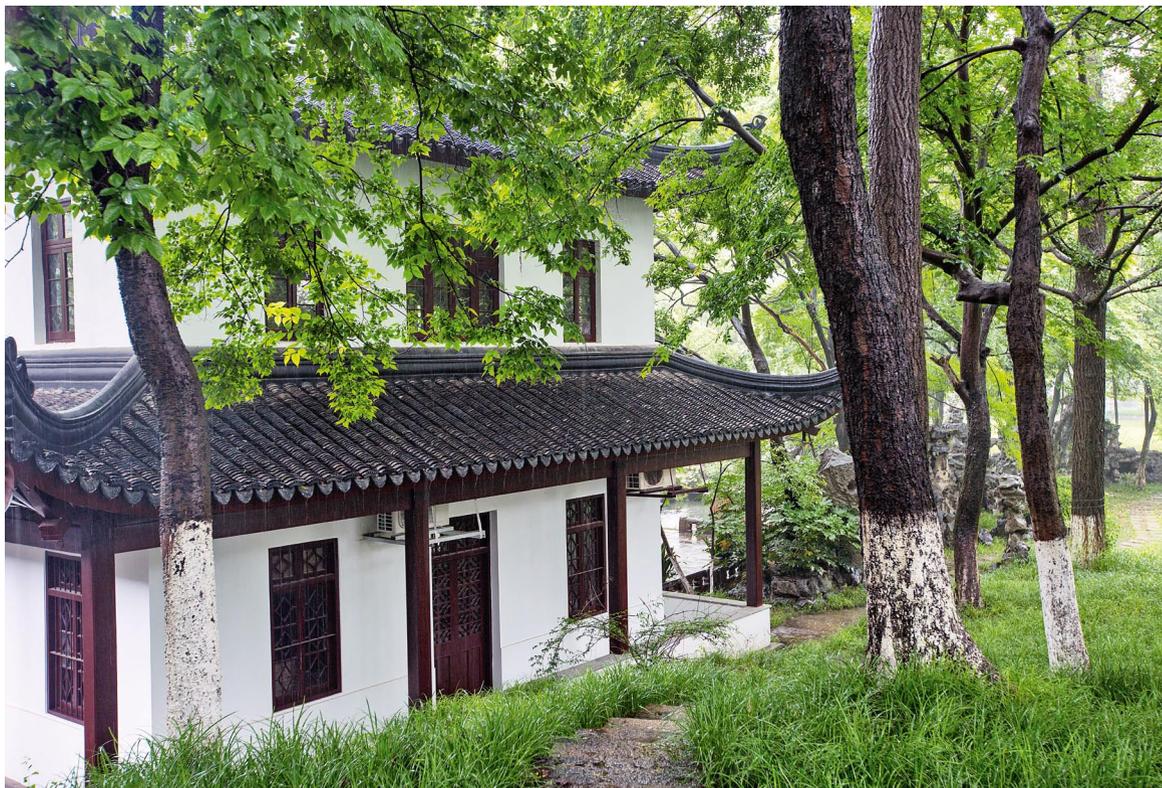
杨绛后来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回忆，当年她问起家族历史，父亲告诉她，上面两代都是穷书生，只做过浙江一些地方的小官。家中虽有祖传老宅，但无田产，父亲去国外读书主要靠政府奖金。

杨荫杭出生于1878年，17岁考取北洋大学堂（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两年后转入南洋公学，再过两年被公派日本留学。据说，杨荫杭从北洋转南洋的原因是，校方镇压因为伙食原因闹风潮的学生，逼问之下，他挺身而出，结果被开除出校。1900年，杨荫杭等留日学生创办《译书汇编》，译介欧美政法名著。1902年回国后，他又和同学在无锡创办“理化研究会”，倡导研究理化学习英语。因为在俟实中学鼓吹革命，杨荫杭遭到清廷通缉，不得已由日赴美，潜心攻读法学，希望以西方的民主法治救国。辛亥革命后，归国不久的杨荫杭被推举为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1916年又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

杨绛有三个姐姐，由于其是父亲归国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很受疼爱。父亲有午睡的习惯，不许孩子们在身边，但有一次，他特意叫住杨绛，让她陪在身边。比起其他孩子，杨绛显得非常乖巧，即使给火炉加煤，也能做到不出声响。

1917年5月，父亲在调查津浦铁路舞弊案时，因为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被司法总长停职，轰动一时。杨绛后来还记得，当父亲带着一家人辞职回南方时，送行队伍非常庞大。“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父亲对杨绛的影响非常之深。1927年北伐胜利，杨绛正在苏州振华女校（今苏州第十中学）读高中，学生会推举杨绛上街为群众演讲。杨绛脸皮薄，害怕受到街上轻薄之徒的欺负，回家向父亲讨主意，希望以他不允的名义答复学校。谁知父亲告诉她：“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不用借爸爸来挡。”父亲随即还讲起自己的一段往事。当年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适逢军阀张勋来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表示欢迎，他的一位部下擅自



苏州振华女校（今江苏省第十中学）一隅。1923~1928年杨绛曾在此就读

做主，把他的名字也登上去了。父亲很不高兴，立即登报声明自己并未参加欢迎。讲完后，父亲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于说不）你敢吗？”

在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分科时，杨绛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究竟“该”学什么。父亲告诉她，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说明性之所近，最为相宜。东吴大学当时并无杨绛最想读的文学系，较好的专业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起初，她想读法预科，以后当父亲的帮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为写小说准备素材。然而，律师出身的父亲，这次却反对她学法律，最终杨绛选择了政治系。

如果说父亲带来新的思想，母亲则用言传身教，让杨绛学习到传统的美德。母亲唐氏出身富商家庭，不但从小就在女先生教导下读书识字，后来还进入上海务本女校学习，爱读小说。印象里，父母亲的关系一直非常默契，两人经常陷入“长河一般”的对话中。

母亲对父亲非常体贴周到。1917年全家第二次回南方，住在无锡沙巷租来的房子里，那段时间不知

什么原因，父亲感染了伤寒。父亲当时像多数激进的留学生一样，不信中医，只信西医，在病情危急的时候，母亲自作主张请来中医，又将中药药方中的珠粉，倒入西药胶囊壳中，伪装成西药骗父亲服用。几十年后杨绛还记得，为了给病人补充营养，母亲撇去鸡汤浮油的场景。在母亲日夜不休的照料下，父亲终于渐渐恢复了。

抗战期间，杨绛一家陷入上海孤岛，为了让丈夫安心写作《围城》，她一面教书，一面承担起所有的家务，甘心做一位灶下婢，与母亲身上那种温良贤惠的影响自然脱不了关系。

如今，无锡杨家的旧居已不可寻觅，当年的留芳声巷，巷口虽然还树立着杨荫杭的介绍，巷子里则是焕然一新的小区，在一所新建的幼儿园旁边，老人们坐着安闲地聊天。

杨绛的堂侄女钱静汝，就住在钱锺书故居后面，当年由爷爷钱基厚和叔公钱基博所建的老宅里。谈起杨绛，她语气悲戚，无论在上海孤岛时期，还是她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期间，都与这位堂婶联系紧密。她

向我谈起钱家的家训：一不与人争名争利，二对人不分上下。这让我想起吴学昭回忆里的文字：“阿季从小就受爸爸影响：做什么也别做官。只做专家不做官，大学里系主任之类也不要做。”钱锺书、杨绛二人一生淡于名利，低调默契，显然传承于他们各自的家风。

走出故居，一场江南淋漓痛快的大雨洗刷着砖地上的青苔。77岁的钱静汝指着二楼的一间房子说，在钱锺书爷爷阴寿100年的时候，两人曾回来在这里小住两天，此后再没回来。1920年，对9岁的杨绛来说，离开无锡，经由上海，她将在几年后来对她影响深远的苏州，在那里，她读完中学大学，度过一段最为难忘的青春岁月。

振华女校的“味道”

1923年，杨绛在上海启明女校学习三年后，和姐姐一起回到苏州。此时，老家虽然还在无锡，父亲已搬家到苏州，不久更在庙堂巷置办房屋，这里很快成为杨绛的第二故乡。

在家度过一个欢快的暑假后，三姑母杨荫榆，也就是后来北京女师大因为学潮风波，被鲁迅等学界名流尖锐批评而被迫辞职的教育家，帮助姐妹俩选择中学。杨荫榆开始选中自己的母校——苏州景海女校，这是当时一所很好的教会学校。可等她被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邀去做了演讲后，很快改变主意，让姐妹俩插班考入振华女校。

王季玉是近代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后来继承母亲王谢长达的志向，终生未娶，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振华女校。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根源、叶楚伦、竺可桢等一批学界名流都曾出任女校校董，学校更延请苏雪林、叶圣陶等一批名师来校任教。

然而，初入振华的时候，校舍还位于十全街上的王家老宅，破破烂烂的环境，让杨绛一度感觉很不适应。但是，王季玉的办学理念很超前，学校的教科书均采用国外中学教科书的最新版本，同时提倡劳动，组织学生扫地擦桌，改掉过去在家使唤佣人的习惯。此外，王季玉还注意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杨绛在学校先后担任学生自治会会计、英文会长、演讲会长。

几十年后，当我在振华中学贾老师的带领下，打开校史馆中陈列的一本古色古香的《二十级毕业刊》时，惊喜地发现，比杨绛低两级的这批学生，还拥有自己的级歌和级花，乃至由毕业生自己撰写的级史。

毕业刊由苏雪林和另外一位老师马介之作序，内文则是毕业生们创作的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一位叫金惠芬的同学在《毕业以后的问题》一文中这样写道：“要造伟大的事业，一定要从深奥的学识，和丰裕的经验得来的。学识既不足，经验又谈不到，实在缺少办事经验的。……照这样看来，最好能升学，现在先把升学问题来进一讲！”这位同学思考的结论有两条：第一，升学应有的目的：不要图名誉！第二，服务应具有的态度：寻找适合于个性的事务。

忆及这段求学往事，杨绛感慨于自己当年的调皮任性，错过向名师求教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收获在于，通过课外活动，学到克服困难与做事的本领。此外，杨绛还在这里认识了那位后来一生的朋友费孝通。费的父亲是女校校董，由于他体弱多病，父亲担心受大男孩的欺负，便将他送到这里，也使他成为女校唯一的男生。跳舞的时候，费孝通害羞，杨绛欺负他：我们全都是女生，你来干什么？几年以后，两人再次成为东吴大学同学。因费孝通爱慕杨绛，多年以后，钱锺书见面还开他的玩笑，称两人是“同情人”。

到苏州的当天，大雨依然没有停的意思，或许只有在雨中，才能领略江南独有的风致。建立在清代苏州制造署遗址上的新振华中学，在烟雨蒙蒙中，亭台楼阁，一步一景。校长柳袁照特意带我选了一个地方坐下来，玻璃窗外，恰好可以看到刻在一块石头上的杨绛为母校百年校庆时的题词“实事求是”。

2005年12月，通过振华女校北京校友会的联系，柳袁照和几位老校友得到早已闭门谢客的杨绛的破例接待。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杨绛当着他们的面，哼唱了当年的老校歌：“三吴女校多复多 / 学术相观摩 / 吾校继起 / 德智体三育是务 / 况古今中外 / 学业日新月异 / 愿及时奋勉精进 / 壮志莫蹉跎。”1939年，刚从欧洲回上海不久的杨绛，在王季玉、竺可桢等人的极力劝说下，还曾勉力担任过一年母校校长。讲起母校，杨绛说：“振华这里有种味道，这个味道影响了我一生。”她绘声绘色地用无锡话模仿老校长每次开

忆及这段求学往事，杨绛感慨于自己当年的调皮任性，错过向名师求教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收获在于，通过课外活动，学到克服困难与做事的本领。

会时的开场白：“我们振华是实事求是的。”在柳袁照看来，杨绛所说的那种味道，或许正是母校注重实干的平民作风。

穿过玻璃门，朝右一拐，就是杨绛那级学生为母校所建的己巳厅。由于提前一年毕业，她只和同学去新校址拔草拣砖，进行义务劳动，没等厅子建好，便去了东吴大学。

不问政治的政治系学生

东吴大学并非杨绛的首选，她当时心心念念的去处是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然而，命运却有些阴差阳错。1928年6月，当她提前一年从振华女校毕业时，清华大学虽然开始招收女生，却并未从当地招生。无奈之下，杨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吴大学，后来，又无奈地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政治系。

也许正因为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只需要将功课敷衍过去就行，杨绛才有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自由自在地读书。从诗词歌赋到希腊悲剧，杨绛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经典。大学的氛围更为活跃，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新鲜的思想。思想活跃的费孝通，经常给杨绛介绍新书，包括弗洛伊德、冯友兰、房龙等人的著作。

在大姐寿康的介绍下，杨绛还跟着一位嫁到中国的比利时人专门学习法语。这也为她日后报考清华大学研究院打下基础，当时研究院的考试极为严苛，考生需要掌握三门外语。后来，在梁宗岱《法国文学》的课堂上，杨绛的法语受到老师表扬，上课提问时，在别的同学回答不上来时，总会叫她来作答。

另一方面，尽管生性害羞，杨绛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圈子。在苏州大学档案馆老师提供的资料上，杨绛曾经担任文理学院1932级执行委员会秋季的英文书记。此外，她还参加了学校的女子篮球队和女子排球队。照片上，杨绛梳着齐刘海的娃娃头，个头排在队列最末，因此也被大家戏称为“洋囡囡”。

1901年3月创立的东吴大学（起初称东吴大学

堂），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在中国建立的早期教会大学之一。与振华女校相似，校方当局坚守教学为主的教育方针，尽量淡化政治，使学生免受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影响。本来的天性，再加上学校学风的影响，让杨绛在整个学生时代，几乎很少涉足学生运动。当然，这与那位当年激烈反满的父亲也有关系，因为逐渐对国内政治失望，在律师的职业以外，他后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教育和媒体上，先后担任《申报》副主编、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晚年更将很大精力放在一部未能存留的音韵学著作《诗骚体韵》上。不知是否自觉于当年的激烈，杨荫杭更希望女儿按照天性，自由追求理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愤慨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各地民众纷纷请求抗战。东吴大学的学生将在东吴附中读书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拉来打鼓领队，奔赴南京请愿。杨绛不愿跟去，转而倡议同学为华北水灾的灾民捐款做寒衣。

然而，不论学校如何小心，到了1931年的冬天，在剧烈变化的外部环境下，东吴大学的学潮还是爆发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不但组织学生罢考，而且要求政府接管东吴大学，不许学生上课，不准离校，切断了在校学生与校外的联系。

杨绛和好朋友周芬一起想了个办法，两人在宿舍不动声色地将行李打包，写好取东西的纸条，交给平素交好的宿舍管理员，然后又一起若无其事地吃饭，饭后两人假装溜达，偷偷地混出了校门。回家以后，又让门房雇车回宿舍取东西，总算有惊无险地逃离了学校。此时，距离毕业还有一个学期，学校因为学潮已经停课，杨绛找老师帮忙联系好燕京大学借读。当时的高校之间，只要办妥手续，考试合格，可以自由借读。

1932年2月，杨绛和同学周芬、孙令衍、徐献瑜、沈福彭五人一起，经过三天的舟车劳顿，顺利到达北平。到燕京大学后，杨绛很快在已在清华外文系就读的中学好友蒋恩钿的撺掇下，改投清华大学借读。

几天之后，在清华园的古月堂，杨绛见到孙令衍的表兄钱锺书。属于两个人的半世传奇，就此开始。从借书，到写信，两人渐生爱慕。在清华园，钱锺书对杨绛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听后，觉得与自己平生志趣颇为相投，她虽然学了四年政治学，却并无济民之志。■

（本文写作参考了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杨绛文集》2卷。感谢李跃光、倪彦对采访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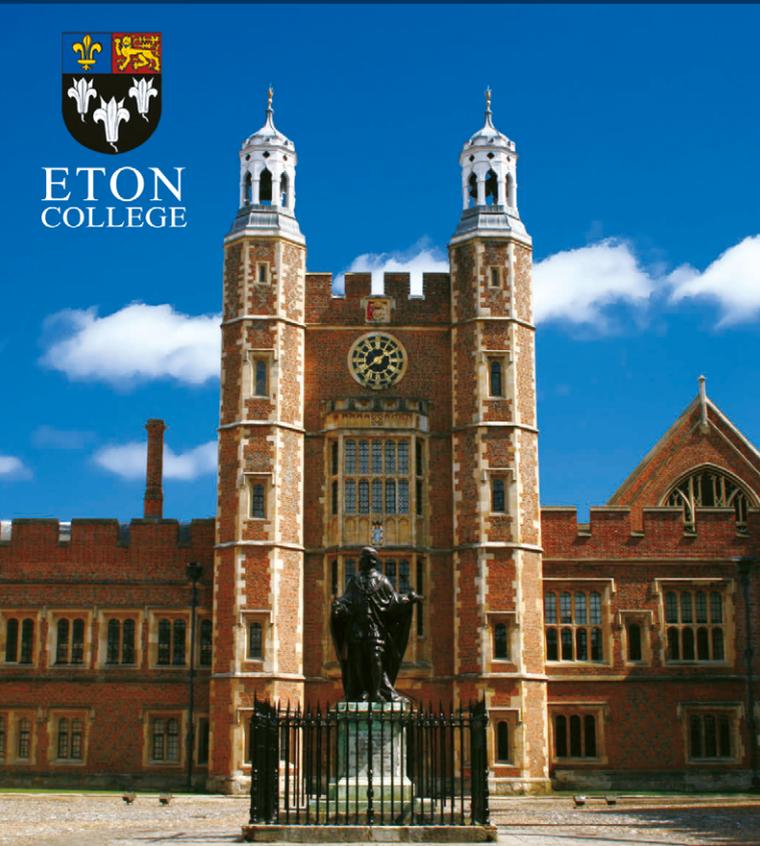
在清华园，钱锺书对杨绛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听后，觉得与自己平生志趣颇为相投，她虽然学了四年政治学，却并无济民之志。

2016全球精英寄宿学校联盟系列访华活动及招生峰会

China Summit of the Association of Leading Independent Schools

7月·伊顿公学专场——给你一个成为威廉王子学弟的机会

伊顿零距离·学霸面对面·独家性指导



重磅嘉宾



威廉·里茨 William Rees

- 10年伊顿前招生官
- 英国众多一流寄宿制名校资深招生顾问
- 主持设计新伊顿招生体系，被英校广泛借鉴采纳
- 必益教育专属高级顾问



艾玛·范伯根 Emma Vanbergen

- 必益教育教育咨询部总裁
- 逾10年为学生提供海外教育咨询的经验
- 曾为华尔街日报教育专栏作家
- 曾经将5位中国学生送入伊顿
- 成功将多位中国学生送入英国精英名校，仅2015年就包括哈罗（3个），威斯敏斯特（2个），温切斯特（2个），切特豪斯（4个），拉德利（2个），威科姆阿贝（2个），汤布里奇（3个），唐屋女子（4个）等

6月30日 北京 | 7月2日 成都 | 7月3日 深圳 | 7月5日 上海

9月·多校联场——不出国门，攫取英国精英名校直招机会

■ 寄宿制英校荟萃 ■ 现场直面招生 ■ 揭秘成功法则

9月11日 北京 | 9月15日 上海



切尔蒙纳姆女子学院
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



唐屋女子中学
Downe House



凯特汉姆学校
Caterham School



拉格比中学
Rugby School



坎特伯雷国王学院
The King's School, Canterbury



丁克洛斯中学
Dean Close Senior School



伊斯堡学院
Eastbourne College



哈利伯瑞中学
Haileybury



斯多中学
Stowe School



赛德伯中学
Sedburgh School



国王布鲁顿中学
King's School Bruton



米尔菲尔德学校
Millfield School

咨询热线:

400 850 4118

必益官网: www.behk.org

微信咨询:

添加微信号“BEeducation”，发送信息“您的姓名+手机号+ALIS咨询”

主办方: 精英寄宿学校联盟

承办方: 必益教育和华申留学



必益教育官方微信



(图片选自《听杨绛谈往事》)



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牛津往事

主笔 / 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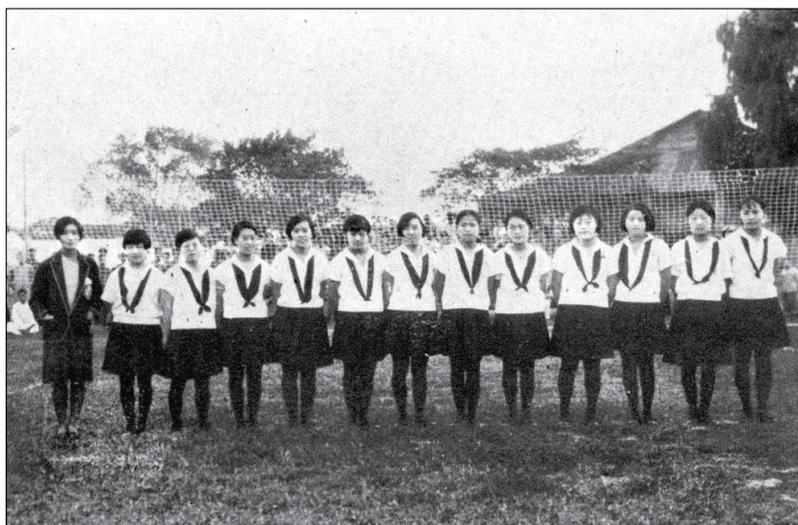
对于杨绛来说，很多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那就是“我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图片选自《听杨绛谈往事》)



(苏州大学档案馆藏供图)



(苏州大学档案馆藏供图)

3

4

1. 1934年4月2日至7日，钱锺书从上海来到北平探望杨绛，两人在北平郊区游玩
2. 杨绛（右）与好友蒋恩钿在清华大学礼堂前的草坪上（摄于1932年）
3. 当年的东吴大学女子篮球队。图中前排左一为杨绛
4. 当年的东吴大学女子排球队。图中左二是杨绛

1935至1938年，已成婚的钱锺书和杨绛同赴英国牛津大学，然后在巴黎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在这三年不算长的留学岁月里，钱锺书埋头苦读，留下了海量的读书笔记，对生活的记述则甚少。而在杨绛的笔下，那段岁月满是生活的细节。她无微不至照顾起钱锺书的起居，“耗去了不少心力体力”。钱锺书出生于旧式大家庭，重男轻女，但杨绛身上并没有新旧时代女性身份的挣扎痕迹。

“饱蠹楼”的笔记

2014年踏访牛津大学，正值埃克塞特学院庆祝自己的700岁生日。这座位于牛津特尔街古老学院和许多熠熠生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文学爱好者来说，必然不能错过吊唁的文学巨匠，大概是创造了“中土世界”的J.R.R. 托尔金。他毕业于埃克塞特学院，但后来执教于牛津另外的学院，与另一位执教于牛津的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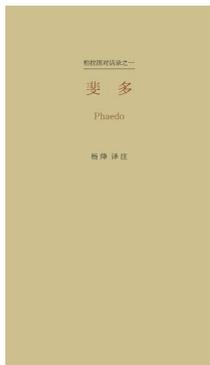
家 C. S. 刘易斯是挚友。钱锺书在牛津读书的时候，这两位校友正在牛津执教。但对于钱锺书是否曾在牛津的街角与这两位文学巨匠擦肩而过，就只是一个充满遐想而难以考证的问题了。

但找到钱锺书与他们或多或少的确切交集并不难。厦门大学中文系的研究者张治就发现，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文人学士在牛津组成了一个团体，名曰“洞穴”（Cave），典出《圣经·撒母耳上》的“亚杜兰洞”（the Cave of Adullam）故事，成员就包括刘易斯、托尔金，以及钱锺书的学术导师赫伯特·布雷特-史密斯（Herbert Francis Brett Brett-Smith），据说是钱锺书论文主考官之一的莱斯·奥胥黎（Rice-Oxley）和 R. B. 麦克罗（R. B. McKerrow）等学者。史密斯和麦克罗都以文本校理而见长，有很多校勘整理英文经典著作的成就。布雷特-史密斯当时 51 岁，是牛津训练出来的学监，在奥里尔学院任研究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著名的编辑，在钱锺书来之前，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他尤其对 19 世纪英国诗人、小说家托马斯·洛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和 17 世纪一位不太有名的剧作家乔治·埃瑟里奇（George Etherege）感兴趣。

这个圈子的牛津学人，治学经验有两个特点。一是关注文本本身，而不是解释文本的意义，重视校勘学或修辞学；二是喜欢从传记家、文学史家和辞书编纂者的成果中寻求解诗之密钥，喜欢在掌故、渊源和语义及

语境的变化中研究文学。很难说钱锺书的读书和研究方法，是否受到了学术导师史密斯和当时牛津学术氛围的影响，因为他自己的家学传统也根深蒂固，“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很深”。余英时读钱锺书，即认为他“在政治的各种风浪中，保持着自己已经确定下来的思想体系，晚年写的《管锥编》和早年写的《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思想不会因政治局面的改变、新的意识形态强烈的要求，就去适应”。但钱锺书一生的治学方法，都与牛津这个学术团体的治学经验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不冲突。在钱锺书海量的读书笔记中，专业的研究者发现，他对 C. S. 刘易斯的随笔集和学术著作读得比较多，《管锥编》中多次引用他的书。在《容安馆札记》中，钱锺书也曾论及托尔金童话故事“幸福大结局”，并曾引述这位校友发明的“Eucatastrophe”（故事主人公在逆境中突然得以善终收场）概念。如此，我们似乎为钱锺书在牛津的学术生活找到一个模糊的坐标系。

1935 至 1938 年，钱锺书留下了海量的读书笔记。与这些笔记和著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记述甚少。踏访牛津，你尽可在托尔金和刘易斯最常同往的“鹰童”（Eagle and Child）老酒吧追忆过往，感受“吉光片羽”（The Inklings）读书会的往日氛围，任由各种古怪想法变成奇幻史诗，但唤起对钱锺书这个名字回忆的地方，只能是博德利校图书馆。这座有着穹顶的古老圆柱形石头建筑，立在牛津正中央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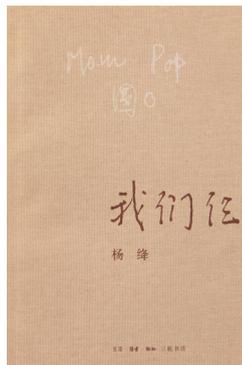
2



3



4



5

1.《斐多》是柏拉图中期写下的一部对话录，描绘了苏格拉底就义当天跟学生讨论灵魂的不朽、随后饮鸩而死的过程。1999 年，杨绛先生翻译了这篇“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

2.《洗澡》出版于 1988 年，写的是 1949 年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小说描写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表现。

3.《干校六记》1981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记述了 1970 至 1972 年间知识分子在河南干校的劳动生活和感受。钱锺书在为该书写的《小引》中说：“干校两年多的生

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4. 2005 年，在钱瑗离世 7 年多之后，三联书店出版了《我们的钱瑗》一书，书中汇集了钱瑗的继子、继女、学生、同事等人撰写的怀念文章。杨绛先生撰写的《尖兵钱瑗》被作为该书代序。

5. 2003 年，92 岁高龄的杨绛先生撰写了《我们仨》一书，讲述他们一家 63 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

心脏地带，很多次成为牛津天际线的标志性建筑。钱锺书在牛津的两年时间，除了上课，几乎全泡在这个图书馆里。他把这个图书馆称为“饱蠹楼”，是非常贴切的。后来贯穿了他一生学术与写作生涯的记笔记的习惯，就是在这里读书时养成的。“饱蠹楼”的图书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钱锺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篋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则写着：“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匱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这都是用毛笔写的，是“经过反刍，然后写成的笔记”。做笔记很费时间，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但钱锺书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不过，在钱锺书、刘易斯和托尔金身上，兴许还有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相似之处。刘易斯从小沉迷于阅读，对他来说，书里的世界显得比现实的世界更真实可感，也更有意义。挚爱的母亲去世后，他就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寻求安慰。而对托尔金来说，他向往古代，他所创造的现代奇幻文学，之所以与传统奇幻文学截然不同，是因为它们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第二世界，也就是一个与我们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世界。后来的现代奇幻作家们，也都是为与现实无关的“第二世界”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为我们远离、逃避现实世界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钱锺书的后半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面临着越来越恶化的生存环境，但他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算是一个特例。这一点屡被人诟病，但鲜有人像余英时那样肯定他思想世界的“政治无涉”。钱锺书曾在一篇题为《论文人》的文章中，以他惯有的幽默和讽刺写道：“歌德不做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heche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样能做战歌。现代的文人比歌德能干多了，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争，能作政论；再不然，能自任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也不会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交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与现实保持的距离感和疏离感，正是钱锺书和杨绛两人著书为学一以贯之的特点。

很多年后，杨绛在《我们仨》里回忆道，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每三

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锺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是学业导师，一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这种情形，今天的牛津亦是如此。在当时，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假期也离开牛津，到别处旅行，他们大多有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但钱锺书一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这是因为他不爱活动，在清华的四年里，“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他因此在牛津和巴黎都并非“交友甚广”。也许正是这种学校的氛围，让钱锺书对获得一个洋学位不以为意。他曾对杨绛说，在牛津，吃两年饭就是硕士，吃四年饭就是博士。他虽然通过了牛津的文学学士论文考试，在1937年拿到了毕业证书，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接着走下面一步：申请学位。因此，从理论上说，钱锺书在牛津并没有被授予任何学位。根据杨绛在《我们仨》的回忆，1936年他们就已巴黎大学注册入学了，“因为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钱锺书感到，拿一个学位要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所以后来他们虽然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却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自由读书，并不想获得学位。

钱锺书在牛津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之前一直没有人读到过原稿，直到2016年，一位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晓宇出于对民国那代学者“脚踏东西文化典范”的存疑，带着求证的好奇心给博德利图书馆写信，才第一次看到了钱锺书在1937年递交的毕业论文原稿。那时钱锺书使用的还是威玛氏注音，署名为Chung-Shu Chi'en，原稿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线装本。面对这样一个宏大得在今天几乎难以成立的论文题目，钱锺书开始了浩瀚的文献考证，而且还从英语之外的欧洲大陆语言文献中寻找爬梳。晓宇记录道：“每一页的几处引用，全篇下来，跨越两百年，甚至提到了20世纪初的文章，不免让人嘀咕，在没有电脑、Google和关键词搜索的时代，他是看了多少书。”论文里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他考证了17世纪英国文献记载上的第一位中国人。在《安东尼·伍德的生活与时代》（*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Wood*）这本书里，他读到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和詹姆士二世在1687年的对话记录，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国居民，詹姆士二世还收藏了这位中国人的画像。沿着伍德和海德的书稿找下去，钱锺书找到了这位中国人的名字“Shin

Fo-burgh”，还考证出他们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中国围棋和骰子。钱锺书考证的这些文献，都是拉丁语所写的。这篇论文的英语不乏行云流水的长句和排比句，词汇的使用不仅复杂高级，而且也有文采，闪烁着他的幽默感。比如，他说自己为什么不把翻译作品纳入考察范围时，就这样写道：“常理和文学理论都同意，编撰比翻译更近于原著的创作过程。虽然有时候一个严谨的翻译可能比敷衍的编撰更需要大脑的耕耘。”他还给英国的汉学下了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汉学专业化的弊端在于，本专业的学生懂得越来越多，但大众越来越冷漠。中国这个话题已然不再是人文热情的一部分了。”

也正是从牛津开始，钱锺书的笔记不断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他就更加肆意地读书、勤谨地记笔记。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杨绛后来回忆：“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曾想为他补裱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钱锺书去世后，杨绛说，她还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她“应尽的责任”。这责任，就是整理钱锺书的学术遗物——几麻袋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她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外文笔记（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和日记混在一起的中文笔记、读书心得。这些成了《容安馆札记》，178册的外文笔记，20卷的《钱锺书手稿集》。

钱锺书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笔记式的，这与中国古人发展的以笔记为主的著作，比如《日知录》和《困学记闻》，是一个路数。有人对钱锺书这些笔记和他所做的研究的价值提出过质疑。对这个问题，余英时曾经做出过他的回答。他说，钱锺书的这种笔记式写作，是因为“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余英时借了一个比方，说明这些笔记非常有原创性，“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现在的论文或专著，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杨绛一直认为，自己虽是一位写作者，但更是丈夫文化遗产的看护人。由此看来，她对钱锺书理解至深。这种至深的理解和由此生发出的“看护”，正是始于牛津岁月。

牛津的生活

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的生活，是以杨绛为主角的。1934年4月，钱锺书以令人震惊的87.95分——历史最高分，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资助：服装费20英镑，往返英国的交通费80英镑，每月学杂费及生活补贴24英镑。这时的杨绛，虽然从东吴大学考上了清华外文系研究生，但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名额。她本打算随钱锺书去牛津后，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杨绛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她虽然觉得很不服气，但“既然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钱锺书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他常自叹“拙手笨脚”，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但到了异国他乡，杨绛才真正见识到他笨拙到了什么程度。到达牛津前，他们在伦敦做了短暂的游览，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杨绛多年后回忆，他看着在伦敦的亲戚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到工厂实习，“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有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一些同学”。初到牛津，钱锺书一个人出门，就在下公交车时脸朝地摔一大跤，“吻了牛津的地”，把大半个门牙磕掉。

杨绛的各种担心都是非常具体的。牛津的学费比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路费，并不合算。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在这些忧虑与算计中，她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做一个旁听生。杨绛在东吴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学习是非常优异的，也是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现在，她虽进了清华，但很快就不得不面临身份和角色转换的选择。2004至2005年，在与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刘梅竹的通信中，杨绛曾透露，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在清华大学本科读外语系，却在东吴大学读政治系”。这其中的心境，在杨绛初到牛津时体现无遗。

在牛津，夫妇二人住在离学校不远的英国房东老金家。那是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杨绛不是正式学生，没有课，就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里补习文学经典。刚开始的时候，还很满意，觉得有读不完的书，

学生又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但当学期开始后，看着满街都是穿长袍或黑布背心，戴方帽子的人在奔走，就有了一种“失学儿童的自卑感”。

钱锺书上的是必修课，最看重牛津学院制下独特的导师“一对一”辅导课，而杨绛则穿着旗袍去旁听大课，“心中充满了自卑感”。也许是为了安慰她，钱锺书让她看他必修的课程和前两届的论文题目，但这仍然不能消除杨绛欠缺严格学术训练的失望。这也是为什么，在回答刘梅竹的信件访问时，她会一再强调，自己的古文功底不高，“都是自习，所以功底不深。很差，很差”。20世纪40年代，杨绛的几部喜剧在上海首先名声大噪。但她却在多年后告诉刘梅竹，李健吾对《弄假成真》的评价“大约是广告行的吹嘘”，而《游戏人间》的底稿丢失，并非意外，而是自己“毁了，不要了，没有了”。她说，她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一部是满意的。

在杨绛的笔下，我们能读到夫妇两人在牛津学业之外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出门散步，挑不认识的地方，“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牛津浓厚的人情味也给杨绛留下了印象。邮差半路上碰到，就把家信交给他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戴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会客气地警告。除了散步之外，他们的生活，仍然是把窗帘一拉，相对读书。白天读各种外文书，回到寓所，就读从国内带来的古文书。也只有在杨绛的笔下，我们才能读到夫妇俩在牛津时的社交生活，虽然他们不喜社交。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俞大猷、俞大綱和杨益宪，他们家的常客是研究敦煌文献的向达。在《我们仨》里，杨绛记录，钱锺书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两人都笑得捧腹。钱锺书一向喜欢讽刺，能和他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他刻薄。杨绛当然体察钱锺书的不谙世故，但她更愿意保护他的天真，而不是让他适应世故。往来的留学生，杨绛也觉得是是非非，所以“除了和俞氏姐妹略有来往，很脱离群众”。

后来，他们换了一处房子，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没有了老金家的人做饭，两人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也学会了用厨房的锅和刀、叉、杯、盘等，自己做晚饭。杨绛慢慢学会了做红烧肉，把买来的肉用大剪刀剪成一方一方，站在电灶旁使劲儿煮，开足电力，汤煮干了就加水；后来又用文火熬，再后来又买了雪利酒当黄酒用，慢慢做出不错的红烧肉。杨绛不断创制新菜，“不断发明，

不断实验，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后来她回忆，直到30多年后，1972年的早春，他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钱锺书才第一次学会了划火柴，自己点燃了煤炉火。在牛津的日子，钱锺书有时累得倒床就睡，而杨绛却累得睡也睡不着。

在一次巴黎和瑞士的旅游后，杨绛回到牛津，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感到自己好在是个“闲人”，而钱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写道：“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她，“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杨绛生产后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下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据说他们的女儿钱瑗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她在产房的这段时间，钱锺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汇报，“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说：‘不要紧，我会修’。”钱锺书又放心回去。杨绛后来写道，她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在伦敦旅游时，钱锺书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教做热敷，她安慰钱锺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女儿钱瑗的出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锺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钱瑗出生后的第100天，他们一家三口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乘火车到巴黎，开始了在巴黎短暂的留学生涯。1938年，钱锺书带着杨绛和女儿，从法国马赛坐邮轮回上海。杨绛曾在书中这样写道：“我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

直到去世前一两年，杨绛先生还在为整理编辑丈夫的手稿而忙碌。她这样评价自己：“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她一向对自己评价不高，唯独在这个意义上，她觉得自己“功莫大焉”。

归国之后：现实与选择

主笔 / 杨璐

“隐身衣”，是理解杨绛先生的概念之一。它关乎角色与立场。

孤岛的谋生

杨绛在回忆文章里并没有写她 1938 年回国时的内心感受，只像回忆一次疏忽的平凡旅行，三等舱伙食不好，胖胖壮壮的钱瑗下船时成了一个瘦弱的孩子。钱锺书有约回清华教书，她把丈夫的行李单独分开。船到香港，钱锺书下船奔赴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杨绛独自带着女儿前行，迎接她的故土，是母亲的离世和战火弥漫。

这大概是杨绛在结婚后所面对的第一个窘境。婆家和娘家为了躲避战火都到了上海租界，居住逼仄，经济上也不像从前那么宽裕。她在两边居住，当女儿、做媳妇，还要想养家糊口的出路。大家族里的儿媳妇，上有婆婆，下有弟媳和小姑子们，杨绛不能是父母精心栽培的大小姐、时髦女知识分子，而是得有儿媳妇的本分。

她是灶下婢，不但要洗衣做饭，冬天的时候，因为燃料紧张，为了省煤，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还自己做过煤饼，用水和煤末和煤灰，雪白的胳膊直插到煤泥里，抹到脸上，煤末渗到指甲缝里。夏天的时候，大热天，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都在二楼大房间乘凉，丈夫和女儿把澡盆擦干，在澡盆里对坐着玩。她后来在《听杨绛谈往事》里跟吴学昭回忆：“她和婆婆、妯娌、小姑子们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又不便于加入锺书、圆圆一伙玩，更不敢公然读书，好像看不起她们。只好借了架缝纫机，汗流浹背，独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缝纫。为锺书和圆圆做衣服是无可非议的，有时婆婆也求她为小叔子用缝纫机合几条缝缝。”那时的杨绛，没有私人空间，也没有跟丈夫说知心话的时间和空间。吴学昭写道，她很能适应环境变化，尽管十分劳累辛苦，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家庭的琐碎和不使用忍让和以己度人可以处理好，家庭以外却是个体很难驾驭的世界，孤岛时期的上海充满了恐怖和压抑。杨绛在散文《闯祸边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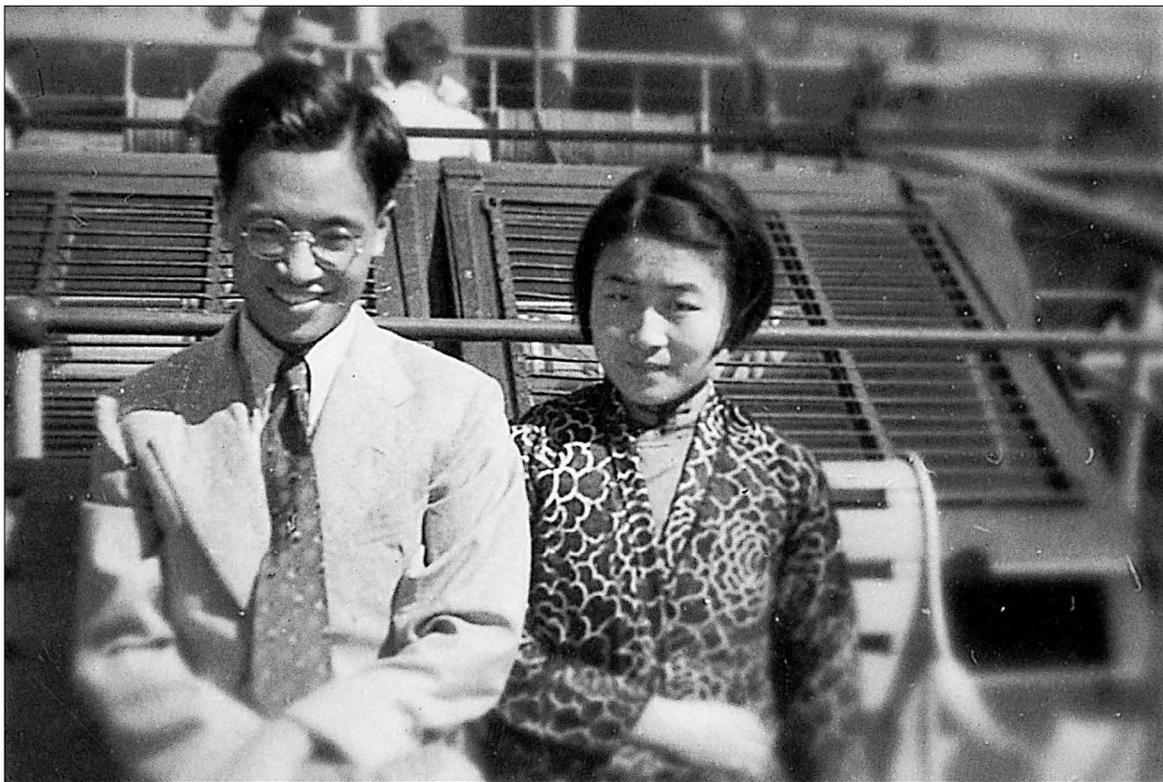
回忆，车过黄浦江的时候，行人下车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兵把守，行人路过时得向他们鞠躬，杨绛不愿行这个礼，低着头就过去了，侥幸没受注意。有一次，她站得比别人晚了，这跟不愿鞠躬是同一个道理。日本兵觉察了，用食指猛抬她的下巴。杨绛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两个人相持不下，直到日本兵退去。

这只是恐怖的小插曲，就在杨绛回国的半年之前，租界发生了一系列暗杀和政治威胁，第一大案是把《社会日报》的编辑蔡钧徒斩首，头颅挂在法租界巡捕房钱的电线杆上，下面还写着字条“看！看！抗日团体之结果”，从 1939 到 1941 年有 20 多个记者被 76 号暗杀，1941 年 12 月中旬逮捕了鲁迅遗孀许广平。当时有作家悲叹：“居留在上海的我们，国家的保护已经脱离，侵略者的魔手在我们的头顶。”所有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都要面临保全性命和爱国感召的冲突。

文化类的谋生难免要跟日本人合作，有民族气节的文化人效仿古代儒生的做法，用退隐、不合作来抵抗伪政权和日本人，既保全自己的生命，又保持了对整个民族的道义承诺。杨绛的谋生也在民族气节和经济收入上做选择，跟日本势力有关的产业全不考虑。她刚刚回国时，帮助中学母校振华女中在上海筹建分校，为广东富商家的小姐做家庭教师。等到富商小姐高中毕业，又到工部局的半日小学做代课教师。学校离得很远，杨绛困得在公交车上打盹儿。钱锺书回到上海后，也在教会大学上课，还有拜门学生，可家里依旧困窘。

战争造成大量难民涌入，失业激增、住房和食品短缺，物价飞涨，连米和柴的供应都成问题。杨绛在《我们仨》里回忆，日本人分配给市民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有一半麸皮。分配的米，只有粳，中间还杂有沙子。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都要买，因为只吃粳不能过活。煤球的供应也短缺，煤厂总是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 300 斤只给 200 斤，还会掺很多泥，烧不着。最为心酸的是，有人送一担西瓜，钱瑗都会很惊叹，杨绛回忆，从前家里买西瓜都是两担三担买，这样的日子，女儿没见过。

为谋柴和米，杨绛开始写戏剧，并一举出名。钱锺书连载《围城》被人关注时，最简单的介绍方法是“杨



（图片选自《听杨绛谈往事》）

1935年后，新婚后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P&O公司的邮轮赴英留学

绛的丈夫”。戏剧在上海的流行是战时畸形的结果。“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禁演英美电影，当时只有很老的德国片、法国片、日本片和一些中国电影，开演前还要放15分钟日本宣传片。为了逃避现实、抚慰孤独和困苦，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大增，电影业满足不了需求，大量流向了戏剧界，给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提供了既保全尊严又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杨绛的第一部戏《称心如意》写于1942年冬天，本来是跟朋友陈麟瑞、李健吾吃烤羊肉时候的一时兴起，她却在繁忙的家务和教课的空当动起笔来，第一稿并不成功，她没有气馁，重新改写了一遍。1943年1月《称心如意》首演，导演是黄佐临，李健吾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部喜剧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当时的剧评人评价，悲剧似乎容易讨好观众，当时形成了悲剧的粗劣繁盛。此时此地《称心如意》的创作与上演值得称赞，不但因为它是近年来少见的喜剧，并且是近年来少见的好喜剧。从人物和结构两方面看，《称心如意》是典型的喜剧。1943年的秋天，杨绛的第二部喜剧《弄真成假》也上演了，这被当时的剧评人认为是“近年来难得的喜剧”。李健吾甚至评价是

丁西林之后的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

选择喜剧大概也与杨绛一贯理性、隐忍、克制的人生态度有关，她没有去做激昂的斗士，但是用细水长流的方式表达着她的立场和选择。她在《称心如意》原序中写道，上海虽然沦陷，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淹没。剧坛是一个重要阵地。当然，剧坛不免受到干扰和压力，需要演出一些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作为缓冲。如果说，沦陷区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除了题材的一枝独秀，杨绛的文学才华也在两部剧里体现。著名戏曲研究学者赵景深在《文坛旧忆》里写，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围，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历史也没有掩盖杨绛的这两部剧作，美国康奈尔大学耿德华教授在1980年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反浪漫主义一章中，把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杨绛的戏剧、钱锺书的小说和散文归



1940年1月2日，日本士兵在上海租界设立关卡，对通过的中国人进行检查。杨绛曾经写过自己过关卡不肯鞠躬的情形

在一起，并专门辟出一章分析杨绛的戏剧。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里对杨绛戏剧的评价是，作家善于抓住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描写世态、鞭辟入里，而语言幽默，含着眼泪微笑，富有个人的艺术风格，不仅在当时是佳构，即使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跨越新旧时代

联想到钱锺书、杨绛之后的境遇，总不免会好奇当初夫妻俩为何没有选择去台湾或者出国。杨绛在中国社科院的同事、翻译家叶廷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都觉得回国，为国家搞建设是爱国的行为。那个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想这样的问题。祖国一直打仗，积贫积弱，出国做二等公民，和平了在国内可以做事。叶廷芳是冯至的学生、听过朱光潜的课，也是赵萝蕤的忘年交，是与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交往的人。

抗战胜利之后，杨绛与钱锺书的生活确实优渥起来。最重要的事情是《围城》即将完成，这部小说在《文艺复兴》月刊上连载，读者们很爱看，都在打听钱锺书是谁。钱锺书的才华从学术小圈子扩展到了大众范围里。他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又兼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还担任了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钱锺书有了收入，杨绛就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她担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也给朋友的杂志写文章，经常约稿的有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储安平的《观察》，傅雷、周煦良的《新语》。

安心做学问和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久，内战爆发了。杨绛和钱锺书的师友、朋友们很多人被裹挟入政治，在去与留之间做选择。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1947年取缔民盟时，就倒向了左翼一边。当时还流行一种“中间道路”的主张，在英美和苏联之间找到一条中国模式，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杨绛和钱锺书的熟人们，朱光潜、费孝通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甚至提出了32条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土地国有化就包含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因素。

杨绛和钱锺书对政治不热心，钱锺书的工作每月要到南京去汇报，早车去，很晚才能回到上海。一次回来得很早，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因为当天的晚宴要跟蒋介石握手，他就提前溜了回来。他俩也并不对新社会抱有一厢情愿的想象。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抗战时期，钱锺书的拜门学生经常请老师为他买书，其实是供老师读书。钱锺书新书、旧书买了

不少，都盖有“借痴斋”的图章，这其中就包含有介绍苏联铁幕后面的书。英文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他们也十分熟悉。杨绛写道：“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走，并非无处可去。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朱家骅是中央庚款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锺书。一次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职位，钱锺书立刻辞谢了。他说那是胡萝卜。胡萝卜与大棒相连，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的驱使。她还跟吴学昭回忆，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邀请钱锺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书籍和行李。香港大学许以教职。牛津大学汉学家斯伯丁(K.G. Spalding) 1949年3月中旬还写信希望他们赴英，两人都不为所动。

留，是毫不犹豫的选择。郑振铎、吴晗都曾劝他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他们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他们是没用的知识分子。钱锺书在1938年决定回国时，给牛津的同学写信，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到了1949年并没有改变。杨绛写道：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5月26日夜，上海解放。清华大学吴晗到上海招聘。钱锺书和杨绛打算去北京生活。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他们买了四张软卧票，同车去北京的还有日后杨绛在社科院的同事卞之琳。

洗澡

北京浓厚的政治空气并未感染杨绛变成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她也没有投入到意识形态里的热心。她一直冷淡地对待时代的变化，解放前没参加任何政治运动，解放后依旧让政治远离自己的生活。

杨绛宁可领“散工”的工资，而不愿意做专任的教授，因为怕开会，不想为冗长的会议浪费时间。她想办法尽量避开“争议”性的科目。她曾经在《控诉大会》里回忆，外文系的危险课是诗歌、戏剧、小说，她教“大三”的英国小说。她的朋友思想很进步，对



1968年“文革”期间，一所学校的学生们正在抄写大字报

她说，老一套可不行了。杨绛并不想学新一套，而是选择回避思想意识，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她选择《大卫·科波菲尔》做精读和分析讨论的小说，因为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崇，政治上有根据。她不再进行容易带来麻烦的文艺创作，而是遁入了翻译里。50年代初翻译了西班牙名著《小癞子》，叶廷芳告诉记者，从翻译书目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杨绛的文学品位和眼光，这本小说属于巴洛克文学，在当时的中国不太有人知道，可能因为杨绛在法国的经历，她知道这个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

虽然内心对局势有闪转腾挪，“三反”和思想改造之前，知识分子之间的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里写道，外文系的学习会空气轻松，从未像法律系那样有时发言剑拔弩张。钱锺书常说点历史掌故，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钱锺书还曾经一一指出苏联《英文简明读本》语法上的错误，引起哄堂大笑。杨绛跟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张奚若夫人

杨景任交好，也时常去看望她和钱锺书的老师温德，给他炖鸡、请他吃年夜饭、过生日。

运动的乌云在无声地接近。杨绛和钱锺书的朋友、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创办者高崇熙被污蔑拿了公家的白金坩埚自杀了，燕园东门外果园的主人、留美园艺家虞先生也自杀了，因为果园归了公，从前的工人变成了积极分子，气势很高。虞先生想不通、受不了窝囊气，自己触电身亡了。

文化界的思想改造是绕不过去的事情。早在1949年，茅盾就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买办文化”的概念，崇拜洋人、醉心欧美生活，“月亮也是外国的亮些”，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人民中间散播民族自卑心理，就是买办文化的特长。这些观念是当时文化艺术领域政策的前兆。1951年底，“三反”运动开始，当时的中央认为，文艺界的思想工作缺乏严肃性、作家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自由主义泛滥，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纠正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状态。有文件明确指出，

高等学校的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洗澡”和“过关”。

杨绛参加过几次“酝酿会”，就是背着被控诉的教师，集体搜集可资控诉的材料，比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杨绛也要准备自己的思想检讨，当时普遍的错误是“向上爬”或者“混饭吃”，她是散工不够“向上爬”、散工工资少、让教什么教什么，不够“混饭吃”，她的朋友暗示她症结在“animal farm”(《动物农场》)，她在课堂上介绍英国当代小说时，讲过这本书。她的“洗澡”顺利通过了。

可是到了晚上的控诉大会却横生枝节，当晚的主题是由学生控诉教师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如何毒害他们。一个女学生上台来控诉杨绛在教授精读《大卫·科波菲尔》时，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杨绛在《控诉大会》里解释，即便是进步的狄更斯，小说里也有会惹麻烦的内容，她的做法是跳过去。跳，有时就有绊脚石，本来是解答学生提问牵涉的几句话，却被编派成“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当晚的主持人是从年轻时就认识杨绛的费孝通，他递了张纸条给女孩，请她简短点，但是，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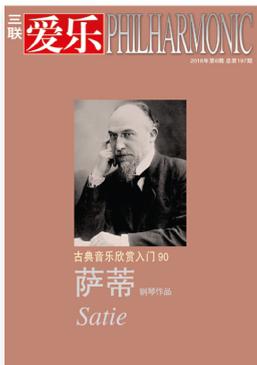
孩根本停不下来。

杨绛受到了侮辱，她说自己，内心却没有丝毫羞愧，第二天清早，喜盈盈地到菜场人最多的地方去。如果是娇嫩女人，大概关门上吊了。杨绛却迎着屈辱而上，把这个当作锤炼。她写道：当时，我的火气退去，就活像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控诉大会30多年后，杨绛写出小说《洗澡》，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进行讨论。“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这部小说里，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最后，“洗澡”没有得到预期效果，因为谁都没有自觉自愿。杨绛的观点十分明确，人需要改造思想，但这必须发自内心，政治运动是无效的。■

(感谢实习记者杨文轶对本文的帮助。参考资料：《我们仨》《听杨绛谈往事》《杨绛散文》《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文革反思与消费热潮》《1949，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抉择》《论杨绛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戏剧创作》《灰色上海，1937~1945 中国文人的退隐、反抗与合作》)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六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0

- 玩笑也优雅：萨蒂和他的钢琴音乐
- 孙健、段召旭、詹湛对萨蒂《裸体歌舞》、《梨形曲》和《玄秘曲》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霍洛维茨去国还乡后的首演

话题 霍尔斯特印度情结

爱乐笔记 键盘好声音之莱昂斯卡娅

现代音乐 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诺诺的世界

演奏家档案 访钢琴家卡蒂雅·布尼亚季什维莉

意想不到的大师，关于尤金娜2

唱片说明书 再听米尔斯坦最后的音乐会

作品 聆听索菲娅·古拜杜丽娜的室内乐作品

专题 钢琴家拜伦·贾尼斯的非凡人生

《爱乐》2016年订阅须知

2016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6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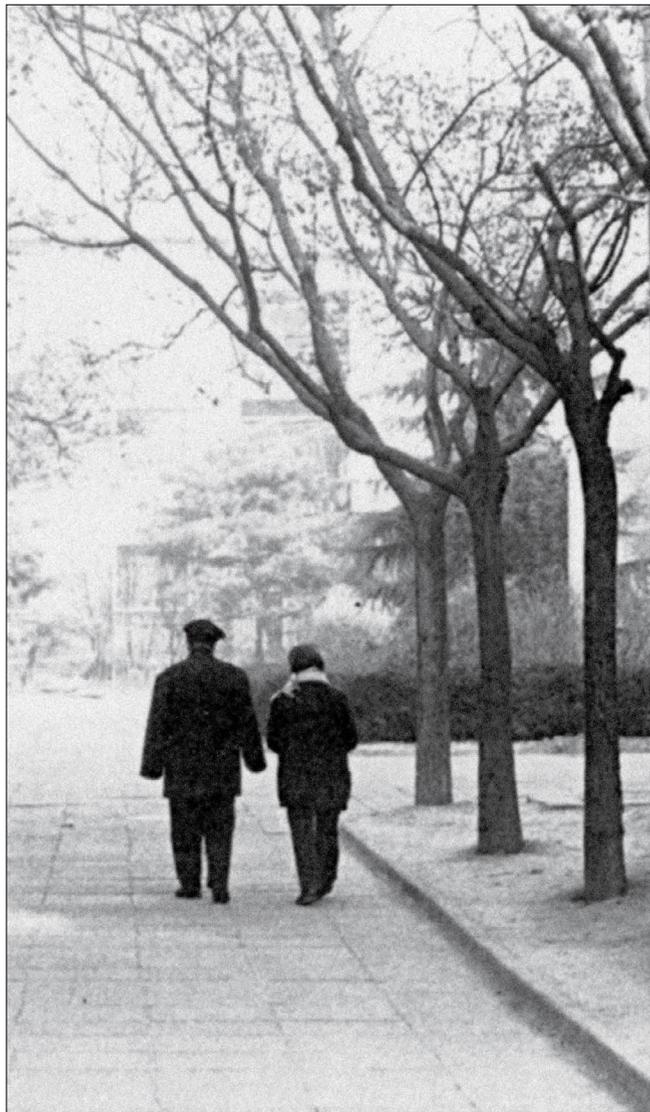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杨绛在“文革”：我的堂吉诃德

文 / 王丹阳

“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图片选自《听杨绛谈往事》）

钱锺书与杨绛在三里河寓所院内散步

揪斗示众

1952年，杨绛被分到尚附设在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1956年，文研所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者直到1977年撤销，成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由此开始了跌宕的“学部”生涯。“学部”在“文革”中也可谓是第一阵营里的学术单位，仅次于北大、清华，后来在她的多部回忆性作品中频繁出现。

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其所写的传记《听杨绛谈往事》中提及，时年98岁的杨绛总结道那25年间她就是一个“零”。“我开始有些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她佯佯不谙人间烟火，情愿靠边站，坐冷板凳。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文研所里几乎全都是大会代表，就她和钱锺书不是；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不参与者仅杨绛；文娱活动、社会活动总排最末；马列主义导向的课题计划她并不担待，一门心思埋头翻译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

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包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包括重译《堂吉诃德》。杨绛接到任务时被告知用任何语言转译都可，但她看了5种流行的英、法译本后，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替原作，于是在47岁时学起了她的第三门外语——西班牙语。直到1965年，她已经完成第一部的翻译，着手第二部时，她没有想到这项细水长流的工作即将被“文革”阻断8年。

“（1966年）8月27日，我交出《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当时第二部已译了四分之三。当日晚间，我在宿舍被剃了‘阴阳头’。”这天被她认为是非常不幸的一天，被没收的是她的誊清稿，没留底稿。正式被揪出来是在8月7日，她下班对在学部文学所上班的钱锺书说：“我今天被揪出来了，你呢？”“还没有，快了吧。”三天后，钱锺书被揪出来了。

之前，还没有一张控诉她的大字报，不过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就跳过了她，这仿佛是种已将此人逐出同类的征兆。再一次大会，忽然有人问：“杨季康，她是什么人？”但没人为她定性，她就这样无

缘于群众队伍了，组里秘书叫她以后开会不用来了。杨绛说：“我就这样被揪出来的。‘揪出来’算什么东西呢？还是‘妾身未分明’。”其实，所内在《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的气氛就愈见肃杀，人人在山雨欲来前如临无物之阵，办公室四壁上贴满红红绿绿的语录条，诸如“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揪出来之后还得待罪。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的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这是她在《丙午丁未年纪事 风狂雨骤》中描述的一段1966年5月16日后的情形。

在“文革”的舞台上，“五一六”意味着一场派系斗争后的改弦易辙。随着毛泽东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十年“文革”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拉开帷幕。对学部来说，也先是“五一六红卫兵团”，后被涂抹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天下，再由军宣队、工宣队入驻监督。在学部的牛鬼蛇神中年龄偏小、自认是无名小卒的杨绛跟其余人一样眼睁睁看风云变幻，如浮桴于海上。在她的干校记忆里，有过弄臣般的情形：军宣队在干校派来监视受隔离的“五一六分子”的老先生们，正是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揪出来的“反动权威”“苏修分子”等牛鬼蛇神。

被揪出来后，就要认真做自己的“牌子”了，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她这样描述那精工巧制的自制牌，给钱锺书找了个长方形小木片，自己的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个圆圈剪下”。各按规定，工楷写上一款款罪名，穿上绳子，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爱丽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她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越来越惊奇）。”

在造反派主导的“文革”舞台上，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上来配合演戏。杨绛20世纪40年代时写喜剧《弄真成假》，但她自称不爱也不善表演，她也许没想到有天会犹如笔下的角色粉墨登场“陪斗”。用休·沃尔波尔（Hugh Walpole）的话来说，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1949年以前的剧评家认为杨绛本质上是个悲剧作者，当《弄真

成假》让人笑中带泪时，想必杨绛是懂得现实辛酸中如何在黄连树下作乐的。

有次是正任学部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挨斗，杨绛在陪斗之列，席间竟然睡着了。忽而有人大呵：“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登台后第一件事就涉及戴高帽子的艺术，她习以为常地称是“登台就有高帽子戴”，但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形成自然低头式，这样会比垂直戴帽时低头来得省力。最初被揪出来时在大席棚里集体示众，初见别人头上的高帽子上写着“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苏修特务”时她还纳闷自己头上的写着什么，下台脱下一看是“资产阶级学者”，后来这帽子上的名目规范化了一番，她的就固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在历史的嘲弄中尽管人在物理上被颠来倒去地驱使，但她内心是淡定的。比如被红卫兵抓住就“老老实实”地按身上挂的牌子自报姓名，自背出罪名“拒绝改造、走白专道路、写文章放毒”，在“文革”的大型表演里，这种轻描淡写、消极处理式的应对何尝不是一种表演。她冷眼旁观着一切戏剧性人格在运动中的亢奋表演，时而凑合几句，时而躲进女厕，为的只是平安渡过每个难关。她没有被无限上纲上线，或许正源自之前坐冷板凳时太低产，以至于“小鬼不足道”。

“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不使掉落，眉头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学马那样站着睡觉。”如果被提名到麦克风前，无非就是自报姓名，自报身份，挨一顿乱骂，她觉得“上了台也不过如此”。在台上陪斗还不必表演，在台下就得充革命群众了，这就让她犯难了：“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

干校时期

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国开始掀起对“五一六”运动的清查。外文所开始清查“五一六”时，杨绛已经恢复群众身，被工宣队唤去翻译法文资料，为江青、姚文元等人所感兴趣的新时期法国剧院新花样服务。她一个人坐在当时外文所所长冯至的办公室里苦翻法文。她见过所里的“五一六”分子招供甚至自编认罪材料，在毛泽东像前含泪忏悔。但寒窗苦译下明哲保身是难的，工宣队就觉得她阶级立场不够，提醒她“你脱离群众不好”。

军宣队登台后，工宣队撤场，学部开始集体下干

校，一定程度上学部是带着清查“五一六”问题而下干校的。钱锺书是先遣部队，他曾回忆，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儿子加紧，一会儿子放松，但仿佛问歇虐，疾病始终缠身。

“那年（1969年）11月3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件大事……我们挤上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11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是月17号，文学所全所下放河南罗山。

当她和女儿钱瑗、女婿王德一在火车站送别先遣部队的时候，离情被闹嚷嚷、乱哄哄的候车室气氛冲淡，只是痴痴地望着钱锺书的远去，想起“从前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小货轮，送行者就把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彩色纸带先后绷断，岸上就拍手欢呼……”1935年夏，当她和钱锺书乘P&O公司油轮赴英时，也是由小船直送上大轮船，这个情景应该习以为常。

翌年7月，杨绛跟随外文所下放干校时，即使是只与钱锺书前后相差8个月，但情形已愁惨得多。一个月前，女婿王德一因不堪被诬陷为“五一六组织者”而自杀。58岁的杨绛在火车上望着女儿踽踽独归的背影，她在1981年付梓的《干校六记》上回忆道：“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在杨绛的自述里，很少直接描写到眼泪，即使是在钱锺书发哮喘、深夜抢救之时。而这一段雨打星散时的落寞和愁惨随着眼泪倒灌入胸腔，节制又让人动容。夫妻团聚时，干校已从罗山迁到淮河边上的息县，从和泥、脱坯、烧砖开始建造住房，后又迁到有玻璃窗的明港兵营……干校两年，杨绛管过菜圃、寄居过乡邻的席棚；在烂泥地上摆马扎看过广场电影；穿过沤肥的粪井、踢开菜地辨识回营的路；也曾在自己的床上差点摸到被猫破膛的腐鼠……

《干校六记》中有处触目惊心的记载。1971年1月，她留守息县的菜园，忽见几人在西岸动手挖土，还问她借了铁锹，刨起了坑。军宣队卷起大车上的芦苇席，里面是一具蓝色制服的尸体，一起埋下了坑。这让人联想到书写50年代末“反右运动”的《夹边沟纪事》，有的改造者饿死后甚至无柴火化，于是被剥光了扔入荒崖下任风沙覆盖。

中原的沃土起码能将死者埋葬，只是若不注意，

没人知道这个浅浅的土堆是个新坟。她告诉钱锺书，在溪岸上走，别踩那土堆，那是座新坟，底下就是身体。杨绛自己是出门就忘路的，“欲往城南往城北”，钱锺书更是路痴，可是在那两年，他们必须不再把走路看作浪漫主义的探险。

之后钱锺书打听到，那是很多被迫害致死的“五一六分子”中的一个，33岁，男性……这段惊悚的记忆留在《干校六记》里，提醒着人们“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留英殊荣、治学建树仿佛云烟，如今不得不提防眼前一个烂泥堆。杨绛说小时候住苏州故居时最爱下雨，后院、草木和石子都被洗得光洁无尘，只是那年的息县出门就是泥海，“息县的雨实在叫人鼓不起劲”。

“家在哪里”

1971年底，传闻说钱锺书在一批将回京的“柔弱病残”名单里，后来被证实是误传，他们夫妻俩送别了那批人后，踟蹰踱步到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锺书想了一下说：“没有书。”她又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锺书答：“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论及当初为何不走，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杨绛说他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千千万万的素不相识者。就像当时多数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并非出于更高的理想，而只是不愿背井离乡。但经此干校一役，杨绛在《干校六记》的尾声写道：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

对于这么一个生长在新旧之交时期、在江南深院长大，后来又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过法式教会建筑、在牛津住过英式公寓的知识女性来说，飘零流离、飞蓬如转仿佛是不可回避的命运。回顾杨绛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不停的物理迁徙中度过：辛亥革命后随父在京沪两地间轮流住；30年代去留洋；40年代在苏沪间辗转执教，同时维系着“灶下婢”的持家角色；解放后先后住清华、北大没几年，又随着中科院学部的迁移住到东四头条、干面胡同宿舍……干校回京后再次被迫搬家流徙，暂寄吃喝拉撒都一窝的女儿的北师大宿舍。

杨绛有意识地和政治保持距离，并得意自己“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亲密”，在干校里总特意把



在“五七干校”期间，下放的知识分子在整理中草药。中间拿秤者是原全国学联主席伍绍祖

自家奶糖分给“五一六分子”吃，以至于被叫作“人道主义者”。可即使她心中有杆和自己及他人相处的秤，却无法为现实中的自己指定一个永久的住所。在92岁时写《我们仨》时，她引了句白居易《简简吟》里的诗：“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不仅意喻着一家三口的天人永隔，还有她意识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40年代还在上海时，她写过一篇意识流散文《流浪儿》，写一个精神上的遨游者与昏暗逼仄的舍间。“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子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

他们是1962年搬到干面胡同的宿舍的，干校回来后那里是个整整10年的家。1973年，他俩因与邻居发生纠葛，搬去女儿钱瑗的北师大宿舍。那是个有着三张上下铺的阴潮房间，但是家徒四壁，连被子、褥子、枕头，都是各家送来的，还有“锅碗瓢盆、菜刀、

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钱锺书哮喘病发时呼吸经常时断时续，被杨绛戏称是“呼啸山庄”。那年1月，他又病发了一次，在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路上，“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液来了”。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道。那年她63岁。

5个月后，他们向学部文学所征得了一间办公室，1974年5月，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住了三年，用无锡老家话讲就是“坑缸连井灶”，用北方俗语说就是兼供吃喝拉撒的。这次，照样需左邻右舍帮忙。“为我们把那间堆满什物的办公室腾出来，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门上配好钥匙，窗上挂好窗帘，还给拉上一条挂毛巾的铁丝。”有人给他们拉来一车车的煤饼，堆在廊下，还装上特制风斗，以防煤气中毒。住了两年，还是差点煤气中毒，还是钱锺书摔倒在地的声音把杨绛惊醒，立即打开北窗，两人惊得挤坐一处等天亮。

多年后，杨绛对那间办公室改造的房所描述的布局，历历叫人唏嘘。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给他们搭成格子放书。

西墙顶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钱锺书伏案著《管锥编》。近南窗是一张小书桌，供杨绛译《堂吉诃德》，许多种大词典都摊在床上。在这间旋踵就打架的弹丸之室，杨绛说人就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里面还容纳了洗脸架、水桶、一只煤球炉……

也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钱锺书等人受江青指示完成了毛泽东诗词的英文翻译。“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钱锺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无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钱锺书旁边的椅上。”

在人前，两人冲着脸面说这房子很舒服方便，翻译组走后，两人互做鬼脸说“要江青给房子”。终于传来江青话说钱锺书可以住钓鱼台去，杨绛可同住照顾。杨绛却不客气地回话：“我不会照顾人，我自己都要阿姨照顾呢。”

政治与家

经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要做政治的局外人，多数只能在内心求得宁静和安稳，杨绛虽然也一直以“零”和“局外人”自居，但毕竟躲不过意识形态洪水猛兽的裹挟。最可悲的是意识形态入侵了千万个家庭，甚至导致父子反目、亲伦分崩，这些家庭的灾难是很多知识分子都曾经历的。钱锺书和杨绛在上海的好友傅雷夫妇在“文革”一开始就不堪凌辱自缢了，与其子留下难以弥补的阶级鸿沟。钱家也受到过相同的离间，杨绛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人，顺应着政治潮流，目的恰是远离政治，并呵护家的完整性。

1966年8月27日，她被剃成阴阳头的时候，并没有钻牛角尖或走极端，从《丙午丁未年纪事》的平静叙述里甚至可看出一丝不以为然，和一种冷峻的幽默。当时跟她同剃头的另一个家庭妇女般模样的人，是含泪合掌地求着人，但她就任由被剃掉半个头，不

反抗也不求饶。也许在当时她就想好兵来将挡的办法，回到家里后拿出女儿从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用小锅做椴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把头发一股一股缝上去”，连着一夜糊了一顶假发。

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于是她自嘲：“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坐车上班，只是被售票员发现了头上的异样而直呼她“黑帮”。这样，杨绛索性走路上班，但街上的孩子眼尖，又看出假发，伸手来揪，她说自己像个过街老鼠，尽量避着小孩，却也不愿同样剃了光头的钱锺书陪着走，“我还是独走灵便”。

那年，杨绛因为钱锺书辩诬而被拖上过千人大会，后来她恍悟：“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限，免得互相牵连，我却一口担保钱锺书的事我都知道。”那时钱锺书因为“黑材料”而被写了大字报，她在大字报边角上贴了小字报，在批斗会上，连钱锺书也看不下去，起身走出会场。“给钱锺书通风报信的是谁？”“是我。”“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是我——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台下一片怒斥，有人问她：“谁是你的同志？”

在一部纪录片里，当时同在外文所的叶廷芳回忆道：“她就跺着脚，两边脸涨得绯红，通红，‘就是不符合事情，就是不符合事实’，她没有别的话可说，就一再说地跺着脚。”所以，杨绛曾说钱锺书能忍能屈，但她自己不行。现场群情激愤时，有人递来铜锣和槌子，她干脆死劲地敲，聊以泄怒。后来她被推出去游街，戴着高帽，举着铜锣，但她心里是清醒的：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她还想着模仿桑丘·潘沙的口吻，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之后，她的应对就显得更圆融了。作为一个别有怀抱、即使在50年代都不以论文之多而取胜的人，她一心只想着翻译，而翻译也是因为1958年时钱锺书因《宋诗选注》被拔了白旗，她才暗下决心，不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文革”初期她被安排去打扫两间女厕，自己做了个小拖把，还带去了去污粉肥皂，特地刮铲掉多年积垢，擦得焕然一新，目的是还能在那儿背点诗词，那是她事先抄好放口袋的，背不出来就去厕所翻翻。“女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

作为一个别有怀抱、即使在50年代都不以论文之多而取胜的人，她一心只想着翻译，因为1958年时钱锺书因《宋诗选注》被拔了白旗，她才暗下决心，不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杨绛说。

“我每晚想到什么该毁掉的，就打着手电，赤脚到各处去搜出来。可是‘毁尸灭迹’大非易事。少量的纸灰可以浇湿了拌入炉灰，倾入垃圾；烧的时候也不致冒烟。大叠的纸却不便焚烧，怕冒烟。纸灰也不能倾入垃圾，因为准有人会检查，垃圾里有纸灰就露馅了。”这是《丙午丁未年纪事》里的话，描述了那段胆战心惊、夜不能寐的岁月，杨绛小心翼翼地周旋着，避免着麻烦。她还想出法子把字纸撕碎，浸在水里揉烂，然后拌进炉灰。为了避免麻烦可谓用心至极。

“救”堂吉诃德

在《我们仨》里，也可见她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是如何规避政治的，但与其说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还不如说更是她骨子里一种南方新式家庭的淡泊权利的性格，和之后作为平凡的持家人的明哲保身之道。钱锺书在中南海亲口听到毛泽东讲话，以为真心诚意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杨绛写了这么“刻薄”一句。她对钱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钱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但杨绛主张不鸣也不放。

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宋诗选注》受到批判，杨绛说过那么段饶有趣味的話：“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故作谦卑也好，真心忏悔也好，至少《宋诗选注》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也顺利出版了。杨绛在鸣放结束后更觉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一定程度上，“反右”期间的“清醒”，没有让她在“文革”时受到太大的刺激。

为人可周旋出空间，但杨绛在学术上从来不是应承之辈，宁愿做减法也不愿迎合上意，所以50年代“三反”时在清华教书，她情愿砍掉自己的“危险课”，并一直以非马列主义文人自居，自认是个思想自由的

无用的人。

文学所初成立时，冯雪峰和何其芳辩论阶级性和人性问题。杨绛不同意只有阶级性而不承认个性、人性。她问道：“贾府四姐妹四个性情，同样的阶级，同样的环境，但四个人一人一个样，怎么解释？”没人能回答。外文组修订研究课题，不是马克思读过并提过的作品一概不考虑，杨绛喜欢简·奥斯汀，但别人说马克思从没提起过奥斯汀，她说“也许马克思没读过简·奥斯汀”，惹得何其芳马上叫她闭嘴。

时经21年才译完的《堂吉诃德》贯穿了杨绛整个“文革”时代，是她事业的一大旨归。但在1966年8月27日，就是被剃成阴阳头的那天，她抱着牛皮纸包好的一大摞《堂吉诃德》译稿，挤上公交车，去单位上缴。当时，她刚译完第六册的一半（上、下部共8册）。前一晚的批斗会上，群众让她交出“黑稿子”。

直到军工宣队进驻学部后，她恢复群众身，才有些空子可以钻，“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我的译稿”。在下放干校之前，她终于要回了稿子，荒废了几年后于1974年开始重译，两年后译完。外文所担心她“下笔即错”，要换所里的年轻人代她写序，而出版社又希望杨绛写自序，这么一搞又经一年才付梓。

《堂吉诃德》在荒谬年代给了她很多乐趣，以及诙谐的想象，她自己也曾因淘气而引来现实的误会。1967年，造反派的风头一过去，她被“解放下楼”变成了“人身”，却被群众问及“四个大妖精是什么，犯了什么罪”。杨绛百口莫辩，原来是她一年前被抄家时没收的笔记本里，把“四个大跃进”戏写为“四个大妖精”。“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害我。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她写。

在誊清稿被没收以后，她曾遍寻稿子的下落。即使在年老时所做的忏悔和讨饶，也看似发自真心，但实则无奈的诙谐，在现实与虚拟的周旋中，撑出自己的小块青天。“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喷怪的。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

用最难的学问忘却最深的痛苦

记者 / 李翊



女作家冰心（左）与杨绛



（中新社供图）



（张希摄）

杨绛居住的三里河寓所客厅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三里河国务院宿舍区，唯一没有给阳台做封闭的，便是杨绛先生家。素粉墙，水泥地，老家具，简单朴素而满室书香。

1977年1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处的办事人员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她去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看房子。立春那天，杨绛母女由年轻朋友陪着，收拾行李迁入新居。杨绛怕钱锺书吃灰尘，把他当作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妥当后，再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

新居有四间房，他们把最大的一间作为工作室，也充客厅。临窗一竖一横摆放两张书桌，夫妇俩各据一张。沿墙是书橱，只西墙靠门有一对沙发和茶几。其余三间，夫妇俩和女儿各住一间，剩下的一间吃饭。院子大，环境清幽，绿荫夹道，早晚可在院里散步。



(图片选自《听杨绛谈往事》)

杨绛在家接待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获奖学生。她说话幽默，逗得大家直乐

一家人安顿下来，专心读书做学问。每月的工资、所需的书籍，都由外文所的董衡巽、薛鸿时等人领来、借来。

“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学术领域百废待兴之际，钱、杨两位先生工作繁忙，所里同事都不敢去打搅他们。可是，我们这代学人，长期受运动干扰，读书少，学殖欠厚实，是普遍现象。因此，大家在阅读经典和从事研究、翻译工作时，总会遇到查遍工具书和参考书也难以索解的问题。于是，许多人就利用我常去钱、杨家的机会，托我把问题带去问两位先生，结果总能使疑难迎刃而解。”薛鸿时是当年在学术翻译领域颇受杨先生扶持的“年轻人”，如今，却是我面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

起初，薛鸿时在外文所当编辑，主要从事中文工作。后来，学长发现他英文水平还可以，便向他约稿。有一回，《世界文学》的李文俊主编要他译一篇

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薛鸿时译成后没有把握，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他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原文第一句我用‘总之’开头，心想正好与原文‘in brief’对上，但杨先生教导我说，‘总之’只能用于总结上文，而原文是对别人提问的书面答复，意思是，‘你所问我的话，扼要地说……’如按我原来的译法，第一句的主要意思就不醒豁了。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素不相识的、《作家》杂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极大的艺术享受’，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文选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从事翻译工作的薛鸿时等人视为宝典。“她指出西方语文与汉语的构造大不相同，用释道安的话来说就是‘胡语

尽倒’，‘要把西方语文翻译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斗才颠倒得过来’。她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杨绛先生看到薛鸿时译出的长篇小说后，写信鼓励他说：“你的词汇和表达力都足以对付……你何不接着翻一本 Dickens 呢？”就这样，薛鸿时从此走上了研究和翻译狄更斯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受到杨绛先生的教导和扶持。

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偕王后访问中国，邓小平把杨绛翻译的《堂吉珂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贵宾，并问她《堂吉珂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中译本《堂吉珂德》是杨绛先生作为翻译大师最著名的代表作，也见证了她整整20年的磨难。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杨绛从清华调入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自此她便把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视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西班牙著名骑士小说《堂吉珂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杨绛翻译的法国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遂决定请杨绛翻译《堂吉珂德》。至1966年的“文革”初期，杨绛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

1972年，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老弱病残”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杨绛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可以重新翻译《堂吉珂德》了。朱虹说，为了忠实原作，从原文翻译起，年近五旬的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

“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重头再译。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一本一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胡真才说，“这次重译省力得多了。至1976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

遍，才于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

《堂吉珂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她坐在国宴主宾席上的镜头上了电视；她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妇女大会；她作为中国社科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珂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和和气气、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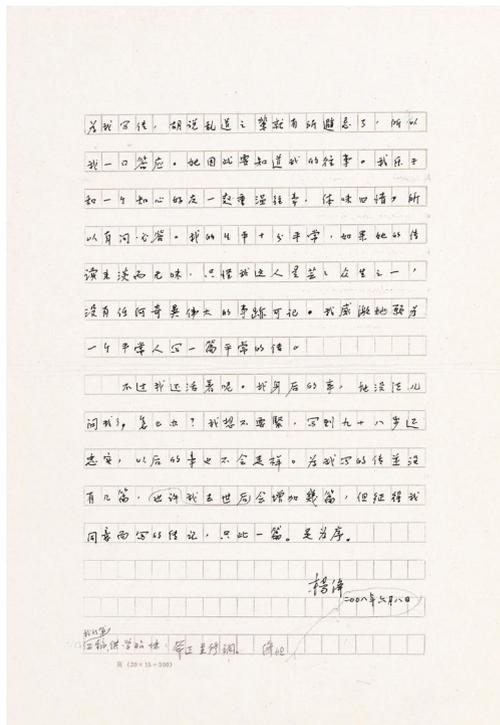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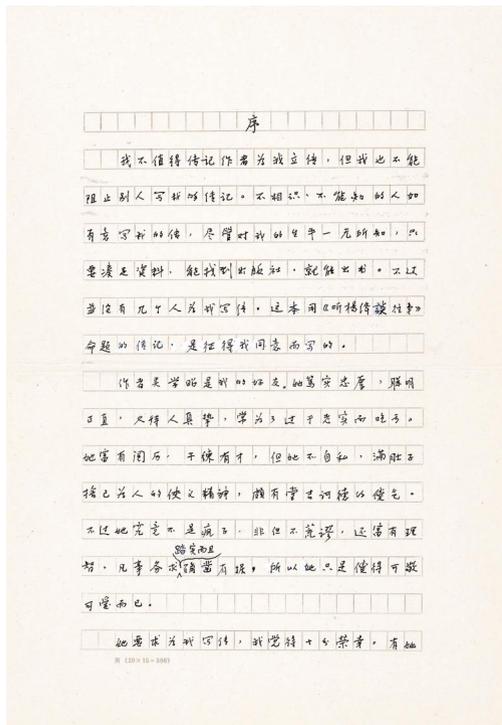
上世纪80年代，杨绛在翻译之余开始业余创作小说，接连写了《大笑话》《玉人》《鬼》《默先生》等多篇小说，又陆续写了许多篇怀人忆事的散文，以至于钱锺书在信中跟女儿玩笑说：“得信，知又大作论文，盖与汝母之大作小说，皆肚里有货之证，若我则搜索枯肠，不成片段，德谚嘲空腹所谓‘既无臭屎，亦无孩子’。”

杨绛的忘年交吴学昭曾经问过杨绛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杨绛很谦虚地回答：“我没有满意的作品。较好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好多篇中短篇小说是试图写各种不同的人物，我都改了又改，始终没有满意。”

1981年，当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之时，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锺书说，这本书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在杨绛家里，钱瑗和钱锺书是她作品的热心读者。钱瑗曾对爸爸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杨绛肯定说，锺书少年之作很精彩，

“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



1~2. 杨绛为吴学昭所著《听杨绛谈话》一书写的序

3. 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小说《围城》

4. 钱锺书在两人同存的《人·兽·鬼》扉页，给杨绛写了一句既浪漫又体己的话：绝不仅有的地结合了各不相同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她的散文只是平平淡淡。然而，据李慎之先生说，钱锺书自己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1982到1993年，钱锺书做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深自敛抑。他是唯一的非党员副院长，他努力做好分内的事，并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汽车也只好到医院看病时才坐。杨绛也深自敛抑，绝不出头。用吴学昭的话说，自1977年以来，杨绛已不复是零，但她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围城》和《洗澡》

1990年，根据钱锺书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国内播出，每一集的片头都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吟诵。用一座“围城”比喻普通人对生活中大多事物的感受，形象生动，流传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话是杨绛写的。

钱锺书曾对杨绛说：“按照常理，我应妒忌你，但我最欣赏你。”早在上世纪的1943、1944年，杨绛编剧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被搬上舞台，反响热烈，杨绛名气不小。《围城》出来后，

人们问作者钱锺书是谁，都说是杨绛的丈夫。

《围城》1980年重新出版，立刻成了畅销书，很多人在阅读之余，以小说为历史，开始考据起《围城》和它的作者来。各种信件，电话搞得钱锺书不胜负担。为了给钱锺书解围，杨绛便写了一篇不论对钱锺书或《围城》都具有文献意义的作品：《记钱锺书与〈围城〉》。分为“钱锺书写《围城》”和“写《围城》的钱锺书”两个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篇文章收入《围城》，作为附录。

杨绛用她“事实—故事—真实”的小说创作程式，解析一切小说和真人实事的关系；说明《围城》是小说，钱锺书不是方鸿渐。在第二部分，杨绛以不多文字最扼要地勾画出一个活脱脱的钱锺书，连他“拙手笨脚”的来由都一目了然。

《围城》畅销之后，北京、湖南、广州、辽宁等多家电视台要求把《围城》搬上荧屏，钱锺书都拒绝了。小说妙趣横生的幽默语言，要在影视媒介中体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蜀芹、孙雄飞、屠岸德等却锲而不舍，他们反复阅读这部小说，体会它的哲理内涵，寻求表现书中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的表现手法。他们花了三年时间写出了改编《围城》

的电视剧本。请了钱锺书和杨绛的老友、作家柯灵做文学顾问。1989年9月到北京登门求见。

为了节省钱锺书的精力和时间，杨绛帮助接谈，意见能说到点子上。她为导演黄蜀芹、编剧孙雄飞详细介绍钱锺书当年创作《围城》的经过。黄蜀芹后来称，她从杨先生“写《围城》的是淘气的钱锺书”这句话得到了灵感。

杨绛把他们留下的电视剧本读了两遍，40多处提出意见，对如何开头结尾都有详细的修改。最重要的是她指出：方鸿渐的性格是被动的，什么都不主动。电视剧不要给人造成他从这个女人追到另一个女人的印象，似乎他很荒唐。其实方鸿渐这个人心肠软，意志弱，略有才学，却不能干。钱锺书也强调“方鸿渐是个被动的角色，Things happen to him”。杨绛还说：“方鸿渐在感情问题方面也是被动的，实际上苏文纨在追他，他还受了鲍小姐的骗，与孙柔嘉结婚也是女方主动。”

在场景选择、道具设置、人物形象动作设计上，杨绛也有种种建议。

关于怎样突出主题，杨绛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她写了几句关键的话给黄蜀芹。那就是后来在电视剧开头作为开场白的吟诵：“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杨绛的意思，《围城》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而言，更泛指人性中的某些可悲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心理，所谓“东山望得西山高”。钱锺书很赞同杨绛的解析，并且引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称引叔本华的一段话来佐证。

电视剧《围城》放映以后，剧组部分同志曾到钱锺书和杨绛家里做客，陈道明建议将杨先生的《洗澡》也改编成电视剧，她没有答应。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新中国成立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肮脏”面彻底“清洗”。杨先生说：“《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写《洗澡》，也像钱锺书写《围城》时，她做钱锺书的第一读者一样，杨绛每写完一章，钱锺书就读一章。读完“游山”的一章，钱锺书对杨绛说：“你能写小说。你能无中生有。”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认为，《洗澡》是一部中国杰出的作品。它怀着希望和恐惧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第一次政治运动中的感受。杨绛运用

她善反讽和妙语的风格，描述遭受挫折的男男女女试图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寻找着落的那个时代，即使觉察到政治狂热和人性残酷，也从不失去她的幽默感和同情心。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洗澡》被许多人视为《围城》的姐妹篇，实际有很大不同。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认为：“《围城》是一个主角贯连全部的小说，而《洗澡》是一个借政治运动做背景，写出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横断面，既没有史诗性的结构，也没有主角。《洗澡》只有对话和描述，没有《围城》那种大段议论。《洗澡》笔调温润，讽刺挖苦不像《围城》那样尖刻。”

“我一个人想念我们仨”

1993年的一天，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10年。”杨绛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三年五年就够长的了。”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便住进了医院。

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外文所的郑士生也说：“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钱锺书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绛，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缓解两位老人焦虑的灵丹妙药，莫过于他们的宝贝女儿钱瑗。她为家里买日用物品，说说外面的新闻，两位老人听着觉得新鲜。她还忙里抽空研究菜谱，时不时做几样时令菜肴，请父母尝鲜。钱锺书能吃一点

杨绛的意思，《围城》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而言，更泛指人性中的某些可悲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心理，所谓“东山望得西山高”。钱锺书很赞同杨绛的解析。



(图片选自《我们仨》)

1980年，钱瑗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进修两年后回国，用留学时学的厨艺做拿手菜孝敬父母

儿，杨绛没有胃口，偶尔试两口，钱瑗就高兴得了不得，会说“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钱瑗是二老的安慰，也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从未刻意教育女儿，但是钱瑗的为人处世，在性格和作风方面，同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杨先生说：“圆圆也像锺书一样惜时如金，嗜书如命。连翻书的样子都像，哗哗地一页页很快翻过，一目十行，全记得。”

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也像杨绛一样，为他人忙得像陀螺，没有自己的时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当年秋冬腰疼加剧，起不了床，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3月，确诊是肺癌晚期。

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1997年3月3日。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第二天下午就在安睡中去世了。一年后，钱锺书临终。病中，钱锺书曾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悬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杨绛说：“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钱锺书说：“那就

要看我身后的人喽！”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社科院时任院长李铁映闻讯赶来，杨绛转述了钱锺书的交代：“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她一路说到电梯口，李铁映最终说：“你给我出难题了，这事我做不了主。”

晚上，在孑然一身的家中，杨绛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电话，他对钱锺书的去世表示哀悼。“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钱先生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久久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薛鸿时回忆说。☑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吴学昭所著《听杨绛谈往事》)

别跟我谈青春 够高薪就值得上

350万高薪职位快速反馈，有投必应
zhaopin.com



拼搏

燃青春
趁现在



下载智联招聘APP
快速反馈，有投必应
010-58635888

凭理智来领会世界

主笔 / 薛巍

她说：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决不放弃理想”。她的议论仿佛是在谈人，又似乎是在说己。

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

1949年，杨绛得到清华大学聘书，兼任教授，教“大三”英国小说。她说英文是她的第一外国语，对英国小说有心得自不待言。她在《记我的翻译》一文中说：“我在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之前，写了一篇研究菲尔丁的论文。我想自出心裁，不写‘八股’，结果挨了好一顿‘批’。从此，我自知脑筋陈旧，新八股学不来……”

《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写于1957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梅女士在《“听”杨绛先生话文学》一文中说：“其中一段以仅仅六百余字的篇幅撮要复述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和史诗的议论，十分清晰明了，即便从未接触过《诗学》的读者也绝不至于搁浅。”这大概要归因于杨先生曾根据英译勒勃经典丛书并参照其他版本，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2004年，法国学者刘梅竹问杨先生：“外国作家中的简·奥斯汀和中国作家中的凌叔华二位的作品风格和您的最相近。您能接受这种说法吗？”杨先生回答说“不能接受”。但她对奥斯汀肯定是颇为赏识的。1982年，杨绛先生写了《有什么好？——读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之所以提出“有什么好”这个问题，大概是因为有人觉得《傲慢与偏见》乃至奥斯汀的所有作品都“平淡无奇，没有令人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场面。情节无非家常琐碎，如邻居间的来往、茶叙、宴会、舞会，都是乡镇上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奥斯汀的小说是描绘世态人情的喜剧，她激发的笑是启人深思的笑。杨先生在文中写道：“奥斯汀有着明辨是非、通达人情的头脑。她生性开朗，富有幽默，看到世人的愚谬、世事的参差，不是感慨悲愤而哭，却是了解、容忍而笑。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称引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

（图片选自《我们仨》）



杨绛工作照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杨绛

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奥斯特丁是凭理智来领会，把这个世界看作喜剧。这样来领会世界，并不是把不顺眼、不如意的事一笑置之。笑不是调和；笑是不调和。内心那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坚定不移，不肯权宜应变，受到外界现实的冲撞或摩擦，就会发出闪电般的笑。”

中国社科院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在《“翰林院”内外》一书中说：“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以前，杨季康在卞之琳所统率的西方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研究课题是英国小说，上至18世纪的菲尔丁，下至19世纪的狄更斯、萨克莱，基本上就是英国18、19世纪的被惯称为现实主义的范。季康先生后来于1979年出版的《春泥集》就是她五六十年代任研究员所写的研究论文的结集。书名

很谦逊，取自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意指她这些文字只不过是‘零落的残瓣’，可充繁荣百花的一点儿肥料。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不到10万字，但每篇文章的学术内容高度凝练扎实，风格极为清爽洁净，文如其人，就是一个简洁、干净、利落！学术研究文章写成如此，何况日后的散文？这时已可预示季康先生特有的那种淡泊纯净、含蓄内敛的风格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说：“我们都知道杨先生是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但其实她也是文学评论家。1957年，《文学评论》杂志创刊不久，她就上面发表了论菲尔丁的文章。可以看出，为了撰写这篇论文，杨先生花费了很多心力。这篇文章中新见很多，而且她没有使用流行的套话。从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她对英国文学的造诣很深，完全可以跻身一线研究员的行列。”

“奥斯特丁更不容易说，因为看过她的作品的人很多，至少看过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杨先生这篇文章没有论文的架势，有随笔的味道，但文中充满真知灼见，观点很到位。她说奥斯特丁的讽刺很淡，都是轻微的嘲讽，写得很细腻。钱锺书先生的讽刺就很浓，把一些人物写得很恶心。在这方面，她比钱锺书高明。她还写过关于萨克雷的评论，显示出极高的理论修养，表明她对18、19世纪的英国文学驾轻就熟，她的论文代表了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她的一些译后记都是很好的书评文章。”

杨译《堂吉珂德》：流传最广的中译本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盛宁说：“我最早读过的杨绛先生的书是她翻译并写了长篇介绍的《小癞子》，记忆中它好像只是薄薄几十页的一本小册子。然而正是它，让我知道了凡以主人公流浪（旅行）经历的形式来表达人生旅程这一宏大主题的文学，都可归类于一种叫作流浪汉文学的传统，而《小癞子》就是这一文学传统迄今为止可以寻到的发端之作。”

柳鸣九在《“翰林院”内外》一书中写道：“杨绛的翻译产品丰硕，《小癞子》《吉尔·布拉斯》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才出版的《堂吉珂德》基本上都是她在‘翰林院’供职期间译出的，几乎囊括了西欧文学中流浪汉体小说的全部名著，成绩斐然，可谓译出了一个系列，一个体系。这是其他任何翻译家包括傅雷也没有

做到的，这既需要有成熟的文学史的视野与见识，更需要有足够传达出这类小说风格的高超译技与精湛语言修养。”

黄梅在《“听”杨绛先生话文学》一文中说，杨先生对流浪汉（婆）们的偏爱让人“迷”且“惑”。她译的小说，如《小癞子》和《吉尔·布拉斯》都是典型的流浪汉小说。堂吉诃德虽然不是正宗的流浪汉，但至少有不少在各地和各阶层中云游的经历，出门碰运气的农夫桑丘就更多一点流浪气。让人惑的是这类在法网边缘上图些便宜的出身卑贱的无业游民，和杨先生这样的名门闺秀、严谨学者距离太远，反差太大。莫非吸引杨先生的，恰恰是这个距离和反差？她关于这些‘下里巴人’的故事的译文和论文背后，有一种对人特别是对和她本人有相当距离的芸芸众生的深刻的关心和好奇。

陆建德说，杨绛先生在困难时期一直自学西班牙语，把时间都用在了刀刃上，这让她多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杨绛先生在她的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记载：1958年开始自习西班牙语，1965年，《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1972年8月，又从头翻译《堂吉诃德》，因中断多年，需从头再译。1978年《堂吉诃德》出版。1985年12月23日，《堂吉诃德》校改毕，稿二包，亲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杨绛先生在论述《堂吉诃德》的文章中写道：“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决不放弃理想。他使得海涅为他伤心流泪，对他震惊倾倒。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也有同样的看法。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至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获得。

“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堂吉诃德》也不仅是一部夸张滑稽的闹剧作品。单纯的闹剧角色，不能充当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读者对他的兴趣不能持久。堂吉诃德虽然惹人发笑，他自己却非常严肃。堂吉诃德不止面貌严肃，他严肃入骨，严肃到灵魂深处。……作者嘲弄堂吉诃德，也仿佛在嘲弄自己。堂吉诃德确是个古怪的疯子，可是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疯，或自己觉得和他有相像之处。”

英国作家贾斯伯·瑞斯（Jasper Rees）在《现代疯子》一文中描述了《堂吉诃德》的重要性：“在米兰·昆德拉看来，当堂吉诃德跨上他高贵的老马‘驽骍难得’上路时，现代时期以及小说就诞生了。《堂

吉诃德》自1605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为西方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的作品之一。跟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等杰作不同，它不是把卑躬屈膝的读者推入高大的神或英雄的轨道，而是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在读了许多骑士传奇之后，希望像以前英勇的骑士那样完成丰功伟绩。因此昆德拉称它为第一部小说。这是一个普通人首次成为史诗的主角，他除了破破烂烂的中世纪盔甲之外，什么都不剩。传奇小说已死。主人公只能靠他自己、靠他迟钝的侍从桑丘。他们一起组成了人类精神的两个对立面。堂吉诃德是一个幻想家，桑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部小说记录了他们令人捧腹的历险，最终闹剧让位给了同情和自我认识的救赎。”杨绛先生也曾经强调，“桑丘是堂吉诃德的对照，好比两镜相对，彼此交映出无限深度。”

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说：“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对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应该是十几个全译本中发行量最大的。她本身是作家，中文功夫很高，所以她的译本比较受欢迎。至于有人说她的译作中有些错误，任何译本都会有这个问题。毕竟这是一本100万字的书，哪个词没有查可能就会出问题。《堂吉诃德》是西方长篇小说之父，在西方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响和影子。杨绛先生说读者可以跳过一些段落，这可以理解，塞万提斯这部小说是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一部作品，当时流行的是巴洛克文学，中国人读起来费劲，就像外国人读《红楼梦》一样，对于一些细节描写也会感到吃力。”

杨绛先生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说：“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发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她在《斐多篇》中把苏格拉底之妻的名字Xanthippe译为“任娣”，以前这个名字有各种古怪的译法。

杨绛先生在论述《堂吉诃德》的文章中写道：“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决不放弃理想。他使得海涅为他伤心流泪，对他震惊倾倒。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也有同样的看法。

杨绛先生在《翻译的技巧》一文中说：“简掉可简的字，就是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所谓点烦。芟芜去杂，可减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据赵振江说，这种做法在翻译界争论较多，因为翻译还是要忠实于原文。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圣华教授则说：“杨绛先生《翻译的技巧》原称《失败的经验》，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多年来每次上翻译课时必定列为参考数据。杨先生在文中提出唐刘知几点烦的主张，切中要弊，是翻译名家的心得，值得郑重推荐。一般人之所以诟病这个说法，一是因为不了解中外语法的差异，二是因为自己的母语水平太差。”对此她在《翻译中的“点烦”与“添烦”》一文有专门论述。

《斐多》：哲学的慰藉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去世，1999年杨绛先生开始翻译《斐多》。

早在1989年，她在《读书苦乐》一文中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加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旁，听他和一伙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梯忒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

《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谈到杨先生翻译时采用的底本：“她已翻译了这篇对话录的一半，忽想起钱锺书认为西洋古典书籍最好的版本是勒布经典丛书版，而她的翻译却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就忙请友好的同事为她借得洛布（Loeb）版的柏拉图对话集希腊原文与英译本对照本（英国伦敦1953年版）第一册《斐多》，又参考研究了英美出版的许多种斐多专家对这篇对话录的评论和注解。”Loeb古典丛书是美国人詹姆斯·洛布发起的普及古典著作的成果，

“我们活一辈子，应该尽力修养道德、寻求智慧……如果一个人临死愁苦，就证明他爱的不是智慧，而是肉体，也许同时也爱钱，或是权位，也许又爱钱又爱权位。”

1912年开始出版，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杨先生依据的洛布版英译本还有一篇介绍，说“《斐多》这篇对话的直接目的是说明，哲学家乐于赴死。为了证明死亡的意愿是合理的，就要证明在身体死后灵魂仍然继续存在”。在这篇对话的开头，有人问斐多，苏格拉底临死是怎么个样儿，他回答说：“瞧他的气度，听他的说话，他是毫无畏惧而且心情高尚地在等死，我觉得他是快乐的。”

《斐多》只有不到100页，它的核心是论证灵魂是不朽的，这是一个形而上学话题，用罗素的话说，苏格拉底的论证并不十分有力，但“这篇作品是西方文学的杰作之一”。杨绛先生说它“是一篇绝妙好辞”，比如苏格拉底说：“天鹅临死的时候，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可是人只因为自己怕死，就误解了天鹅，以为天鹅为死而悲伤，唱自己的哀歌。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它们有预见，它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就在自己的末日唱出生平最欢乐的歌。”

对于“追求哲学是学习死”，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一书中做了阐述：“柏拉图用各种形式说过，哲学是面向死亡的一种修炼。但是，他却是用一种悖论的方式言说的。他想说，需要把灵魂从肉身中脱离。这指的不是面向死亡的修炼，而是一种涉及精神生活、知性生活或者思维生活的修炼，指的是在找到感性认知之外的另一种认知方式。我们也可以说，需要从经验的、低级的、注定会死的自我过渡到超越的自我。苏格拉底在《斐多》里清晰地区分了在喝过毒芹酒之后就要变成一具尸体的自我与在精神层面行动和对话的自我。这指的完全不是为死亡做准备。他想说的仅仅是需要把自身从感性生活中抽离。面向死亡的修炼是一种面向生命的修炼。”所以苏格拉底提出，活着的时候要爱护灵魂，不仅今生今世爱护它，永生永世都爱护。

杨先生之所以决意要翻译《斐多》，除了逃避悲伤，应该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柏拉图描述的哲学家伟大的人格、哲学家倡导的活法：“我们活一辈子，应该尽力修养道德、寻求智慧……如果一个人临死愁苦，就证明他爱的不是智慧，而是肉体，也许同时也爱钱，或是权位，也许又爱钱又爱权位。”苏格拉底临死前对他的朋友们说：“我听说，人最好是在安静中死去。你们要安静，要勇敢。”

帮我们 拯救 它的 微笑



自由游弋的江豚总是面带微笑。它们活泼温婉，聪明而有灵性，是长江里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可是工业污染、过度捕捞，以及过多的航运与水利工程，让它们变得比大熊猫还要珍稀。

为了给江豚留下最后的家园，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建构湿地保护网络，促进江湖联通。只有保护好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才能给珍稀的江豚创造最后的生存繁衍机会，让它们的微笑延续下去。地球是我家，一起保护它。了解详情，请访问 50.wwfchina.org



明星股东们的造富运动

主笔 / 谢九

最近几年来，上市公司牵手影视明星逐渐成为 A 股市场的新风潮，曾经专业的资本市场，俨然已经成为明星们“一夜暴富”的淘金乐园。尤其是近期唐德影视拟高价收购范冰冰旗下爱美神公司 51% 的股份，更是引来深交所发函关注，将影视明星在 A 股的造富运动推向高潮。

上市公司和影视明星的合作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对明星旗下公司的收购价过高，而且后者的公司大多成立不久，并没有过多的历史业绩和可靠的估值标准，这就使得上市公司的收购行为看上去几乎就像是给明星们白白送钱。

比如最近引发高度关注的唐德影视（300426）收购范冰冰旗下的爱美神，成立时间不到一年，注册资本 300 万元，唐德影视拟收购其 51% 的股份，虽然尚未公布具体收购价格，但是唐德影视公告称此次收购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重大资产重组通常有三个标准：收购标的总资产超过上市公司总资产的 50%；收购标的净资产超过上市公司净资产 50% 且高于 5000 万元；收购标的的营收占比超过上市公司营收的 50%。唐德影视 2015 年度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是 14.8 亿元和 8.7 亿元，以此标准来看，意味着爱美神公司 51% 股份的估值应为 7.4 亿元或 4.35 亿元。一家成立尚不足一年的公司能够达到这样的估值，即使是放在一向高估值的高科技领域也并不多见，引发公众质疑甚至深交所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去年 10 月，华谊兄弟（300027）以 7.56 亿元收购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娱乐有限公司 70% 的股份，后者主要股东包括李晨、冯绍峰、杨颖等等艺人明星，该公司仅仅成立一天之后就被华谊兄弟以 7 亿多元收购，也是引发公众一片质疑。去年 11 月，华谊兄弟再以 10.5 亿元收购东阳美拉公司 70% 的股权，该公司成立也仅有两个月时间，99% 的股份由冯小刚持有；截至华谊兄弟公告收购之日，东阳美拉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资产总额 1.36 万元，负债总额 1.9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0.55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500 万元。

在 A 股市场，上市公司利益输送的事情虽然时有发生，但通常是上市公司向大股东输送利益，但像影视公司这样大手笔向外人输送利益，在商业逻辑上难以成立。从更深层面来看，其实是上市公司在业绩增长压力之下，通过快速绑定明星资源，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利润增长点，虽然这种利润增长点未必可靠。

比如华谊兄弟收购浙江东阳浩瀚和东阳美拉时就表示：“本项目的实施是公司加强电影、电视剧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加强公司储备项目的能力，对公司在电影、电视剧业务发展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公司通过加强电影、电视剧业务，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司的收益，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暴风科技收购稻草熊公司时表示：“稻草熊影业作为业内优秀的影视制作机构，其推出的影视剧集具备良好的市场基础，可以帮助暴风科技吸引更多流量、提升广告品牌价值。同时暴风科技长年积累的视频服务数据又能够与稻草熊影业团队长年的影视经验相结合，对项目选取成功率、市场认可度都具备显著的提升作用。”

上市公司牵手影视明星，也是一场多方博弈的游戏。表面上看，上市公司为明星们的“皮包公司”动辄支付数亿元的对价，但作为资本市场的游戏主角，上市公司们的智商显然不会如此低下，影视明星们刚刚成立不久的公司转瞬就能以几亿元卖给上市公司，其实也远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风光。

从最近几年上市公司收购明星公司的案例来看，大多数存在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明星和上市公司之间有对赌协议，也就是明星必须保证未来几年之内其公司业绩能够达标，否则需要以现金补齐；其次，上市公司虽然以高价收购明星的公司，但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以全部现金支付，而是以少部分现金加公司股份的形式，明星能够拿到手的现金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多，更多还是转化成上市公司股份，这就使得明星和上市公司成为更紧密的利益结合体，如果上市公司股价下跌，明星所持股份市值也会大幅缩水。而上市公司支付给明星的现金部分，也并非由上市公司自掏腰包，而是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融资，而对于参与定增的投



(张白兔拍摄)

2015年2月17日，影视明星范冰冰和赵薇以唐德影视股东的身份出席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八楼举行的上市仪式

资者而言，可以按照当前市价打折的优惠价格参与定向增发，自然也是乐得捧场。在这场多方博弈的游戏当中，只有散户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除了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利之外，没有任何参与博弈的砝码。

近期唐德影视收购范冰冰的爱美神公司虽然关注度颇高，但是由于收购细节尚无公布，因此无从分析，另外一家同样关注度颇高的收购案则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可供解读。

今年3月中旬，暴风科技（300431）发布公告称，计划以10.8亿元收购稻草熊影视公司60%的股份，后者的股东为刘小枫、刘诗施（演员刘诗诗）和赵丽颖。暴风科技此次收购的方式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分别收购刘小枫、刘诗施、赵丽颖所持有的稻草熊影业47.40%、12.00%、0.60%的股权，三人在这次收购交易中所得分别为：2.56亿元现金和5.97亿元市值暴风科技股票；6480万元现金和1.51亿元市值暴风科技股票；324万元现金以及756万元市值暴风科技股票。

即使是上述所得，也并非意味着可以全部落袋为安。按照收购协议，稻草熊原有股东刘小枫、刘诗施、赵丽颖需要做出业绩承诺，稻草熊影业2016年度的

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2016年度和2017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2.4亿元，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4.36亿元，并同意就稻草熊影业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部分进行补偿。资料显示，稻草熊公司2014年净利润为-23万元，2015年净利润为2852万元，如果想要实现业绩承诺，还是具有较大的难度，否则就需要对净利润不足部分予以补偿。而稻草熊原有股东得到的暴风科技股票，未来变现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暴风科技是A股市场有名的“妖股”，2015年上市之后曾经连拉30多个涨停板，股价一度逼近150元，今年3月至今，3个月之内，暴风科技股价跌幅超过30%，这也就意味着稻草熊原来三大股东的身家也随之大幅缩水，而按照收购协议的规定，稻草熊原有三大股东获得的暴风科技股票，分别有12~36个月不等的锁定期，在波幅巨大的资本市场，未来能够以怎样的价格变现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

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此次收购并不需要上市公司自掏腰包，而是通过定向增发来募集资金，因此，上市公司看似为收购付出了高达10.8亿元的代价，但其实并未拿出一分钱的真金白银，同时在稻草熊股

东的业绩对赌协议下，为公司未来业绩寻找更多的利润增长点。由此也不难看出，上市公司虽然对明星看似慷慨，但是资本市场的钱也并不那么好赚。

在此次暴风科技收购案之前，更引人关注的是去年华谊兄弟公司对明星股东的一系列收购案。去年11月，华谊兄弟宣布以10.5亿元收购冯小刚旗下东阳美拉公司70%的股权，冯小刚同样也给出了5年的业绩承诺期，2016年度承诺的业绩目标为税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自2017年度起，每个年度的业绩目标为在上一个年度承诺的净利润目标基础上增长15%，一直持续到2020年。如果没能完成某个年度的业绩目标，则以现金的方式（或目标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补足目标公司未完成的该年度业绩目标之差额部分。

如前所述，在收购冯小刚公司之前，华谊兄弟在去年10月份还以7.56亿元收购浙江影视娱乐有限公司70%的股份。在此次收购中，所有东阳浩瀚的明星股东也给出了5年的业绩承诺期限，自标的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2015年度承诺的业绩目标为税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9000万元，自2016年度起，每个年度的业绩目标为在上一个年度承诺的净利润目标基础上增长15%。

如果比较暴风科技和华谊兄弟的收购案不难看出，两家上市公司在大手笔收购明星公司的同时，都要求明星股东给出了业绩承诺，暴风科技要求3年的业绩承诺，华谊兄弟要求5年的业绩承诺。不同的是，暴风科技的收购是以现金加股份的方式收购，而华谊兄弟的收购都是以现金一次性支付，相比之下更显慷慨。不过，华谊兄弟看似慷慨的背后，其实是相对更为理性的收购，从估值水平来看，华谊兄弟对明星股东的收购价格其实并不算高。以收购冯小刚公司为例，华谊兄弟以10.5亿元收购冯小刚旗下东阳美拉公司70%的股权，意味着对这家公司的整体估值水平为15亿元，按照冯小刚给出的业绩承诺，2016年实现净利润1亿元，意味着公司的收购市盈率为15倍，如果东阳美拉公司的业绩能够达标，15倍的市盈率是一个并不高的估值。从收购浙江东阳浩瀚公司来看，以7.56亿元收购其70%的股份，意味着后者的整体估值为10.8亿元，按照公司承诺业绩2016年实现净利润1.035亿元，意味着收购市盈率为10.4倍，更是远低于冯小刚旗下的公司。因此，如果收购标的都能够实现承诺业绩，华谊兄弟以现金一次性支付，其实还是很划算的交易。相比之下，暴风科技的收购

估值就贵了很多，公司以10.8亿元收购稻草熊影视公司60%的股份，意味着稻草熊影视公司的估值为18亿元，按照业绩承诺，稻草熊影业2016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对应着公司收购市盈率为18倍，远远高于华谊兄弟的两宗收购案。

不过，尽管上市公司牵手明星的资本运作看似多赢，但却忽视了普通投资者的利益，而更重要的是，上市公司收购明星公司之后，是否真的能够增厚公司业绩，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由于明星旗下公司大多没有可靠的历史业绩，普通投资者对于这种高价收购并不看好，纷纷选择了用脚投票。华谊兄弟去年年底宣布系列收购方案至今，公司股价最大跌幅接近一半，暴风科技今年3月宣布收购方案之后，股价跌幅也超过三成，而宣布高价收购范冰冰公司的唐德影视尚在停牌之中，预计复牌之后股价表现也不容乐观。

影视明星的公司更多成为上市公司的收购对象，背后更深层次还是体现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压力。高价收购范冰冰公司的唐德影视，今年一季度主营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大幅下滑59%和72%，而一向保持高速增长的华谊兄弟，去年业绩增速也明显放缓，2015年的净利润增长不足9%，“扣非”（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更是负增长12%，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增长也只有7%，扣非后负增长40%，而暴风科技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只有300多万元，扣非后更是出现亏损，这样的业绩显然难以支撑公司的高估值。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希望绑定一线明星，为公司利润增长寻找更多出路。

事实上，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来收购资产原本是非常普遍的资产运作，既可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又为二级市场炒作提供新的题材，只不过随着收购的资产变成影视明星的公司，公众关注度也就骤然提升。除了影视明星之外，上市公司在其他领域的资产收购也同样如火如荼，只不过公众关注度不如收购明星公司那么高。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业绩压力也随之加大，由于内涵式增长越来越难，通过收购实现外延式扩张成为上市公司增长的重要途径。定向增发已经成为目前A股市场最主要的融资途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26日，A股市场的IPO融资额大约为200多亿元，而通过定增募集资金高达5000多亿元，定向增发已经成为目前A股市场绝对主流的融资模式。

通过定增实现外延式扩张，能够成功的关键仍在于收购的标的资产是否优质。如果确实能够增厚公司业绩，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增长点，公司的这种收购扩张策略就可以实现多赢——上市公司实现业绩增长，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快速实现资本增值和套现，参与定增的投资者在提供融资需求时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更多的普通投资者则受益于公司股价上涨。但如果上市公司收购的只是劣质资产，最终带来的结果则是多输。上市公司没能实现预期的业绩增长，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套现程度有限，公司股价下跌，参与定增的投资者和公司普通股东都被套牢。

类似这样的多输局面在A股市场并不鲜见。统计数据显示，以去年A股市场的并购案来看，有500多家上市公司给出了业绩承诺，其中有100多家的业绩承诺没有达标，占比约为两成。一旦收购标的业绩承诺不能达标，上市公司的业绩和股价都将形成负向反馈，最终结果就是上市公司业绩压力越来越大，而

公司的投资者因此遭受股价下跌的损失，即使是以折扣价参与定增的投资者，也并不安全。截至5月23日，今年实施完成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共600多家，其中股价跌破定增发行价的有120多家，占比超过20%。由于现在A股市场行情并不乐观，定向增发在熊市行情下也越来越难以操作，去年共有50家上市公司最终终止了定向增发，今年前5个月已经有50多家宣布终止定增，合计金额超过1000亿元。

回到上市公司高价收购明星公司这一话题上来，其真实的核心不在于上市公司付出了怎样的价格，而在于被收购公司的资产是否足够优质，是否能够为公司带来实质性的业绩改善。如果被收购的明星公司确实能够实现预期的业绩高增长，那么享受高溢价收购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最终被证实只是空壳皮包公司，而并无创造利润的能力，那么现在高价收购明星公司的行为，就只是资本市场又一轮的博傻游戏，在短暂风行之后又会悄然消失。☑

踏寻旅人心目中的心灵圣地
深入绝美与隐秘之境
呈现与众不同的行走记忆

最美的滇与藏

生活周刊
最美的滇与藏
· 昆明· 普洱 · 西双版纳

可在以下电商购买本产品

亚马逊 amazon.cn JD.com 当当网 dangdang.com

内含周刊：
《最美的滇藏线》
《去墨脱》
《腾冲》
《西双版纳》



1945年8月6日，B-29型轰炸机“恩诺拉·盖伊号”在广岛上空投下了人类第一颗实战原子弹“小男孩”

奥巴马访广岛，何以起风波？

文 / 刘怡

奥巴马本人对其“无核武世界”代言人形象的重视，以及继续夯实美日同盟的需求，意味着5月27日的广岛之行带有浓厚的表演性质。但同样有人质疑这是一种过火的历史修正主义表态。

71年之后，又有一位美国总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5月10日，在宣布奥巴马总统将于本月27日伊势志摩G7峰会后访问广岛的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

约什·厄内斯特将1945年杜鲁门总统下令对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策形容为“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一表态与同一天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在其官方博客上发表的文章基调一致，即淡化对历史事实是非性的争论，强调此次出访之于当下美日关系以及美日同盟前景的意义，并再度呼应奥巴马在2009年布拉格演讲中提出的“无核武世界”（Nuclear Weapons-free World）口号。

但这毕竟是一次具有极大政治敏感性的出访。自1945年以来，美国已经经历了12位总统，其中只有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吉米·卡特在卸任3年之后造访过



2016年5月27日，奥巴马到访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并献上花圈

广岛。2011年“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外交电报显示：尽管奥巴马本人在2009年11月首度访日之际就流露出访问广岛的意向，但被日本外务省婉拒。当时正值日本六年一度的全国反核集会结束不久，日方担心美国总统的到访非但不能显示和解之意，反而会激起反核主义者对美军在日本储存和部署核武器的愤慨。包括老对手罗姆尼在内的共和党政客则指责总统刻意迎合东京的政治口味，因之可能对美国在全球的威望造成削弱。

从那时起至今，美日两国政府陆续进行了长达6年半的舆论准备和幕后协调，包括由两任驻日大使约翰·鲁斯和卡罗琳·肯尼迪先后造访广岛、长崎，以及今年4月克里国务卿对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与和平纪念碑的访问，以传递“美日友好及同盟关系不可动摇的印证”乃至“两国实现无核武世界的决心”（肯尼迪语）。而在出访行程最终确认之后，包括现任副国

家安全事务顾问本杰明·罗兹以及前顾问托马斯·多尼隆在内的外交智囊也频频发声，以营造广岛之行实乃水到渠成的印象。

如此高调的舆论宣传，恰恰暗示了反对的声浪依旧存在。1995年广岛核爆50周年纪念之际，美国老兵团体对历史修正学派重估此次行动正义性的企图进行了抗议，甚至迫使国会举行了听证会。而在奥巴马启程前往伊势之际，韩国核爆幸存者团体（代表在广岛、长崎核爆中幸存的朝鲜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提醒美方注意安倍晋三内阁利用此次访问将日本粉饰为“二战”受害者的企图。英国《金融时报》美国事务评论员爱德华·卢斯更是尖刻地讥讽称：尽管奥巴马试图通过广岛之行把自己打扮成“无核武世界”口号的代言人，但恰恰是他在任内启动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核武库升级计划，他也未能阻止朝鲜获得事实上的核打击能力。这意味着出访的沽名钓誉性质大于实际意义。

不过，奥巴马终究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与其前任们保持了一致——没有为投掷原子弹的决定道歉。此举延续了美国对其全球领导权之道义基础的表述，也安抚了韩国等周边同盟国。但反响如此之大的造访，毕竟是对安倍内阁的显著“赏脸”，它意味着美日同盟已经走出2009～2011年的波动期，重新成为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基石。而在共和党强势候选人特朗普大肆鼓吹“美国第一”的背景下，卸任在即的奥巴马高调对越南和日本示好，亦不无强化既有外交路线、夯实新老盟约的意图。

领导权的道义表述

1995年初夏，在“二战”结束将满50年之际，华盛顿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展览引发了全美热议。广岛核爆投弹飞机“恩诺拉·盖伊号”难得地公开亮相，在主题为“十字路口：‘二战’的终结、原子弹与冷战”的大型展览上向游客开放。负责撰写文案的史密森尼学会工作人员依据流行的历史修正主义观点，在展牌上公然宣称：“美国对德、意法西斯和日本的战争是两场性质截然不同的冲突——前者是复仇之战，后者则被多数日本人视为保卫自身独特文化免遭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的抵抗。”在关于“恩诺拉·盖伊号”的介绍中，策展方也对核爆行动的来龙去脉惜字如金，却加入了大量表现原子弹受害者惨状和城市被毁情况的照片。此举在民间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个



1948年，原子弹爆炸过去3年后，广岛地区的儿童外出时仍须戴口罩，以减少吸入空气中的放射性尘埃

和平主义组织的成员闯入展览现场，向“恩诺拉·盖伊号”投掷垃圾和血浆袋，并用红油漆在机身上喷出“杀手”字样。老兵团体“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和空军协会（Air Force Association）则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指责博物馆方面企图淡化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美国国会最终不得不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以矫正视听。

查尔斯·斯维尼少将在“二战”末期任第393重轰炸机中队指挥官，是唯一一位先后参加过广岛、长崎原子弹空袭的飞行员。他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代表了传统舆论对这两次行动性质的界定：“我相信当初杜鲁门总统做出这项决定不仅是客观环境使然，在道义

上也是势在必行。”“的确，我只注意到原子弹使得原本可能在日本本土战役中牺牲的4.6万名美军的生命获得了保全，而没有提及因之死去的日本人。问题在于，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并不在美国——1945年夏天，日本可以选择投降以避免更多生灵涂炭，他们明明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却选择拖延。”“关于那些死于广岛和长崎的日本平民的生命，我们应当去质问当初的日本军阀——是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国民为代价去追求‘共荣’，是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战。难道关于日本国民无辜横死的终极责任，不应该追究到这些人头上吗？他们首先将苦难强加在远东国家头上，最终才殃及了自己的国民。”“由于德、日法西斯未能征服

全球，今天的世界变得更好了；同样，由于我们这些胜利者的宽大，今天的德国和日本也变得更好了。”

斯维尼的这番表态，除去为历史事件正名外，也暗含了对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政治和安全领导权的道义表述：尽管1945年以来的美国霸权主要建筑在经济和军事“硬实力”基础之上，但作为击败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华盛顿在若干亚洲国家心目中还带有“解放者”光环。韩国、菲律宾、泰国能从日本控制之下重获解放，托庇于美军之力甚多；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从英联邦治下独立，同样和美国对战后非殖民地化运动的扶持有关。这种基于对日战争正义性的道德叙事，与美国作为全球开放政治经济体系缔造者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关于美国霸权的一项重要“软实力”表述——正是美国的到来终结了以暴力和不平等为特征的亚洲旧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将开放、自由的新秩序（“美国治下的和平”）引入到西太平洋，并始终以经济和军事力量对其加以维护。倘若将美日战争的性质描述为单纯的权势政治，这种软实力表述将不复存在，华盛顿历来标榜的伍德罗·威尔逊主义、它对全球化之形而上属性的褒扬乃至它在亚洲存在的合理性都将出现巨大的道德真空。美国怎能承认，由它主导的战后亚洲秩序在道德上并不优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呢？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

但以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马丁·哈维特为代表的修正派学者同样提出了他们的论据：在战争结束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平等”在美日关系之中的优先度已经高于“正义”。出生于1945年之后的日本人无须为其父辈犯下的战争罪行道歉，但在广岛和长崎遭受辐射杀伤的平民却须终身承受健康方面的重负，美国政府应当向后一类人道歉。华盛顿主导的亚太伙伴关系，应当建立在主体地位的平等和战略利益方面的相互吸引基础之上，而承认胜利者同样具有道德上的不完美性是走向平等的第一步。

1995年的这场论战，最终以哈维特宣布辞职、“十字路口”展览的文案恢复传统表述而告终。但接下来的21年里，修正学派的反诘始终不曾停止。他们甚至还和制订“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某些外交智囊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高度实用主义的观点：既然日本在未来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承担的份额将越来越重，则华盛顿应当在某些问题上对东京做出让步，首当其冲的便是象征意义重大但不涉及物质利益交换的历史责任问题。承认美国在核爆问题上对日本平民具有道德亏欠，有助于弥合美国政府与日本民众在历史认知问题

上的分歧，为进一步的情感和解以及强化政治、经济盟约扫清障碍。而韩国等周边国家即使不乐见这一做法，也会因其与美国之间的现实利益关联，而选择默默接受。

奥巴马的广岛之行，最终在传统观点和修正学派之间取得了折中——尽管他在演讲中提及“无辜的人们由于残酷的战争而遭到杀害”，提及了哀悼之情，但并没有对投放原子弹的决定表示道歉。换言之，他终究没有正面挑战美国对其领导权的传统道义表述，从而部分平息了质疑之声。但就访问决定本身而言，奥巴马已经表现出了将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估作为现实外交工具的实用主义倾向，与日本政府的需求高度契合，足以窥见在过去21年间，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嬗变。

美日同盟再夯实

当然，在伊势 G7 峰会和广岛之行的具体安排上，奥巴马并不惮于显示美国的主动地位。5月26日峰会开幕当天，安倍晋三首先安排各国首脑参观了供奉天照大神（象征日本皇室）的伊势神宫。但奥巴马耐人寻味地迟到了数十分钟，并且没有和安倍行拥抱礼，从而将自己和潜在的宗教/历史纠葛划清了界限。次日下午抵达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之后，奥巴马首先向纪念碑献了花圈，但没有鞠躬，在17分钟的演讲中也更多谈到了广义上的战争行为和军事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而没有过分直白地强调广岛、长崎的象征意义。演讲词最末，他再度强调了和平的价值，悄然滑过了“和解”的主题。

当然，与2009~2011年日本民主党执政期间两国同盟出现的波动相比，卸任在即的奥巴马还是给予了安倍丰厚的外交回馈。这主要是出于夯实美日同盟政治和外交基础的考虑。长期以来，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大体以前沿部署的军事力量和经济、贸易关系为基础；在外交上往往表现为线性的双边同盟，对盟国的自主性和活动空间采取严格控制的态度，亦不鼓励多边议程的出现。但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和安全力量强势复兴之后，这项传统政策的可靠性遭到了质疑，迫使华盛顿不得不采取“更加活跃、一体化以及扩张性”的外交姿态（李侃如语），以改善战略处境。而美方外交路线调整的几项主要内容，无不与日本具有直接关联：（1）利用各盟国国内政治态势的新变化，随机巩固既有的双边关系，这一点在安倍第二次上台



2009年4月5日，奥巴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无核武世界”的口号。此举对他在当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产生重要影响

之后取得了显著成果。(2) 借助中国崛起带来的西太平洋安全态势的改变，强化主要盟国对美国海空军的安全依赖，并在一定范围内赋予其更大的防务主动性。这在去年日本通过新《安全保障法案》，为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铺路一事上获得了直接体现。(3) 随着朝鲜核问题再度凸显，原本分歧较大的日韩两国至少在安全利益上具有了更大的交集。而美国的意图便是乘机鼓励两国形成平行于美日、美韩同盟的区域内安全合作议程，继而将类似的模式推广到东南亚，作为双边盟约的补充，从而在不削弱主导性的前提下增加权势冗余。

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正常国家化”已经成为历届日本政府一致追逐的长期目标，其构成包括获取更充分的防务和外交政策主动性，以及谋求在国际组织内的更大话语权；手段则以对内扩充和修正安保体制、对外输出经济和文化资源为重点。然而从构成要件上看，日本依旧缺乏积累世界性权势所必需的区域政治根基——在东北亚，与日本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中韩两国恰恰也是和东京存在最严重情感疏

离以及政治分歧的国家；即使不论反省历史的态度，日本在地区经济和安全一体化、防务政策、修宪倾向等问题上与中韩两国所做的沟通和协调也相当不足，这使得中韩很难确信日本的意图是可靠的、有建设性的。缺少了中韩两国的信任和支持，日本即使能依靠经济援助在东南亚获得一定影响力，其基础仍是不稳固的。而在全球层面，日本在气候问题、粮食安全等较新的议题上表现平淡，却汲汲于伸张军事权利和安保诉求，显然无助于迅速建立正面、积极的形象。

这种情况下，安倍政府最便捷也最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取向，依然回到了日美双边框架之内。在安全层面，东京试图借重美国的对华防范心理和“亚太再平衡”需要，进一步获取自主的防务空间；在经济层面，则要利用酝酿中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对冲”中国的贸易优势。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安倍实际上也试图利用美国意图强化双边盟约的战略契机，抬高日本的身价。在中国强势崛起的背景下，华盛顿需要向盟国证明它依然有能力和意愿维持在西太平洋的安保承诺，而日本无疑是最直接的试

金石：倘若美国在类似东海争端这样的地区安全问题上态度冷淡，日本政治家便可以在国内大做文章，以“美日安保名存实亡”为名，进一步加快防务扩充和修宪进程。若美国倾向于纵容日本，东京、首尔乃至马尼拉自会得到信号：它们成功地与华盛顿形成了捆绑，往后即使越界行事，大规模冲突也只会中美之间爆发，本国不会成为主要的成本承担者。

此种情形，与上世纪70年代欧共体和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相当类似。彼时，西德等国利用身处对抗苏联第一线的地理位置之便，坐地起价，要求美国在军事援助和核保护方面提供便利。然而这些国家又担心美苏妥协、将西欧丢给莫斯科，于是极力夸大苏联危险的迫切程度，力图诱使美方承诺在第一时间使用核武器；如此，美苏再无机会和解，西欧则可永保其重要性。而今日的亚洲恰恰是全球范围内存在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潜在冲突中心甚至核扩散风险的地区；换言之，每一盟国皆有尝试风险转嫁和义务捆绑的可能，日本不过是其中较为活跃、利益关联度也更突出的行为者。

不仅如此，安倍实际上也希望通过外交层面的调整，获得来自华盛顿的政治酬赏。去年12月，日本政府出人意料地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深刻道歉，从而为两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协调一致创造了基础，这一做法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嘉许。而奥巴马的广岛之行，对即将投入参议院选举（今年7月）的日本民主党无疑是巨大的利好消息。反核和平主义团体“和平之舟”的创始人吉冈达也就此表示：奥巴马造访广岛，将为安倍晋三巩固个人在国内的权势创造机会，从而反过来加剧东北亚的不稳定局面。

奥巴马的外交遗产

在奥巴马的批评者看来，总统最后一年半任期内的一系列外交布局和出访，沽名钓誉的意味要远远高于其实际成效。美国与伊朗签署了终结其核计划的协议，但完全无法阻止德黑兰继续开发中远程导弹以及介入也门战局；对古巴的出访名义上推倒了最后的冷战“铁幕”，但美国在加勒比海原本就具备压倒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对越南的历史性出访和解除售武禁令看似迈出了一大步，囊中羞涩的越方却根本没有足够资金将俄式武器装备全盘更换为美式标准。在广岛再度重申“无核武世界”的目标，同样是一种空洞的大话——为平息来自军方和国会的压力，奥巴马在

两个总统任期内仅削减了美国核弹头总数的10%，为1989年以来的最低值。《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也未能在其任内获得通过。2010年与俄罗斯签署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New START）计划在10年内将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由各6000个减少至1550个，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该条约的执行情况已无法监控。

被讥讽为“说大话、做小事”政策的典型代表的还有兴师动众的“亚太再平衡”。尽管美国在权势回归和巩固双边盟约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批评者依然指责奥巴马未能以切实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对亚洲盟国重申美国力量的可靠性，在给中国划出“红线”方面表态也不够直接，往往要到问题出现后才会设定标准或做出反应，华而不实。风头正劲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更是祭起了上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第一”口号，鼓吹重新审视美国的国际定位。考虑到美国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互动的即时和剧烈程度，这当然会让人怀疑奥巴马苦心孤诣的遗产是否会在2017年之后快速贬值。

实事求是论之，“贬值论”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2015年，由战略地理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创办、与共和党保守派颇有渊源的情报公司和智库“战略前瞻”（Stratfor）在其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国父眼中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文，从中可以窥见某些风向。该文对宣称托马斯·杰弗逊首创“美国孤立主义”的流行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指出：恰恰是杰弗逊在历史上最早意识到美国乃是一个洲级大国以及欧洲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它不可能永远自外于旧大陆的纷争。当欧亚大陆出现有能力封锁大洋或损害美国安全的威胁时，华盛顿必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与此同时，杰弗逊鼓吹的成本控制原则仍应得到尊重，这意味着区分当下威胁的轻重缓急，把资源投入到最具迫切性的方向。

上述观点流露出一项意味深长的信息：把孤立主义视为共和党天然倾向的传统观念已经过时，驴象两党在保持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反对离岸制衡的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所不同者，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将比奥巴马更清楚地划定底线，减少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路线的冲突系数明显升高，但对美国威望的可靠性会有更大加成。而奥巴马在哈瓦那、胡志明市和广岛留下的遗产，恰恰可以成为改弦更张的资本——广岛之行的争议留在上一位总统任内，其于美日同盟的巩固作用乃至对潜在盟友的示范效应则将延续惠及奥巴马的继任者。■



血检女王：从传奇到骗局

主笔 / 徐菁菁



Theranos 公司 CEO 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在公司实验室里

创业十几年，即将成为大热新科技的这家公司，被证实是一场骗局。

跌落

一年以前，2015年4月，《时代》杂志公布了2015年度“影响世界的100位人物”榜单。榜单分成了五个类别。在“巨人”这个类别里，31岁的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排在第5位。在她前面的是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后面是掌握美国科氏工业集团的巨头科赫兄弟（Charles Koch & David Koch）。为她的当选撰写评论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伊丽莎白·霍尔姆斯的故事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大学二年级时，她从斯坦福大学退学，投身于自己的愿景：医疗应当如同基本人权，唾手可得。”基辛格写道，“当我被乔治·舒尔茨（前国务卿）介绍给伊丽莎白时，她的计划听起来就像一个本科生的梦想。我告诉她，她只有两种前景：或者一败涂地，或者巨大成功。两者之间没有回旋的余地。”

那个时候，霍尔姆斯似乎已经逼近了巨大的成功。她与她的生物科技公司 Theranos 被美国主流媒体广泛报道。根据公司的说法，他们将彻底颠覆目前的血液检测行业。新技术在人们指尖轻轻扎一下，采集100~500微升血液，就可以完成240多种化验，检测结果会在4小时之内出来。而且，其验血价格低廉，不到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标准费用的一半。Theranos 声称，如果美国联邦医保与联邦医助服务中心全面采用该公司的血检技术，将在未来10年内为联邦医疗保险节省980亿美元，为医疗补助节省1040亿美元。

2013年，Theranos 与世界上最大的药品零售企业沃尔格林（Walgreens）签订合同，在其连锁药房设立健康中心，为消费者提供采血化验服务。此后，Theranos 的估值扶摇直上，达到90亿美元，而拥有



Theranos 公司律师团领衔律师大卫·博伊斯

公司过半股份的霍尔姆斯成为美国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

Theranos 的商业成功笼罩着一层玫瑰色的光环。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霍尔姆斯说起自己的事业，她认为，如果检测变得简便易得，那么各种疾病的诊断就会更早一些。“我们将看到这样一个世界，没人再会说这样的话：‘如我早些知道……’在那个世界里，没人会太早告别人世。”

2015 年，霍尔姆斯的声誉达到顶峰。她被奥巴马委任为全球创业总统特使。她因“诚实、勤奋、独立和逆境中的坚持而取得的非凡成就”成为霍雷肖·阿尔杰奖最年轻的获奖者。老牌政经杂志《大西洋月刊》邀请了硅谷 101 位 CEO、投资人和智囊团成员对硅谷现在的技术、政治和文化进行了一次投票。“哪一家创业公司会改变世界？”这个问题的投票结果显示，Theranos 仅次于特斯拉（及埃隆·马斯克的其他公司）位居第二。

然而，就在基辛格撰写那段充满溢美之词的评论的同时，霍尔姆斯的成功已经拉响了警报。2015 年 4 月，《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凯瑞伊欧（John

Carreyrou）向霍尔姆斯发出了采访邀请。过去几年里，霍尔姆斯是媒体的宠儿。每当媒体找到 Theranos 公司，询问霍尔姆斯是否能够接受采访时，她的公关团队通常会简单干脆地回复两个问题：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但约翰·凯瑞伊欧得到了不同的回答。在两个月的推阻之后，Theranos 派出一个律师团队到访了该报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领衔的是大卫·博伊斯（David Boies）。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律师代理过比尔·盖茨和美国政府。律师们在椭圆形长桌上放下了两台录音设备。他们在凯瑞伊欧面前坐下，按下了录音键。谈话开始没多久，博伊斯就警告《华尔街日报》，他们可能会针对该报提起法律诉讼，指控他们获取“专利信息”和“贸易机密”。

4 个小时的谈话以博伊斯撂下“狠话”告终。但这并没有阻止《华尔街日报》在 2015 年 10 月刊发他们的爆炸性报道。报道显示，霍尔姆斯的成功背后隐藏着巨大谎言。2005 年，霍尔姆斯雇用了有多年微流体控制研究经验的英国生物化学家吉本斯（Ian Gibbons）。吉本斯和 Theranos 多名研究人员一共被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 23 项专利，其中 19 项专利把霍

尔姆斯列为共同发明者。这些专利构成了 Theranos 商业模式和其发明的“爱迪生”化验仪器的核心。吉本斯在 2013 年 5 月死于自杀。他的遗孀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丈夫生前曾告诉她，研究进展其实很缓慢，其技术“完全不管用”。在得知吉本斯夫人和媒体通话之后，Theranos 的律师给她写信，警告她如果继续“发表有关霍尔姆斯女士的不实言论并泄漏保密信息”的话，将会被起诉。

一名前高级员工告诉《华尔街日报》，到 2014 年，该公司收到的样品中，“爱迪生”只处理了 200 余项检测项目中的 15 项。“爱迪生”2014 年全年检测数不到总检测数的 10%，剩下的 90% 检测使用了传统仪器。

任何医疗仪器（包括商业产品和自制仪器）都要经过美国联邦医保与联邦医助服务中心的可靠性检验，以证明它们能产生准确的结果。每年，验证机构会向医疗仪器使用者寄送若干样品，后者上报他们的化验结果，以证明他们的化验是准确的。《华尔街日报》获得的 Theranos 内部电子邮件显示，2014 年初，该公司把收到的验证血样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传统仪器上检验，另一部分在“爱迪生”上测试。结果，在维生素 D、两种甲状腺激素和前列腺癌标志物等项目上，“爱迪生”和传统检验的结果有相当的差距。内部员工猜测，“爱迪生”的结果存在偏差。一名员工在邮件中询问，他应该向政府和验证机构上报哪一种数据。第二天，Theranos 首席运营官桑尼·巴瓦尼（Sunny Balwani）回信说，他对没有法律背景的人提出法律意见并解释数据“极度愤怒和沮丧”。他还说“根本就不应该用‘爱迪生’测试样品”。这一邮件抄送了霍尔姆斯。

报道刊发之初，Theranos 对报道列举的所有问题都予以坚决否认。但管理机构开始介入调查。Theranos 被迫承认，他们只在爱迪生机上做 12 项测试。其余的测试都是在传统设备上完成的。而且，就在报道刊发前的一个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禁止该公司使用其长度只有 1.29 厘米的微型血液存储容器“nanotainer”，因为该容器未得到该机构的使用批准。4 月，Theranos 宣布，由于“爱迪生”的准确性存在问题，过去两年里的 2 万份检验报告是无效的。

也就是在 4 月，美国医保与医助服务中心认定加州纽瓦克市的主要实验室操作违规。该机构在一份报告中称，Theranos 让患者“面临直接的威胁”。正在考虑吊销实验室的资质，并对霍尔姆斯和巴瓦尼实施两年内不得涉足检验领域的禁令。很快，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SEC）和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开始对 Theranos 展开犯罪调查，以搞清楚这家公司是否涉嫌误导投资者和政府官员。与此同时，霍尔姆斯还面临两场消费者的集体诉讼。从巨大成功到一败涂地，一场硅谷神话是如何被制造及毁灭的呢？

理想与现实

2003 年秋天，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专业二年级学生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告诉自己的导师钱宁·罗伯森（Channing Roberson），她打算退学，开办自己的公司。罗伯森极力反对这个想法，他认为她至少应该完成本科学业。他告诉霍尔姆斯，在他参与过的 40 多家公



美国全球创业投资基金德丰杰（DFJ）投资基金的创办合伙人蒂姆·德雷珀



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就读斯坦福大学时的导师钱宁·罗伯森

司里，还没有一家是由19岁女孩开办的。

对于霍尔姆斯来说，这个劝告毫无说服力。她有限的人生经验已经证实，但凡她有明确的目标，并执著坚定地去追求，她总能够打破“先例”，拿到自己预期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起，她的父亲克里斯蒂安·霍尔姆斯时常到中国出差。这促使伊丽莎白很小就开始学习汉语话，高中二年级的暑假，她筹划进入斯坦福的暑期汉语（普通话）班。她不停致电该项目办公室。每一次，对方都告诉她，这个项目并不接受高中生。一天，当她再次拨通电话时，项目负责人怒气冲冲地从雇员手里夺过电话：“我无法忍受你不断来电。我现在就对你进行测试！”他用普通话问了一些问题。伊丽莎白回答得很流利。就这样，他破格接受了她的入学要求。在高中，霍尔姆斯就完成了3年制的大学汉语课程。

在斯坦福，这个“大一”新生一入学就去找后来成为她导师的钱宁·罗伯森：“什么时候让我进您的实验室？”大家默认的规矩是：只有博士生才能在实验室工作。但霍尔姆斯每天缠着教授，几个月后，她又成功了。

19岁的霍尔姆斯对自己未来的事业已经拿定了主意。小时候，她读过自己高祖父的自传。19世纪90年代，丹麦移民克里斯蒂安·霍尔姆斯一世来到美国。他做过“一战”时期的老兵、工程师、发明家、医生，成立了一家现在名为“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的医院。伊丽莎白曾告诉记者：“他最后是工作累死的，但是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有激情。我那时就想，我能成医生吗？”但问题是，她受不了见血，甚至连抽血都不行。霍尔姆斯说：“当我知道要抽血检测的时候，我会提前好几个星期就紧张。”

这并没有阻止霍尔姆斯将兴趣放在医学上，相反，恐惧帮她找到了方向。2003年暑假，霍尔姆斯到新加坡基因组研究院实习。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使用血液、鼻腔分泌物等各种样本，诊断包括非典型肺炎在内的呼吸系统感染。这次经历使霍尔姆斯对“芯片实验室”（lab-on-a-chip）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芯片实验室”是微流控技术（Microfluidics）实现的主要平台。它把生物、化学、医学分析过程的样品制备、反应、分离、检测等基本操作单元集成到一块微米尺度的芯片上，使用极少量的样本，自动完成分析和数据输出的全过程。从新加坡回到斯坦福，霍尔姆斯向正在研究优化药物输送装置的罗伯森描述一个想法：可以设计一个可穿戴设备。通过一块芯片，实时监控病人的

血液，了解药物在人体内发生的作用，并将检测结果发送给病人和医生。

霍尔姆斯的事业创想与软件工程师桑尼·巴瓦尼一拍即合。霍尔姆斯高中时就和巴瓦尼相识。那时巴瓦尼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在微软等公司工作过，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两人常常谈论起他们的共同看法：在医学诊断领域，不仅仅是化学或者生物学，软件也是重要的。它可以使整个过程实现自动化。2004年，巴瓦尼在斯坦福读完了计算机科学学位。霍尔姆斯说服父母，挪用了自己的大学学费和父母的部分津贴。她把治疗（therapy）和诊断（diagnosis）拼在一起，“Theranos”创业公司正式上马了。

基辛格曾经谈起自己为什么会成为霍尔姆斯的坚定支持者。“没法将她跟其他人比较，因为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拥有她一样特殊的能力。”他说，“她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强大的判断力。她不喜欢表现，我也看不到她对赚钱有太多的兴趣。她像个僧侣，不俗丽，走进别人的房间不会喧宾夺主，但到了她的地盘，她就是老大。”

人们都相信，霍尔姆斯对自己的事业确实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她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乔布斯的照片。照片日期为2011年8月24日。那一天，乔布斯宣布因罹患胰腺癌而辞去苹果公司CEO的职位。霍尔姆斯把他当成自己的英雄。

这个年轻女孩的一切都是围绕事业展开的。只要季节合适，她每一天的穿着都是一样的：黑色外套、黑色高领毛衣、黑色的细条纹长裤、黑色的低跟高跟鞋。她住在帕罗奥多（Palo Alto）一间有两个卧室的朴素公寓里。房间里没有电视机，冰箱是主角，但里面是空的。她有一套严格节制的饮食规范：不喝咖啡，素食，每天要分几次喝下由黄瓜、欧芹、羽衣甘蓝、菠菜、生菜、芹菜混合而成的蔬菜汁。据说这样的饮食能够帮助她控制睡眠时间，得以每天工作16个小时。她曾经能够背诵简·奥斯汀，但她早已不在小说上花时间了。她甚至不和朋友来往，也不约会。事实上，在过去10年里，她从未休过假。

霍尔姆斯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我可能，不，是肯定不寻常。”她说，“我9岁的时候就能从头到尾读完《白鲸》。我读了不计其数的书。我仍然保存着7岁时的一个本子，上面写着我对于一台时光机的详细设计。我成长中最棒的事情是从来没有人会告诉我，我不可能做到这些事情。”

霍尔姆斯出生在一个与失败绝缘的家庭。高祖父医生克里斯蒂安·霍尔姆斯不仅是成功的医生，还和辛辛那提富有的女继承人贝蒂·弗莱切曼结了婚。克里斯蒂安·霍尔姆斯四世的母亲是名模，父亲是旧金山富豪。他本人在华盛顿担任过许多政府要职，在国际贸易和减灾方面功勋卓著。伊丽莎白曾回忆，家里的墙上挂满了父亲出现在国际冲突和灾难现场的照片。她的母亲同样也十分成功。尼尔·安妮·道斯特曾是美国国会国防与外交政策副官。

2004年底，霍尔姆斯筹集到了690万美元投资。第一个100万来自美国全球创业投资基金德丰杰(DFJ)投资基金的创办合伙人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德雷珀是霍尔姆斯一家的邻居。这笔钱使霍尔姆斯得以雇用科学家和工程师。另外一名投资者是唐·卢卡斯(Don Lucas)。卢卡斯在硅谷是教父一般的人物，以投资甲骨文公司闻名。为了见到卢卡斯，霍尔姆斯动用了父亲的关系。克里斯蒂安·霍尔姆斯在卫斯理的同窗是一名前银行高管，和卢卡斯有不错的交情。后来，通过卢卡斯，甲骨文创始人兼CEO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也为Theranos掏了腰包。

然而Theranos并没有按照霍尔姆斯的计划发展。她可以一如既往地勤奋、执著；家庭关系能为她带来投资，但这些都无法解决公司的核心问题：技术突破。

好几位Theranos的前员工都说，霍尔姆斯对自己的使命有一种冷酷的执著。这种执著深受外界的赞赏。但事实上，它似乎使她难以真正理解和直面公司产品的缺陷。无论在私底下还是在公开场合，她都会自然而然地将理想与技术现实混为一谈。

2005年4月，在一档广播节目里，霍尔姆斯说，公司生产的手持设备能够帮助制药公司及时了解他们的药物在病人体内的作用情况，只需要“用微小的针头”从手臂或者手指上“抽取一小滴血液”。她把的设备叫RDX新陈代谢分析专家，说它已经进入生产流程。“我们希望能于今年晚些时候向我们的制药伙伴发布出来。”但根据两名Theranos前雇员的说法，当时这种仪器的制造可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公司仍然处在研究血液检测的化学方法的阶段。

在那几年里，霍尔姆斯的努力其实都失败了。她希望制造一种家庭能够使用的验血设备。为此，她从苹果等公司挖来了高级设计人员。2007年，公司终于开发出的第一台微量血液检测的设备重达70磅。在经过了一轮革新后，才减重到23磅。但它显然还是没有市场前景。谁会把这样一台机器放在家里呢？

在制药企业，霍尔姆斯也处处碰壁。一名知情人士向媒体回忆，2008年，在和瑞士诺华公司会面的前一天，霍尔姆斯和一位同事在苏黎世的一家酒店里反复用一片柳叶刀刺破自己的手指。他们用自己的血液来检测公司的设备。有时候，测试结果显然过高，有时候又太低。有时候，设备干脆报错。两小时后，同事宣布退出这场测试。而霍尔姆斯仍然在执著地试图从自己的手指头上挤出血来。第二天，她在瑞士诺华公司高层的见面会上再次刺破自己的手指。按照计划，设备将检测一种蛋白的浓度。知情人说，三次测试，设备三次报错。霍尔姆斯毫不惊慌。她抱怨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技术故障，然后继续鼓吹她的技术有多么巨大的潜力。当然，诺华制药并没有因此买单。

恰逢其时

如果故事沿着这个路径发展，霍尔姆斯不可能成为硅谷的神话。转机出现在2010年的一次医疗技术会议。在那儿，霍尔姆斯见到了沃尔格林公司医疗创新部门主管杰伊·罗桑(Jay Rosan)。她提出，自己有一种技术，能够对微量指尖血进行上百项化验，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沃尔格林可以在他们的药房里提供这种服务，让消费者自主选择化验的项目，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个说法一下子就击中了杰伊·罗桑。

沃尔格林公司是一家历史超过百年的药店连锁销售机构。其年销售收入近800亿美元，在全美拥有7500家药房。这家老企业正在发起创新，投资一些创业公司，寻找在健康行业的新的立足点。公司高层对于搭上硅谷先锋们的快班车充满了热情。

霍尔姆斯的说法准确抓住了一股商业机遇。她曾阐述她的理念：“重新定义诊断的范式：过去，人们在有了症状之后才去寻找信息。而今后，不管人们是贫是富，他们都能够任何时候获得他们的健康信息。”在医疗服务行业，传统的以医院为核心的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以病人为导向。DNA测序成本的降低已经使得商业公司能够为人们提供他们的个人基因信息。智能电话软件随时让使用者监控他们的心率、睡眠周期和运动量。这些活动都不再必须通过医生指导。这个时代，消费者越来越渴望能够有机会获得他们的个人健康数据。而在美国，血液化验本身就是一项价值750亿美元的巨大产业。这个产业的2/3来自医院外的血液检测。其中价值250亿美元的检测是在公司运营的独立实验室里完成的。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市场。



Theranos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沃尔格林公司的一家药房内设置的健康中心

2011年春天，沃尔格林雇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对他们即将进行的一些医疗技术投资进行评估。Theranos 也是评估对象之一。当时，霍尔姆斯带来了自己的一台设备。一名霍普金斯的科学家告诉她，研究人员需要将设备带回巴尔的摩的实验室进行测试。霍尔姆斯答应自己会提供给他们一台，但是她并没有。

事实上，在沃尔格林与 Theranos 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有数次机会发现馅饼底下可能存在的陷阱。2011年夏天，沃尔格林的高层希望对 Theranos 的商业运作和实验室能力进行一手考察。到访者被引进 Theranos 的会议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陪同，一名沃尔格林团队的成员在会议期间想用洗手间，甚至也得到了 Theranos 方面的陪护。Theranos 并没有允许他们进入实验室，也没有允许他们了解爱迪生机的技术。这个考察小组在报告中说，他们认为，沃尔格林需要更多的信息以确定是否要和 Theranos 合作。但是这份报告的发现并没有被采纳。

2012年10月，沃尔格林再次派出团队考察 Theranos。团队中的成员包括奎斯特诊断公司的一名前实验室主管保罗·拉斯特（Paul Rust）。“当时的情况非常奇怪，”拉斯特回忆起那一天的访问，“样本测试结果确实非常不错，但是我根本没有被允许进入实验室——我不知道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爱迪生机给出的。”霍尔姆斯对此给出的解释只有简单但似乎又无可辩驳的一条：技术是公司的核心秘密，他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知识产权。

2013年9月签署合同以前，沃尔格林的高层和顾问们有过争议。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他们是否能够相信一家毫无经验的公司所做出的技术承诺。然而，沃尔格林最终决定冒险。2013年，数字医疗行业的热度比两年前高得多了。Theranos 告诉他们，美国西夫韦公司要在他们超市里设置 Theranos 的采血点。一些管理人员担心，如果他们对霍尔姆斯施加太多的压力，Theranos 会选择和其他连锁药店合作。

对错失商业机遇的担忧甚至迫使沃尔格林做出了极为少见的让步。早些时候，沃尔格林曾经研究将他们的药店记录系统和 Theranos 的数据库结合起来。但 Theranos 提出他们要有更多的控制权。于是，Theranos 得以在药店里独立运转自己的“健康中心”，他们不在药店设置检验设备，所有样品运回实验室化验。最终达成的合同也没有给沃尔格林查看 Theranos 临床信息和财务记录的权利。

Theranos 在亚利桑那和加州的 42 家沃尔格林连锁药店提供血液化验服务，这成为它通向消费者的主要渠道。在那以后，谎言更加变成了一种必需。2013年11月，Theranos 在加州的实验室拿到了一名病人在沃尔格林药房下的血检订单。从事这次血检操作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告诉联邦政府的调查人员，在做检测之前，他进行了三次质量控制试运行——让爱迪生机设备测试那些数据已知的样本，但是三次测试的结果都无法达到要求的准确度。他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于是研究和部门的人来到实验室里，删除了质量控制数据，这样，设备的运转看上去就正常了。

2014年4月，霍尔姆斯收到一封来自一位雇员的邮件。这位雇员在长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爱迪生机与其他传统检测设备的比较中，Theranos 在有选择性地挑选数据，以使得爱迪生机看上去更准确。在一次测试中，在公司删除并操纵了一些信息后，爱迪生机的准确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日常的质量控制检查中，它依然总是失败。“我很抱歉这封邮件看起来像是攻击，我并无意如此，”他写道，“我只是感到有责任告诉你我看到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寻找解决办法。”霍尔姆斯把邮件传给了巴瓦尼。后者回复这封邮件，否认了邮件里提到的所有事，并且质问该员工，是否理解统计学和实验科学。

星光背后

沃尔格林之所以选择相信 Theranos，或许还有另

一个原因。在许多人看来，这家创新企业的董事会阵容实在令人惊叹：前财政部长、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前国防部长比尔·佩里，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科瓦塞维奇（Richard Kovacevich）。

2011年7月，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霍尔姆斯被引荐给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根据霍尔姆斯的回忆，这场原定10分钟的谈话后来持续了两个半小时。霍尔姆斯善于和权贵们打交道。她的声音低沉，说起话来总是很真诚，她还是个非常好的倾听者，总是很平静。一位熟悉乔布斯的人说，霍尔姆斯和乔布斯非常不同：“她有史蒂夫从没有过的社会知觉。”

霍尔姆斯的技术以及它将给美国医疗服务带来的改变令舒尔茨感到着迷。他格外欣赏她“纯粹的动机”，以至于在当月内就加入了Theranos的董事会。在接下来的3年里，舒尔茨成为介绍人，不断将他的军政界朋友拉入Theranos。

Theranos称，他们与美国国防部有密切合作。2011年，霍尔姆斯和四星将军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相识。根据她的说法，马蒂斯对在战场上使用Theranos的技术十分感兴趣。2012年，Theranos的代表造访了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这次访问并不成功。爱迪生机的重量比目前美国国防部使用的手持设备要重，而且要将设备卖给美军，Theranos还缺少FDA的批准。2012年，一名官员曾经针对Theranos的血检技术向美国国防部发出警告，并针对该公司在未通过FDA认证的情况下推广其技术向FDA发起了一项正式问询。霍尔姆斯找到马蒂斯来解决自己的麻烦。她称该官员对Theranos的担忧是“公然露骨的错误信息”。“如果你能帮助我们向管理部门纠正这个信息，我将十分感谢。”几小时后，马蒂斯就在邮件中质问其他军官，让他们“克服这个障碍”。“我曾经试图推动这个设备尽快投入使用，很显然，我们进行了一年而没有进展。”

霍尔姆斯为她的董事会成员提供股票或者津贴。他们也很可能是真心喜欢她。为了调剂她单调的社会生活，乔治·舒尔茨夫妇邀请她去剧院，在她家里为她的30岁生日举办过一场聚会。基辛格和夫人甚至试图帮她安排约会。

2013年，与沃尔格林签订合同后，霍尔姆斯神话已经臻于完美了：年轻女性、斯坦福大学退学、颠覆型的科技创新企业、素食主义者、人道主义情怀。理查德·科瓦塞维奇说，公司的最大挑战是让Theranos

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而霍尔姆斯本人就是进行宣传的最大资本。“我们根本不需要广告就能够得到最好公关。”

硅谷的科技媒体热切拥抱了霍尔姆斯和她的创业公司。他们一次又一次称赞她是“下一个乔布斯”。这些报道连同霍尔姆斯的董事会都在向投资者传达一个最强信号：Theranos一定是他们不容错过的机会。

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蒙蔽了。2004年，霍尔姆斯曾和医疗风险投资事务所（MedVenture Associates）的5位投资人见面。这家公司有29年的医学技术投资经验。投资人坎贝尔·怀特回忆，霍尔姆斯“天花乱坠地讲着这项技术将如何改变人类”，但却没有提供任何技术和科学上的细节。当投资人要求她提供这些细节，讲讲她的技术和现有的血液诊断技术的具体差别时。霍尔姆斯被激怒了。“我们越往下追问，她就越不自在。1小时后，她站起来，转身离开了，留下我们惊诧地面面相觑。”

“当公众们吞下激动人心的媒体故事时，精明的投资者确实在质疑Theranos的花言巧语。”《YC创业营：硅谷顶级创业孵化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作者兰德尔·斯特罗斯（Randall Stross）告诉我，事实上，硅谷最受推崇的5家生物科技投资公司都没有掉入Theranos的陷阱。成熟的生物技术风险投资者会花费大量资金用于法律或技术咨询。审核创业家的过程一般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格外看中同行评审，以此判断公司的产品数据和成效。这些都是霍尔姆斯没有提供的。

Theranos曾经两次接触谷歌风投（GV），两次都被拒绝了。GV负责生命科学和健康方面投资的五人小组中，两人拥有生物工程博士学位，一人同时拥有生物物理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学位，另一人在哈佛拿到了医学博士和MBA学位。因为一名主管认为，Theranos背后“可做手脚的地方太多”。MPM投资的联合创始人卢克·艾弗宁（Luke Evnin）从未见过霍尔姆斯，但他一直感到这家公司董事会是一个谜：“你看看她的董事会，里面居然没有一个人真的了解他们在做的生意，这太奇怪了。”

当霍尔姆斯和Theranos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上时，科学家的智识令他们本能地对Theranos的宣传产生疑问。

多伦多西奈山医院多伦多大学临床生物化学部门主管、多伦多大学实验医学和病理学系教授艾利夫瑟里奥斯·迪亚曼蒂斯（Eleftherios P. Diamandis）

是最早公开对 Theranos 提出质疑的科学家之一。他告诉我：“多伦多一家主要教学医院的副主席叫我留意 Theranos 公司的新技术。他说这家公司发明了用少量血液进行许多诊断的革命性办法，而且价格低廉。他对 Theranos 的兴趣来自该医院新到任的主席，他想知道这家公司是不是真的能用其他实验室 10% 的成本进行化验。我猜想，医院管理人员们真的在考虑用 Theranos 模式来降低实验室成本。”

迪亚曼蒂斯很快发现，尽管他无法获得任何技术信息，但 Theranos 的许多说法对公众来说都是巨大的误导。Theranos 称其他商业化实验室的化验结果通常需要 3 天才能出来，而他们的速度要快得多。但事实上实验室的许多化验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Theranos 称其化验成本只有其他集中化实验室的 10%。事实上，一般实验室的消耗品和试剂成本大体上大大低于 Theranos 的报价。比如，一次常规化验的试剂成本可能少于一美分。而真正影响价格的是人力成本和实验室运营的经常性开支，而不是技术本身。而且，以多参数的方式来计算成本是不合理的。“比如，同时进行 30 项化验将花费 30 美元，那么一项化验相当于只花费了 1 美元。但如果那 29 项化验本身就是不必要的呢？做更多的化验并不意味着获益更多。”

甚至，Theranos 商业推广的重点概念——提倡人们自主进行血检，排查健康风险这一理念本身就不被医学界认可。对无症状个体进行没有针对性的血检，很可能会因为检验结果的假阳性而使受试者产生不必要的焦虑，造成过度化验、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一个人化验出他的前列腺特异抗原为 $20\ \mu\text{g/L}$ 时，他会依据统计学指标认为自己有超过 50% 的可能患上前列腺癌，并因此要求做活体检查。但其实，如果他几天前还做过化验，当时的前列腺特异抗原为 $1\ \mu\text{g/L}$ ，他患上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前一次检查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前列腺炎导致的。”而在不考虑病人病史和其他临床发现的情况下解读实验室化验结果还有可能是危险的。目前我们检查肾脏功能最有力的化验办法是检查血清肌酐。血清肌酐的参考值为 $50\sim 115\ \mu\text{mol/L}$ 。一个门外汉可能认为 $110\ \mu\text{mol/L}$ 是正常的，但医生知道，如果他曾经的化验结果是 $80\ \mu\text{mol/L}$ ，那么他近 50% 的肾脏功能可能已经丧失了。这个例子说明了化验结果解读的重要性。患者自行解读结果很可能会让他们认为自己一切安好，延误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一些科学家对 Theranos 已知的技术细节提出了

质疑。“任何实验室测试，不管它多么具有革新性，都有其局限。”芝加哥大学临床医学实验室主任、教授姚建德指出，“指尖采血不像静脉采血，不会刺破血管，让血液自然流出来。如果过度挤压手指采血可能损坏细胞。被损害的细胞组织将干扰检测结果。”Theranos 说他们知道这一点。霍尔姆斯告诉记者，他们有完美的数据报告显示，他们指尖采血的化验结果和静脉采血如出一辙。

十几年来，情况一直是这样。Theranos 以保护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公开任何技术细节和信息。于是，没有人能证明他们是否真的具有超乎寻常的技术手段，也就没有人能够对其做出致命的批评。在这种不能证伪的情况下，贩卖一种不存在的技术就成为可能。

Theranos 并不是唯一一家拒绝接受同行评审的医学检验创新公司。这些企业都把自己隐藏在了政府监管的灰色地带。

根据规定，实验室自建项目 (LDTs—lab developed test) 是指在某个特定的实验室内一些新的检测项目被建立、评估和验证。这种检测只能在该实验室内使用，不能外传或者出售给其他任何实验室或者医疗保健机构，因而不需要 FDA 的批准。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通过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 (CLIA) 对这些实验室进行认证和监督。认证和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实验室出具的检验结果是准确的。这个管理体系的搭建主要是考虑到市场上没有针对某些疾病的商品化检测试剂。许多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项目之所以没获得 FDA 批准，并非检测的临床意义不大，而是因为实验对象相对局限，使得试剂厂家投入产出比过低，而不愿意使之商业化。姚建德告诉我：“如果没有实验室自建试剂政策，所有的诊断化验都需要经过 FDA 的批准，那么很多病人将无法享受到最前沿的化验手段的帮助。”

“在 CLIA 认可他们是一家合法运作的实验室后，Theranos 利用了实验室自建试剂政策的漏洞。”姚建德说。一方面，他们没有出售爱迪生机，只在自己实验室里使用它们，因此无需向 FDA 申报；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 CLIA 对其实验室的认可标榜其新技术的可靠性。但事实上，没人能证明他们到底使用了什么技术以取得检验结果。

2013 年 9 月，CMS 对 Theranos 的加州实验室进行过检查。实验室二楼放置的都是从其他公司购入的传统设备。Theranos 内部把这里称作侏罗纪公园，因为霍尔姆斯和巴瓦尼说，他们的新技术很快就会淘汰

掉这些设备。而爱迪生机则被放在楼下叫“诺曼底”的实验室里。这个名字寓意 Theranos 的技术如诺曼底登陆一样，暴风骤雨般占领市场。两名当时的雇员说，管理人员告诉实验室工作人员，在 CMS 检查期间不要进入“诺曼底”。事实上，CMS 只检查了“侏罗纪公园”，根本没有到楼下看看爱迪生机。Theranos 后来向媒体解释说，该公司并没有隐瞒任何实验室的存在。他们告知了医疗及医疗服务中心他们的实验室有两个部分，但后者选择检查当时“90%的样本检测使用的那个房间”。

2015年7月，为回应医学界的质疑，Theranos 称他们的 I 型单纯疱疹病毒 IgG (HSV-1, herpes simplex 1 virus IgG) 免疫分析获得了 FDA 的认可，说明其测试准确性和可靠性不容置疑。但也只有专业人士能辨识出“猫腻”：疱疹病毒是 Theranos 主动提交 FDA 认证的唯一检测。事实上，这项检测只需要判断出疱疹病毒的存在与否，相对于许多定量性质的检验来说非常简单。迪亚曼蒂斯指出：“公众可能并不知道的是：FDA 许可并不意味着新方法就优于常规的方法。FDA 并不检验这种方法的运行过程，以及它的

技术是否更先进或者更落后。”

绝大多数的投资者也不知道这些。根据旧金山投资公司罗克健康 (Rock Health) 的统计，在 2015 年，数字医疗募集到的投资已经超过 45 亿美元，是 2011 年时的 4 倍。来自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和企业科技风投正在医疗保健领域探索着新的机遇。近来，受各国央行 GE (量化宽松) 资金充裕的推动，大批公司都选择在这一生物科技领域下了极大赌注。

2014 年底，平步青云的霍尔姆斯接受了《纽约客》记者肯·奥莱塔的采访。和那些热情吹捧她的记者不同，肯·奥莱塔在自己的文章里留下一点小小的质疑：“Theranos 的实验室很大，错综复杂地放满了成排的设备。样本被放置到这些设备里面。霍尔姆斯对设备的运转如同对国家机密一样讳莫如深。”肯·奥莱塔追问这些设备的技术细节，霍尔姆斯回答道：“一个化学过程。化学反应发生了，样本的化学作用发出信号，信号被译成了结果，这个结果会被有资质的实验室人员检查。”肯·奥莱塔说，这个回答“含糊得可笑”。正是这寥寥数语引起了《华尔街日报》记者凯瑞伊欧的注意。☑



《寻味套装》
内含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
《最想念的年货》与《春宴》两期美食特刊

启程最动人的美食之旅
寻找记忆中曾温暖你的味道

踏访20多个省市自治区
记录上百种地方特产
还原中国最本真的饮食秩序

可在以下电商购买本产品

亚马逊 amazon.cn | JD. 京东 .com | 当当网 dangdang.com

“减招” 风波与教育公平

记者 付晓英



5月26日，高考前最后一堂语文课，学生们即将进入最后的备考冲刺阶段

高考是大事，一有波澜，即成风波。

前不久，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方案，其中的附件《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调控方案》首次公布了各省高校生源计划调控人数。按照方案，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北、湖北等12个省市将面向中西部10个省区调配16万招生名额，其中湖北和江苏两省的调配计划分别为4万和3.8万，在12省市中位居前两名。数据一公布，便首先在江苏引发轩然大波，其他生源调出地的考生和家长也紧随其后，在网络上发帖痛陈苦衷、批判教育不公平，很多家长甚至聚集到当地教育部门门前，拉横幅、打标语抗议“减招”政策。

临近高考，有关招生考试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家长和社会放大，三四万的调配名额的确为数不小，数据公布时又缺乏解释细则，利益攸关的考生和家长群体因此风声鹤唳，对于该政策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为此，我们采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以及“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解读跨省生源调控政策。

“减招”是个伪命题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的《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调控方案》一出台就在江苏、湖北等省份引起轩然大波，这在高校招生领域是新政策吗？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陈志文：跨省生源调控计划其实不是新政策，早

在几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只是今年才首次面向社会公开调控人数，因而才备受关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布局非常不平衡，一些省区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各省份之间的高考录取率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缩小地区差异、促进教育公平，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与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每年专门安排增量计划，由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录取率较高省份的高校承担，面向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录取率较低的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招生；2009年又根据生源涨跌的不同，出台了调控计划。

调控计划的目的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缺少生源但有招生的需要，而另外的部分省市有生源却缺少高等教育生产加工能力的矛盾。这两个计划的核心是解决地区间的不平衡。2007年，我们最高的省市与最低的省市录取率相差40个百分点，现在最低的省份与最高的录取率已经缩减至10%左右。2012年又出台了面向农村学生的农村专项计划，要求教育部直属高校拿出招生计划的2%，定向到相关贫困地区县及以下的中学去招生，目的是帮助农村孩子上好大学，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目前各省也都出台了类似计划。无论协作计划、调控计划还是农村专项计划，都是国家为缩小地区差异、促进教育公平出台的政策。

三联生活周刊：生源调控政策一出台，考生和家长看到本省调出成千上万的招生名额，第一反应是认为外省抢夺了本省的名额，会造成本省录取率下降，将调控政策等同于“减招”，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

陈志文：“减招”是个伪命题。以江苏省为例，舆论发酵时，江苏省教育厅很快回应：“今年江苏省高考报名人数36.04万，较2015年减少3.25万名考生，根据省内高考生源状况、高校计划总规模和进出省计划安排、往年招生录取情况等因素测算，预计今年江苏省高考录取比例将不低于去年，甚至略有提高。”在“已经充分考虑了省内高考考生的本专科录取率不降低的因素”的前提下，江苏省对3.8万名调控名额分配又进行了具体区分，确定本科名额为9000名，专科名额为2.9万名。国家在调整生源计划时有一个总体的原则，即不影响当地录取率，在此基础上选择一些生源逐渐下降的省份，把招生计划调配给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以此来缩小地区之间高考录取率差异。而参与调整生源计划省份的本科录取率都不会下降，这在全国各地是一致的。

所以，无论是江苏还是湖北，大家担心的省内减招危机其实并不存在。这些调出的名额本来就是专门

面向中西部省份的增量计划，对省内学生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生源危机已经浮现

三联生活周刊：减招虽然是个伪命题，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也情有可原，已经执行几年的招生名额调配政策突然公之于众，除了几个简单的数字，没有其他任何透明的信息，家长们面对教育部门最终划定的数据一头雾水，不免产生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么，参与生源调控计划的省市是如何挑选的、每个省份的调配名额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

陈志文：招生名额不是根据一个既定的公式就能推算出来的，要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高校的自主行为，也有教育部门和发改委的宏观调控，非常复杂。我没有参与到具体的规划决策执行过程当中，这方面的信息了解得也不多。

我对于名额测算与分配细节虽然不得而知，但参与支援招生与生源调控的省份毫无例外具有高校资源丰富、高考录取率较高等特点，这些地区的高校面向中西部省份增加招生名额，一方面提高了中西部省份的高考录取率、让更多学生享受更优质的教育水平，而另一方面，扩大招生来源也是很多教育发达地区高校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比如说江苏省，今年江苏省高考报名人数同比下降8.27%，是连续第6年下降。但江苏省的高校总数已经雄踞全国第一，“211”高校总数也领先于其他省市。因此，江苏省高考录取比例一直在连续增长，去年已经达到了88.8%。如果按考生和家长的希望，招生名额无限增长，如此一来，考生人数下降，但录取人数却不减反增，录取比例就会大幅度提高，甚至出现报名人数少于招生计划的情况，这对于高校和家长可能都不是好事情。毕竟没有哪个学校愿意把排名为最后5%的考生也招上来。所以把更多招生计划投放到其他生源较好、较多的省市，也是高校自身生存法则的需要。另外，从长远来看，如果只局限在本省招生，可能很快会出现报名人数低于招生计划的情况，这样一来，高校便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生存危机。如果江苏把所有招生计划全部都投放给江苏、而不面向其他省市，估计江苏全省的考生都被录取完还不够。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提到高校招生出现生源危机，这是否已经是普遍问题？

陈志文：2008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最高峰

1061万，之后迅速下跌，到2015年，高考报名人数已经比峰值减少了100多万；2004年起，小学一年级新生下降至1700万左右，到2014年仍然不过1700万。也就是说，从2016年以后的10年间，中国每年的18岁适龄人数基本探底，而高考报名人数应该也不会有太多增长，参加高考的绝对人数的减少是一个长期现实问题。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高校的快速扩招。中国高校从1999年开始扩招，高校招生数量便从1998年的100万左右猛增至2015年的700多万；高考录取率也由1977年的4.7%增长至80%左右，江苏、内蒙古等很多省份的录取率甚至超过或者逼近90%。所以，上大学其实越来越容易。比如说河南，之前在河南考大学非常难，2008年河南的高考录取率只有42%，但在全国各地高校出现生源计划无法完成的情况下，很多生源计划就投到了河南。因此，河南的高考录取比例从2008年后迅速提高，到2012年高考计划录取率已经增长至86%，当然，河南省的考生人数也在下降，2008年时河南的考生人数大概是98万人，而最低时只有70多万，考生数量的增减也是导致其高考录取比率变化的重要原因。

近年，全国各地高校都出现了不能完成招生计划的问题，招生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即便是北京的高校，也有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放弃报到，当然，这也是一种进步。所以，跨省生源调控计划不仅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需要，对于高校的生存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地方高校对学费的依赖性很强，北美一个学者的研究表明，前些年部分地方高校对学生学费的依赖性高达30%到40%，对于地方大学来说，学费就是它的血液，如果生源长期不足，大学便无法良好运转，会直接危及生存。

教育公平是永恒的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教育部门澄清了“减招”误解，但是因为名额调配而产生的问题并未迎刃而解，家长的焦点反而很快转移到“一本录取率”上。作为高考大省，江苏省的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80%，但一本录取率还不到10%，低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因此被指摘为“教育不公平”，呼吁提高重点大学在江苏省的招生比例。对此，你怎么看待？

陈志文：首先，“一本录取率”的概念其实并不确定，你能在哪里给我找到关于一本学校的明确定义？它其

实是录取过程中的一种技术手段而已。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一本学校、二本学校名单是相同的，同一个学校在不同省份的归属也经常不同。很多学校在一个省份参加多批次招生，包括北大医学部，多年前在某些省也是既有一本也有二本。前些年很多本地高校参加一本招生，这些年出于生源考虑，它们更喜欢参加二本招生，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本地学校在当地参加二本招生，在隔壁省参加一本招生。现在，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已经明确，逐渐取消批次做法，简化录取批次。上海从今年开始取消一、二本录取批次，山东和浙江也将从明年开始取消一、二本录取批次。

另外，我想强调，家长把矛头指向“一本率”，跟此次涉及的调控计划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调控计划涉及的名额都是省内普通院校名额，可能还到不了很多家长关心的“一本”的层次。

三联生活周刊：江苏家长群体的担心与焦虑虽然与名额调配风马牛不相及，但却从侧面反映出公众对重点大学录取率的关注，背后其实还是老生常谈的教育公平话题。

谈松华：高等教育首先体现在入学机会上的公平竞争，现在入学机会的公平是通过一次高考按分数高低确定，这是大众能接受的形式公平。但因为学生所处的城乡区域不同、受教育条件不同而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公平。此外，中国高水平大学的分布也非常不均衡，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分六大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上海、武汉、成都、西安、沈阳六个大区所在地城市的大学数量占全国高校数量的近一半。现在高校分为部属大学和省属、地市县大学，一百零几所部属大学都相对基础比较好。加上有的省（市）实施省部共建学校，省部共建后，省里要求增加高校本地的招生人数。还有就是人口大省没有高水平大学，所以当地上高水平学校的学生比例特别低。从长远看，肯定应该逐步形成高等学校更加合理的分布，但是短期内还难以实现。只能考虑通过考试招生计划的制度设计来增加人口大省、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招生比例。

这种招生政策倾斜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政策，美国对不同族群也有入学上的倾斜政策，所以也才会有1997年白人学生起诉密歇根大学在招生中歧视白人学生的事件，当时白人学生想要入学需要考比黑人学生更高的分数，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了大学在招生时有限度照顾少数族裔学生的做法。

陈志文：我们首先要承认存在问题，然后去努力解决，但是，无论怎么样，都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

相对的公平。对于公平的评判，不仅要从历史上去看，也要横向比较。高校招生上的种种不平等与不合理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但这些不公平和不合理如今都在逐步缩小，更趋于合理。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省际高考录取率的差距已明显缩小。2015年，高考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07年的17个百分点缩小到5个百分点之内，而农村招生计划也从第一年的1万人扩大到今年的7.5万人。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在讲不公平，江苏说不公平，四川作为受援省份，家长也说不公平，北京的家长还在说不公平，为什么？这场公平纷争的根源在于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谈公平、选择性地谈公平，实际只是打着公平的旗号谈自己的利益。如此下去，根本不可能有公平可言。

但是，从根源上讲，跨省生源计划的调整也只是缓兵之计，虽然给中西部地区的考生增加了录取机会，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公平就是打破过去的利益格局进行再分配，推进教育公平的关键在于平衡地区间的教育资源。只有增加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硬件设施，提升教育师资力量，增加教育资源投入，才能真正推动教育公平。

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各地在高等教育上的不均

衡。上世纪50年代我们在高校的布局时就是按大区中心省份、中心城市相对集中布局的。比如陕西虽然在西部，但是其学科门类和学校总量都是比较高的。而相邻的河南省就很少，没有一所部属学校，这也是造成今天大家觉得不公平的根本历史原因。

而教育部严控部属高校的属地招生，就是在力图改变这种不公平，同时还采取对口支援、省部共建等多种措施扶持中西部高校建设。但是，一个好大学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现在有一半的本科院校历史不超过20年。改革开放之初，高校数量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陕西，30多年后，高校数量最多的是江苏。如果以历史的眼光看，江苏历年来高考录取率和本科录取率都是在上升的。现在北京部属高校的属地招生比例已经降至10%以下，甚至7%，在全国是最低的，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美国斯坦福即将卸任的校长约翰·亨尼丝日前访问上海，谈到了他的骄傲与遗憾。骄傲的是能让穷孩子上得起斯坦福，免除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学生的学费；但遗憾的还是教育公平，他遗憾地说：教育公平的实现还很缓慢。我想，这就是全世界普遍面临的难题，我们不断追求、不断接近，但我们恐怕很难完全实现最理想的公平。☑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陈满冤案：稻草叠加的力量

记者 / 李翊 摄影 / 蔡小川



无罪获释后的陈满（左）和好友姚军。20多年前他们曾经一起闯海南，如今命运迥异

从1992年12月28日陈满被羁押到2016年2月1日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陈满成了国内已知服刑时间最长的蒙冤者。

海南省高院5月13日发布消息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海南省高院决定支付陈满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2753777.64元。沉冤得雪，背后是坚韧的父母、一诺千金的普通人程世蓉、接力的律师、重情义的同学，让人在陈满的悲情命运之外看到善良和对公平正义的追寻。

闯海南

2016年2月2日，猴年春节前五天的，陈满回家。

“家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人的模样全变了。”回家首日，全家人聚拢，陈满哭了好几场，又大笑了好几回。眼前忙碌的父母，在23年的漫长等待中，由中年熬到老年，如今走向暮年，老态渐露，陈满说，这是他最不忍心看到的一幕。

同学聚会，“人人手上拿的都是智能手机，这在当年简直不敢想”。陈满说，入狱前，他曾以1800元预订了一部传呼机，哪料传呼机还没到手，他便被抓走了。

同样的不适还出现在观看春节晚会时。侄儿不停地在支付宝上抢红包，陈满觉得“咻咻”声像鸟儿叫，他怎么也琢磨不出，为啥这样一阵猛戳就能戳出红包来。

闲下来的陈满，偶尔也会一个人出去转转，但他不敢走得太远，总是直来直往，怕走得久了，找不到回来的路。23年后的绵竹已不是他当初离家时的模样，街上人多了，车多了，楼变高了，路变宽了。

和朋友聊天，对方考虑的是怎么安度晚年，52岁的陈满还停留在23年前激情燃烧的心态中，一门心思琢磨着要重新创业。

虽然已经回家三个多月，但是监狱和社会23年的时空阻隔带来的认识真空，陈满还需要慢慢适应。

陈满是个很温和的人，说话慢条斯理。他没有像祥林嫂那样，逢人便诉说内心的悲愤和不甘，而是平静地坐在那里，讲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案发前，陈满很少抽烟。这是一个淳朴、忠厚的老实人，他对

司法机关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表示了足够的宽容。至少在这个时刻，他没有对国家、对社会表示出任何怨恨。

“平淡而有礼貌，也客气，但无法窥知内心的想法。”这是陈满案再审律师王万琼在海南监狱第一次见到陈满时的观察，平静是因为刻意地回避了和案件相关的记忆。王万琼见过陈满情绪失控的时候，这个“面容苍老黝黑、微微佝偻着背的老年人”说到因为刑讯逼供所作的有罪供述时突然非常激动。“他一下子站起来吼道：我没做过的事，我怎么说得清楚呢？我之前说我没杀人，钟作宽不是我杀的，可他们非要我承认人是我杀的！”这种情绪的爆发让王万琼在案卷之外加深了心理确信：“这就对了！这才是真正的陈满！他肯定是被冤枉的，我最初的判断没错！”

父亲陈元年反复说过，陈满案改变了三个儿子、陈家三代人的命运：小儿子陈满，含冤入狱23年，至今未婚娶；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的二儿子陈抒为弟弟鸣冤，精神崩溃，生活至今无法自理，55岁依然孤身一人；大儿子陈忆，四川美院毕业的高才生，陈满入狱后，不得不扛起家中重担，被硬生生耽误了下来。

这原本是一个文学气息浓厚、幸福的革命干部家庭。父亲陈元年和母亲王众一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四川自贡有名的重点高中蜀光中学。陈元年搞地下外围工作，之后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分配到四川绵竹政府部门工作，与大家庭决裂一心革命的母亲参军进藏，在军大卫校学习后分到陆军医院工作，退休前是绵竹医院的护士长。一家人都喜欢文学、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在陈满卧室的书架上，有一台八九成新的夏普700双卡收录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陈满和两个哥哥一起花了1500块钱买的，是绵竹当时最好的收录机。和这台收录机一起经受了时间和地震的洗礼而历久弥新的还有60多盘音乐卡带。“发了工资，我们就会去成都外文书店买古典音乐磁带，买的是比普通带子质量好的铬带，日本产的TTK磁带。”陈满高考补习班的同学，也是后来一起在工商局工作的同事姚军说，“为了省钱，陈满买《命运交响曲》，我就买《田园交响曲》，回到陈满家，再用收录机翻录一套。”

姚军是陈满的高中同学，也是好朋友。两人的母亲都在卫生系统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两人高考落榜后一同考入四川绵竹工商局。1988年，两人不顾家人反对，从工商局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去闯海南。同行的还有陈满的发小、高中代课老师王福军——因为小儿麻痹症留下的身体残疾，几次高考分数过了重点大学

却在体检时被刷下来。谁都没有料到，海南之行，三个人的人生轨迹从此被改写。

1988年8月23日，有“海角天涯”之称的海南岛从广东省脱离，成为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海口，这个原本人口不到23万、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首府，也成为全国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国”。用潘石屹的话说，1989年他坐船来到海南时还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夜之间，岛上已经涌进了15万人。

停薪留职去海南前，陈满和姚军、德阳市糖业烟酒公司的谢涛、成都的小罗、县防疫站的王普等人来到海南考察了半个月。姚军有台理光XR7型相机，是国外留学的哥哥送给他的。在“天涯海角”，五人轮流用这台相机拍照留念，落日余晖中，留着当年最流行的长发的陈满，意气风发。

“那时候年轻，有激情，不甘心在一成不变的体制内混时间，总想要实现自我价值。第一次考察后，我们觉得海南是自由岛，政策比内地灵活，再加上有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深圳作为比照，就觉得机会难得，义无反顾了。”1988年3月8日，姚军、陈满、王福军以及其他四个人先坐火车，再坐船来到海口，开始“闯海南”。为了筹措创业经费，姚军甚至卖掉了心爱的理光相机。临出门前，八人约定：“将来无论谁发达了，都要提携大家。如果谁出意外了，剩下的人要帮忙照顾他的父母。”

初到海南时，八人住在海口盐灶路海关宿舍旁边，为了解决食宿，每人出资800元，在海关宿舍旁开了一个叫“成都饭店”的小餐馆，然后一边开餐馆，一边寻找赚钱的机会。陈满在外面找过很多活：复印机维修；帮安徽人搞快餐；给“德阳市驻海口办事处德海金贸总公司海口分公司”当厨工；做租房、买车各种信息的中间人；帮江苏无锡人成立的海口意达实业有限公司跑腿……在海南逐步站稳脚跟的同时，陈满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人脉资源。1992年6月份，陈满创办了“冬雨装饰有限公司”，案发前，陈满的公司已经接了五六个工程，有两个没做完，有一个刚开始做。他还和一个在法国开装修公司的北京人初步谈了成立中法合资企业的合作意向。陈满用了4年的时间，一点一点挤开成功的缝隙，可是，紧闭却只在一瞬间。

1992年12月25日晚上19点多钟，陈满租住的上坡下村109号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救火时，发现一具尸体。警方现场勘查发现，死者身受多处锐器伤害、



陈满（左）陪着母亲和大哥陈忆一起吃饭。这是他在狱中渴望了 23 年的事情

颈动脉被割断，一个煤气罐被人从厨房搬到了卧室门口点燃，很明显是杀人后纵火焚尸。案发第二天公安人员找到王福军要他去认尸，说死者是陈满。“尸体很恐怖，头快被砍断了，整个身体烧过，有一条腿已经碳化，但左看右看也不像陈满，倒是当时的房东老钟。”王福军回忆道，“从停尸房出来我跟公安人员说，不是陈满，是老钟。当时警车上的几个人说，这下事情麻烦了！”

46 岁的钟作宽是四川广元一家纺织厂的职工，案发地海口市上坡下村 109 号是他们公司购置的房产，公司撤走后，老钟被留下看房子。钟作宽比陈满晚到海南，人生地不熟，1991 年 4 月份经朋友介绍结识陈满，希望互相有个照应。陈满说，1992 年元月份，他离开大鹏公司后没地方住，在征得钟作宽同意后，搬到了上坡下村 109 号。

1992 年 12 月 28 日，陈满作为杀人纵火嫌疑犯被警方羁押。王福军说，他当时在四川老乡的装修公司打工，参与办案的一位 50 多岁姓黄的公安曾经找

他要过一张工艺毯，并透露说：“你这同学比较厉害，审了六天六夜才承认是他杀的。”但是王福军自始至终都认为陈满是冤枉的，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凭我跟陈满的接触，他做不出这个事。我看过尸体，能把人砍成这样，凶手一定是穷凶极恶之徒。陈满性格很温和，而且我们和老钟相处融洽，没有矛盾。老钟没钱，陈满的事业已经开始有起色，他为啥要杀老钟？”

一审前，同样是这个老黄找到王福军。“让我跟陈满家里递话，拿 3 万块钱出来就送他出岛，其他的事不用管。陈满的父母不肯低头，没有答应。”王福军说。

1994 年 11 月 9 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陈满因未交房租等原因，与被害人发生矛盾，遂起杀人念头。在没有任何物证和人证，仅有陈满的口供，同时有大量人证可以证明陈满没有作案时间的情况下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两罪并罚，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后被告人陈满没有上诉，检



察机关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1999年4月15日，海南省高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一诺千金

从60岁那年介入陈满案算起，11年过去了，中国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退休人员程世蓉的头发

白了一半。用之前代理过陈满申诉案、后来参与律师团支持陈满案申诉的李霄霖律师的话说，陈满案能再审并申诉成功，程世蓉起了关键的作用。“她的理念可能不如专业的律师，但是她把案卷吃得很透。在全社会都很冷漠的状况下，99%的律师都做不到她的认真。”李霄霖对本刊记者说。

程世蓉也是绵竹人，上世纪60年代，她和陈元



2



3



1. 陈满的冤案昭雪了，坚持申冤20多年的父亲也老了，身体每况愈下

2. 陈满的卧室里，书柜上摆放着一台八九成新的夏普700双卡收录机

3. 当年意气风发闯海南的陈满（左一）和姚军（左二）

成曾在绵竹政府机构短暂共事。后来，程世蓉和丈夫调往北京工作，两家人再也没有过交往。2004年，程世蓉退休以后重返绵竹，在一个农家乐偶遇陈满的父母。

“老人见面总爱问些家长里短，然后他们就提到我的老三怎么怎么样了，一说就要哭了。陈满的母亲本来比我高，我原来觉得她特别雄赳赳气昂昂的，怎

么一下子背也驼了，矮了我一截。简单说了几句后，就约了个时间到他们家去聊，用四川话说说好好摆一下嘛。那就从头到尾又把东西翻出来了。”

程世蓉给本刊记者的第一印象，是个干脆直爽，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与时俱进、有大丈夫气概的老太太。她在43岁的年纪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办的律师资格培训班，半年后参加全国第二届司法考试，以超

他思路还是清楚的，没有那种特别偏激或者特别暴躁、特别自我。他关注商业，让他父母给他订杂志和报纸，因为他当时算了一下账，出来大概多少岁。

出录取线 105 分的成绩拿到资格证。她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从事行政工作，管理过单位的房地产业务，在所里办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开发软件。曾经和她相处过的人对她有这样的评价：“有胆识，敢担当。”公交车上有人吵架了，所有人默不作声，她会是站出来劝和的那个。但是她也知道审时度势，她说：“如果打得厉害，我没那个力量劝阻就不会上去。就好比有人落水了，我如果会游泳就救，不会游泳就找会游泳的救。”

以程世蓉对陈满父母的了解，这两个人有文化，又都当过兵，比较正统和硬气。“他们肯定已经非常仔细地看过案卷，而且跟律师也有过很深的接触。他们是那种人，如果确定人是陈满杀的，绝不会护短。但如果确信陈满是冤枉的，他们就一定要讨个公道。我觉得这也是当初他们为什么没有答应海南公安给 3 万块钱私了的原因。”程世蓉说，“看完案卷以后，我确信证据不足，但不是说就下了多大决心，只是说我可以帮你们。我觉得确实不公平，对一个家庭来说太不可接受了。一、二审前后，他们从四川到海南、上北京，来回奔波数次，不仅耗尽积蓄还负债累累。现在身体每况愈下，实在跑不动了，他们仍然坚持每月寄发申诉、控告信，希望却越来越渺茫。所以当时我说行，我回北京想办法。”

在答应陈满父母的请求后，程世蓉来到了海口美兰监狱，以陈满亲属的身份和陈满见了一面，两人隔着玻璃墙聊了 40 分钟。“我总的感觉他思路还是清楚的，没有那种特别偏激或者特别暴躁、特别自我。他关注商业，让他父母给他订杂志和报纸，因为他当时算了一下账，出来大概多少岁，我开玩笑说你还有点野心勃勃。”程世蓉说，当时她心里想，这孩子有点天兮兮的，就是天真、不靠谱的意思。“我只能理解他真的不知道这么多年的变化。”

回到北京，程世蓉开始了行动。最初的计划是双线作战，北京和海南各找一个律师。因为不好操作，

加上考虑到海南本地律师会有顾虑，这个计划很快被否定了。“我花了几个月把陈满案卷宗仔细阅读、分析、摘录、列表对比，整理成脉络清晰的案情介绍和分析文本，然后上网‘骚扰’一切能找到的律师。把求助过的每位律师名字整理成文档，10 年下来，名单里有几百人。”程世蓉说，“大多数没有音信，有位知名律师回复我，说这案子不太乐观，需要新的证据，否则很难翻案。还有律师说愿意给陈满代理，但先要付 5 万元代理费，没钱？甬谈。”

没有专业人士的帮助，程世蓉决定自己写申诉书。她向两级法检机关寄送特快专递 18 封，挂号信 7 封，托人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转交了三次材料，三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情况，和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苏泽林有过邮件的交流。2005 年“两会”期间，利用最高人民检察院三位官员做客新华网的机会，她再一次向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渎检厅陈连福厅长反映案情。她原本以为，案件事实清楚，平反指日可待。

“我写了最长的有一次是 43 页的陈满的案情，寄给海南法院、检察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政法委，我当时的分析可能海南方面是不是没有如实汇报啊？”程世蓉说，因为不了解实际的司法状况，也没有实际的办案经验，对这种案子的申诉难度没有预估，不知深浅地走了进去，才发现水深不可测。

2009 年 5 月，陈满父母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信函，答复是对陈满案不提起再审。一边是翻案遥遥无期，一边是陈满父母的殷殷期待，程世蓉感觉到了压力。程世蓉不是没有动摇过，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既不提这件事也没给陈满父母反馈什么，但是陈满的父母特别坚持。

“从跟我接触以后，陈满的妈妈很多次说，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帮我们了，几乎就是隔三差五地打电话。他们来电话我会发憊，若他们久不来电话我又会去个电话。我是怕他们不在了。说些废话也能松口气。我总在想，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他们或许还等得到。还好，两个老人还能坚持，头脑还清醒。”程世蓉说，“所以我不是什么高大上，我就是个普通人，我看到这个事了，觉得我受不了，能帮就帮一点吧，哪怕给他点安慰。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有这种心态，我跟他说了我又写了一封信，又去跟谁聊了，又见谁了，咱们等待吧。这种话对他们还是有安慰作用的，觉得有人管。”

司法机关的路走不通，程世蓉改变了策略，转而

求助公众舆论的支持。她开设博客，注册了微博，公布案件详情，还通过私信求助于知名法律人士。2013年，经过9年的奔走，转机出现了。李金星代表数十位律师打电话给程世蓉，表示愿意免费代理案件。为了支持律师的工作，程世蓉和陈满的父母商量，支付律师调查期间的交通住宿费用。考虑到陈满父母的实际经济状况，程世蓉决定求助于陈满的同学和朋友，最早找的人就是姚军和王福军。

姚军在海南养过鹌鹑，开过蛋糕店，投资全部失败后于1988年重新回到绵竹工商局工作。他在工商局做了9年经济大队的大队长，退休后被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聘请创建和管理即将在绵竹开业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姚军性格外向，有些理想主义，却也懂得处理人际关系。在得知程世蓉的想法后，原本就一直在关注陈满案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率先捐出了2万块钱。王福军并没有贸然答应程世蓉。对数字敏感的王福军在1996年考取了注册会计师证，1998年回绵竹创办了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因为经历坎坷，王福军谨小慎微，凡事考虑得比较多。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最初因为对程世蓉不了解，他担心程世蓉借陈满的名义为个人敛财，在多方打听并了解了程世蓉多年来为陈满一家的付出后，王福军彻底消除了戒心。

程世蓉建了微信群，其中就有姚军和王福军。她起草了一个告朋友书，让群里的人修改之后再散发出去。“明确地说支持律师为陈满申诉募集差旅费，怎么收钱和付钱。我们很讲规矩的，姚军牵头找同学，王福军负责审计，一点瑕疵都没有。陈满的同学们也特别仗义，纷纷慷慨解囊。”程世蓉说，“前几天我还核对了一次，实际上募集的资金不算陈满他父母拿出来的钱，11.85万元，现在账上还剩63块钱。”

2015年2月16日，陈满的律师易延友收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最高检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16号那一天，真是惊喜。从那个抗诉书来看，内行都看得出肯定翻。性质定了，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就基本上放松了。”程世蓉说，“其实，我只是一根稻草，将朽。在他们无可攀附、无可依靠、跑不动也喊不动的情况下，稻草被当作救命的钢绳。”

陈满案申诉成功后，程世蓉的两个女儿在朋友圈刷屏。小女儿写了一段话：“狄更斯说：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辈。我妈十几年的努力，不光在拯救一个人和一个家庭，也是用自己的

行动在说：一个普通人如何不成为一个庸碌之辈。”

冤案申诉的制度障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最初接触陈满案，是在2013年12月份。

“那时李金星律师问我是否愿意给陈满案代理申诉。我听他简要说明了案情，就觉得这个案件即使是冤案，申诉成功胜算也不大。”易延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因为第一，时间比较久远，时间越久，过去的事情就越难以查清，官方平反的成本也就越高，其平反的意愿也就越弱，因此难度也就越大；第二，陈满认为自己冤枉，判决后却没有上诉，让人心生疑虑；第三，本案既没有死者归来，也没有真凶再现，在我之前已有多位大律师接力申诉，均被拒绝，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与职业律师不同，易延友虽然也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但是更多时候他的身份是学者、大学教授。在教学和科研之外，他的精力有限。所以他有一个原则：每年办少数几个收费的案子和一个不收费的案子，其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学者了解社会、学以致用途径的一个途径，所以在接案子的时候，他会特别慎重。

易延友仔细地阅读了陈满案的全部案卷，在看完案卷后，他基本上决心已定。“案卷给我几个特别的印象：一是该案一、二审定罪的证据当中，很多明显是证明陈满无罪的证据，尤其是大量的证明陈满没有作案时间的证人证言，却都被当作证明陈满有罪的证据来加以使用；二是该案所有的物证全部丢失，既没有在一审法院出示，也没有在二审法院出示，这就意味着法庭上完全不可能对这些所谓的证据进行质证；三是证明该案关键事实的唯一证据是陈满自己的供述，但是陈满的供述本身充满了大量的矛盾——既与客观事实矛盾，也自相矛盾，而且按陈满自己的申诉，他是在被收审10天后遭到残酷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做出的供述。我觉得陈满案很有可能是一个冤案。”

接受委托后，易延友和另一位川籍律师王万琼在2014年春节前夕第一次到美兰监狱会见了陈满。他要了结心中仍存的疑惑：陈满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杀人犯？如果他没有杀人，为什么会供述得如此详细？又为什么会在一审被判处死缓后没有上诉？



上图：因为一个承诺，与陈满非亲非故的程世蓉为陈满案申诉 11 年

下图：陈满（左）和发小王福军（中）、同学姚军在一起



这次会见，经过反复的发问，易延友大体上明白：陈满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尽管案发时他也年近三十，但是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包括对司法制度的运转，可以说知之甚少；因此他只是简单地认为，不管他自己怎么供认的，司法机关都应当把事情查清楚。至于他供述中的那些细节，经过反复征询，易延友总算明白，一个人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之下，侦查人员想要的什么细节会说不出来呢？对于为何没有上诉这个问题，陈满倒是说得很清楚：一审判决之后他没有拿到判决书；他一直等着二审律师去见他并帮助他上诉，但是律师一直没有等到，所以耽误了。”

从监狱回到宾馆，易延友百分之八十相信这是个冤案。“之所以百分之八十，是基于以下考虑：看相貌，陈满不像个凶手；看他回答问题，陈满不像个特别有社会经验的人；看陈满的性格，不像是一个深藏不露之人。因此，结合案件证据，他不可能是个在十几分钟的空隙内从他装修的宁屯大厦跑到被害人钟作宽的住所将其杀害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宁屯大厦并给装修工人、业主端茶倒水的人。”

2014年2月22日，易延友到最高检申诉大厅递交了申诉状，从此开始了正式的申诉征程。2015年2月15日上午，最高检决定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诉。易延友兴奋得要跳起来。在易延友看来，最高检的抗诉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法治事件。不仅陈满个人冤案有望昭雪，而且也让众多的喊冤者看到了希望。“多年来，最高检只有在不满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无罪判决或者罪轻判决的场合，才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要求重审。今天，最高检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求改判被告人无罪的抗诉，在我印象中尚属首次，可以说史无前例。”

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2月1日在海口市美兰监狱，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再审案公开宣判，陈满无罪释放。

回顾给陈满申冤的这两年，易延友深深地觉得审判监督程序需要做一次彻底的改造。“坦率地承认，在我申诉过程中，最高检的检察官对陈满案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对申诉代理人的权利也给予了充分的保障。但是，其他刑事案件的申诉却远比这个案件艰难。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受理申诉的司法机关审查申诉材料的期限。尽管再审案件从立案后到结案有期限规定，但受理申诉材料到立案的过

程却无期限限制，导致很多案件的处理遥遥无期。同时，由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申诉一般应向做出原生效裁判的法院提出，原生效法院就一直延宕不决，当事人也就无法获得上一级法院的救济，指望做出原生效裁判的法院纠正自己简直是与虎谋皮。受理申诉的机关如果级别高一些，自然可以摆脱原审法院的羁绊，但是若非存在充足的理由，通常大家也不愿意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去得罪一个群体。这应当是中国冤案难以平反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从最高检将陈满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之后，易延友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能收到要求他代理申诉的求助信。“仅靠一些律师良心颤动导致头脑发热提供援助是完全无望的，最根本的还是要防止冤案的发生。”易延友认为，就预防冤案而言，从源头上做起，从犯罪嫌疑人一旦失去人身自由就赋予其沉默权和律师在场权，应当是陈满案带给我们制度上的最大教训。“陈满冤案之所以发生，和他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密不可分。如果在讯问时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刑讯逼供就不可能发生。另外，申请法庭强制传唤有利于己的证人到庭作证以及要求不利于己的证人当庭对质的权利，也是预防冤错案件的根本性机制。”

另外，对陈满案原审判决和裁定的审视也让易延友深深地感到，科学精致的证据规则的重要性。“陈满案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侦查机关在案发现场收集的物证全部丢失。物证与案件的关联性都是附条件的：所有物证都应当经过法庭辨认和质证、有些物证要经过鉴定，才满足关联性的条件，否则就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物证的辨认和质证虽然有一些规定，但是具体如何操作，对物证、书证如何进行法庭上的验真，却较少有详细的规则。

对于要求终身追责和严厉追责的呼声，易延友颇感忧虑。“我宁愿相信那些刑讯逼供的野蛮行径都是制度设计不够优良的结果，也相信如果制度设计得当，坏人亦无从恣意妄为。在讯问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严厉追责的观点欠缺一定的正当性。另外，过分强调严厉追责，虽然在一些个案中快意了恩仇，但是却容易迫使其他冤案制造者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挠冤案的平反，也就会导致后续冤案平反的难度极大地增加。这一结果与那些主张严厉追责者的善良愿望也是背道而驰的。”

(陈卫摄)



4月27日，父亲张宏伟和母亲田雪娟翻着影集给张超凡挑选可以放大用作遗像的照片



山西少年的非正常死亡

实习记者 徐文奇

到现在，母亲田雪娟似乎有点理解自己的儿子了。虽然孩子、学校以及由此构成的重重关系，仍是一个她无法进入的世界。

少年之死

2016年4月22日晚上，还未到16岁的少年张超凡自己蒸了米饭，吃了父亲张宏伟炒的西葫芦，之后和两个同村的小伙伴走着去离家1.25公里外的“网络快车”网吧“上班”。他的父母没有想到，再次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绛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奄奄一息。不久，儿子就去世了。

张超凡是被一群同龄人殴打致死的。这些同龄人

是他曾经的同学，他们都就读于华晋学校。不同的是，张超凡一直在这所学校，而其余6人则来自另外一所初中——卫庄初中。两校合并时间不到一年，现在共用华晋学校的名字。

少年张超凡被殴致死一个月之后，这所学校和这个叫二里半的地方，一切如常；下村也一切如常。唯一的变化是，下村张家院落里，若没有访客，就出奇的静。两只小狗，一黑一白，人来时象征性叫两声，并不真咬，久了就趴在院落里，垂头丧气。

早晨6点多钟，华晋学校的孩子们在跑操，一边喊着“一二三四”的口号，声音很大，很远就能听见。初中生要上晚自习，从19点到21点20分，放学时天已彻底黑下来，学校门口，路灯昏暗。大部分学生住校，因为家离得远。家在学校邻近的，或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或由家长来接。孩子们走出校园还要向门



(陈卫摄)

张超凡生前就读的华晋学校

卫出示证件，现在已经很难接近这所学校。有学生告诉我，老师不让对外面说什么。问起是否有欺凌的事，孩子拔腿就跑。家长说，以前还可以进去见孩子，签字就可以，现在也不行。

华晋学校的校徽上印着“1972年”字样。谈及这所学校，当地人都知道，本是一所“子弟学校”。它依托的“五四一九厂”，是个兵工厂。学校去年才和卫庄初中合并，其所在地名为二里半。从这里到张超凡所在的村子，刚好是二里半的路程。走在从二里半到下村的下坡路上，远远就能看见山上晋文公的白色雕像，雕像后面的青山，好似一座圆圆的坟墓。张超凡的墓就在下村晋文公雕像不远。这个死于4月23日凌晨的男孩，再过3个月左右就16周岁了，但他永远都无法达到16岁。本地有一观念，人死之后，年龄恒定。

家人给他配了冥婚。那女孩死时16岁，至今已有3年。女方家只说是病死，具体情况没人知道。配冥婚是当地民俗。张超凡下葬后不久，下村又有青年去世，这次则是自杀，家里也给配了冥婚。张超凡的妈妈田雪娟说，这是“帮孩子完成最后一件事，两个

人成双成对的”。

张超凡留给这个家的，除了记忆、悲痛和沉默，还有一张他睡过的床。在客厅左边里边，客厅柜子里还有他的衣服，“有一部分已经烧了”。田雪娟说，还有两大摞书，在另一间屋子。事发后，这些书从学校拿回家，装满两个书包。

张超凡去世一个多月了，但这些书——他的遗物，从来没有人检查过。他们夫妻两个都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她还好——小学毕业了，丈夫张宏伟则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因此，在孩子的教育上，他们不懂什么，基本上也很少过问，只尽量满足孩子物质上的所有要求。

张超凡的父亲很少说话。在沉默之中，隐约透露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愤。客厅茶几上放着一个烟灰缸，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过滤嘴。猴年春节之前，张超凡不再住校，晚上放学后，很冷的天，都是张父去接。提起张宏伟，村里人都叫他“宏伟”，一个老实人，谁都不忍心看他内心苦痛。

一走进客厅，正对门的地方围着茶几放了一圈白色沙发，靠墙的沙发左边放着一张小床，张超凡就睡在那里。白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很醒目，照片中的小男孩站在最前面，个子还不高，拍照那一年，他只有10岁左右。在窗户下放着一张张超凡和冥妻的合影，这张照片中张超凡看起来已像个小孩子，只5年，变化如此之大。田雪娟说：“我孩子1.7米的个子，只有不到120斤。”

客厅右边有两个偏厅，里面是姐姐的房间，外面是父母的房间。张超凡床头的衣架上挂着他生前的一些用品，一个橙色腰带，一个红色九节鞭，一个黑色耳暖。床上是一床蓝色的被子。田雪娟说，儿子学过跆拳道，那“棍”是别人送的。她说：“孩子心善，不是下手和人打架的孩子。”所以，在整个殴打事件中，张超凡可能并没有还手。

事件发生在4月23日凌晨，开始于网吧，结束于网吧。

当时，张超凡在网吧当网管，这些少年来上网。起因是，他们要买饮料喝，但他们身上没钱，遂要求赊网吧的账。张超凡不让，因为所谓“赊账”，很可能是记在他的账上。这惹恼了这群人，他们开始打张超凡。以这些少年的眼光看来，打得很“精彩”：吧台打，厕所打，花园里打……在不同的地方殴打。

我问：“为什么换了这么多地方打？”我以为张超凡是在逃命。曾经和这些少年混一个圈子的吕强告

诉我：“是有人在拖着，有人在打他。”吕强说，在那些孩子们的感觉里，这样打舒服，很刺激、很爽。吕强是绛县陈村人，和其中一位打人的少年同村，他们曾经就读于同一所初中，也一起厮混过。他了解这些人，但没想到他们会做出这样“逆天”的事。

殴打持续了4个小时，看到张超凡快不行的时候才拖回网吧。这时候，这些打人的少年打了120，后又给张超凡家人打电话。田雪娟一共接到了两通电话，第一通还要她到网吧，第二通已是要她到医院。

下村离张超凡出事的二里半，距离不远，却形状有别。下村的海拔要低，地表很不平整，属于半丘陵地形。二里半依托三线建设的厂区发展起来，城镇化程度较高，相对来说，下村则是较为传统封闭的农村地区。二里半与下村之间，是这个殒命的农家子弟一生的活动空间。

张超凡因是父母两姓唯一男孩，自然会被长辈们视同掌上明珠。他却没有像别的“小皇帝”一样，恃宠而骄。田雪娟说，像张超凡这样大的小孩，有几个会主动干家务活？有时候张超凡还会给家里人做饭吃。下村村民们对张超凡则印象不深，可见他的调皮也不至于到什么“引人注目”的程度。张超凡家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他像他父亲一样老实，老实得像一块土。

张家并不算富裕。下村这些年在调整种植结构，很多人家不再种传统的粮食作物，如玉米、小麦等，而是改种果树，或者栽培树苗以出售。张家因承包地多为坡地，浇不上水，只能靠天吃饭，种的仍多为玉米。张家也承包一些川地，可以浇上水，田雪娟称之为“保命田”，但也是种粮食。他们偶尔打一些零工，主要在周边地区，很少走远，多半是为了张超凡的学业和生活。

今年尤其不敢走远，因为他要中考。打工已是农民挣钱的主要渠道，这一点已很普遍。当地农民懂得嫁接技术，一年的春天之际，有一批人会远到新疆和田、喀什等地嫁接枣树，这季节性的工作挣得虽多，劳动强度却大。田雪娟告诉我，她过去也去，但胳膊和腰都受损了，就再也不去了。

走进下村，可以看到很多家户的建筑有着高大的门楣，瓷砖贴得很漂亮，正中间往往贴出来几个吉利的大字。张家的门楣则略逊一筹，其整个家户建筑显得灰旧、破败。张家的房子修于1995年，村子里除了那几座土坯房，算他们家的房子最老。

暴力链条

张超凡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在华晋学校读书。田雪娟记得自己的孩子的学习成绩属于中游，20多个学生中，她孩子占到十几名。田雪娟说，张超凡最好的是政治和地理，我们看他七年级的地理书，从头到尾都认真勾画了一遍。她告诉我，七八年级的时候成绩已经不知道了。两校合并后，就更少知道孩子学习情况。合校是在张超凡九年级的时候发生。田雪娟一直认为，孩子是在合校后出现的问题。

2015年9月开学，张超凡进入九年级，开始住校。大概两个月之后，2015年11月份以后就不再住校，张父只好每天接送，一直到放寒假。

这段时间，张超凡的学习尚稳定，状态还好。看他的数学作业本，老师批改到2016年1月18日，给了一个“良”的成绩。在这之前，他连着得了四五个“良”。

翻看张超凡的遗物发现，他九年级（下）的课本很少——或几乎没有。田雪娟讽刺并愤恨地说：“我儿子的书都没有了，他上什么学？”

2016年2月23日开学，到3月11日张超凡主动逃离学校，之间只有16天的时间。这16天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诡异的是，在3月11日这一天，张超凡离下课还有10分钟的时候，跳墙走了——这是老师说的。那墙很高，家里因为害怕孩子再次跳墙摔伤，所以被迫答应让他休学。这以后，他就再也不愿意上学了。

事后田雪娟回忆说，其实“孩子被欺负得上不了学”。休学之后，张超凡在家，尝试过一些事情，如修摩托车，但后来坚持要去网吧上班。

上了十几天班，那件事便发生了……

之所以发现张超凡在校期间就被欺凌，是事后根据他身上发生的很多事综合分析得出。那些被欺负的事情，在他生前并没有被关注到。2015年11月份，老师打来电话，说张超凡出事了，原因是他举报了一起收保护费的事件，那孩子最终交出来400块钱，但也记恨上了张超凡。

田雪娟说，参与殴打张超凡的孩子之中，有一个她曾见过，不久前来过他家吃饭，张超凡的课本他也用着。询问起当时看到这个孩子有什么感觉的时候，田雪娟说，没什么不同，两个人还到山上开开心心地照相。这个少年就是收保护费的那个。

对张超凡的欺凌，从校园之内，延续到校园之外，不因其身份改变而改变。这些打人的少年中似乎有一条鄙视链。他们看不起张超凡这样的同龄人，因为他们曾经“告密”，也因为他太窝囊——不知反抗。张超凡所使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他们完全不同，而这种方法——向老师求助（被部分人认为是打小报告）——并无助于将他从这种被欺凌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这些初中生组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小群体，一个小帮派，他们非常团结，这种团结是为了一致向外，可以保证他们在与外界对抗之时能够齐心协力。可以说这些少年非常“单纯”，他们认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武力，如此简单粗暴。

我辗转采访到吕强，他曾是那些“不良少年”中的一员。他说这些打人者曾经（某种程度上）还是他的“小弟”。这些人在他嘴里就是“经常一起玩的人”。两年前，吕强从卫庄初中毕业，他毕业的方式很特殊，是被开除的。在这之前，他已经以同样的方式“毕业”于另外一所县城的学校。

他似乎有点炫耀的意思，说他看过最大的打架场面是200人，年龄全都是15~17岁，都是初中生。这些人之中，真正动手的可能会有70人。他们200多人，本来是要打一个人，但最后没有打起来。或许是因为女人，或许是想要报仇，最后，也可能只是因为“太无聊了”。

从县城的学校转学到卫庄初中，进入初二，吕强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那几个打张超凡的少年，也欺负过他。他告诉我也被打过——但后来他强大起来，“十倍还给了他们”。有没有被勒索过？没有，吕强说因为自己没有钱。吕强告诉我，有钱的和老实的孩子是他们的目标。要想不被欺负，必须反抗，不能太逆来顺受，因为那只会带来变本加厉。

吕强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打。卫庄初中是寄宿制学校，少年们就在夜里的时候，偷偷溜出宿舍，在操场上打。他们打架用的是钢筋，“用书卷着钢筋”。钢筋是从附近的回收站买的，或者工地上偷的。经常有人受伤，但受伤也只能忍着。

在那段时期，他曾经有半个月天天受伤。这些全是内伤，表面看不出来。他的腿曾经被人用棍子打得黑青黑青的，有半个月要瘸着腿走路。大概打了两个月，打得他们个个心服口服，这才开始不受欺负，他也成了那十几个人的“老大”，也就是成了初二的小团体的“头儿”。

2015年11月之后张超凡就不再敢住校，而让父亲每天接回家。他那时候或许已经饱受欺凌，不堪忍受，但他并没有对父母说明，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这次打张超凡的几人就属于同一个团体，他们曾经欺负过吕强，但在其强大后，也想过靠拢他，不过吕强没有“收”他们。吕强告诉我，他当时觉得这些人很傻。意思是，他们不懂事，没轻没重，很多事情，本“可以用脑子和钱解决（但他们不知道）”。

吕强是初二这十几个人的头，他们在学校里没人敢欺负，初三的也不敢。他们和社会上的同龄人——这些人是“毕业”（被开除）了的和别的学校的学生——打过架，在胡同里、野地里、广场上……经常打。吕强说，是为了一个女同学。社会上的人和这个女同学谈恋爱，吕强他们则把她抢了回来。最后，她和他们中的某个人在一起，这件事才告一段落。“女人”，在这些少年看来，也是一种资源。他们所争抢的并不是某个人本身，而是要挽回一种所谓的“尊严”。

他们初二这一帮人不收保护费，因为他们不缺钱。言下之意，收保护费的少年只是因为缺钱，往往家里条件确实不是很好。吕强告诉我，这些打张超凡的少年中，某个家里很穷，也是他一直在收保护费。保护费，他们在卫庄初中就一直在收了。当吕强转学进来的时候，就知道初一这帮人的行迹。当两校合并之后，这些行为并没有停止，只是对张超凡来说，也许是第一次遇到。所以他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报告老师，却没想到这会成为他不幸命运的导火索。

这些少年对自己欺负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不起的情绪。“见面就想欺负欺负”，以便“让别人知道他们有多厉害”，吕强说。他们之所以不喜欢张超凡，还因为他报告了老师。

吕强多次跟我提到“打洗脚水”的说法。在他们中间，当一个人不被欢迎，甚至被厌恶，成为受欺负的对象之后，就可以称为被“列入打洗脚水的名单”。名单上的孩子要给其他人打洗脚水。因举报有人收保护费后，2015年11月之后张超凡就不再敢住校，而让父亲每天接回家。他那时候或许已经饱受欺凌，不堪忍受，但他并没有对父母说明，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她能体会到孩子在受到多次欺凌后内心的“委屈”。委屈无法释放，因此除恐惧之外，还会感到一种“无助”，田雪娟说。

涉事的绛县华晋学校一位负责安保工作的老师说，“现在的小孩管不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学校里有个小孩不做作业，老师罚他拖走廊的地。第二天家长就找过来，指责老师罚自己的小孩。老师说因为孩子不做作业。家长就说：“不做作业，不是你们教不好吗？”

失灵的代际沟通

张家总是尽力在硬件上给予孩子。田雪娟告诉我，孩子的学习用品一应俱全，各种教辅书买得也多。包括给家里拉了网线，买了电脑，可以上网，也是为了张超凡。田雪娟说，小孩子若看到别人家能上网，而自己家里不能，会羡慕。张家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算太了解自己的孩子。

张超凡是一个孤独的小孩，家里没有人知道他内心世界如何。张父完全不上网，田雪娟有微信——是为了某次工作之便。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中间，QQ更为普及。张超凡去世之后，QQ密码家人无从知道。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沟通失灵，时时处处可见。如在孩子的书上，偶尔写下手机号，田雪娟说不是他们的手机号，但不知道是谁的；有时写下很多类似腾讯账号的一串串数字，这些数字对父母来说，就像符码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到现在，田雪娟似乎有点理解自己的儿子了。她说：“经常（受）欺负，心理的负担有多重。孩子性格会变的。精神的压力比身体的压力程度要多很多。”

她能体会到孩子在受到多次欺凌后内心的“委屈”。委屈无法释放，因此除恐惧之外，还会感到一种“无助”，田雪娟说。这种无助，因和家长之间的不能沟通，而被压制，无从表述，成为沉重的精神压力。

在张超凡的遗物中，除了书和作业本，我们发现一个承传自他姐姐的笔记本。里面抄、写了一些可能透露其内心世界的句子。张超凡的字写得歪歪斜斜，

田雪娟说不好看，是因为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曾送他到私立学校，那个学校只重视速度，没有重视质量。在这个本子上，记着他练习唱过的一些歌，记录的方式是“练习”+“《(某歌的名字)》”，如：练习《十年》。大概有十几首。田雪娟说，张超凡爱唱歌，“天天对着电脑就唱，年轻人的歌我不喜欢”。笔记本上抄写歌词的就只有这一首《坠落》，是《超神学院》(动漫剧)的一个插曲。歌词如下：

夕阳下云朵，被夜晚吞没
微弱的灯火，闪烁昏暗的街楼
彷徨的眼眸，起伏的胸口，颤抖
就算，最后一刻心被划破，面对烈火，无需闪躲
绝不放手，奋力一搏
就让从前的我化成火
燃烧的灰烬不停坠落
卸下沉重的锁
奋力挣脱驱散心魔
由你我在此刻，变成火剩下的灵魂不停冲破
打碎云朵一起，慢慢坠落

在这样的歌词里，能看到孩子什么样的内心款曲，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挣脱的意识，以及被心魔纠缠的事实，却无疑是他这段时间的真实心态。

这个少年将自己包裹起来，藏匿在自我的世界里，在意他心灵感受的家人无从进入，而外人则很少在意他。他在笔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我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了，我想发泄。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向谁发泄，朋友、同学、亲人，还是？？？（被涂掉），背叛了我……”

我们不知道那个被涂抹的名字代表的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为何会感到“愤怒”，为何会体验到“背叛”这种极端情绪。

张家目前正等着处理张超凡后续事情，夫妻俩都无心他顾。玉米地里要除些草，再次联系田雪娟的时候，他们就在除草。过些日子，麦子也可以收割了。现在他们只希望这件事快快地结，希望还儿子以公道。

张家客厅茶几上放着一支燃烧了一半的白色蜡烛，很显眼刺目，田雪娟回应称：前几天线路检修停电，点了蜡烛，一直没有收拾。

我们去看张超凡的书，在另外一个屋子堆着。看完后，走出那屋子的时候，田雪娟不经心地说：“原本考虑的是，等孩子大了，让他住在这屋里，再在外面盖个小房子……”



绘画·阿梗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吴冠中画作《交河故城》(106厘米×102厘米,1981年)



黄永玉画作《新会灯市》(97厘米×180厘米,1976年)

寻常大院内的中国美术传奇

记者 / 李晶晶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一个只有在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才可能出现的罕见“盛况”，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与影响。自上世纪40年代末起的数十年来，“大雅宝胡同甲2号”如同一所“文化家园”，聚集、见证了众多20世纪艺术大家的艺术人生。

若让时间倒退60年，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漫步在东城区，可能会无意踱入一个普通寻常的大院，若四下打听，便会知道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职工宿舍。这里住了十几户人家，老老少少，欢声笑语，一片和谐。大人们用自己的青春、热情与才华撰写着中国美术的辉煌篇章，同时他们也悉心关注着下一代的成长；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被大人們的奋斗精神所感染，一起读书、画画，在这个胡同里度过金色童年，共同成长……这就是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个个名声如雷贯耳：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吴冠中、李苦禅、张仃、董希文、叶浅予、周令钊、侯一民、彦涵等，也正是他们创造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

1946年北平艺专请徐悲鸿先生来主持。他刚接管北平艺专时，工作繁忙。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女士，便扛起了帮助老师们找宿舍的重担。她坐着黄包车，一处一处跑，一处一处看，最早的北平艺专教职工宿舍便选在了大雅宝胡同甲2号。大雅宝胡同这个宿舍实际上是四个连在一起的院，各家的大门都是敞开着，孩子们可以从前院看门的赵大爷家，跑到李可染家、李苦禅家、董希文家、张仃家、黄永玉家等。

“据我母亲说，可染先生当时和苦禅先生是邻居，两个房子墙中间还有个洞，小孩子可以钻来钻去。”徐庆平先生（徐悲鸿之子）回忆道。张郎郎先生（张仃之子）记得李可染家就只有一张桌子，吃饭、画画、写字都是它。李苦禅家有两间，但是一间里面只能放一张床，给他妈妈住，另外一个叫“一明一暗”，就是一个厅加上一个卧室，加起来只有三四十平方米。

挨着他们的就是董希文家，当时有两间，加一个厨房，就只有这么小的房子。1953年董希文画《开国大典》，这幅画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为董希文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当时家里根本搁不下，董希文借了别人的家来画。但就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各位大师创造出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

李可染的艺术潜力是被徐悲鸿在一次重庆的画展上发现的，称李可染将徐渭在花木上的自在、独创风格运用到了人物画上，形成了以前没有的画风，遂邀李可染来北平艺专，并将齐白石和黄宾虹两位老师介绍给李可染。张郎郎回忆说：“我早晨起来上学，很早就看到他在画画，我就趴在窗户上看半天，他都不



李可染画作《漓江帆影图》(68.5厘米×90.5厘米,1985年)

张仃、李可染、罗铭三个人在 1956 年去江南写生，和莫奈他们的想法一样！这样一去画就找到感觉，后来在北海办了画展。

觉得，因为特别专注。”李可染心中充满了对国画革新求变的追求。张郎郎说：“那段时间，我父亲每天推着自行车和李可染从大雅宝走到中央美院，一路上就商量中国画如何改革。国画的山水到了清朝的四王之后就走进了死胡同。后来他们顿悟，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印象派拿起画板走进自然，过去国画都是属于心中的画，没有直接摹写大自然，大家都是照着芥子园画谱画就完了。”

张仃、李可染、罗铭三个人在 1956 年去江南写生，和莫奈他们的想法一样！这样一去画就找到感觉，后来在北海办了画展。这是中国国画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在现代画上走出了新的道路、新的改革。

徐庆平回忆道：“李可染他们去江南写生，条件是很艰苦的。回到北京的时候，鞋都是破的。但在艺术成就上，却为国画辟出了新的道路。”李可染一生十分谦卑，他自己曾说：“我从来不满意自己的作品。即便再过一百年，只能好一些。”

这个时期在大雅宝胡同甲 2 号院内，李可染完成了《工农劳模北海游园大会》《漓江帆影图》，还有张仃的《苏州庭园》、叶浅予的《北平和平解放》、董希文的《百万雄师下江南》、侯一民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吴冠中的《交河故城》等作品，影响了一个时代。1957 年夏天，叶浅予和张仃、黄苗子等人结伴西行，并在山西芮城永乐宫临摹元代壁画，当时陆鸿年、王定理正按美院中国画系叶浅予等领导安排带学生把整座永乐宫壁画摹完，为永乐宫迁址搬装壁画而精心工作，元代永乐宫壁画的魅力使美术界及美院的教员、学生深为震撼。永乐宫壁画构图严谨、笔法简练，以自然景观场所区隔人物活动为其特点。叶浅予在《北平和平解放》这幅政治题材作品中，非常巧妙地运用这种手法，还吸收了很多民间年画和宗教水陆画中多维空间的表述技巧，以更充分地渲染炽烈的热闹气氛。这幅作品应该是民族、民间和时代、生活相结合，成为和谐统一的典范佳作。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李小可，多年以来都希望能够以“大雅宝胡同甲 2 号”这个院子为题做一个展览，以表达对 20 世纪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艺术家们的敬意。怀着这样的初衷，加上适逢佳士得立足亚洲 30 周年，佳士得拍卖公司得到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共同主办“大雅宝胡同甲 2 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展览，将这些感人的故事以及 30 多幅大师们的不朽作品一同展现在亚洲的国际舞台上，并与已经长大了的大雅宝胡同孩子们一起回溯那段历史。展览展出了曾经居住在大雅宝胡同甲 2 号里的主要艺术家的代表作品，以及艺术家们人际交往、艺术共事和时代背景等相关故事、文献资料，为我们揭开了传说中的大雅宝胡同甲 2 号这所“文化家园”。

徐庆平打比方说：“一讲到巴黎两大艺术中心，人们就会想到洗衣船（即巴黎蒙马特高地上的一所破破烂烂的楼房），毕加索等现代画家都曾在那里住过；还有另一个地方叫作蜂窝，在巴黎蒙巴纳斯的一片楼房，里面都是如鸽子笼般的小屋子，当年住着贫困的画家。这两个破旧的地方，却永远留在艺术史上，就是因为现代艺术的起步、变革从这两个地方开始。中国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那一定就是大雅宝胡同甲 2 号，因为它是集中北平艺专、中央美院的画家大师最多的地方，为 20 世纪中国美术带来最大贡献的地方。”

时光荏苒，现在的大院基本上没有了当年的模样，可“大雅宝胡同甲 2 号”却成为一个永恒的代名词，专指那些曾在那里奋斗、成长过的艺术家及他们的孩子们。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群，值得让全球所有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人去聆听他们的动人故事，从而了解这群人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体会这群人纯朴真诚的情感，敬慕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

“大雅宝”的艺术家们有着不同的艺术道路和观点，却互相尊重、理解，不但创造了让人称奇的、中国童话式的美好的“大雅宝胡同甲 2 号”，更一起创造了 20 世纪中国美术的辉煌。而作为文化的继承者与开拓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却被渐渐遗忘，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此次展览旨在通过相关文献的呈现回溯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一页，以此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更多材料与角度。展览致力于描绘出一个鲜活的“大雅宝胡同甲 2 号”，这也是对这段历史的首次梳理和集中呈现。■



上图：1950年，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庆祝白石老人九十寿辰合影。（左5）齐良迟（齐白石四子）、（中）齐白石、（前）李苦禅、（左7-11）廖静文、徐悲鸿、齐良已（齐白石五子）、李可染、王朝闻、（右1）李瑞年、（右2）叶浅予、（右4）滑田友（李苦禅之子李燕提供）



左图：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展览现场

德国宝沃演绎“老兵归来”

主笔 / 李三



宝沃汽车公司全球 CEO 华立新

5月24日，在工信部发布的第284批公告目录中，终于见到了宝沃的名字。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正式取得乘用车生产企业资质，这意味着经过10年时间复活的宝沃汽车，在中国正式走完汽车生产销售的法规流程。

德国有多家汽车博物馆，每家都有珍藏的典故，有的已经成为历史，有的则通往未来。记不清在哪家博物馆里，曾经看到过一张巨大的图表，众多汽车品牌组成一个豪华的矩阵，遗憾的是其中有些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品牌，当中就有宝沃。博物馆的讲解员提及宝沃当年的种种辉煌，看到参观者不解的表情，解说者幽默地说道：为什么不存在了？是因为这个品牌太好了，你买了它，它老不坏，你不会买第二辆，所以最后他们家就死了。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但这个玩笑背后，宝沃确实曾经辉煌。

宝沃的历史可追溯到1924年，工程师卡尔·宝沃作为创始人，设计和创造了最初的宝沃汽车。到上世纪50年代，宝沃汽车已经位列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之一，占全国汽车出口量的60%，其明星车型伊莎贝拉更是深受德国家庭的喜爱。全盛时期，宝沃工厂有超过2.3万名员工，在1924到1961年的37年中，有超过百万辆宝沃汽车生产下线。

宝沃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陈威旭有很多关于这个品牌的故事，他说，宝沃“消失”在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汽车工业界的动荡时期，据说宝沃的消失是一个谜，当时的宝沃不差钱，工厂还在运营，资金链却被断掉，监事会主席被换掉，一大堆阴谋论说辞，所以宝沃又被称为“羽化成仙”了。但它

的余晖还在，工厂给了奔驰，今天奔驰的ACLK、GLK等都还在那里生产，多年积累的人才也就流到各个产业，成为当时德国快速成长的奠基石的一部分。

“二战”将领麦克阿瑟将军曾有一句名言：Old soldiers never die（老兵不死）。宝沃就是德国汽车界的功勋老兵。2008年，宝沃瑞士公司正式成立，卡尔·宝沃的孙子克里斯蒂安·宝沃开始与国际汽车行业专家团队合作，启动品牌复兴计划。2015年7月，德国宝沃汽车集团在斯图加特注册成立，宣布品牌复活重回汽车业。

现任宝沃全球CEO华立新，也是德国汽车界的一位“老兵”，他曾经为戴姆勒-奔驰在中国市场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在加盟宝沃汽车前，华立新多次与克里斯蒂安·宝沃沟通，被他的执著和激情所打动。“在他的世界中，复兴宝沃汽车一直是他的梦想。”华立新说。为了品牌复兴尽快打开市场，华立新还直接担任宝沃中国董事长，在发展欧洲、印度、俄罗斯以及巴西等业务的同时，短期内重点突破中国市场。当华立新被问起为什么选择宝沃时，这位本已退休的老将留下了这样的回答：“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品牌，但我从未想过有人会复活它。我希望能把这个儿时记忆的品牌在我的手中发展起来，这对我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挑战，更是奖励和荣誉。”

宝沃首款 SUV 产品 BX7 已经在中国上市销售。华立新介绍：“这是德国的 DNA，真正的德国设计，并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定位会高于日系、韩系车型，但会接近大众品牌。如果你希望买一辆高档车，但资金有限，那宝沃会是一个好选择，我们希望让豪华触手可及。”

在车坛消失半个世纪之后，如何一点点地找到存在的理由，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回归与其说是一个复兴的梦想，不如说是一次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宝沃，目前为止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关于它的辉煌历史，在宝沃的“历史名片”上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陈威旭：宝沃目前在 15 个国家还有它的品牌俱乐部，现在全世界还有 1000 多辆高端的古董车。当然光靠情怀显然行不通，拿出该有的品质才能打动消费者。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制定品牌的复兴战略？

陈威旭：我们的策略用三个字概括：第一个字 B，就是宝沃品牌；第二个字 G 是德国制造；第三个字 W 是全球布局。这就是我们的全球策略。未来我们还将新能源、智能化的德国高品质产品与全球优势资源整合，立足德国，进行全球市场布局。谈到全球布局，我们是以德国为中心，遍布到各地，在成熟的市场里锻炼产品、锻炼品牌，接下来到其他的国家生产、销售，产生销量有了利润以后，再回到总部，继续研发，产生正循环。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与目标消费者形成心理共鸣？

陈威旭：首先，消费者想要追求的是一个比较精致有匠心的东西，要很时尚，功能很炫，质感是经过精心设计出来的，还必须可靠耐用。其次，在科技上得有突破，同时，价格不能太离谱，要触手可及。我们的定价会在主流品牌的上端，但不会往超级豪华的价格走。

消费者现在买车不光是买产品，所以，我们希望在消费者的心理层面提供一个好的产品，让豪华触手

可及。不光只是产品，从服务、经销商体系到车联网的生态圈搭建，我们都是这么要求自己的。

三联生活周刊：宝沃已经消失了 50 多年，这么短的时间如何造出领先的汽车？

陈威旭：宝沃的继承人克里斯蒂安·宝沃先生从 2005 年就在着手这个计划。2008 年，宝沃公司就在欧洲正式成立，找到设计团队等等。2010 年，设计及工程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福田成为我们的投资人，开始购买设备等。我们是以德国的研发中心为基础，德国的供应链，整合很快。在北京的生产基地从每颗螺丝到组装全部是德国宝沃汽车的生产体系。

三联生活周刊：短时间内如何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

陈威旭：经销商布点的进度超过我们的想象。中国市场我们一共分三次招商，目前已经有近 100 家签约，年底可以开 120 家，到 2017 年会增至 200 家。4S 店是要建的，没有店无法交付。

三联生活周刊：首款产品 BX7 的起价不到 17 万元，宝沃的定价基础是什么？

陈威旭：我们定位的原则是德系做工品质，极富诚意的价格，概括说就是让豪华“触手可及”。现在很多品牌已经模块化了，其中也包括豪华车，底盘都一样，只是不同产品的质量略有差异。而宝沃就是希望能够打破这个界限，采用全新 BSP 平台生产，既遵循模块化设计，又可实现车身尺寸和轴距的弹性调整，还可以自由搭配各类悬架，令车型更具衍生性。宝沃的产品定位是高端车，BX7 宝沃倾尽了 10 年心血，融入了宝沃领先技术及前沿设计，不到 17 万元的定价，更体现出我们对市场、对消费者的诚意。

三联生活周刊：宝沃的目标消费者锁定在哪个群体？

陈威旭：我们的目标消费者，如果以高中低分级，我们希望在中间往上，为进步的现代主流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这个人群，他们有梦想、有信心，他们做事很切实，希望能够乐享未来，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现在的时代中坚。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让他们执梦想、近未来。■

《破产姐妹》以及年轻人的成功

文 / 张月寒



美剧《破产姐妹》剧照

太温和则没有棱角。太没有观点就是平庸。

美剧《破产姐妹》2011年播出的时候，无疑填补了某种空白。在之前美剧市场普遍年龄群不是太老就是太嫩的整体环境中，《破产姐妹》适时填补了二十几岁观众群这一市场空白。在它之后，似乎才是《衰姐们》(2012)、艾米·舒默，以及同样的女性重口味喜剧《大城小妞》(Broad City)。

虽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刚刚更新完的第五季似乎没有第一、二季那样黑色和重口味了，但2011年当《破产姐妹》甫一出世的时候，还是给人一种清新大胆的独特魅力，是很能脱颖而出的。从年龄层偏大的《绝望的主妇》《欲望都市》，或太过高中生的《绯闻少女》《美少女的谎言》《90210/新飞越比弗利》，终于有一部

美剧开始聚焦刚刚走上社会的年轻女性群体。探讨她们的生存与挣扎、现实和理想。

学者雪莉·弗德瑞克(Shirley Fedorak)在《大众文化：一种每日生活的文化》(Pop Culture: The Culture of Everyday Life)这本书中试图用她的专业人类学来解释人们对于任何大众文化(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小说……)的迷恋。当“检视当今社会”的时候她时常有一种困惑，即当下最受欢迎的一些流行文化产品，它们受欢迎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破产姐妹》首先在于大胆探讨了年轻女孩经济困窘的这一社会问题，直面了“大家或许都穷过”这种现实。当时拍板买这部电视剧的前CBS电视台娱乐部主席妮娜·塔斯勒(Nina Tassler)，年轻时也就经历过“破产”期。事实上，如果不是生而富有，很多人或许都多多少少体会过这种“钱不够花”的尴尬。《破产姐妹》恰恰是将这种尴尬从谗言走向大众。又同时包含一种励志向上的色彩。每集结束，电视剧都会打

出两个女孩的银行存款余额，五年过去了，她们几乎还是没有存下什么钱。

于英美文化习俗上，破产也不像在中文里具有那么强烈的羞耻和幻灭感。很多英美国家的年轻人都会把“破产”当成一种口头禅。在这样一种形势下，2011年，当有两个年轻女生在电视上说“我们快要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时，一切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正显得新鲜有趣和适逢其时。

作为女性喜剧，《破产姐妹》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直言不讳、“粗鲁”甚至“冒犯”。第一季推出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和它“粗鲁直诨”的台词风格有着莫大关联。剧中主角麦克斯(Max)的台词大都直接、冒犯、直抒胸臆，就算对以“直接表达”为习惯的美国人来说，或许都算“太直了”。以至于这部剧刚刚播出的时候饱受争议，2012年时甚至达到了一个“全民皆骂”的时期。很多观众认为此剧太“冒犯别人”，充满种族歧视和刻板印象。

可是，有些东西就是越有争议越火。第二季在种种争议不断下，还是获得了1000多万的观众总人数，成功续订第三季。

直抒胸臆也是《破产姐妹》的一个最大魅力。主角麦克斯自小身世坎坷、洞悉世事，所以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是黑色的。这也使得她经常能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去嘲笑、讥讽别人。可她也如此真实，将很多人平常不敢讲之看法，大声说出来。刚刚结束的第五季最后一集，麦克斯看见餐厅里一个三十几岁模样的男子在一个周二工作日的下午，穿着一条背带裤，正在涂自己的填色本。她立即就看不过去了，说要“教育教育”他。于是她走上前去直接问：“Why？”指他为什么要涂填色本这种东西。男子立即说：“哦，这可以缓解压力非常有禅意……”麦克斯说：“你知道，sex也是可以缓解压力的吗？而且，你周二下午没事干在小心翼翼为一只独角兽的屁股填色，那证明你也没什么太大的生活压力嘛！”

台词不俗是这部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它背后的因素则为《破产姐妹》的共同编剧是迈克尔·帕特里克·金(Michael Patrick King)和惠特尼·康明斯(Whitney Cummings)。前者是《欲望都市》的王牌编剧。《欲望都市》那一段段警言式台词到今天仍被奉为经典。后者惠特尼首先自己就是单口相声艺人出身，2011年也自编自演了电视剧《惠特尼的烦恼》。

“女性视角”是《破产姐妹》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虽然是写“女人剧”出身，但迈克尔·帕特里克·金还是很清楚自己需要一个真正的“年轻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使这部剧能贴近年轻女性群体，为她们发声。

值得一提的是，惠特尼本人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也经历过破产阶段，所以她深切明白剧中两个女主角遇到的一切问题以及没钱的尴尬。惠特尼之前的单口相声就已经和麦克斯的台词风格很像，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些优秀的语言，似乎透过麦克斯这一虚构形象的演绎，才会更好玩、更有新的火花。惠特尼之前自己的电视剧《惠特尼的烦恼》也时不时闪现机智幽默的台词，只是，毕竟没有像《破产姐妹》那样成为一种现象。播出两季后就没有续订了。

或许写作和演戏终究是两回事。又或是，在视觉世界里，人们毕竟还是肤浅的。《破产姐妹》两个主演的颜值也是这部美剧如此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英语文化国家，凡是涉及“喜剧”，特别是在“单口相声”界，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就是“种族歧视”和“刻板印象”。喜剧人们也必须靠这两点让观众发笑。而这两者，也是一切争议的起点。纵观现在各路喜剧、脱口秀、民间单口相声，无不充斥的是这两者融合而成的段子。拯救这一切的其实是西式幽默中的“自嘲”。正是自嘲，使观众宽容。喜剧人除了嘲笑社会现象，更嘲笑自己。《破产姐妹》中麦克斯也是这样。

虽然说电视剧终究是虚构作品。但我觉得《破产姐妹》现实感最强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人们，努力也不一定会很快成功。如今，当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努力工作数年后，发现自己并没有像一些电视剧里那样突然得到一个机遇而迅速崛起。这时他们开始厌恶影视剧中的主角那么容易成功，再一次明白一切都是假的。而《破产姐妹》里的成功速度却几乎和现实一致。五年了，剧中颜值、才华、努力都有的两个主角，还是住在布鲁克林那间破公寓。于是正在观剧的观众看着自己也同样始终没有崛起的现实，或许就没有那么绝望了吧。

总的来说，《破产姐妹》整个第五季虽然有起有伏，但这两对姐妹还是继续坚持了下来。既没有绝对成功，也没有完全失败，一直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从第一季时去慈善商店买衣服的那种惨，到第五季时她们虽然拿到电影投资，但还是在餐厅当服务生。这不禁让人觉得这部剧和现实生活真的很像。

电视剧的一大亮点当属每集开头，当麦克斯遇见各种奇葩顾客，无情嘲笑他们、针锋讽刺他们的那一小段。既针砭社会现象，又一吐很多观众心中对特定群体积压的某种不爽。比如：带着电脑在咖啡馆坐一整天又无所事事的人、太保护孩子的母亲、难伺候的老太太群体、无故对人打响指的人……《破产姐妹》用一种更华丽形象的方式将单口相声中的“抨击”“发泄”，大声展示出来。既一扫积郁，又年轻可喜。☑

戏剧人赵立新： 演员中的知识分子

文 / 驳静

采访结束后的用餐时间，赵立新显得挺疲惫，也挺自得。他跟助理的对话中有两句给我留下印象，一句是：“可惜《英雄广场》没时间去看了，记得帮我买这本书。”还有一句是：“还是拍电影好，对吗？拍电影可以休息。”



赵立新



1989年，赵立新（左三）在莫斯科阿拉巴特街拍摄纪录片作业《中国功夫在苏联》

从《大先生》谈起

《大先生》这部戏在北京首演了四天，前后被媒体、戏迷和知识分子讨论了一个月。首演后两周，我采访“大先生”鲁迅的扮演者赵立新，问他何时开始全国巡演，他回答：“之前热情高涨，但现在变得微妙起来。”

再一个两周后，在天津大剧院的食堂里，我遇到了来看《英雄广场》的李静，作为《大先生》的编剧，她否认了《大先生》全国巡演取消一事，说：“在这事儿上他就是比较悲观。”

“悲观”的确是赵立新最初对《大先生》的态度，他甚至觉得，在舞台上诠释鲁迅这事儿，很可能一伙人摩拳擦掌了一通，最后仍然逃不掉夭折的结果。因为剧本本身也经历过炼狱般的磨砺。最初“大导”林兆华邀李静写鲁迅的话剧剧本是在2009年，并且想过请濮存昕主演，6年后剧本终于完成，李静说：“大导和濮哥那儿都行不通了。”她就把剧本发给赵立新看，当时只是想着，赵立新表演、导演经验都挺丰富，能给提点意见，后来转念一想：“不如就找他，他既能导，又能演，只是没想到他能一口答应。”

一口答应后的赵立新，其实立马又有点后悔。他周围朋友的第一反应要么是“不太像”，要么是“不太好演”。

毕竟诠释对象是鲁迅，一个所谓“被过度谈论而又误解最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当时赵立新还兼有导演的职责，听上去压力更大。

一开始赵立新和李静也没找到合适的投资方，一度计划在小剧场演出。后来二人与曾写过《笑谈大先生》的陈丹青，就剧本进行了一次三人对谈，后者不只建议把题目改为“大先生”，还把“文化乌镇”的陈向宏介绍给了他们，这才有了青年戏剧导演王翀的加入，这意味着，赵立新可以专心诠释角色。不过，赵立新是受过苏联和瑞典两个话剧体系正统训练的戏剧人，而王翀是实验戏剧派，再加上李静是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人，首次合作，用赵立新自己的话说，就是“三驾马车配合得出乎意料的好，我甚至还在两人中间充当润滑剂的角色”。

尽管如此，等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的时候，赵立新发现行程非常紧。他只有四天时间排练，一天合成，没有多余的时间讨教钻研。“后来我觉得，这恰恰是这部戏的大忌，如果我真钻到鲁迅作品的故纸堆里，钻到鲁迅专家的著作里，我就成了一个爬虫。”赵立新说最后他得到的反馈出乎意料的好，于是更加庆幸当时没有刻意去贴近那个符号化的“导师、斗士”鲁迅。“我平常演戏也是这样，干脆远远拉开距离，告诉观众，我不像，我也不是。”

所以《大先生》上演后，鲁迅“白衬衫牛仔裤”的形象惹人注目，这也成了评论声音里出现的高频词。鼓楼西剧场创办人李羊朵女士也与赵立新颇有渊源，我们在谈到《大先生》时，她甚至问我：“衬衫牛仔裤这副打扮，得是赵立新的主意吧。”

“除了鲁迅，皆为傀儡。”后现代的白衬衫牛仔裤

在舞台上奔走呼号，对手戏时而是代表许广平的“蓝色海洋傀儡”，时而是代表朱安的“头戴棕纱人偶头像”。而胡适是只鸟笼，周作人是一把可以打开的油伞形象，鲁迅的母亲，则成了高悬空中的一抹剪影。

李静说首演的四场，每一场都在进行调整，大到傀儡的数量，小到背景中领袖上衣的纽扣。我看的是第二场，最后一个段落里，鲁迅看到世人的丑态，出离愤怒，抢过了傀儡手里的一个个面具，癫狂地喊出他们的心声。每抢一个面具，赵立新就换一种方言，东北方言、上海话到河南话，演了个遍。正是这段惹得现场观众笑声此起彼伏。

原来的剧本里，鲁迅本来是旁观者，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博学家，这四位原本也是由傀儡出演，王翀则认为这样的操作太常规，这一幕的台词，如果由鲁迅发出来，效果会好很多。赵立新被说服了，但他发现，如果这样操作，就只有使用不同的方言一条路。“方言既是我的强项，也是我小心使用的工具，要出效果，又不能沦为小品式表演，关键在于掌握平衡，不能失控。”用自己抵触的方式表演，还是挺忐忑，好在现场观众笑了，而对看戏比较挑剔的人，也都认可了这一段。

“但最后一场的这一段，就没什么笑声了。”赵立新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前三场后，自己表演到这段前产生了心理预设，觉得这可能是一段华彩，这样一来，表演者对戏剧的整体性理解就被削弱了。

他举这个例子，是想证明“整体性认知”对戏剧表演的重要性。“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去看，如果一个演员预设对华彩部分的喜爱，就会有卖弄之嫌，而且就像爱一个人，还包括她早上起来没洗脸还有眼屎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中戏讲过6年表演课为人师表的一面就显现出来。

2002年，赵立新还没有完全从瑞典回来，但已经开始在中戏代课。除了给学生们讲表演课，赵立新后来还带过一个专科班。“赵老师从头到尾带了我们两年，既像是导师，也像是班主任。”李耀林是他们班上的学生，现在也是一名戏剧导演。他跟我提起赵立新时一口一个赵老师，能听得出来这一声名副其实的“赵老师”中，与当下社会上泛泛的“老师”称谓之间的区别。他说他们班一共30多人，一到赵立新的课，不只像他这样平时不太爱上课的同学到了，不大的教室，一半是自己班上的同学，另一半则是慕名而来的学生，“总能挤六七十人”。在李耀林眼中，赵立新的表演风格非常新鲜，讲课也十分激情投入。李

耀林记得一次课后作业，他写了一个跟爱情有关的剧本，拿去给赵立新看，结果赵老师什么也没说，只问了他一句：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与戏剧的经典恋爱程式

交流过程中，我发现赵立新很喜欢用“女人”、“恋爱”这一类比喻。比如前文提到的华彩，再如，问及他与戏剧的关系，他说他像恋人一样对待它。“之所以不用夫妻，是因为恋人特有的小心翼翼最能形容现在我和戏剧之间的关系，既有敬畏，又常常很想见到它。”

借用恋人关系的比喻，他从“大二”到俄罗斯电影学院开始到第二年时间，算是他与戏剧的暧昧期。80年代到莫斯科，赵立新是一个自信满满又因为语言到处受挫的留学生形象。8个月时间过了语言关后，他才开始感受到一些与戏剧的情愫。但是与国内不同，他们的电影学院没有表演系，所以表演课就由戏剧学院的老师来讲，从而感受那种戏剧魅力，既激动人心，又令人不知所措，因为“对在那样的环境里学习的人而言，戏剧能做多远，的确不太确定”。

这种暧昧期，被瑞典戏剧人结束。

赵立新考入瑞典国家话剧院之前，还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小剧场有过一份合同，合同内容是导演由北岛的小说改编的一部话剧《幸福大街13号》。赵立新用英语和剧组沟通，演员们则用瑞典语演绎。这部剧让瑞典演员觉得中国人既能导演又能表演，所以当其中一个演员在哥本哈根戏剧节遇到瑞典国家话剧院的艺术总监时，就向其推荐了赵立新。

刚进入瑞典国家话剧院的赵立新，还不会说瑞典语，但是马上就得到了他的第一个角色。导演为了他这个中国人，在该戏排练了15天马上要上演之前，生造了一个“魔鬼”，它没有台词，像黑色蝙蝠，自始至终都落在舞台一角，找机会引诱那些善良的人。没想到这样一个异峰突起的沉默角色，上演后获得了许多关注。《瑞典日报》曾整版介绍这个神秘的东方人。“这部戏一举奠定了我的江湖地位，大家都在谈论说瑞典‘国话’来了一位神秘的东方人，要跟他们抢饭碗。”在瑞典，戏剧学院也呈三足鼎立之态，当时每年的毕业生也有两三百人，同样面临着激烈的就业竞争。“我一个黄种人跑到人家地盘上，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跟他们抢坑，本身就很奇怪。但我很自豪，我觉得凭本事吃饭，你戏好了我走，我戏好，不管我



(摄影:王)

上、下图: 3月31日, 赵立新主演的《大先生》在国家话剧院首演



(摄影:王)

是什么颜色的萝卜，这个坑就只能归我”。

赵立新真正与戏剧进入热恋，与深度感受瑞典语分不开。

他在说到如何拥抱瑞典语的时候，提到一个细节。他在排没有台词的魔鬼角色期间，有一天开车去上班路上，打开收音机，听一个电台节目叫“斯特林堡的信”，是由瑞典皇家剧院的演员朗诵的。“当时外面飘着雪，北欧的雪能下得特别大，下得不急，厚重的雪，还有汽车尾气的白烟，让前面的红绿灯显得额外耀眼。我坐在车里，等红灯的当儿，透着车窗哈气，突然觉得电台里的语言美极了，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把它学好。”

赵立新讲述这一段的时候，声情并茂，也很有画面感，他说回国后的6年时间里，都会大声朗读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的书，这个习惯直到他离开朝九晚五的中戏才中断。“戏剧舞台是要人表达爱与恨的，是对冷漠的理解，对悲伤的抒发，这些情感宣泄的前提，都是得有爱，你会迸发，会玩味那些词儿，会用这些词来勾引你的情绪，好叫它们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当时的想法？我要成为瑞典国家话剧院最优秀的演员。”等到第二部戏《哈姆雷特》，赵立新就已经用瑞典语演出，紧接着的第三部戏是费尔南多·德·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中世纪经典《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的同名改编作品，他演了男一号。

为中国戏剧操心

回国之后，赵立新与戏剧之间，又经历了另一种暧昧。

事实上，当时的国内戏剧市场，令在西方戏剧世界里沉浸了十几年的赵立新大吃一惊。现在他也觉得当年看到这种“喜剧段子当道”的状况后有点急躁，不过这种落差，大概无异于今天任何一个留学归国的游子。“因为大众的无知，我肩负起这样一个推广和普及戏剧的责任。”颇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气魄，但后来发现并非人人都感兴趣，慢慢地，他也决定“不愿屈就，不奉陪了”。他说自己反正能力多，到哪里都能吃饭，比如在中戏有一份教职，写戏拍戏都不误。

但就这样放弃戏剧也不太可能，所以现在的他走“曲线救国”的迂回路线。表面上看，的确也是若即若离，每年最多只排两部戏，剩下的时间全在演电影和电视剧，从《开天辟地》中的蒋介石到近期《芈月传》中的张仪，从反间谍剧《于无声处》中的上海男人陈其乾，到新近出演的洪七公。对此，李静评价说

“他也有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是赵立新自己所说的“市场对我的压力，投资商对我的期许”，所以他反而把这种压力全都转嫁在影视剧上。“干脆在影视剧上做纯的资本市场，反正这个利益大，毫不夸张也不必回避地说，是戏剧的成百上千倍。而在戏剧上面，我就一定做我喜欢的。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有这个号召力，想做一部戏的时候，不需要妥协，本来是张三配李四，结果成了王五配赵六，我想聚得起所有我想要的演员搭起一个班子。”

他用“要么赏心，要么悦目”，总结了这几年的心得。他觉得要想在国内戏剧市场上获得成功，无非就是这两条，占其一可得票房。他认为《大先生》这部戏则是赏心。“我对观众的理解是这样的，生活中遇到糟糕的事，困惑成团，就需要去赏心，因为深入思考就是一次对心灵的洗涤。”而《大先生》中的摄像和人偶等元素，同时也含有悦目的成分。所以在大先生的表演上，赵立新的助理当时看完后第一反应是他“用生命在演戏”，到谢幕时，整个人是虚脱的。他说：“我就不信，我全部的投入，全部的扔出，会打动不了观众。”事实上，观众买账，业内口碑也不错。

对于一部戏，今天赵立新的理念是“要有人看才是好戏”，而与早年间咬定不松口的“好戏总有人看”相比，是一个观念上不小的转变。

这种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妥协，也体现在对小剧场的态度上。

有意思的是，李静和鼓楼西剧场的创办人李羊朵，都称赵立新是一位知识分子式的演员。李羊朵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是赵立新的学生。她告诉本刊，在鼓楼西剧场创办之初，她作为一个在戏剧上没有足够知识储备的新入行者，对于鼓楼西剧场要走什么路线，受到赵立新的影响非常大。鼓楼西剧场的开张之作，就是赵立新主演的爱尔兰经典剧作《枕头人》，上座率惊人，能排在当时小剧场的第一，这部戏连续演了三周，直演到主演没有时间为止。有了这样一个红火的开场，李羊朵也觉得鼓楼西剧场非常幸运，而今天它定位的“西方当代经典”方向，也与赵立新早期的支持分不开。

赵立新甚至对创办多年的蓬蒿剧场忧心忡忡。他没有跟王翔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但一方面佩服创始人王翔对戏剧的坚持与毅力；另一方面，不免认为纯粹的戏剧在中国市场显得极端，容易受到市场的折磨。

他自己受过这种折磨，大概就很不愿意别人也一样。■

塔霍：“哥德堡”和人生的变奏曲

记者 周翔

“《哥德堡变奏曲》可以让时间停止下来，并打开新的联系。……它就像是生命的一个循环，可以一遍又一遍地演奏它。”



塔霍

1968年出生的塔霍，瘦削、挺拔，在舞台的灯光下会让人觉得仿佛是20多岁的青年，这大概有赖于他每天坚持游泳、冥想、瑜伽。身为法国人同时还是艺术家，人们常常觉得他应该天性浪漫、随性甚至懒散一点，但他却喜欢保持非常规律的生活。2012年在哈内克的电影《爱》(Amour)本色出演一个钢琴家，让更多古典音乐圈子以外的人们关注他、了解他——出色的外表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塔霍似乎一点儿也不重视这个可以引以为傲的资本。他说有时候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会觉得不喜欢自己。“我并不想去思考其他的事情，只想专注于音乐。”相比于他在巴黎的好友朱晓玫，塔霍是那种演出型的音乐家，他喜欢舞台，在舞台上他觉得能找到回家的感觉，反而安心而放松。因此他开过许多音乐会，演奏巴赫、舒伯特、贝多芬、拉莫、拉威尔、拉赫玛尼诺夫等不同作曲家不同风格的音乐，他也喜欢在古典音乐中尝试放入一些现代的元素，把流行音乐和古典作品做连接，为此他发行了《屋顶上的牛》专辑。他描述中的自己像个工作狂，“总是练琴，总是工作”，人生中最长一段没有工作的时间，是7年前为了练习《哥德堡变奏曲》，他推掉了所有的音乐会。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人生这个阶段选择来挑战哥德堡变奏曲？

塔霍：我觉得其实无论什么时候演奏这部作品可以说都是过早的，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生命经验。我以前并不想演奏这部作品，是8年前我开始慢慢地想要尝试演奏它。两年前我录了《哥德堡变奏曲》的CD，我问自己：这是不是最好的时间来录它？它就像一座高山一样，但是现在不录的话，将来又会不会太晚呢？对我来说，很难判断到底什么时候去演奏它最好。它

是一部键盘乐器的杰作，巴赫是为羽管键琴所作的，而不是为现代钢琴。它真的非常难弹，羽管键琴有两层键盘，现在却要在钢琴的一个键盘上表现出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会觉得每次在音乐会上完成演奏，都像是人生前进了一步。

三联生活周刊：为了准备这部作品，你休假一年，在旅途中去寻找它。你去了哪些地方？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塔霍：在我的生活里我总是不断地练琴、不断地工作，比如就像现在，今天早上我为接下来在台北的音乐会练习，同时也为一周之后在澳门的音乐会练习，还为两周以后在巴黎的音乐会练习，我得同时练习不同的乐曲。但是想要演奏《哥德堡变奏曲》，我知道自己需要时间只专注于这部作品，所以我对自己说需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中止我所有的音乐会。准确来说不是一年，是9个月。9个月正好是人类孕育新生命的时间。在那9个月，我专注于练习哥德堡变奏曲。没有了音乐会的压力，我往往会选择其中一首变奏曲，整天都练习它。我觉得非常有趣，也很安心。

我之所以去旅行是因为我不喜欢在巴黎练习。巴黎就像北京一样，压力非常大。我在北京练习的效果都比巴黎好，因为巴黎是我的家，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在酒店里，我不需要去想家里的事情，可以专注于音乐。那9个月我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加拿大、法国、美国，还有马提尼克岛，我都去那些安静的城市。

一个音乐家永远都不希望自己停止练习，我的祖父是一个小提琴家，他一直都说如果我停止练习的话我会死的。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因为已经80多岁高龄，他其实拉得非常不好了，但他还是坚持拉琴直到去世前5天。当我在那9个月里停止了音乐会，一开始我有一个月都在生病，我一直有肾结石，那段时间变得非常痛苦，因为我的身体和精神已经习惯于始终处于压力之下，永远想着下一个音乐会。现在节奏慢下来了，会有一种特别的眩晕感，身体似乎就有些困惑了，仿佛在说：发生了什么？但是《哥德堡变奏曲》可以让时间停止下来，并打开新的联系。现在我恢复了。我想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在其中去寻找平衡。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怎么理解这部作品？你曾经说过它“仿佛在描绘一系列人的肖像”，它的主题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但又是新的开始，能否详细说说？

塔霍：当你听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你会仿佛失去了对时间的意识。第一首咏叹调，与最后一首咏叹调

之间的一个小时，有30首变奏曲。大概在10分钟或者15分钟之后，你会不知道你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也许音乐会在20分钟之前开始了？也许更早，也许没那么久。你忘记了时间。舞台上我好像在和每个人交流，身处他们中间，但又是一地对地交流。当我们到了最后一支曲子，最后一个音符，接下来的那种静默非常美妙。昨天音乐会我演奏的感觉就很好，因为弹完最后一个音后有一个很长的安静的片刻。有时候听众会很快鼓掌，但我喜欢完成之后有一个很深的沉默，在这其中也包含着音乐。我甚至希望将来音乐会上演奏《哥德堡变奏曲》之后，没有人鼓掌喝彩，首尾两支咏叹调相同又不同，似乎我可以继续演奏下去。它就像是生命的一个循环，可以一遍又一遍地演奏它。

三联生活周刊：其他钢琴家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你比较喜欢谁的？华人钢琴家朱晓玫也非常痴迷于这部作品，你们俩又是好朋友，你怎么评价她的演奏？

塔霍：我喜欢古尔德的演奏，在古尔德之后演奏《哥德堡变奏曲》是一个大挑战。古尔德演奏《哥德堡变奏曲》的方式非常个性化、独特，没有人可以模仿。他的演奏方式并不是巴洛克式的，不是完全忠于巴赫的。要忘记古尔德版本的最好方法是听羽管键琴演奏的版本。版本之间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节奏的差别，即使是古尔德自己不同的版本也有差别。

我也喜欢朱晓玫的演奏，她好像是古尔德版本的另一面，截然不同。我以前不想弹这部作品，多少也因为朱晓玫的录音珠玉在前。我跟晓玫说我不能演奏这部作品，但她说不，她劝我去演奏它。我和她弹得不一样，因为我的人生与她不同，我们的身体、手指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当我听她演奏出来的声音，会觉得非常温暖，简单、谦逊虔诚，像一个妈妈在对孩子唱歌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羽管键琴演奏出来的《哥德堡变奏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怎么看钢琴和羽管键琴演奏的区别？

塔霍：那是非常不一样的乐器，巴赫那个时代没有现代钢琴，巴赫在音乐史上是唯一一个作品在所有乐器上都能被演奏的作曲家，例如我们用手风琴演奏巴赫，效果非常好。因此，他并没有考虑作品对于乐器的局限。以前，不同城市间流行的乐器不同，巴赫在不断试验，他将大量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转写成羽管键琴，也把自己的羽管键琴作品转换成其他乐器演奏，比如他把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改编成羽管键琴和

交响乐协奏曲。从这一点我们就可得知今天我们用现代钢琴演奏的合理性。现代钢琴可以模仿许多其他乐器，可以重新演绎弦乐作品，也可以演奏管乐作品，模仿羽管键琴作品。使用钢琴时，有时候在你手指下的仿佛是整个交响乐团。我深信巴赫不会反对用钢琴来演奏《哥德堡变奏曲》。羽管键琴常用装饰音，可以令音符带有性格，利用装饰音可以制造各种效果：流利的、犹豫的、令人吃惊的、有力的……用钢琴演奏并不一定用装饰音，钢琴的弦会有长时间的回声。装饰音可以让耳朵被其吸引，在脑中停留更长时间，但是不能让它掩盖音乐，如果不需要，就不能画蛇添足。在巴赫的乐曲里很多地方是不必加装饰音的，这就需要掌握平衡和分寸。羽管键琴声音亮、精准，钢琴声音哑、圆润，因此钢琴家演奏时更加轻柔，这就是另一个需要平衡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版本的《哥德堡变奏曲》有时候花的时间差很多，你的版本花了60多分钟，你是怎么掌控和安排时间的？

塔霍：演奏的速度与乐器、音乐厅和声效果有关，演奏当天早上到音乐厅排练，我才看到要使用的钢琴，是这个乐器告诉我要用怎样的速度演奏。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在演出中用自己的钢琴，那你总是需要适应不同的钢琴，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挑战吗？

塔霍：这是挑战，但我挺喜欢这样。有时候用于练习的钢琴并不是很好，我需要很努力地去寻找方法弹出美丽的音色。但是这样一来，我常常在台上会觉得很好，因为音乐会的钢琴都是很好的。以前我在家里练习的钢琴非常好，但反而有时候我在舞台上感觉就不好了。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你喜欢去朋友家练琴，而且把自己的钢琴卖掉了？

塔霍：对，就像我喜欢在巴黎以外的地方练习一样，在巴黎练习的时候，我也需要离我的家远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爱》中你扮演的钢琴家去看自己的老师，你曾经提过，在现实生活里你也会定期去看自己的老师。在你的音乐生涯里，有哪些人对你是非常重要的？

塔霍：我的老师去年去世了，92岁。最后一次去拜访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认识我了。我很喜欢去拜访她，虽然不是经常——大概一年两次——但是对我来说，能够见到她非常重要。她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同时也是我最好的老师。我从她那里学到关于音乐的

一切：音乐带来的快乐、对音乐的渴望，对舞台的渴望。我的父母虽然不是音乐家，但是他们喜欢舞台、喜欢表演，当我10岁的时候，我曾经在舞台上跳舞，爸爸是导演，妈妈是编舞，我记得我非常享受舞台上的感觉：灯光、声响，和很多人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让我觉得舞台是我的生命。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发行的《屋顶上的牛》是张比较特别的专辑，你在里面重现了20世纪20年代的流行音乐。为什么会录这样一张专辑？

塔霍：“屋顶上的牛”是“一战”和“二战”期间巴黎的一个酒馆，许多音乐家喜欢在这里。当时巴黎是艺术的中心，许多美国人来到这里，欧洲的音乐家们发现了美国的爵士乐，并且把它们和其他的音乐融合在一起，我想用我的CD重现那些音乐。不过CD里也有很多古典音乐，比如我弹了拉威尔的乐曲。我们觉得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有时候它们并不是那样截然不同，许多作曲家、音乐家都会从流行音乐中汲取灵感。流行音乐在舒伯特、肖邦甚至巴赫等人的音乐中也很重要，就像《哥德堡变奏曲》的最后一首变奏曲，他放进了当时的流行歌谣。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谈论电影《爱》中的音乐时曾经说过“静谧比声音更重要”，这也可以看作你对音乐的一种理解吗？演奏时的停顿、留白，同样也是一种表达，是乐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塔霍：当然。在音乐会的时候，第一个音符响起之前的静寂非常重要，你要在演奏之前明白所有的事情，你可以听见观众的沉默。在音乐会中间，你需要去选择沉默的好时机。比如《哥德堡变奏曲》，你要去寻找乐章之间合适的停顿，有时候你需要连续去弹奏下一首变奏曲，有时候你需要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在音乐会最后——我们已经聊过那个最后的静默了。所以音乐会不仅仅是音乐，它还像在讲述一个故事。在演奏的间隙，我的手会忍不住要继续下去，我会跟自己说，你要静下来，不要接着弹。■

（实习记者王紫祎、王天艺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音乐会的时候，第一个音符响起之前的静寂非常重要，你要在演奏之前明白所有的事情，你可以听见观众的沉默。在音乐会中间，你需要去选择沉默的好时机。

“我们对历史说实话，就是对现在说实话”

文 / 卫西谛

5月22日，第69届戛纳电影节落幕，还差一个月不到就要过80岁生日的英国导演肯·洛奇以《我是布莱克》第二次获得金棕榈大奖。

“双金棕榈”是电影界最令人尊崇的殊荣，在肯·洛奇之前仅有8位导演获得过。他从影以来共13次入围戛纳，获得其中各种奖项，10年前凭借史诗作品《风吹麦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首次获得大奖。这两部金棕榈作品，代表了洛奇长达半个世纪的电影创作的两个主题：描写劳工阶层的艰辛生活与不屈抗争，以及对英国“反面历史”的讲述与反思。

本届电影节的评奖结果引来了现场记者的嘘声与非议，他们认为评论界普遍看好的影片未能如愿以偿(由场刊的媒体分数为证)，于是揣测评委会是否过于“保守”。尽管令人尊敬的肯·洛奇的获奖赢得了欢呼，但是关于“保守”一说，无疑也指涉到他的新作没有创新与显著进步。《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描写一名患有心脏病的木匠在申请社会福利金时，却被官僚机构无情地判定为具有工作能力，在繁琐荒诞的制度与程序前做了一番挣扎后，最终没有等到应有的医疗和生活待遇，猝死在福利机构的洗手间里。对于熟知洛奇电影的电影工作者、记者、影评人以及影迷而言，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肯·洛奇式的工人阶级悲惨世界”。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洛奇给出了一部杰出电影应有的基本要素：立场、良知、深情，还有精湛的技艺。

“如果你是个工人，那么一周七天都会下石头雨”

1936年，肯·洛奇生于英格兰中部纽里顿的普通家庭。母亲是裁缝之女，父亲是矿工之子。洛奇的父亲以工厂电工的职业养活家人。在洛奇的记忆之中，全家人最愉快的事是每年一次的黑池(Blackpool)度假，这是一座在利物浦附近的海滨小城。在当地音乐礼堂演出的悲喜剧对洛奇的日后电影创作影响颇深，那些喜剧讲述穷人和失败者的挫折故事，“带有一种欲望压抑的喜剧感”。另外，据说他十几岁时还常骑自行车到30公里外的莎士比亚故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看戏。后

来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时，他加入了著名的喜剧团体Oxford Revue参与表演。

上世纪60年代前后，越来越多的电影观众回到家中，坐在扶手椅上观看电视。当时的BBC电视剧部门为了开发更多内容，专门招收受过良好教育、并有剧团经验的年轻人。肯·洛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963年进入了BBC，开始了电视剧创作。使他初露锋芒的是一套叫作《星期三剧场》的电视剧，他拍摄了最有影响力的三集：《十字路口》(Up the Junction)、《凯西回家》(Cathy Come Home)、《两种情绪》(In Two Minds)。通过这些电视片，肯·洛奇发展出了一种“戏剧纪录片”(Drama Documentary)风格，糅合了戏剧表演、纪录片形式、社会性旁白，打破了原有电视剧呆板简单的叙述模式，影响了后来的电视节目生产制作。在英国媒体的各类专业评选中，《凯西回家》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佳剧集。其中《十字路口》那集，描写一对两个阶层的年轻人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悲剧。这集电视剧很快被翻拍成电影。很多年以后，已成大师的侯孝贤回忆说，他在军中就是看了这部影片，被剧情深深感染，从此走上电影之路的。

托尼·加内特是肯·洛奇第一部电视片的主演，后来成为他的制片人，对他的早期创作生涯至关重要。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回忆说：“我们当时是试着从唯物主义的视点出发，去创造某些东西。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整个电视剧创作的传统，实际上都是基于唯心主义哲学。它早已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或至少存在于电视摄影棚里。一旦有人指出他们所做的一切远非真实的世界或人们真正的生活，他们就会说：我们是在搞艺术。”托尼·加内特说：“我们肯定不是在搞艺术。我们只是努力地试图弄清楚这个世界。”这段话当然也可以视为加内特的亲密战友肯·洛奇当时的创作心声。

1967和1969年，肯·洛奇连续拍摄了他最初的两部电影——《可怜的母牛》(Poor Cow)和成名之作《男孩与鹰》(Kes)，将他在BBC形成的社会纪实式的主题和风格带进了电影院，以新颖流畅的现实主义手法，去描写社会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显然，这些矿工、码头工人以及失业者们过的日子，和电视新闻、广告、政客演讲、中产阶级通俗剧里塑造的美好生活大相径庭。用洛奇的话来说，他要请大家“看看影片中的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分享当代神话中那个舒适、令人满意、富裕的社会”。



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由英国导演肯·洛奇指导的该片获第69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男孩与鹰》被认为是英国电影史上的杰作，曾被英国电影学会（BFI）选为“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佳影片”的第七名。影片的小主人公是约克郡矿工小区的男孩，贫穷、瘦弱，单亲家庭，哥哥在矿上工作。这个男孩被哥哥欺辱、被同学欺辱、被老师欺辱，只有在驯养一只雏鹰时感到快乐，因为他觉得它不同于一般宠物，而是可以自由翱翔的飞鸟。最终粗鲁的哥哥为报复他的不听话而将雏鹰杀死，这个毫无前途的男孩不得不默然地埋葬了自己唯一的朋友。故事简单，情节简单，人物简单，对白简单，简单至极，却生出令人震撼的力量。

影片有着对当时英国的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家庭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度批判。但是肯·洛奇绝不说教，也不煽情，他只是把现实还原到最逼真的程度，逼真到观众可以感受到人物的呼吸。那个男孩在粗糙艰难的生活中，残存着的快乐、希望和灵性，与家庭、学校、社会中所遭遇的欺辱形成强烈张力。这种张力超越了简单的戏剧性，具有了某种诗性，深潜入观众内心。如果把这部电影比作以石投水，那么它在当时的英国投下强有力的巨响之外，仍然可以在半个世纪后的观众心里留下

长久不散的波纹。基斯洛夫斯基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在电影学校做学生时看到了这部片子，当时想要是能在拍摄现场那就好了，他说：“我不要做他的助手，我愿意在他身边给他泡泡咖啡，我就是想看看他是怎么拍成的。”

其实在肯·洛奇之前不久，英国已经出现了以林赛·安德森为代表的“自由电影”运动，可是他觉得有些不满足。因为像《如此运动生涯》《如果……》这样的电影，虽然将镜头对准了劳工阶层，可是洛奇说：“银幕上的人物看上去都比角色的实际年龄小10岁，而且他们带着演员自身的口音和个性。”大多数人没有打算长期投身工人阶级的电影，只是“视工人地区为一种异国特色的布景，最终放弃了这个战场”，回了伦敦，或拍摄好莱坞式的电影。在上世纪70年代末，洛奇的合作者、制片人托尼·加内特也远离了他，去好莱坞发展。而肯·洛奇沿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罗西里尼、德·西卡）、捷克新浪潮（米洛斯·福尔曼、伊利·曼佐）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进。从这些电影前辈的作品那里，他已经深刻意识到：“电影是有可能表现普通人的生活 and 困境的，而不应只是关于明星、财富、荒诞的冒险故事。”



英国导演肯·洛奇

但是整个七八十年代肯·洛奇都不算顺利，他在电影与电视之间徘徊，从影片的投资到发行都像是一场又一场的苦战。虽然他拍出了像电视作品《希望的年代》(Days of Hope)那样描写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史诗，但是利润的微薄和严苛的审查都使洛奇陷入创作的泥沼。他拍摄的电视片有的因批判殖民主义而引起委托方的不安而考虑销毁拷贝(《白纸黑字》(In Black and White))，有的因拍摄劳资纠纷被指过度倾向工会而被禁止播出(《一个领导的问题》(A Question of Leadership))，有的因将警察粗暴对待罢工工人的画面纳入纪录片而被电视台删节(《你站在哪边?》(Which Side Are You On?))。

随着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当选，英国的福利资本主义走向了终结，税收提高、降低公共部门支出、住房销售全面私有化。在此期间，洛奇只要有机会就直接用纪录片来对此政策下导致的工人运动进行反映。即使是撒切尔夫人执政结束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不断反映当年撒切尔主义负面影响的优秀作品：《奏出新希望》(1996)，《光猪六壮士》(1997)，《跳出我天地》(2000)，《骄傲》(2014)。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受到了肯·洛奇电影的

鼓舞，延续着他的主题和风格(尤其是喜剧性)。而当年的肯·洛奇却必须应对英国上下对他的质疑、排斥、非议，他说：我用多少时间来拍这些影片，就用了多少时间来捍卫它们。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洛奇先生！”

2006年，肯·洛奇拍摄完成了背景为1920年前后爱尔兰内战的剧情片《风吹麦浪》，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影片的背景是当年英国军队撤离爱尔兰时，与爱尔兰政府签订了条约。这个不彻底的条约，允许爱尔兰自治，但北部六郡(现北爱尔兰)仍归属英国。面对这种不平等，爱尔兰抵抗军中的戴米恩和泰迪兄弟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个认为这是屈辱的妥协，一个则认为这是来之不易的战果。曾经为了独立与自由而共同出生入死的兄弟，因为对和平的不同定义，最终导致哥哥亲自下令枪毙了同胞弟弟。这部诚恳面对历史的影片让许许多多爱尔兰人当场泪洒影院。

肯·洛奇首先对自己的祖国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戴米恩和泰迪兄弟的悲剧，根源来自英国对爱尔兰的残酷统治。但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洛奇不仅还原了历史，也还原了人在历史中的位置以及在何种状况下做出的选择。当戴米恩追求国家独立时，忍痛枪毙了被敌人抓捕后泄密的朋友时，沉痛地说：“我越过了底线。”依靠“越过底线”而获得的胜利与光明，都终将面临不可挽回的黑暗深渊。肯·洛奇要向我们展示的是，以正义的名义而实施的理性残酷是最恐怖的，因为它可能永无止尽。当他接受金棕榈颁奖时说：“我们对历史说实话，才能对现在说实话。”这句话对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是真理。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肯·洛奇就已经开始把视野投向英国现实之外更广阔的地带，涉及与英国相关的“负面历史”以及世界各地的社会问题。比如：描写发生在北爱尔兰的政治阴谋的《秘密档案》(Hidden Agenda)；描写30年代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去往西班牙内战前线的《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表现尼加拉瓜解放斗争的《卡拉之歌》(Carla's Song)；在美国拍摄的关于非法移民被无情盘剥的《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这些影片都带着一种国际共产主义的情怀，令人想起左派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也曾在世界各地进行电影工作的经历。

《土地与自由》在1995年上映之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尤其是在西班牙。影片围绕同属于反佛朗哥法西斯阵营内部发生的战斗展开，年轻的英国共产党员大

卫·卡尔怀着满腔热忱来到西班牙，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场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影片透过大卫·卡尔的亲身经历，描绘了共和派、西班牙共产党、斯大林军队一方，对无政府主义工人团体、民兵、托洛茨基主义的统一工人党一方的清洗，这成为西班牙内战的重要转折点。影片上映之后，西班牙《国家报》赞扬影片：“亲切而又令人愤慨的画面……是对自由西班牙的回忆所做出的最美致敬。”《世界报》的标题则更为直接：“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洛奇先生！”

这部影片在西班牙引发了巨大回响，长达三个月名列票房的前十名，据说许多青年走出电影院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原本引发肯·洛奇拍摄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是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但最后他舍弃了这部小说，因为奥威尔“过度强调知识分子在内战中的作用”。《土地与自由》虽然始于革命浪漫主义，但很快直面了内战的残酷性与复杂性，就和10年之后的《风吹麦浪》一致，悲剧最终在同一战线内部产生。

“如果洛奇能拍一部不用摄影机的电影，他也会那样做”

进入新千年之后的肯·洛奇也继续保持着他的战斗状态，不遗余力地表现英国大街上的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那些永远不会出现在别人电影里和国家媒体上的人们的真实生活。肯·洛奇坚定地站在这些被不公平对待、被消音、被忽视的人们那边，为他们大声疾呼。2004年的《深情一吻》(*Ae Fond Kiss*)，用同情的目光观察了在苏格兰的穆斯林移民的生活困境；2007年的《这是自由世界》(*It's a Free World*)则尖刻严厉地批判了将非法移民变成一门生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2010年的《爱尔兰大道》(*Route Irish*)则愤怒地指责资本家将伊拉克战争变成了一门生意。肯·洛奇一直作为“电影知识分子的桥头堡”屹立不倒，甚至不惜被他人认为是“国家的敌人”，也不理会被嘲讽“他到底有多恨自己的国家”。

肯·洛奇的电影一直坚硬和诚实，但在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加入抒情与喜剧元素。《天使的一份》是洛奇近年来最好的带有喜剧色彩的影片，主人公是一群失业的年轻人。2011年，英国失业青年人口首次突破百万，肯·洛奇希望“诉说一个关于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空虚未来的故事”。于是，与他合作了20年的编剧保罗·拉弗蒂(Paul Laverty)写成了这个充满悲悯之心与乐观精神的故事。故事十分巧妙。人们常说流窜在大街上的年轻人，很多都靠酗酒逃避现实，人生最终被酒精毁了，

可是肯·洛奇却反过来拍，描写威士忌如何拯救了年轻人，让主人公罗比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品酒。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半个世纪以来肯·洛奇一直为工人或失业者说话，但他在影片中也毫不掩饰这个群体的缺陷：粗俗、愚蠢、暴力倾向、不够团结等等，但是他认为社会不应该给他们先入为主贴上标签：“罪犯”“懒汉”“无所事事的人”“吃政府补贴的寄生虫”。洛奇呼吁人们应该用平等的目光看待他们，发现他们善的本质，看见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为他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洛奇常用喜剧方式来表现他电影中的主人公们的生活与性格，这是他电影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说劳动人民最会自嘲，劳动人民最禁得起开开玩笑。

洛奇坚定地拒绝好莱坞式的“happy ending”(美好的结局)，当观众一致认为《天使的一份》的结尾主人公似乎有了一个好结果，但他说“扮演罗比的小伙子到现在还没有固定工作呢，他每周只有四小时的短工可做”。

有时不明就里的评论家会质疑肯·洛奇的电影技艺，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华丽的场景、摄人心魂的长镜头或跟拍、清晰的戏剧结构等等，于是就批评他的电影是否过时，或者是否仅是因为立场而赢得尊重。人们忽视了洛奇电影通过逼真再现与建构现实的能力，已经达到无法逾越的写实高度，从而能够产生巨大的情感能量。他的工作方式是：挑选故事发生地或有相同经历的非职业演员、按时间顺序安排拍摄、不排除即兴、不允许取景器进入现场，以及使用现实中语言——为此，大量的方言致使伦敦的观众也不得不借助字幕观看，描写青少年生活的《甜蜜十六岁》(*Sweet Sixteen*)因为粗话而不允许18岁以下观众入场。

剧作家格里菲斯(Trevor Griffiths)在考察了洛奇的拍摄风格和技巧后说：“如果洛奇能拍一部不用摄影机的电影，他也会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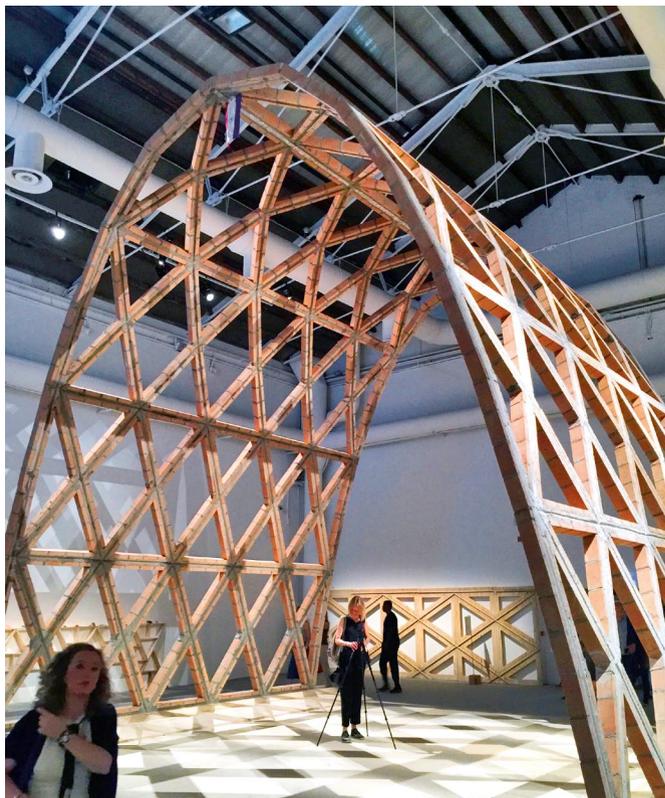
一部《电影手册》出品的纪录片，拍摄了肯·洛奇在现场的工作状况。1996年左右，他正在拍摄一部利物浦码头工人罢工的纪录片，在街头跟着游行队伍不停地奔跑，指挥工作人员在哪里架设摄影机，如何取景。这位当时年近六旬、身着牛仔褲的英国人，和我们惯常见到的顶着名利光环的大片导演以及戴着墨镜的艺术家式的电影大师都完全不同。当旁边有记者在街上拉住洛奇，问他会不会出席自己刚获奖的新片的首映式时，他回答说：导演更应该出现在需要他的工作现场，而他的工作现场就在工人争取自己权益的地方。他的态度就像是在不停干活的蓝领们的工作态度——一位电影工人。☑

(参考书目：《英国写实主义导演肯·洛奇：历史与背景》，斯图亚特·兰恩著，宋磊译)



威尼斯现场： 从预制到 VR 全息设计，具有民主品质的建筑？

文 / 方振宁（发自威尼斯）



(方振宇 摄)

左、上图：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参展作品

无论是威尼斯艺术还是建筑双年展，我们首先注目的是谁是总策展人？什么主题？谁获奖和获了什么奖？其中最不重要的其实是主题，因为要想上百个参展者，围绕一个主题做文章而不跑题，就需要所出之题有足够的宽泛度。所以，你只要看看每年的主题，就知道其中的大部分是伪命题，也就是你可以完全忽视它的存在。

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第一次参观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是“未来”，而15年后的艺术双年展的主题是“全世界的未来”。“未来”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时间刻度和地理定位的近似乌托邦的说法，而会有谁会认为“全世界的未来”是“未来”这一主题的升级版？

今年威双的议题被普遍理解为是围绕难民问题。



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在现场觉得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建造的“预制”技术，以及人与建筑这个被长久思考的话题。而难民问题只是在个别国家馆的内容上比较突出。即使被开发的预制技术可以被难民设施所用，难民仍不是主题本身，建造是建立在建筑学的基础上的话题。

两个主要展场中，绿园城堡聚集了多数国家馆；而为了体现独立策展的概念和扩展空间，上世纪70年代，由瑞士著名独立策展人史泽曼开拓的军械库空间，由一连串的联排船坞码头改造而成，令人印象最深的预制建造技术的展示，就大都集中在这个延绵的空间里。

人与建筑

“孟买工作室”是至今为止最受瞩目的印度建筑师组合，他们曾在妹岛和世担任威双建筑总策展人时，

集中展示了他们的成果，而这次的项目很别致，他们的题目是“超脱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老生常谈来提高建筑质量”。从我们接触到“孟买工作室”的经验来看，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测试材料的工匠，而不是一个使用电脑做设计的建筑师，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手绘的建筑草图。他们不同于传统空调办公室满是制作关于某处建设的专业建筑指令（计划和技术规范），“孟买工作室”到处都是材料和满是手工原型与全尺寸模型的工棚，工匠和建筑师咫尺之隔，在一个开放的工作场合反复思考测试创意和经验。这种设计与建造、手和思想、传统与实验之间的紧密结合是非常少见的，这也是他们受到世界建筑界普遍关注的原因所在。他们收集了无数的老建筑部件，这些部件可以让我们看到传统技术的智慧和轨迹，我们不会把他们当作收藏家的原因，是“孟买工作室”常常会设计出让人耳目一新万分意外的具有当代因素的新建筑，尽管如此，他们的着眼点仍然是乡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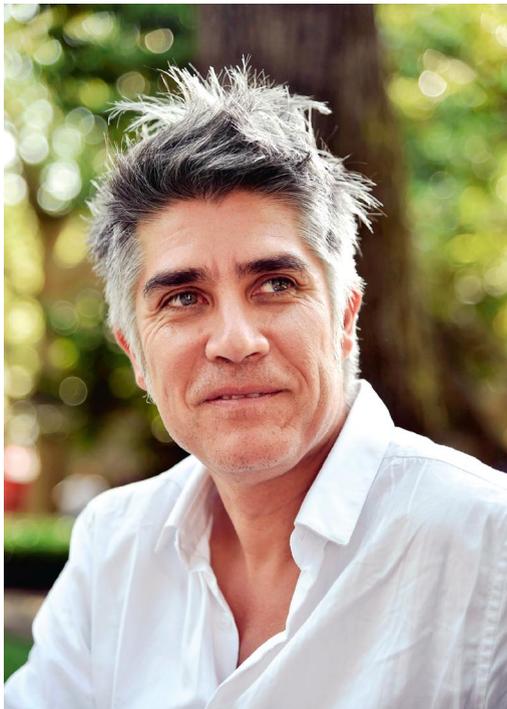
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独特的展出空间和展品

成功地把印度本地知识和技能整合到设计过程中，不是纯粹的智力修辞，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设计手法及其低成本思考都有着人道主义的背景。其实“孟买工作室”也使用相同的方法，为富有客户和某个精英建造与平民建筑无差异的建筑。这种方法的魅力在于，它是为了扩大和传播一个特定的想法。中层阶级是以精英阶级为模板，而更低层次的人则以中层阶级为模板。如果一个社会精英决定将当地工艺品和技艺，作为品质的象征而不是选择全球各地的新科技，那么这样就会诞生一种具有民主品质的建筑。

在绿园城堡馆的中央展厅的正中展厅，有一件让所有人都会感到震撼的巨大的拱形项目，它就是贝尼特斯（Solano Benitez）在巴拉圭的工作。这么巨大且空灵的拱。实际就用了两种最容易得到的材料做成，它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砖块和未经训练的劳工将不足转换为充裕。

都市化要求快速建造，但是因为手段和资金的不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真正实现过。贝尼特斯一直在巴拉圭给这两个世界上最充裕的资源进行重新定义：砖块与未经训练的劳工。很难想象，巴拉圭这个国家工业化的建筑材料就只有砖块。而贝尼特斯的贡献就在于让人们增加了对砖块性能的理解。他的极其精致但却自然的建造方法，已经为用未经训练的劳工去建造做好了准备。然而建筑物的质量是底线。贝尼特斯能设计出图纸来增强不合格劳动力产品的质量。他有时候会设计出违反直觉的预设构件的面板，比如简单地将灰浆倾倒在放在地面上的砖块之间。他会将砖块“折叠”成自支持的三维嵌板。贝尼特斯用他的设计技巧创造出一种既中肯又意想不到的建筑风格。他在结构上的智慧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面对急速的全球都市化，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技术。

就像我自己从来对乌拉圭这个小国的小场馆展出的内容基本没有什么印象一样，参观乌拉圭国家馆



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亚力杭德罗·阿拉维纳

可能是花时间最少的馆，而这次它让我留步也留住我的思考。这是一个不大的空间，用塑料泡沫布的帘子分隔的一半的空间，而开放的空间中只在地面上开了一个不大的洞，旁边有一点崛起的土，重点在那半透的帷幕里面。走进去发现，只是在墙上有一些铅笔画的画和字，墙的正中写着：“当我们的生命与其紧紧相连时，我们才能理解何为建筑。”而另一面墙上画着几位在极限条件下生存的人物的铅笔画，上面的一段话让我们有了深入思考。“考虑到有限的可用资源，他们对体能的直觉性的管理，使得他们在无生命迹象的地方，幸存了超过2个月的时间。在1972年10月13日，一架乌拉圭飞机在安第斯山脉坠毁。一群年轻人就这样被置身于前所未有的条件下。在3800米高的雪山上，在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下，他们仅能依靠自己的直觉与创造力，将所剩无几的物件改造成建筑、防护物和避难所。”我以为这是乌拉圭馆所呈现的有关人与建筑问题的深刻思考。

“柏拉图版块”和偶发性空间

走过军械库的人，都可以在码头的岸边看见一组

由巨大混凝土预制块搭建的拱门，门分圆形和方形，这是比利时ORG Permanent Modernity的项目“开放社会的纪念碑”。从远处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当走近之后才发现是为比利时的移民建造的实验项目。

建筑师在此展示的移民市场的建筑首次展示了城市计划，并且已经将广场的一个边缘付诸现实。通过无数次的更改，他们的设计最终变成了一个系列的门廊的元素，这些元素可以连接成封闭的房间，打开网格或垂直堆叠。他们称其为“柏拉图版块”，因为柏拉图式的大切口同混凝土元素风格相符。这样的操作使得门廊从梁柱结构转变成一种简单抽象的平面形状。为了实现开放性的表达，建筑师用超尺寸设计了垂直和水平元素，并调整节点来维护和巩固抽象平面，而不是梁柱式的普通工业仓库。

他们有四种柏拉图面板模块，以看似随意的形式组合重复，从不同角度可以引出不同的解读。在这里，预制的结构是建筑的主导。建筑的其他部分就是填充板、桌子以及百叶窗等，这些都可以在未来再回收。他们希望在未来实现这种面板的不同聚合。该系统可应用在其他许多建筑，在造型和尺寸的灵活设计的同时，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明确而肯定的预制性构造原理。

瑞士馆克里斯蒂安·克雷兹(Christian Kerez)建筑师，只在馆里做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装置，它像一朵落地的云，其实更像一块巨大的太湖石，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巨大的不规则的物体其实是一个空壳，而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口进入到体内。这个口让人们产生很大的好奇心，都想进去体验一下里面的奇观。进去之后发现纯白色的空间像一个溶洞。克雷兹把它称为“偶发性空间”，意在以基础研究来调研建造的可能性和技术性，人们可以带着许多想象力，来思考、建造并体验建筑。

克雷兹提出把建筑性的空间作为一种假设：建筑可以通过建筑的自身媒介被展现。为实现这一项目，克雷兹得到他所任教的大学ETH团队的合作和支持，他们通过技术的连接与排序，数字化的过程和丰富多样的技术辅助，一种包含细节的空间产生了，它既复杂又具有可能性，这就是偶发性的空间。

克雷兹是当今备受瞩目的中年建筑师，他在上大学期间就迷恋日本建筑师和他们的设计，已故的筱原一男是他的偶像，其实不止筱原一人，他还不断地从日本当代设计中获得灵感。影响克雷兹的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俄罗斯构成主义天体建筑师列昂尼多夫

(Ivan Leonidov, 1902 ~ 1959)。克雷兹的早期设计是极简主义风格，这种风格持续了将近 30 年，但是与中国项目的接近，让他发现了另一个天地，他被中国的园林元素所感染，生成出巨大的空间设计，这在他投标广州美术馆的项目设计可以证实这一转变，所谓偶发性空间，实际上是中国的巴洛克。

HoloLens 虚拟设计

美国馆有十二组建筑项目参展，然而注意到 GLF 的人并不多，其实它的首席创意官就在现场解说。HoloLens 是微软公司去年发布的一种全息眼镜科技产品。所以用微软开发的“HoloLens 虚拟建筑设计”来到威尼斯是一条潜在的新闻，其重要性就像 2000 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拉开了“数字化建筑设计”的序幕一样。。

GLF 分配到了 Packard Plant 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项目，它是一个长半英里的废弃汽车厂。格雷戈·林恩 (Greg Lynn) 通过与微软的 HoloLens 合作，不仅可以在 3D 中体验这个场地规划和设计，更可以利用其他模型，做更直观的尺度对比。以往建筑师最大的挑战就是把设计从二维的屏幕中转变为三维的物理实物。然而通过 HoloLens 这样一款可穿戴的电脑设备，建筑师可以直观体会尺度、比例、形式和空间，轻松看到虚拟空间与原有环境的结合度。从而完全改变了人们对设计方式的观念。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它不只是一个畅想，而是浸入现实。

格雷戈·林恩花了一辈子来研究如何把视觉转变为物理实物，HoloLens 是跨越这个鸿沟的桥梁。从二维、三维到实体空间，这是建筑，也是革命。

福斯特与非洲无人机机场

在军械库展线的尾段，有着一连串展示，那就是诺曼·福斯特的阵式，而出品人是福斯特基金会。动线是这样展开的：观众会走进一个集装箱通道，两壁展出福斯特与非洲无人机机场的畅想图，走出通道，迎面是一个用砖砌成的四脚踏地的拱顶，特制的薄砖让我想起罗马砖的规格。拱顶内部吊着一个小型无人机，暗示它和非洲无人机机场的关系。之后，福斯特通过一系列实物和影像资料介绍项目的概念和进展。

福斯特强调建筑与基础设施同行，为了提供产品运输发展基础设施的道路、港口、机场、铁路是发展

的一个必要步骤，非洲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位。无人机提案预计将带来进一步的发展；利用无人机在小尺度范围内搬运东西可能是一条捷径，最终也能节省时间和金钱，而不必等待笨重、传统的基础设施。与蜂窝网络相比，它是相当于旧的电话线。无人机提供医药、食品或缺少的零件来修理汽车或自来水厂，可以称为一种细胞基础设施。

这种网络具备了港口和福斯特探索港口建筑的理念，它是模块化的（如许多海湾一样必要）、灵活的（能按需求变化成长），使用当地材料的（压缩黏土或泥砖），并且是非常通用的。如果有需要，它可以用于许多其他项目（市场、社区中心、盖平方）。这就是为了使建筑真正为社区服务选择正确建筑的具体贡献。

福斯特结合国家艺术工程，让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建造。实际上，他鼓励学生参与建设，不是作为一个教学或学术声明，而是作为一种方法来检验方案的可转移性。在年底，每个模块将被压缩成一个材料和程序的包，发送到遥远的地方，被当地未经严格训练的劳动力使用。所以在双年展中的登记建设过程是为了作为一种未来的教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型不仅是一个对象，更是一个过程。

在本次威双各个角落都可以遇到“预制”的项目，可见它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和越南，也都有建筑师在从传统的预制技术中提炼和衍生出新设计，用于服务今天的生活。所不同的是，预制之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在人类建造的历史中是作为一种有亲切感的系统存在，如果保持这一技术，同时又能呈现一种当代美学，它就会受到普遍接受。在东西方都热衷于预制技术时，技术手段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亚洲的预制技术依赖的材料是木、竹等，而欧美则是砖、石和混凝土。对于后者，参数化技术让预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可是我们总需要有一个最近的未来被期待，那就是 VR 全息设计新技术。☑

预制之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在人类建造的历史中是作为一种有亲切感的系统存在，如果保持这一技术，同时又能呈现一种当代美学，它就会受到普遍接受。

死亡之衣

文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Pia Interlandi



溶性服饰就像身体的第二层皮肤



时装设计师茵特兰迪设计陪葬专用服装，结合了死亡、仪式和转换的观念进行研究和实践

对茵特兰迪来说，专门为安葬选择衣服的人实际上是把生命的尽头视为一个事件，一个和出生同样重要和神圣的时刻。

时尚世界总是围绕着青春、美貌和权力展开，死亡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概念。虽然时尚广告和数字媒体中会不时使用与死亡相关的意象，但时装设计师在很大程度上是装扮和迎合活人，这与接近死亡的现实相距甚远。也许，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思考过与死者一起埋葬的衣服的意义。

居住在墨尔本的时装设计师及艺术家皮娅·茵特兰迪（Pia Interlandi）却是鲜见的例外，过去几年，她的工作一直集中于陪葬服饰及葬礼仪式的相关设计及研究，她的职业生涯转折源自个人经历中一次尤为深刻的体验。2009年，她的祖父加埃塔诺去世，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冰冷僵硬的死亡之躯。

“那种缺乏灵魂、精神或能量的极度寂静状态让我深感震动，没有这样的对比，你可能意识不到在活人的皮肤下面有着多少运动。”她回忆说，“我知道这就是‘死了’，能够确切看到什么是死，对我来说是一次强烈的生命经验。”

茵特兰迪和她的姑妈一起，担当为祖父在葬礼告别仪式上穿衣修饰的职责，她的祖母选择了逝者生前最好的一套西装。这位曾经自豪、强大和传统的男人死在医院的病服中，能够帮助他回到熟悉的服饰中，让家人看到他最后庄重的样貌，茵特兰迪觉得这不是恐怖的经验，而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同时，她作为时装设计师的头脑开始不停地质疑：“为什么给祖父穿上我们选择的那些服装？死者很难穿衣服，我们不得不把他从一侧滚动到另一侧，把他的衬衫和外套拉上来，让穿衣的过程变得非常尴尬。我恍然大悟，这些服装不是为死者而是为运动自如的、活生生的身体设计的。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在大学教纺织技术，了解大多数服装纤维的选择注重耐久性、耐洗性等，它们可能会比身体的有机分解过程更持久。”

祖父去世之后，她又经历了姑婆、外祖母等家人的死亡，激发她去尝试设计陪葬专用服装，围绕为死者穿衣创建有意义的仪式，结合死亡、仪式和转换的观念进行研究和实践。她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的研究论题被定为“为死者穿衣：用于坟墓的服装”，她的角色也从时装设计师转变成研究者和死亡服饰推动者，并从葬礼培训学院获得了葬礼监礼人的资格证书。

从2012年持续至今的“坟墓服饰”项目，是为客户设计和定制可生物降解的寿衣，并与死者的家人一起进行穿衣仪式。那是一件件不同寻常的衣服，为每个生命体最终都会经历的事件而设计，鼓励分解而不是保存，接受生物必然性的拥抱。60多岁的卡莉成为她的第一位健在顾客，经历了父母去世的过程之后，卡莉开始为她自己最终的死亡寻找和准备服饰。客户的要求和偏好挑战着茵特兰迪的原创设计，不断将新的想法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上大学的时候，她已经开始研究可溶性织物和服装，作为生命本身无常和短暂的隐喻。从隐喻的层面直接面对死亡现实以后，她对纤维的生物降解性尤



从事陪葬服饰及葬礼仪式的相关设计及研究的茵特兰迪（右）

其感兴趣。她与法医及昆虫学家伊恩·达杜尔（Ian Dadour）教授，一起设计了“猪项目”，调查纺织纤维在自然土葬过程中的分解过程和速度。

在澳大利亚，解剖学法规明确规定不能用人作为实验研究，猪的相似大小和器官方向是最好的替代。研究人员采用了21头来自肉食加工厂的死猪，把它们清洗干净、穿上衣服并埋在一个袋鼠保护区。第二年，每隔50天他们挖出3只穿着衣服的猪，观察纤维在地下化学元素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变化。

“关于不同纤维在埋藏环境中的分解时间，‘猪项目’确认了我的猜测。不过，我对像麻这样的天然纤维

在身体上的迅速分解感到惊讶，我用于盘带和刺绣的聚酯纤维却完好无损，一年后，它们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茵特兰迪说。

如果说服装是自我意识和个人品位的外在表现，在许多方面它是人们展示给外界的第二层皮肤，死者也一样，裸葬通常被视为疏忽或不尊重的表现。虽然死者对衣服不再有温暖、保护和舒适性等要求，对茵特兰迪来说，专门为安葬选择衣服的人，实际上是把生命的尽头视为一个事件，一个和出生同样重要和神圣的时刻，意识到这将是人生的最后一件衣服，携带着自己的身体最终回归泥土。☑

最终，衣服会不留任何痕迹地脱离身体

三联生活周刊：请你大概描述一下你为埋葬或火葬的死者设计的衣服是怎样的？

茵特兰迪：从造型上说它们非常简单，设计不是分成衬衫、领带、外套、裤子等，而是整件像长袍一样的服饰。前片有一些可以捆绑的绳结，使它们容易被套上身体，尤其是在家人心绪沉重的情况下。用于埋葬的纺织品都是选择棉、麻、真丝和羊毛等天然纤维，它们比涤纶、锦纶、腈纶等合成纤维更容易分解。最终，衣服会不留任何痕迹地脱离身体，也不会干扰身体的自然分解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怎样通过这一服装设计显示出它的仪式功能？

茵特兰迪：我总是尽量让服装易于纳入家庭的穿衣仪式，比如我曾经设计过一件衣服，在为死者穿衣过程中，每个家庭成员前去系一个结，每个绳结代表捆绑一个曾经活过的生命，这也是一种爱的捆绑。我会用到可拆卸的口袋，里面装家庭照片、信件等。我也会经常用到“最后的面纱”，这是为了软化死者最后的面貌，每个家庭可以自行选择面纱的透明度。柔软的纱状织物轻轻地向下延伸，盖住死者的身体，这是更缓慢、更柔软的淡出。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一再展示你的可溶解服装实验？

茵特兰迪：最初我使用可溶性纤维，是为了体现服装中脆弱的概念，从衣服的“死亡”让穿着者意识到自己生命的脆弱，更多是一种艺术的视角。现在，可溶性服装的实验结果，能够以更美观、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向他人展示被埋葬的衣服所发生的变化。我用这些图像向他人沟通关于腐烂分解的概念，也不会引起常见的厌恶感。服装是我们穿着的第二层皮肤，可溶性服装让我探索如何消除服装和皮肤之间的渗透性边界，在生命的尽头质问关于服装的三个问题：你会穿什么？谁会为你穿衣？你会留下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与死者埋在一起的衣服设计成以特定的方式转化，但是其中的转变过程是人们看不到的，作为设计师你怎么向他人传递这类服装的价值？

茵特兰迪：在设计之前我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来获得科学的结果，以确定布料和纤维等恶化的速度，



“坟墓服饰”项目是设计和定制可生物降解的寿衣

所以我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转换过程。我相信这些转变虽然看不见，但是能够让活着的人安心，知道这些东西会逐渐离开身体分解消失，几乎有种诗意的感觉，也减轻了人们对葬礼的恐惧感。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葬礼监礼人你是如何工作的？

茵特兰迪：在参与的过程中，重要的是保持诚实、轻松、自然的状态，当死者的家人看到尸体不是恐惧或担忧的对象，他们也会放松下来。曾经有一次，我和家庭成员一起为一位过世的老太太穿上紧身衣时，她的女儿突然咯咯地傻笑起来，因为这是她的母亲多年没有穿过的服饰。当我们为她选择口红的时候，女儿们含泪微笑着，回忆起母亲做过的一些趣事。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你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他人的死亡？

茵特兰迪：死亡总是悲伤和伤感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死亡感到舒服。但是，我希望帮助人们把葬礼仪式视为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难以否认同时又是美丽的过程，通过我的服饰和仪式设计引导一个家庭以平静、安慰的方式经历这个过程。☑



2016 香奈儿“巴黎在罗马”高级手工坊系列发布会后台等待上场的模特

时间的针脚

文 / 何潇

“奢华的反义不是贫穷，是庸俗。”——可可·香奈儿



在 Lemarié 山茶花及羽饰坊，将这些装饰元素裁切并分别缝合固定于斗篷和连衣裙上，共需耗费 180 小时



工匠将粉红色皮革裁成花朵和树叶形状，将斜纹软呢和蕾丝裁成小方片备用

花朵与羽毛

在高级手工坊里，我看见了一双双以时装之名，复兴传统手工艺的手。

司机将车子来回倒了两次，没有找到正确的门牌。这是巴黎的东郊，天正下着雨，路上没有行人，我们只得走下车去寻找。这片区域十分寻常，沾上了雨水之后，仿佛是克劳德·弗朗索瓦歌里不那么浪漫的巴黎。没有游客会到这里来寻找花都绮梦，除了那些为了手工艺而来的人。

在某扇普通的大门背后，隐藏着手工艺人的圣所：Lesage & Lemarié 手工坊。城市里有许多像我这样庸碌的人，为了生活，踩着时代鼓点走，亦步亦趋，无知无觉。而手工艺人，却可以将自己放在浮躁的时代之外，全神贯注地去做那些“无用”的东西：一朵花、一片羽毛、一块绣布。这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特权。

在造访这两个传奇工坊之前，我读了著名的时尚记者苏西·门克斯对它们的回忆。那是三十几年之前，“丰裕奢华的 80 年代”。Lemarié 羽饰坊的作品，以精致华美闻名，工坊却是狭小而局促的，拥挤的房间中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羽毛饰品，仿佛 Folies



1

1.2016“巴黎在罗马”高级手工坊系列发布会展品

2. 将丝缎、雪纺、绉绸、乌干纱及漆皮裁成树叶和花朵形状，然后进行手工染色，绣在面料上

3.Lemarié 作品完成后，送回香奈儿高级定制工坊，由裁缝缝合成形

4. 树叶和花朵的裁切、染色及刺绣共需耗时 623 小时



2



3



4

Bergère 歌舞厅的后台。大师安德烈·勒马里耶(Andre Lemarié)对待它们的方式,却毫不马虎。在他眼中,每一片羽毛,都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

当我走进庞坦区(Pantin)的手工坊时,感到了传统工艺所经历的现代化洗礼。应该说,这种改变是积极的。在宽敞透亮的工作间里,工匠们正在进行工作,光线透过玻璃窗倾泻进来,照在他们身上。自从香奈儿决定买下这些珍贵的工坊后,他们就开始在这里工作。年迈昏昏的老工匠,在黯淡的灯光下穿针走线的情景,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张老插画,留在上个世纪的回忆之中。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纳迪娜·迪法(Nadine Dufat)女士。她是Lemarié山茶花及羽饰坊的负责人,有一些年纪,身上带着法国女人的优雅。

Lemarié羽饰坊代表着羽毛装饰工艺一息尚存的华彩。它诞生于1880年,是欧洲硕果仅存的几家古老羽饰坊之一。1996年,为香奈儿纳入囊中。在过去,羽毛装饰一度盛行于欧洲,从衣帽到手袋,均以羽毛作为妆点。“一开始,工坊主要制作羽毛饰品,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时尚配饰是不使用羽毛的。我们那时的巴黎工坊有超过300个工人。”纳迪娜·迪法对我说,“然而在后来,风尚改变了。”

1946年,创始人的孙子安德烈·勒马里耶接管了羽饰坊,将之转到了新的方向。安德烈·勒马里耶的贡献是,把高级时装的技巧引入到羽毛饰品的制作上,并开始与一些著名时装屋合作,比如巴黎世家和香奈儿。“我们在20世纪中期开始与香奈儿合作花朵,这是一段经常为人所谈起的故事。”纳迪娜·迪法告诉我。60年代,可可·香奈儿第一次与Lemarié合作,她给予这个工坊的一个订单,便是制作其标志性的山茶花。自此,Lemarié与山茶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很难相信我们平时见到的香奈儿山茶花,是由人手一朵一朵做出来的。“我们有三个工匠主要负责山茶花的制作。”纳迪娜·迪法说。这里是一片花海,墙上与桌上都是零散的花朵,每年,工坊生产2万到4万朵山茶花。“这些花,都叫作山茶花,但是,每一朵都不是寻常的山茶花。”

我的目光被一个年轻姑娘吸引住,她背对着我,在桌前制作花朵。一双白皙的小手,正在一片一片“花瓣”上摩挲。每一瓣未完成的花瓣,都有一些湿润。她告诉我,花瓣经过加湿处理,变柔软后,更容易获得形状。我这才发现,每一瓣花瓣的形状,都是由姑娘的双手给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朵花都是不同

的。

她所做的是明天大秀上的花。这样一朵一朵做,完成一个大约需要一到两个小时。看来简单清爽的花朵,制作起来却颇为复杂。工坊里制作花朵的材料繁多:欧根纱、皮革、花呢……不同的材质,需要使用不同的剪裁工具,林林总总加起来,共计4000余种。

每朵山茶花都有它的生命流程。给予它们生命的不是大自然,而是这些匠人。小心地剪出花瓣,仔细地给出形状,将之缝制在一起,再给花瓣染上颜色、将之晾干……这是花朵的生命诞生之初。接着,它们会开始自己的人世生涯。在裙子上安家,被设计师和模特介绍给全世界。再被顾客买走,成为其人生记忆的一部分。

“心灵手巧,眼睛灵活。”当我问及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工坊工作时,纳迪娜·迪法说,“主要是能看到差别,看到细节。她们需要擅于学习、倾听,还有就是有创造力,这非常重要。”

“人们来到这里,想看看我们能提供什么。我们并不是唯一一家还在做羽饰工艺的工坊,在巴黎与意大利还有几家。但我们与他们不同。他们出售羽毛,我们出售作品。”纳迪娜·迪法告诉我。

即使运营了百年,羽饰坊依然经常遇到挑战。最为困难的一点是,他们不能很快确定客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纳迪娜·迪法拿起架上一款深色羽毛组成的样品,说:“顾客不会告诉我们具体要使用怎样的羽毛,而是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的感觉。鲜花感,浪漫的,轻盈的……我们要给他们看各种样品,才能确定最终结果。”

到达羽饰坊的这天,恰好是香奈儿大秀的前几日。这也是羽饰坊最为忙碌的时候,所有工作必须赶在秀前完成。令我颇为惊讶的是,一些作品,甚至是在走上T台的前夜才完成。

“作秀之前的那几天,我们总是非常紧张。”纳迪娜·迪法说,“卡尔(香奈儿艺术总监卡尔·拉格斐)做设计,我们将样品做出来,然后给他看。他觉得没问题之后,再将这些用在作品上。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用。”她向我展示了一个羽饰样品,工匠花了30小时来完成这个部分。卡尔·拉格斐将之用在了一条高级定制的裙子上。这条裙子,需要超过1000小时的工作量才能完成。

与我同来的人感叹细节的处理,表示“美得过分”。这正是高级时装的魅力,非贴近细看不能明了。与成衣不同,它的迷人之处,不是几张美艳的时装大片可以表达。实际上,照片总在削弱它的美——在这一点

上，高级时装与极致的美景和真正的美人相同，在这些事物上，摄影术总是在做减法。

我随着纳迪娜·迪法来到一间挂满了羽饰样品的房间。当我一件件看过去，马上被这些缀满手工花朵、羽毛、蕾丝与刺绣的织物迷住了。这些“样品”完全可以被拎出来，当作一件工艺品放进精品店售卖，或是放在画框里，充当住所装饰。它们有着温柔梦幻的配色和繁复精致的细节，延续了法国时装工业的传统。看到这些，我才明白，法国之所以能一直保持着世界时装中心的地位，除了玫瑰色幻梦和想象，还因为扎实的手工艺基础。

“不同的羽毛有不同的处理工艺，工匠们懂得所有这些。有时需要好几种技巧一起使用。比如这件，是给圣洛朗所做的作品，羽毛都是绣上去的。使用怎样的技巧，主要取决于客人的作品和要求。”

“将新材质的花朵与新材质的织物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喜欢将这些工艺（savior faire）结合在一起。”说着，纳迪娜·迪法向我解释这些羽饰如何转化成卡尔·拉格斐的设计图景。

“比如这个，将蕾丝、花朵、鸵鸟羽饰结合在一起，再在其中加上一些刺绣……这是非常 Lemarié 的作品。”像花朵与羽饰一样，其上使用的蕾丝、刺绣与褶皱，也出自相应工坊之手，每一件皆是匠人劳作多时的结晶。它们与时装设计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使其丰富，却不会喧宾夺主。

她给我展示了一件结合花朵与羽毛元素的作品。这块小小的织物繁花似锦，仔细看来，每朵花都不尽相同，大小各异，有着独一无二的细节。“这样一件作品，通常需要12到20人来做。有人专门做花朵，有人专门负责羽毛。”纳迪娜·迪法说。

然而，如是这些，都只是高级时装的一部分。在设计师作品最终完成之前，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会出现在哪里：也许是袖子，也许是裙摆，也可能是任何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最终，卡尔·拉格斐将它用在了香奈儿婚纱上，这件婚纱花费了1900个小时才得以完成。

我看到，一条绣满了花朵与羽毛的裙子平躺在工作台上，就像一本打开的书，其上布满的花朵与羽饰，就像书页上密密麻麻的注脚。每一个注脚后面，都有一扇通向手工艺的大门。

高级时装像一本浩繁的书，如果你愿意坐下来仔细阅读，会发现它们是引人入胜的。这种探索的愉悦，与阅读《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著作相似。

与后者不同的是，高级时装是“众人的作品”。隐藏于其后的，是一双双以时装之名，复兴传统手工艺的手。

时间的针脚

刺绣之于高级定制，犹如烟花之于巴士底日（法国国庆日）。——弗朗索瓦·勒萨热（Francois Lesage）

上世纪80年代，苏西·门克斯造访法国刺绣大师弗朗索瓦·勒萨热的手工坊 Lesage。那时的 Lesage 还在一栋有着蓝色外墙的小楼里。房间非常狭小，纽扣和丝线放置在空果酱罐里，整齐排放在破旧木架上。弗朗索瓦·勒萨热拉开抽屉，抓起一块布，自豪地宣布：“这是夏帕瑞丽（Schiaparelli，法国著名的高级时装屋）！”就像在瓦罐里找到了一枚珍珠。

拥有100多年历史的 Lesage 刺绣坊，是一个鲜活的法式刺绣博物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这里制造了4万个刺绣版本，拥有超过60吨的存货。直到现在，这些古老的绣样还保存在绣坊里。1992年，Lesage 开办了刺绣学校。许多人漂洋过海，来到这个时尚圣地学习法式刺绣，其中也不乏中国学生。

Lesage 刺绣坊的故事得从1858年讲起。那时，阿尔伯特·米绍内（Albert Michonet）创立了 Michonet 开端绣坊，名声鹊起。这是高级时装的诞生之初，阿尔伯特·米绍内的合作对象包括高级时装之父查尔斯·沃斯、帕康夫人（Jeanne Paquin）和薇欧芮（Vionnet）。1924年，弗朗索瓦·勒萨热的父母阿尔伯特·勒萨热与玛丽-路易斯·勒萨热买下了 Michonet 绣坊，这是 Lesage 刺绣坊的开端。1949年，老勒萨热夫妇辞世，弗朗索瓦接手了家族事业，此时他只有20岁，却将绣坊发扬光大。

而今，Lesage 刺绣坊与 Lemarié 工坊一道，搬到了庞坦区。在现代化的工坊里，工匠们做着与100年前同样的工作。办公室的门后，我看到一张小牌子，其上写着：“保持冷静，爱香奈儿（Keep Calm and Love Chanel）。”2002年，Lesage 刺绣坊被香奈儿买下，成为其手工坊大家族的一员。香奈儿每年有8个系列，涵盖高级定制与高级成衣，其中不少作品都用到了 Lesage 刺绣。

Lesage 刺绣坊现在的创意总监是于贝尔·巴雷尔（Hubert Barrère）。他与弗朗索瓦·勒萨热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此时的于贝尔·巴雷尔还是一名学生，他学习法律，却希望投身到时装工业里来。毕业后，



1



2



3



4

于贝尔·巴雷尔在Hurel 绣坊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弗朗索瓦·勒萨热从一开始便对他另眼相看，并为之保持着持续的联系。2011年，弗朗索瓦·勒萨热过世，于贝尔·巴雷尔接过了他的工作。

于贝尔·巴雷尔与卡尔·拉格斐的合作始于2012年，他表示非常喜欢香奈儿“高级手工坊”系列，感到这个系列让他们“有时间去思考”。在2015年的萨尔斯堡系列里，卡尔·拉格斐谈到了灵感来自萨尔斯堡，没给更多的提示，余下的一切都由绣坊发挥。

“我们研究了莫扎特、霍夫曼斯塔和音乐节，还研究了茜茜公主的历史，罗密·施耐德（Romy Schneider）的电影和所有浪漫欢乐的东西。”然后，绣坊制作了白色小花和蝴蝶绣饰，华美却是田园牧歌式的，充满历史感和浪漫气质。“这个系列是一份礼物。”于贝尔·巴雷尔说。

来到手工坊之前，我在香奈儿的Open Door 预览

上看过这个系列的作品，对其上的白色雪绒花和燕子记忆犹新，它们让我想到《音乐之声》里萨尔斯堡的春天。我没想到，这些清雅的小花是这样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它们看来精细，却并不厚重，也不浮夸。一件短夹克上，领部镶有金线穗带，底部和腕部层叠着许多金属亮片。这些细节，花费了330个小时的针线活来打造。难怪有人说，“高级工坊系列”堪比高级定制。

在对待手工艺上，香奈儿表现出了大牌风度。Lesage 刺绣坊有40余个客户，除了香奈儿，还有迪奥（Dior）、瓦伦蒂诺（Valentino）、圣洛朗（YSL）、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等时尚行业一线大牌。这些品牌，大多与香奈儿存在着激烈的同行竞争关系，有些甚至是其强劲对手。然而，为了让工坊保持生命力，香奈儿并没有将之垄断。

“在订单处理上，香奈儿会得到特别的对待吗？”

1. “巴黎在罗马”系列浅米色蕾丝连衣裙，饰以“意面蝴蝶”和“半蝴蝶意面”造型刺绣及珠子

2. Lesage 刺绣坊的工匠正在工作

3. 应用传统手工艺隐藏式刺绣法加工绣品

4. Lesage 刺绣坊制造了4万个刺绣样本，这些古老的绣样都保存在绣坊里

“并非如此。我们一视同仁。”工作人员回答我，“当然，香奈儿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但他们与其他客户是一样的。我们无法知道下一季卡尔会不会用到刺绣元素，我们得对所有人一样。”

绣品的价格，因花费手工的不同而不尽相同。就“高级手工坊”系列而言，一条裙子通常需要10个工匠来完成，花费一个星期，每天工作10小时。这里可以看到各种材料：丝质绣线、日本珍珠、水晶玻璃、亮片、羽毛、乌干纱、雪纺……甚至是皮革，也可以运用到刺绣里。

在香奈儿发布的2016“巴黎在罗马”系列中，有一条长裙，其上缀满意大利面一样的蝴蝶结，是由皮革和珍珠制成的。这是绣坊最新一季的作品，绣品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将皮革与珍珠结合在一起，亦刚亦柔。为了保证手工的精确度，从裁剪皮革到捏成意面形状，再到钉上珍珠，每一步都有人各司其职，“绝不会出错”。

一名绣娘正在绣台上绣一件作品，绣面朝下，看不到绣纹。旁边摆放着图纸，印的也是绣纹的背面。这是Lesage刺绣坊的看家手艺“隐藏式刺绣”（Broderie de Lunéville）。这种绣法诞生于1867年，最大特点，是在刺绣时绣面朝下，用一根特别的钩针，将珠片、水晶等装饰物固定在面料上。这种缝制法的好处在于，针脚被全部藏匿在背面，正面看不到任何缝制痕迹，非常美观。

“Broderie de Lunéville”的名字，来自这种刺绣使用的工具，Lunéville钩针。钩针模样质朴，前部是尖锐的钩针，后部是木质手柄，由金属环固定在一起。虽其貌不扬，名字却很有诗意。拆分开来，Lunéville由“lune”和“ville”组成，合在一起的意思是“月亮之城”。

我站在她的身后，默默地看着她穿针引线。她的双手一上一下，绣台下面的手，将一颗一颗的小珠子送到线里，形成一道珠线，再由绣台上的手牵引，固定到布面之上。这样精细的活计，需得人手才能完成。她就这样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小动作，没有一点儿厌烦的样子，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想起理查德·桑内特的话：“技艺本身，绝不是一种和精神活动无关的机械性重复。然而，它也不是你花心思就一定掌握的。”

工匠的人生，便由这样一个个重复的时刻组成。工坊里的年轻姑娘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愿意将之作为终身职业。如今，手工艺是一个日渐式微

的行业，却依然有人，想要将整个生涯交付给这样一个单调却需要极度用心的工作。

这里弥漫着一种安宁专注的气氛。刺绣工匠年龄各异，有年轻姑娘，也有白发老人。绣坊里，桌子整齐排列，绣匠背对背坐着，就像大学图书馆里正在温书的学生。每个人都在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有人抬起手，拉直手中的线；有人在比照图纸；有人将丝线小心地穿进针眼……第二天就是大秀的日子，仍有一些东西没有完成，这里却没有丝毫焦躁的气息。

人们通常所说的“匠艺活动”，指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日渐消失的生活方式。这个定义并不准确。“‘匠艺活动’其实是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冲动，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在《匠人》一书中，理查德·桑内特写道，“‘匠艺活动’关注的，是事件本身。”

我们一辈子可以做许多事，因而反复选择。而工匠的生活，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将之做到极致，不再选择。我至今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好工匠对我说，后悔自己的选择。

手工的价值

拥有而不占有，法国人对于爱情的态度，浸染到一针一线的光辉里。

尽管香奈儿的忠诚顾客每一年都会为当季新品打破头，但高级工坊的意义，却不在于填满这些闪亮宽敞的私人衣橱。2002年，卡尔·拉格斐决定每年推出一个独立的高级成衣系列，即每年12月发布的“高级手工坊系列”。其目的在于展示高级手工坊的传统工艺，也是手工艺之于时尚的价值。

可以料想的是，我在手工坊所见的一切，将是这个夏天重要的时尚谈资。5月的最后一天，香奈儿将其2015/16高级手工坊系列（Métiers d'Art）——“巴黎在罗马”搬到了北京。2009年，香奈儿高级手工坊系列曾经到过一次中国，当年的主题城市是上海。“巴黎在上海”在黄浦江边铺开秀场，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这是一门应用的艺术，关于如何将事物做到极致。这个系列是由‘艺匠’打造的，精髓在‘艺匠’的‘艺’。”卡尔·拉格斐说，“系列的精神体现在细节中，你必须靠近仔细看，亲自触摸，才能感受到它们的精雅。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它们的制作过程，真正欣赏它们的美。”

每年，卡尔·拉格斐都会选择一个和品牌有联系

的城市作为创作主题，打造这个系列。在过去的十余年里，高级手工坊系列的灵感城市包括东京、纽约、蒙特卡罗、伦敦、莫斯科、上海、拜占庭、孟买、爱丁堡、达拉斯、萨尔斯堡、罗马。来到北京的“巴黎在罗马”，主题城市是“永恒之城”罗马，灵感来自法国银幕女神和意大利电影。

与高级时装系列和高级成衣系列不同的是，高级手工坊系列不属于任何时装周日程，是十分特殊的一个系列。而今，这个系列俨然成为一个标志，被称为“香奈儿时刻”。香奈儿是唯一一个，为高级手工艺创作独立系列的时尚大牌。对于消费者而言，该系列相对于普通成衣，显得更有价值。

早在1985年，香奈儿便开始收购老手工作坊，1997年，设立了附属公司Paraffection，统一管理旗下的所有手工坊。而今，香奈儿旗下的手工作坊有十余家，其中包括我拜访过的Lemarié山茶花及羽饰坊和Lesage刺绣坊，还包括Maison Michel制帽坊、Desrues纽扣及服饰珠宝工坊、Goossens金银制品工坊、Massaro制鞋坊、Guillet花饰坊、Montex刺绣坊、Causse手套坊、Barrie针织坊和Lognon褶皱坊等。

“后继无人”是传统手工艺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即使是在看重手工制作的欧洲，一样不能摆脱这样的窘境。在而今的生产环境下，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困局。一方面，手工生产的商业模式，无法满足习惯了流水线生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而随着原有工匠的日渐老去，这些工艺也日渐枯竭。与此同时，时装工业制造程序的亚洲转移，也对原有的欧洲市场产生了冲击。一些老工坊，因为“供血不足”，面临关闭的危机。

对于高级时装行业，传统手工艺的失传是致命的威胁。高级时装赖以生存的根本，正是这些古老的工艺。高级时装的价值，除了设计师的设计，更多体现在凝聚着众人心血的手工艺上。高级时装屋与手工工坊之间的关系，好比鱼与水。以香奈儿为例，时装屋每年要推出6个高级成衣系列和2个高级订制系列，换言之，不到两个月，就要发布一个系列。而大多数工作，都是在系列周期最后两周完成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工匠参与制作，这些系列无以为继。

解决这个困境的一个方法，是时装屋积极参与到手工工坊的运作中来，常见的方法是购入与合作。除了香奈儿，其他奢侈品牌也各有动作。就在近些年，爱马仕收购了Annonay制革厂；开云集团收购了稀有皮革鞣革厂France Croco；而路威酩轩（LVMH）集团，

则与比利时知名的Masure制革厂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又取得了新加坡鳄鱼皮革厂“兴隆国际”与Roux制革厂的控制权。

在这些“金主”的保护下，手工工坊得以从倒闭的危机中存活下来。像Lemarié山茶花及羽饰坊和Lesage刺绣坊一样，这些被收购的高级手工坊，大多与收购方保持着相对自由的关系。他们与收购方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也继续服务于行业其他品牌。不久之前，我探访了里摩日的巴斯坦鞣革坊，它为法国制鞋品牌威士顿（J.M. Weston）买下，却依然为全行业的高级制鞋提供服务。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手工坊活在自由的空气里。只有生活在开阔的环境中，拥有鲜活的血液，才能保持灵感和创造力。“每一家工坊都有自己特殊的技艺，他们都对香奈儿品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我们希望他们不仅仅只对香奈儿，而应该向所有时装品牌提供这些特殊技艺。与越多不同的设计品牌合作，它们会变得越好。”香奈儿全球精品部总裁布鲁诺·帕夫诺夫斯基（Bruno Pavlovsky）接受《时装商业评论》（*Business of Fashion*）采访时说，“要保有创意，就必须与不同类型的人合作。”

拥有而不占有，是法国奢侈品行业的一个共识。法国人对于爱情的态度，浸染到一针一线的光辉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高级时装曾经面临过灭顶的危险，却最终存活了下来。这个传统行业的眼界与胸襟，是其存活至今的重要原因。

在Lesage手工坊，我走进了那间著名的刺绣标本储藏室。这里就像一个活的博物馆，存放着一个世纪以来的刺绣样本。高耸至天花板的储物架，填满了整面墙。在这些架子上，时髦的香奈儿储物箱取代了过去破旧的Lesage纸板箱。这些纸盒里，放着各个品牌的古老绣样：香奈儿、巴黎世家、夏帕瑞丽、迪奥、圣洛朗、高蒂耶……Michonet绣坊诞生那年的绣样，依然保存在这里。

我将黑色纸盒从架上抽出，找到那张1858年的Michonet绣样。绣纹在一张黑色的织物上，一点也不华丽，非常低调。我将布面翻过来，摩挲其上细细的针脚。它确实很旧了，柔软、细致，那么美丽。我忽然感到，在这个古老行业里做一名匠人，是令人羡慕的。他们并不高高在上，却在这个躁动的时代里，获得了“时间豁免权”。他们的人生痕迹，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躺在时间的针脚里——即使被绣在背面，也在永恒的序列里。■

波特祖母的生物钟

记者 曹玲



你听到自己身体内有无数生物钟在“滴答”作响吗？

成千上万的生物钟

格尔达·波特（Gerda Pot）的祖母是一个坚定的守时主义者。她总是在同一时间吃早餐、午餐和晚餐，喝茶和咖啡的时间也是固定的。波特的祖母已经90多岁，身体健康，独自生活，波特很想知道，祖母有规律的生活习惯里是否蕴含着保持身体健康的金钥匙呢？

作为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营养学家，波特比其他人更容易找到真相。她发现自己并非第一个这样

想的人，迷迷糊糊之中，她闯进了一个被称为“时间营养学”的领域。

我们很早就知道生物钟混乱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在几十年间，我们一直认为生物钟就是大脑中的一个计时器。直到后来，科学家才认识到人体包含数目众多的生物钟，即便不是以百万计，也有数千个不同的时钟在精心调节我们的心脏、肺、肝脏等不同组织和器官，让它们正常运转。我们的身体在许多方面遵循24小时节律，它调控我们何时睡觉，何时醒来，调节我们的血压、体温、激素分泌水平，甚至调控母乳成分从早到晚有所不同。

关于生物节律的最早记载大约在300年前，法国天体物理学家让-雅克·奥托斯·德梅朗（Jean-Jacques d'Ortous de Mairan）发现，把含羞草放进

黑暗的环境,含羞草的叶子依然以24小时的节律打开、闭合。

上世纪60年代,科学家让志愿者在无法感知时间的地下室居住,发现大部分人每天的生活规律会保持不变:三分之二的时间是醒着的,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觉。但是少部分志愿者体内不同节律的运行周期不同,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比如某个实验者体温每25小时达到一次最低值(通常实验者的入睡时间是体温最低的时间),但是他每隔40小时才睡一次觉,似乎体内时钟的指针已经彼此分离,不再同步。这个观察结果显示,控制我们身体的生物钟不止一个。

到了70年代,科学家找到了哺乳动物生物钟的位置所在。他们阻断啮齿动物不同的大脑区域,以弄清大脑内哪些区域在影响动物每天的活动。结果发现,动物眼睛后面的小丘脑有两个很小的区域,现在被称为视交叉上核,这个区域的神经元连接视网膜,负责对光明和黑暗的周期性反应,让肌体随着白天和夜晚的时间活动或休息。视交叉上核只有四分之一米粒大小,由大约2万个神经细胞组成,这两个区域向大脑和身体发出信号,控制激素释放、调节体温和食欲。这个位于大脑的生物钟,被称为中央生物钟。

几年后,基因研究揭示了除了中央生物钟外,人体还有很多外周生物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约翰·霍格尼斯(John Hogenesch)发现,哺乳动物近一半的基因活性随时间变化而变化。2014年,他绘制了小鼠12个不同器官中成千上万基因的24小时表达模式,包括心脏、肺、肝脏、胰腺、皮肤和脂肪细胞,制作出哺乳动物基因振荡“图谱”。

这些生物钟和大脑的时间机制差不多。作为对外部信号的响应,两个核心基因连锁激活了其他基因,从而引起细胞活性的突然改变。最终,一些被激活的基因通知核心基因停止发号施令,抑制组织细胞的活性。

最令人惊讶的是,控制基因活性随时间变化的信号并不一定来自大脑。如果把肝脏细胞养在培养皿中,它也会很快进入24小时节律。“人体只有一个生物钟”的概念已经成为过去时。英国萨里大学科学家乔纳森·约翰斯顿(Jonathan Johnston)认为,人体中数以千计甚至百万计的生物钟,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它们各行其是,之间也相互通话,相互协调,完全改变了人们对生物钟的认识。

2000年,科学家发现通过改变小鼠的进食时间,就能改变它们的外周生物钟。小鼠昼伏夜出,与人类

正好相反。通常它们在白天睡觉,如果强制它们只能在白天进食,它们的外周生物钟就会改变12小时,但是大脑中的中央生物钟始终保持不变。肝脏适应最快,三到四天就能适应,心脏、肾脏和胰腺要花一周才能适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进食不规律可能会导致更多后果,比如更容易增加体重以及患上脂肪肝。

同样,如果限定了小鼠进食的周期,不管它们吃多少,反应都和限制饮食热量的小鼠变化一样。这似乎可以证明,诸如食物这样的外部因素能够重置身体的外周生物钟,就像肝脏、胰腺这种参与控制血糖水平的器官那样,生物钟不再受到大脑左右。如果在一个异常的时间进食,相应的器官很可能还没有做好处理食物的准备。

用好你的生物钟

这些研究不禁让波特想,进食时间究竟在健康中起什么作用。验证这样的想法很难,因为你不能定期获得人类的器官样本,以监测他们的日常活动,或者使特定组织中某个基因失效。波特转而使用了“英国国家健康和发展调查”的数据,这个研究始于1946年,对5000多人进行了详细的持续调查,包括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吃了什么、什么时候吃。

研究给她的“祖母假说”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她发现吃饭不规律的成年人,几十年后患上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更高。尽管存在个体差异,她依然认为规律的饮食对每个人都有益处。换句话说,不只是吃什么、吃多少的问题,什么时候吃也非常重要。

玛尔塔·加劳莱特(Marta Garaulet)是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的研究员,同时在几个减肥门诊任职。2008年,当她第一次告诉人们,肥胖是因为脂肪细胞搞错了时间时,她受到人们的嘲笑。“那时人们认为生物钟基因对于肥胖来说无关紧要,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加劳莱特以多种研究告诉人们,脂肪是人体众多组织中的一个,它有自己的生物钟。比如,2014年她和同事测定了一些肥胖症患者的生理节律,发现那些有着健康生物钟的患者,脂肪细胞一天内随时间变化改变温度,这些患者的减肥效果更好。她推算,三分之一的人生物钟基因变异,这些人减肥会更难一些。另外一项针对400名节食减肥的肥胖症患者的研究发现,进餐时间能影响到人的减肥效果。那些习惯下午

3点之前吃主餐的人，比下午3点之后吃主餐的人多减下大约25%的赘肉。

进食时间不只关乎新陈代谢。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制作人体各组织器官的活动时间线。例如，我们的身体为迎接一天的繁忙工作，心脏会率先经历一阵紧张活动。黎明前那段忙碌时分是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高峰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心脏病容易在清晨发作。

同样，肺也会在我们最活跃、最需要它的时候提高效率，同时免疫功能也会增强。甚至有迹象表明，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生物钟的变化有关，可以解释为什么症状往往在下午和晚上更严重。医生逐渐认识到，打乱人体生物钟还会增加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包括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生物钟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长期值夜班的人，糖尿病、肥胖和心血管等疾病患病率更高。普通人也可能有类似的经历，旅行时倒时差就让人充分理解若想让生物钟和头脑达成一致是多么痛苦。即便你不值夜班、不坐飞机穿越多个时区，也可能患上“社交时差”综合征。所谓“社交时差”综合征指的是长假之后重返工作岗位时，很多职场人士感觉浑身倦怠、提不起精神的状况。工作时间表要求我们上班，但是身体却不想工作，有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影响了80%欧洲人的健康。人们在工作日早晨6点起床，周末九点钟起床，身体需要付出的代价和跨三个时区旅行一样。

虽然这些情况听起来令人沮丧，不过科学家也指出生物钟的好处。一开始，我们需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节律，根据身体节律制定进食时间，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控制体重。约翰斯顿正在研究调整进食时间是否能加快我们的新陈代谢，以降低值夜班、倒时差以及假期综合征的影响。他建议，避免假期综合征可以在一周内坚持一个时间用餐，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

一些公司正在瞄准外周生物钟来开发药物。拿肺来说，肺在夜间活性降低，哮喘病在夜间更易发作，生物钟紊乱引发的最致命的症状之一就是夜间哮喘。几年前，爱尔兰地平线制药公司获得批准，研制了一种能缓解哮喘症状的类固醇药物——强的松缓释配方。还有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在睡觉前服用降压药缬沙坦，比醒来时服用效果提高60%，还能降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夜间给药是促进大众健康经济有效的方式。

霍格尼斯的工作表明，很多药物都在不同程度上

考虑了人体的生理节律，比如100种美国最常用的药物中有56种，250种世界卫生组织基础药物清单中有119种都考虑了这一点。这些药物中许多都有6小时左右的半衰期，也就是说，服药约6个小时后，药物在体内的浓度会下降一半。2014年，霍格尼斯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后，美国多家制药公司纷纷向他求助，想知道有些以前被定为有毒或者低效的药物，是否只是因为检验选错了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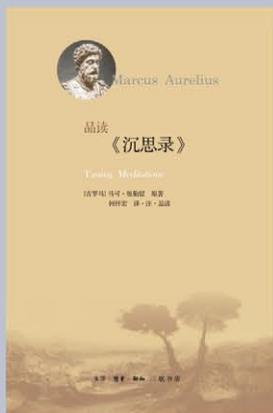
时间是影响药物效率的一个重要但却被低估的因素。目前有一个新兴的领域叫“时间疗法”，这个疗法的先驱英国华威医学院教授弗朗西斯科·利维（Francis Levi）教授说：“我们的细胞中存在着一种时钟，调控着药物的新陈代谢，因此一些药物适合在夜间给药，一些适合在白天给药。我们发现，时间疗法遵循患者的生理节律，从而减弱了疗法的毒性，并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时间疗法已经被用于癌症治疗领域。一旦细胞癌变，癌细胞的生物钟要么昼夜颠倒，要么完全紊乱。科学家们在一项针对小鼠的实验中发现，清晨接受癌症药物治疗的小鼠，没有下午接受治疗的小鼠存活率高。在针对人类的研究中也发现，许多治疗癌症的常用药物随着给药时间的不同以及患者生物钟的不同，药效也不一样。在合适的时间服药，药物对肿瘤的伤害力会大一些，而对身体的伤害会小一些。

在风湿性关节炎领域，针对时间疗法的研究也在进行。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症状通常在早晨更严重，在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免疫系统T细胞攻击自身所致。这些细胞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它们的炎症反应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疗法相对来说毒性较大，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肝损害、掉头发等等。如果能确定最佳给药时间，药物就可以在有需要时才对免疫系统进行抑制，降低副作用。

目前，科学家发现除了癌细胞之外，还有一些细胞缺乏生物钟，比如胚胎干细胞。胚胎干细胞是一种有无限潜能，能在一定条件下分化成各种组织细胞的全能细胞。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研究生物钟的卡丽·帕奇（Carrie Partch）曾做过小鼠胚胎干细胞实验，她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说：“起初，这就像是来吧，来吧，还没有‘滴答’，还没有‘滴答’……然后，在这些细胞分化的某个时刻，时钟就来了。”

或许，我们可以更加关注身体的“滴答”声，帮助自己活得更健康、更长寿，波特祖母的例子已经证明了生物钟的神奇力量。☑



品读《沉思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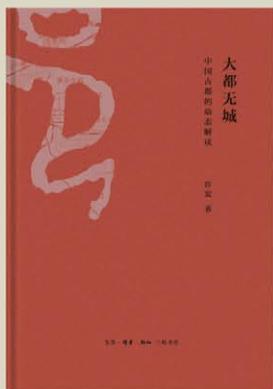
[古罗马] 马可·奥勒留 原著 何怀宏 译\注\品读 定价：45.00元

《沉思录》是哲学家何怀宏在1980年代末完成的重要译著，译文忠实简练，素雅凝神，二十多年来在无数读者中默默流传。现在，他以逐段对照的方式与我们慷慨分享他的权威解读，同时感念这部不朽著作在动荡不安的时刻曾给予他的巨大安慰。

败在海上：中国古代海战图解读

梁二平 著 定价：100.00元

元日海战、清英海战、清法海战、清日海战、日俄海战……作者通过二百幅从元到清的海战图，讲解了发生在中国沿海的海战以及近代中国的海防，反思中国为何在海战中连连失利，任由列强肆意入侵，“败在海上”。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许宏 著 定价：48.00元

从二里头国家（夏或商王朝）诞生到汉代的绝大部分都城是没有外城的，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如何观察古代都城在先秦时期的时代变迁，如何理解“大都无城”现象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文化内涵，跟随考古学家一起寻找答案。

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

叶嘉莹 著 定价：32.00元

撷取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位诗人的诗作，从物象、心境、结构等角度切入，带领读者贴近作家的生命历程，体会诗作的美感特质。书中三位诗人的诗作特点不同，带有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丰美的感发作用，但都同样具有感动人心的效果，都是“真正的好诗”。



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

[法] 阿兰·科尔班 著 苜蓿 译 定价：39.00元

他们被树的存在震慑了。对于这植物界的王者，他们既欣赏，又恐惧。他们几乎都在守候和倾听树的话语。有些人希望好好利用这些信息，使树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更有少数人尝试与树结合，对它表明自己的爱。

中国茶密码

罗军 著 定价：49.00元

茶香是怎么来的？茶香与发酵程度有什么样的关系？六大茶类可以如何简单地理解？茶叶是如何发明的？茶叶的消费方式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人类历史上为了茶叶而发生哪些战争？为什么说茶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料？应该如何喝茶才能对人体有益？



穿越微观与宏观的光

文 / 苗千

人类需要光、依赖光。

不仅各种宗教典籍多以宇宙中的第一缕光线开篇，现代物理学的开端与发展也始终与光有关，从光的微粒学说和波动学说之争，延伸至认识到光的波粒二象性，到对于量子纠缠现象的理解，一直发展到量子计算机研究，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对于光的认识一直紧密相连。

开创了现代物理学的大科学家牛顿在 1704 年完成巨著《光学》，论证光是由极微小的颗粒构成，他用一块三棱镜把一束白光分解为一条彩色的光谱，证明白光是由各种单色光的颗粒所组成，这与当时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的光波动学说相对立。因为当时牛顿威名赫赫，使得物理学界长期倾向于光的微粒说。

直到大约 100 年之后，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用光的双缝干涉实验证明了光具有和水波相似的干涉性质，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光的波动性质，人类对于光的本性的认识自此产生了 180 度的转变，而随后麦克斯韦提出的电磁学理论，把光、电、磁三种现象统一起来，利用波动方程加以描述，光的波动性质已经完全清晰了。

挽救了光的粒子理论的是爱因斯坦，他通过光电效应提出了光子假说，认为光的能量是一份一份地被发射和吸收的，这个假说最终得到了证实。到了 1927 年，保罗·狄拉克证明光子是电磁场与电荷相互作用的量子态激发——人类终于从理论层面认识到光的波粒二象性：光的干涉现象体现了波动性，而对光的吸收和探测则体现了粒子性。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只是微观世界奇异现象的一部分而已，更令人迷惑的则是微观世界的量子纠缠现象。

假设一个自旋为 0 的粒子衰变为两个自旋为 $1/2$ 的粒子，这两个粒子无论相隔多远都将处于一种纠缠态之中。根据角动量守恒的原则，在任何方向上，这两个自旋为 $1/2$ 的粒子的自旋方向将总是相反的（虽然在未被测量之前，这两个粒子的自旋方向并不确

定）——在被测量之前，人类没有任何机会、任何信息能够预测两个粒子的自旋方向。这两个粒子的自旋状态实际上是处于向上和向下的叠加态，这种状态会持续到测量行为的发生。但是测量行为使量子叠加态立刻转变为一个确定的数值，这两个粒子无论相隔多远，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都会立即使另一个粒子的状态也从叠加态变成确定态。

自从量子力学诞生之日起，如何理解量子力学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理解量子纠缠现象，被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是理解量子力学的核心问题。处于纠缠态的粒子状态并不独立，而是与另一个相联系，正如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尔文·薛定谔所说：“量子纠缠中有着量子力学的精髓。”量子计算、量子加密和量子传输技术都依赖于处于纠缠态的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这种在微观世界中非常普遍的量子纠缠现象至今都无法被处于宏观世界的人类所理解，这就涉及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寻找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界限。

在 1935 年，薛定谔就意识到了量子力学在宏观世界中有着更为复杂的体现，而且把量子力学的理论应用在宏观世界有可能导致非常奇异的结果，例如生死难辨的“薛定谔的猫”，正是量子叠加态的宏观体现。“薛定谔的猫”显然使薛定谔自己也感到迷惑，甚至让人开始怀疑“真实”的意义。为了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安慰，在 1952 年他写道：“我们从来不会用单个的电子或是原子或是（小）分子做实验。在假想实验中，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设想这样做，但是这总会无可避免地导致荒谬的结果。”

“真实”元素的缺失说明量子力学并不完备，但是近年来各种越来越精确的贝尔实验说明量子力学确实打破了爱因斯坦关于定域性的局限，或许微观世界的“非定域性”和量子纠缠才是“真实”最基本的元素。研究量子纠缠现象，探索微观与宏观之间的界限，目前大多数的精密实验都是利用光子来完成的。光子统计学和光子计数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可以真正检验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在光子概念上的不同，很多此前的思想实验已经变为现实。实际上，现在人类已经可以利用单个的光子、电子、原子进行实验，IBM 公司甚

至利用单个原子组成的图像拍摄出了世界上最小的电影，这些成就显然都是薛定谔那一代物理学家所无法想象的，很多假想实验早已成为现实，但是量子力学所带来的困惑与那个时代并无太大不同。

在与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本质的争论过程中，玻尔强调，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这条分界线必须是移动的，人的神经系统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量子系统。惠勒对此进行了更清晰的表述：“没有任何现象算得上是现象，直到它们被记录下来（被观测到）。”——这正是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也是目前物理学界的主流观点。

量子计算技术需要利用到量子纠缠现象，这项技术直指量子力学的本质。定域性、因果律，这些在宏观世界不可打破的规则在微观世界不再是不可打破的规律，两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玻尔在量子领域和宏观领域之间画出了一条线：测量工具和观测者属于宏观领域，被测量的量子系统在分界线的另一边。但问题在于，这条分界线的具体位置至今也不清楚。把微观与宏观世界之间的分界线推到极致就产生出多重宇宙理论，到了物质世界和意识之间，整个宇宙都是量子态的表述，每一次观

测都会诞生无穷多个宇宙，但这仍然是对于量子力学本质某种意义上的回避。

不仅是进行量子纠缠实验，在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研究中光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光子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信息，而且不容易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发生退相干，相对来说容易进行高精度的操作，因此最适合用来进行通讯。光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许许多多传统力学完全无法解释的现象，对于一种新现象的理解，也就意味着人类可能对于一种新现象加以利用。因此，对于量子计算机的研究很可能帮助人类最终理解量子纠缠现象的本质。

1994年在科罗拉多博尔德举行的一次原子物理学会议上，牛津大学物理学家阿瑟·厄克特（Artur Ekert）举行了一次关于量子计算的讲座，他的讲座启发了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伊格纳西奥·西拉克（Ignacio Cirac）和奥地利物理学家彼得·佐勒（Peter Zoller），他们在1995年第一次提出了实现量子处理器的想法，利用一个离子的两种状态来实现一个量子比特，但在目前大量的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实验中，人们仍然经常使用易于操作的光子。人类理解光、操纵光的历史，正在书写一个新的篇章。■

《读书》2016年第六期目录

盛洪 通古今之变

范勇鹏 这个世界会好吗？

詹福瑞 学者的魅力

孙郁 “多”通于“一”

王汎森 袁一丹 满眼都是“现在”

短长书

重读荒芜的打油诗（邵燕祥）·“吹捧

李何林的反革命骨气”（白维国）·置身

身事内的艺术批评（符鹏）

李零 说“解构永恒中国”

刘永华 乡土中国，有多“乡土”？

聂锦芳 “到马克思的故乡去！”

刘文瑾 现代性与犹太人的反思

闻一 没有国界限制的战争

黄永生 周郑信札与“黄学”研究

杨新宇 影史留名《王老五》 喜剧

悲心蔡楚生

品书录

人类的可能与不可能（冯庆）·赋予

信仰以自由（陈斌）·何谓公职的傲慢？（李石）

程虹 风，在海上漫步

张宗子 梦中的忽必烈汗

杨渝东 韩国的政治化宗族

刘天骄 全球史与国际法视野中的

《独立宣言》

朱也旷 列维坦的伟大不在于，而在于

杨鹏 愿力与艺术同在



《读书》
生活需要读书，
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软实力的硬博弈

文 / 张斌



2015年5月2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搜查了位于迈阿密的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协办公大楼，并从中搬出若干箱文件带回检查

25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提“软实力”概念，简而言之，就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听起来好悬，约瑟夫·奈特别强调了“吸引和说服”，也有“诱导”一说。

提升软实力的口号咱们喊了若干年，工程巨大，收效潜移默化。近日，世界体坛风云变幻，体育之于国家软实力的意义和价值又被重点突显，美国早有“世界警察”的名头，而当下掀起体育世界惊涛骇浪的几次作为，好像匡扶正义的义举只剩下美国人担当了，这种论调显然不太中听，但美国学者坚信这就是国家软实力使然。

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一向被认定是国家软实力中的“硬通货”，因此申办者前仆后继。经典论断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于中国国家形象与品牌建设成就巨大，高速发展的中国从漫长“冷战”残留的场景中脱身而出。而拥有2022年世界杯承办权的卡塔尔则被善意地期待利用这一契机，代表阿拉伯世界向全世界做出最友善的表达。

约瑟夫·奈曾经有言，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是东道主最伟大的市场契机，伟大竞技成就同样如此。著名的《Monocle》杂志2014年的国家软实力排行榜

上，德国位列世界第一，而那一年德国正在享受大力神的荣光。估算国家软实力，奥运会金牌数自然会被折算成分数计入。当年，中国竞技体育统帅部曾经推出所谓“119计划”，将田径、游泳和水上项目三大奥运金牌宝藏的总计119块金牌作为奥运争光计划的主轴，外国人对这个“119计划”颇感兴趣，认定北京奥运会51块金牌便是源于此。无论逻辑是否完全吻合，但是倾国家之力的确可以见效更快。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俄罗斯军团惨败，在奖牌榜上仅仅列在第6位。4年后，帝国反击战大获全胜，33块奖牌登顶成功。

振国威，提实力，任何国家都代价巨大，同时也考验过程中的道德和法律的周延性。俄罗斯体育如今处于危难之中，潜逃者透露了索契冬奥会中俄罗斯方面的种种“手段”，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特工还牵扯其中。国际奥委会针对北京和伦敦奥运会存留尿样再做检测，隐隐的，俄罗斯又会是主角。步步紧逼，眼看着国际奥委会就要决断俄罗斯的里约之路是否通畅了，俄罗斯体育将蒙受“冷战”结束后的最大劫难。

当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与瑞士警方冲入国际足联会议酒店抓人时，整个世界都在揣度美国意志摧毁国际足联根基的动机。美国人很得意的，德国媒体会将美国首席检察官林奇奉为“FIFA猎手”，而英国主持人则认为起诉足球恶人的行动“堪为马歇尔计划后美国人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

《纽约时报》透露，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决定，无论国际足联贪腐案涉案人员国籍，犯罪行为涉及在美国境内的银行账户和互联网服务器，都将适用美国法律。由此推断，未来俄罗斯兴奋剂事件完全有可能成为美国国内法庭的审理对象。约瑟夫·奈早就说过，美国的软实力主要就体现在其巡逻警察身份。针对国内的兴奋剂事件，美国人确实没有手软，接连颠覆了阿姆斯特朗和兰蒂斯两位运动偶像，无人可以超越法律之上。约瑟夫·奈对此评论：“如果美国代表体育界的诚信，那无疑将提升我们的国家品牌。”

林奇因为办了国际足联贪腐案会名声大噪，美国反兴奋剂委员会负责人泰加特也会因为搬倒偶像而被写进史册，司法和正义的力量已足够强大，但隐在其间的大国博弈，并非每个人都能完全读懂，“吸引和说服”也并非那么轻易。■

奥巴马的“亚洲行”是一笔战略遗产

文 / 宋晓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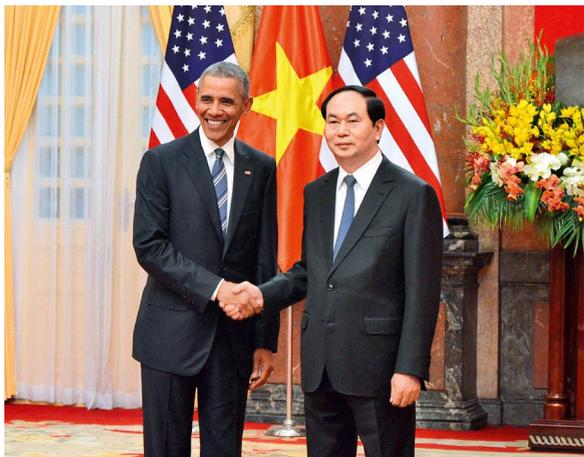
5月28日，奥巴马结束了他的亚洲之行。在他这次对越南和日本的访问中，无论是全面解禁对越南的武器禁运，还是破天荒地访问日本的广岛，都让一些中国媒体认为这是奥巴马任内在军事上拉越、日两国遏制中国崛起“用力”最大的一搏。对此，我在接受一些国内媒体的采访时给出的观点是：鉴于奥巴马执政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他的这次亚洲之行更像是留给后任总统的一笔战略遗产。

2006年，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学院副教授莱恩(Christopher Layne)出版了题为《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美国的大战略》的专著。在书中莱恩认为美国未来有四种大战略可以选择：一是克林顿执政时实施的“选择性干预型战略”；二是小布什执政时实施的“主导支配型战略”；三是“隔岸制衡型战略”；四是“孤立主义型战略”。莱恩认为，对于美国而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应该是“隔岸制衡型战略”。莱恩认为，建立“隔岸制衡型战略”的前提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唯一重大的战略利益就是防止出现霸权国家，同时并不认为欧亚大陆的大国战争将不可避免地要把美国拉下水。为此莱恩认为，所谓“隔岸制衡”就是在欧亚大陆上“任其他大国在彼此间的安全对抗中相互削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增

强美国的相对实力”。简单说，莱恩主张的是一种通过让欧亚大陆热点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分担美国军事义务的积极均势战略。

很显然，相对于小布什政府对热点地区采取积极军事介入的“主导支配型战略”，奥巴马在任的7年多时间里，在外交上所采取的战略，无疑更接近莱恩所提出的所谓“隔岸制衡型战略”。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除了在热点地区避免大规模军事介入外，还通过对外军售加快了在热点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化程度。根据2016年3/4月号《琼斯妈妈》杂志的一篇文章统计，自2009年奥巴马执政以来至2015年，美国对外军售的金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不仅超过了小布什政府对外军售额(600多亿美元)，而且达到了1970年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对外军售之最。同时，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25日引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字报道称，从2011至2015年，排在美国对外军售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沙特、阿联酋、土耳其、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地区、印度、新加坡、埃及和伊拉克。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不仅在不断敦促北约的欧洲国家扩大军费投入以抵消俄罗斯军力的增长，而且还加大了向中国、伊朗和朝鲜周边国家和地区军事资源的输入。

最后我想说的是，就目前美国总统大选的趋势看，无论是曾经强调运用“外交巧实力”的希拉里还是带有“孤立主义”色彩的特朗普接任下任美国总统，都有可能部分继承奥巴马政府作为战略遗产的“隔岸制衡型战略”的相关元素。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位都可能在国会压力和军火集团的游说下(据美国非营利调查新闻组织ProPublica的调查显示，从2011至2013年军工行业协会和大型军工企业为了说服奥巴马政府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共花了1.7亿美元的游说费)，除了会对越南、印度等中国周边国家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外，也不排除他们会超越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高达200多亿美元的纪录，向台湾地区出售更多或更先进的武器。而在台湾地区新领导人坚持不认可“九二共识”的背景下，美国下届政府的对台军售很可能让未来的两岸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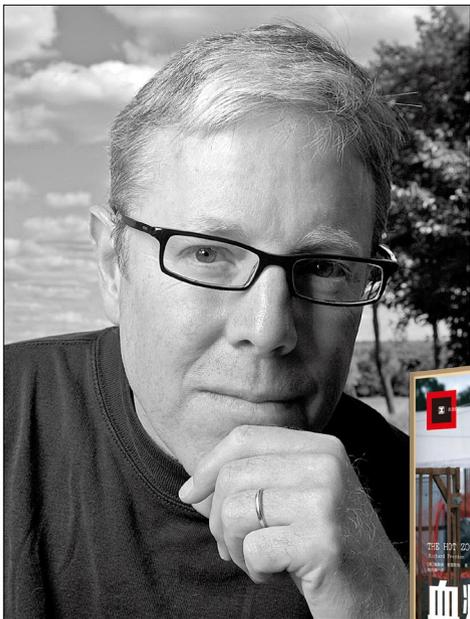


(图题来源/新华社供图)

5月23日，在越南首都河内，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右)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埃博拉病毒：无情的生命“黑板擦”

文 / 薄三郎



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与他的作品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2014年的西非海岸，埃博拉病毒肆虐。彼时，我正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所医学院留学。尽管相距万里，美国民众却被埃博拉病毒闹得人心惶惶。当时，一名在利比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生，被运回国内治疗，尽管最终痊愈重生，民众却难免担心病毒会传播作乱。毕竟，“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世界，病毒也搭乘了便利之机。

当时的美国机场，纷纷升级入境安检级别。毕竟，面对致死率超过70%的埃博拉病毒，任何些许的疏忽，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美国CNN的一名评论员还专门制造了一个词“恐埃症”（Fear-bola），来描摹美国对埃博拉病毒的非理性恐慌。

事实上，这并非美国与埃博拉病毒的首次遭遇。1989年11月，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城就发生过埃博拉病毒事件。这个小城位于华盛顿特区以西24

公里处，晴朗的天气里人们都能在雷斯顿城的高层建筑上望见华盛顿纪念碑那米黄色的尖顶。这里的灵长类动物检疫中心接收了100只从菲律宾进口的食蟹猴。令人不安的是，转眼不到一个月，数十只猴子相继死亡。大量研究之后，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埃博拉病毒。最后，美军出动将大楼封锁，所有动物处死。幸运的是，在目前已知的五种埃博拉病毒中，这种莱斯顿亚型只感染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让人类逃过一劫。

埃博拉病毒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1976年7月，西非两起同时爆发的疫情使它暴得大名。其中一例死者是学校教师鲁克拉（Mabalo Lokela），在不明原因发烧、腹泻、呕吐后死亡。其后几天，曾在同一医院看病的人相继死亡，症状相似。由于这些病例位于雅布库村附近，村庄周围有一条埃博拉河，人们便以河流的名字命名这种未知的病毒。此后数年，尽管西非及世界各地零星出现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人们对它的记忆却十分模糊。直到最近三年，久违的杀手再度登场，全世界一下便记住了它。

早在22年前，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就在《The Hot Zone》一书里，向人们描述了埃博拉病毒的冷酷无情。眼下，这本书出了中文版，书名叫《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作为一名医生，尽管我对危重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陌生，可看到作者在书中的形象描述时，仍难免满身冷汗。简单点说，大自然的真实之力，的确比小说还要惊悚。比如说，作者曾描述了这样一个病例的死亡：“患者体内的一切都不对劲，确实是‘一切’，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致命：血液凝固、大量内出血、肝脏变成糊状物、肠子灌满血液。”真是令人惊悚！

理查德·普雷斯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英语博士，《纽约客》杂志的固定撰稿人。美国天体物理学会甚至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他的亲弟弟叫道格拉斯·普雷斯顿。两人都是作家，哥哥主攻纪实、科普作品，弟弟则是科技惊悚和恐怖小说家，著有纽约自然史博物馆谋杀案系列小说，如《掠食因子》《渠城猎手》。

1995年，导演沃尔夫冈·彼德森将《血疫》中

的内容搬上了银幕。在达斯汀·霍夫曼、凯文·史派西等一干实力演员的演绎下，电影《极度恐慌》(Outbreak)让人们领略到新型传染病的恐怖骇人。不过，剧中虚构的Motaba病毒要比埃博拉病毒还要“毒辣”。导演原本设定的剧情结局是，爆发Motaba病毒的美国小镇在爆炸中毁灭，可鉴于残酷的结局无法让观众满意，不得不改成小镇得救的美式大圆满。

电影里的主角总是神勇英明的。可事实上，看不见的主角才是最危险的。当人类首次窥见埃博拉病毒的真身，就像是一束照进黑暗洞窟的手电筒光束。它深藏在雨林之中，沿着神秘路径演化而来，却集纳了病毒最为凶残的一面。它的结构简单极了，只有几种不同的蛋白质分子，排列成一条长辫状的结构。要知道，典型的病毒大多呈现圆球形，而埃博拉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呈现出纤丝状，呈现出弯曲或缠绕的状态，就像微缩的蠕虫一般。

这容易使许多生物学家产生错觉，让人很难将其与残暴的杀手相联系。可实际上，“它们就像是聪明的猎食者。通过无声无息的潜行，突然暴起袭击。你会惊讶于大自然的魔力，这种毒辣甚至拥有了美感的境地。它非常清楚：人类就是肉食”。

读完《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后，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们耳闻的多种传染性疾，其源头为什么都指向非洲？具体点说，为什么这些骇人听闻、嚣张跋扈的病毒，大多来自西非的热带雨林地区？我想问题的答案可能要分两方面。

首先，在热带雨林里，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是蝙蝠。科学家们已大致判断出，蝙蝠是埃博拉病毒自然条件下的生存库。总之，蝙蝠是多种高度传染、致死率高的病毒的摇篮与温床。更重要的是，蝙蝠作为唯一可以飞翔的哺乳动物，能够轻易地“旅行”，将病毒携带到更远的地方，因其与黑猩猩、猴子等哺乳动物的基因更接近，从而使病毒的传播更为高效。

其次，在西非地区，由于卫生条件、饮食和文化传统等制约，人们常捕猎蝙蝠、黑猩猩等动物作为食

物，这就使人类赤裸裸地暴露在埃博拉等病毒的面前。而且当地的卫生设施不完善，脆弱的卫生系统在埃博拉面前几近崩溃。当地还流传着大量谣言，认为咖啡加洋葱就能将埃博拉治好，这无疑使防疫工作难上加难。此外，当全世界的医务工作者涌向西非时，恐惧不安的当地人甚至将石头丢向医务工作者，殴打甚至杀害他们。

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埃博拉病毒呢？乍看之下，我们与非洲之间山遥水远。可实际上，“环球同此凉热”。中国与非洲多个国家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大量的游客、经贸及务工人员往来穿梭，这为病毒传播带来可乘之机。其次，埃博拉病毒被认为是“世纪瘟疫”。潜伏期短，致死率高，传染性强，任何的疏忽不慎，都可能给我们以致命一击。

理查德·普雷斯顿无疑是一名优秀的调查者，他深入西非腹地探寻埃博拉的源头，又对美国本土20余年前的埃博拉病毒事件仔细调查，在书中善于使用比喻等手法，将埃博拉病毒的冷酷残暴刻画得极为细致。比如：“病毒是分子大小的鲨鱼，是没有思想的行动。紧凑、冷酷、理性，只考虑自己，病毒全心全意自我复制：速度有时候非常惊人。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复制。”

大自然是一个多面手，仿佛诡谲难测的“黑暗森林”。《逼近的瘟疫》一书中比较道：“利用高倍显微镜去观察微生物世界，就会看到一种疯狂的、拼命推挤的场面，那里的微生物不停地互相推搡，其速度之快、力度之猛，相比之下，连午饭时间东京便道上匆匆的人流也显得十分缓慢了。可以想象，假如微生物真有胳膊的话，它们必会不停地推搡邻居，在永无休止的争斗中争取一块生存之地。”

在病毒的世界里，埃博拉病毒就像是生命的黑板擦，无情地将生命直接擦除。《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一书的末尾说：“埃博拉曾在这些房间里兴起，闪现身影，进食，然后回归森林。它还会回来的。”——准确点说，它一直没有离开，一直伺机潜伏着。☑

(作者为上海长海医院麻醉医生、医学博士，著有《健康流言终结者》)

《素食主义者》：在布克奖中胜出的韩国文学

记者 孙若茜

46岁的韩国女作家韩江凭借小说《素食主义者》获得了2016年度的国际布克奖，成为拥有这一奖项的首位韩国作家。



韩国女作家韩江与她的作品《素食主义者》

《素食主义者》是韩江2004年的作品。2015年，这本书被28岁的年轻译者黛博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它讲述了一个原本在别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韩国女人英惠，因为突然间不断地梦到血腥、杀戮而决定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并最终完完全全地把自己当作一棵植物的故事。吃素这件事，在英惠的生活框架中视为极其叛逆的举动，它完全击碎了它与丈夫、父母、姐姐、姐夫之间的相处模式，疯狂地搅动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生活，暴力、欲望、抛弃、占有，每个人对待她的方式不同，但同样地自

私和粗暴，故事以英惠被收治在精神病院，把自己视为植物而拒绝一切食物告终。

这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素食主义者》《蒙古斑》和《树火》，分别以英惠的丈夫、姐夫、姐姐的视角切入，看待并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三部分间相互映照、连续，又彼此独立。其中的《蒙古斑》是韩江在2005年写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凭借它作者拿下了第29届李箱文学奖。作为韩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它牢固地奠定了韩江在韩国文坛的地位。韩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素食主义者》的创作灵感恰是来自作家李箱的笔记中的一句：“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她因对这句话念念不忘，最终写出了想成为植物的人的故事。

想要成为植物是为了远离与人的争逐，摆脱暴力和黑暗。“我们能否忍受暴力和美丽混淆的世界？”《素食主义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又进而将问题引向“在生活里应专注于人性的哪一面？”韩江形容自己的作品是在“质问人间的复杂格斗”，“通过这么极端的故事，我感到我可以提问最难的人性问题”。黛博拉认为，要在一个暴力横行的世界，探索创造一个纯真世界的可能性，正是韩江写作的动力来源，不论《素食主义者》还是她的其他作品。

对暴力的关照始终存在于韩江的作品里，这或许应该追溯到她的生活经历：她1970年出生，是全罗南道光州人。虽然1980年的“光州事件”爆发时，韩江年幼且当时正居住在首尔，但她始终是光州人，这一点决定了她无法侥幸错过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她在家中衣橱深处发现了被“捆绑”得严严实实的影像资料，照片上记录着“光州事件”中充斥的杀戮和虐待，因此她很早就对暴力有明晰概念，对人性持有怀疑。

对照《素食主义者》，以参加战争并得到荣誉勋章为最大荣耀的英惠父亲，其军人身份就带有明确的指向，他既是韩国社会中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又是故事中暴力的代表。书中英惠有一段清晰的童年记忆：9岁那年她被家里的小白狗咬了腿，父亲就把狗捆绑在摩托车上绕着村子行驶，一圈、两圈……直到跟着跑的小狗嘴里吐出白沫和鲜血被活活累死，被当作晚餐端上桌。她知道，父亲之所以放弃原本将它吊在大树上，边用火熏，边用木棒揍它的处死方式，是听说这样可以保持肉质的鲜嫩。听说被狗咬后要吃狗肉才能被治

愈，英惠也吃了一口，从此，她永远也无法忘掉小白狗边跑边看她的眼神。

相比吃素后，父亲用暴力的方式逼迫英惠进食，这段童年回忆的画面无疑更加残暴和变态。甚至可以说，这也是英惠之所以走向极端的关键诱因之一。2010年，当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并成为当年圣丹斯电影节的十部竞赛片之一时，导演林武成在片中用镜头强调了父亲的家暴——不管是对待那只小狗还是对待英惠的母亲，英惠童年时累积的心理阴影对她之后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被更加明确地放大了出来。如果一定要将作品与作者的经历进行关联，那么“光州事件”对韩江心灵的冲击，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英惠亲临暴力。

实际上，韩江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少年来了》，是对“光州事件”的直接讲述。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院副教授崔一说：“‘光州事件’对光州人内心留下的创伤是现在进行时。一座孤立无援的城市对抗全副武装的政府军，光州人的创伤不仅来自面对枪炮时的恐惧，更来自孤立的绝望，面临有可能会悄无声息地被消灭，从人们的记忆中、历史中消失。‘光州事件’现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关照和查明。好多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活着，原因不同，但是都不愿意说出真话。当历史没有被解释清楚时，记忆永远都是现在进行时。”

“讲述‘光州事件’的作品不少，但是韩江的作品颇有特色。主要是她对历史事件的关照，既不是宏大叙事式的，也不是个人的琐碎叙事。她相对倾向于阐明身体、精神等个体生命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再现。虽然谈不上有多么卓越，却颇具特色。”崔一解读说，韩国当代文学的60~80年代是“政治性自我”或“意识形态自我”的时代，反独裁、民主化、南北统一等政治诉求是那一时代文学的主要命题。作家的“自我”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构筑，被“政治的他者”或“意识形态的他者”所支配。所以没有“自我”，只有“他者”。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独裁政权的没落，需要与之抗争的现实突然消失。“敌人”（也就是“他者”）没有了，“自我”也随之消失。于是韩国文学进入到“后政治时代”，从宏大叙事转入个人叙事，作家或作品不再追求历史的必然性，转向纯粹的“个人”或“自我”，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历史、个人的诉求等成为文学的主题。

韩江1994年凭借短篇小说《红锚》崭露头角。到了90年代末，韩国文学开始出现又一次转向，从“后政治时代”或“自我的时代”转向“普遍的时代”。作家们重又将目光投向个人之外的“他者”，却已经不再是“政治的他者”或“意识形态的他者”，而是更具有

普遍性的“他者”或更具有人文关怀的“他者”，例如欲望、价值、人性等。尤其在这一时期，女性作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活力，如申京淑、孔枝泳、殷熙京、金爱兰、韩江等等。她们的写作已经不能单纯地从“女性主义”的话语去评价。其中，韩江写作的一贯主题，就是对人的暴力性的反思。

韩江的父亲韩胜源，是70年代韩国文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1988年曾获第12届李箱文学奖，其文学成就也足以写进韩国当代文学史。韩江在14岁就确定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自然和父亲的影响密不可分。韩胜源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曾说，小说家的家里到处是书，女儿从小在书堆中摸爬，走上文学之路，不足为奇。事实上，韩江的哥哥和弟弟也都是小说家。但是在具体的写作上，韩胜源关注的是人的普遍性价值，或者说超越性价值，更多探讨精神、灵魂、宗教，韩江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写作风格也与父亲截然不同。

黛博拉说：“她建立了独特的自我风格。她笔下的角色可以无比残暴，同时无比善良。她所写的内容通常很极端，不是极端的性行为，就是极端的暴力和戏剧冲突，但她的语言从来不是大喊大叫的类型。她的笔法很自控，但不是纪实报道式的冷漠。我觉得，她对过度煽情和冷眼旁观之间的平衡把握得刚刚好。”

以《素食主义者》中最引人注意的《蒙古斑》为例，中文版译者千日在译后记中写道：“作者的文字大胆但不色情，她毫不避讳地展现欲望、单刀直入地描写两性，但她笔下‘姐夫与小姨子’超越伦理的两性关系丝毫让人产生不了任何肉欲，这一切都贯穿着深沉的悲剧色彩，而最终的结果则是两个具有极强蕴意的个体被世俗推向‘疯癫’的层面。”崔一也解读说：“身体叙事是韩江作品中常见的内容。不少韩国批评家将韩江归入生态文学的范畴。这种评价没什么错，但是也不全面。因为在我个人看来，韩江的写作没那么简单。她写的是身体，可是她讲的却是精神的层面，具体而言可以说是‘自我’与‘他者’的问题。”

但崔一同时认为，韩国的美学反映在其文学作品中，是没有绝对性的价值取向，比如追求悲壮美、崇高美、神性美等等。相对而言，中国文学一直以来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的终极关怀，而日本则具有强烈的自然关怀，韩国则介于两者中间，确切地说更倾向于人与人之间关系。“这可能也是韩国文学无法在世界上受到更多关注的原因之一。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不够大气。再加上韩国或韩语的影响力本就无法和汉语或日语相比，韩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必有不少障碍。”崔一说。■

刘心武：更自由扇动文学的翅膀（4）

文 / 朱伟



刘心武

（任晨鸣摄/中新社供图）

刘心武在1985还做了件很重要的事——开了“私人照相簿”专栏。这个专栏的想法是刘心武在当时西单西绒线胡同口的义利快餐厅，以很含卖弄的目光，告诉我与上海的谷白的。那时谷白还在《萌芽》，他拉我想编一本高端文学刊物，希望刘心武能打破传统的文学表达形式，刘心武就提出了这个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专栏。那年代想编刊物可不容易，之前我与谷白合作，曾编过一本没封面，售价仅两毛，形式上模仿《中华活页文选》的《文学白皮书》，是文联出版公司刚创办时，找到当时的总经理李湜，以书代刊，用书号出了20期就停刊了。编这本高端文学刊物当时很令我兴奋。刘心武谈设想与交稿子，我们的约谈地点，都在西绒线胡同。当初开的这第一家“洋快餐厅”，主菜记得就是盖浇牛肉饭，一人一个托盘，饭后有咖啡。刘心武交的开篇作是《影子大叔》，提供的是他叔叔的照片。还记得他给每张照片都配有令我击节称好的图说，图说之重要性，是从那时种在我心里的。那时刘心武时时有出人意外的想法，我们谈得最多的

是拓展文学的外延问题，认为传统文学的表达类型亟待突破。

可惜的是，谷白当初到福建，似乎是鹭江文艺出版社，最终未谈成以书代刊。设想流产，他就把这个专栏带到了《收获》，从1986年第一期起，延续到1987年。现在回头看，最有意思的还是开端第一篇《影子大叔》与第二篇《留洋姑妈》，有带体温的私人性。之后写他人，照片很难保证有层层深入的质量，缺了私人性，就很难有贴近的情愫。而老照片本来尺寸就小，印刷在凸版纸上模糊不清，也可惜了。

其实，确定到《人民文学》后，刘心武也就无心认真经营这个专栏了。刘心武到《人民文学》，与王蒙的方式不同，他先以副主编身份过渡了半年，筹备这半年，希望能突破王蒙而亮相。突破王蒙的定位，《人民文学》在形式与内容探索上都需要更大的宽容度。而他自己，还真用了半年时间，一页页地写一本《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手册，非常细致地分辨、明确每人、每一岗位的分工、工作职责。这个工作，我主编《三联生活周刊》后也屡次做过，却最终都无耐心做完。

这半年里，刘心武介入编辑，先在第七期推出了香港施叔青，那是一篇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小说，但他说，好小说的味道不在浓。然后第九期，推出深圳一位新的女作家刘西鸿，以她的《你不可改变我》为头条。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一个个性硬朗、桀骜不驯的新女孩，记得刘心武当时特别看中她笔下年轻的都市气息。在他看来，这个刘西鸿代表着比刘索拉更年轻，相比而言，刘索拉老了。记得他当时笑眯着眼，特别强调这篇小说开头结尾的粤语“多有味道啊”，“啊”是挑着眼的问号。这一期二条是高行健的《给我老爷买鱼竿》，老爷其实是祖父，一篇手法娴熟的意识流，鱼竿联结着老爷、童年、故乡。从鱼竿转轮能联系到左轮手枪、老爷的猎枪；从鱼竿到河、院子、枣树、老爷的鸟，联结着乡愁。顺着鱼竿寻找，家乡变了，找不到了。想象力精细绵密，结尾甚至对比电视转播联邦德国与阿根廷的足球赛，亲情都在背后。高行健的小说中，其实我更喜欢1984年经我手发的他的中篇小说《花豆》，牵系的深情：细雨濛濛中的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荡秋千时像伞一样绽开的裙。她在板壁后洗澡，板

壁后的水声与擦肥皂的声音，是深留我印象中的温馨细节。高行健写两人错位，错位后回味的感伤。那时刘心武与高行健走得很近，他信服高行健的艺术感觉。

刘心武其实是在80年代的转折点上接的《人民文学》。但那时我们的兴趣都在讨论所谓的“纯文学”上，我们竟相信真有一种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所谓“纯文学”。那时我对好小说所持的标准是，能够超越简单的社会反应，它的表层是对故事的叙述，读者阅读的故事其实是它的叙述方式。而这叙述所表达出的意象，最终要看有没有哲学内涵，意象决定氛围，内涵决定故事的深度。刘心武给了我过度的信任，让我负责他作为主编亮相，整个小说的“配菜”。他沉浸在“更宽容、更开放”的思维里，希望最大程度地体现对文学内、外延的拓展，完全没意识到此时80年代早已“日过午”，于是就有了《人民文学》的1987年一、二期合刊。

一、二期合刊当时是集中了各种最新锐的作家与类型：莫言的《欢乐》、杨争光的《土声》、马原的《大元与他的寓言》、刘索拉的《跑道》、福建北村的《谐振》、云南姚霏的《红宙二题》、广州叶曙明的《环食·空城》、四川周忠陵的《扳网》、上海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当然还有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些小说，好几篇是提前组稿，留存到一、二期推出的，比如莫言的《欢乐》与马原的《大元与他的寓言》。《欢乐》其实是描写莫言自己如何挣脱贫困农村，伤痕累累的过程，母亲是一种象征。当时看中它，是因它把莫言那种纠缠如麻的语言超凡繁衍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语词纠葛如密不透风的热带雨林，我以为这正是莫言的特点。而马原的极疏朗则与莫言的极繁密形成强烈对比。马原当时醉心于叙述结构出的意味关系，“寓言”这个标题，寓言赋予意味，换个角度，就是游戏的陷阱。小说中的大元与陆高，是马原自己的童年与成年；南京李潮与江西的金岱，是马原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沾沾自喜于角色转换的叙述效果，让你揣摩其玄机。而杨争光质朴的农村写实又与他们形成对比：《土声》三个短篇，第一篇写干旱与压抑的直率的性；第二篇写儿子因父亲当众让他“丢人”轻易的死；第三篇写一个农民一见所怕之人就尿裤子。

这些小说确实都挑战了当时的接受能力。

一、二期合刊中的杨争光、北村、姚霏其实都是《中国》推出的作者（还有刘恒，他的《萝卜套》因交稿晚了，未赶上合刊发稿）。那时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尚未崭露头角，刘恒、杨争光、北村、姚霏在1986年最受关注，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都发表在《中国》上。格非那时还叫真名刘勇，其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也发在《中国》上。《中国》是以丁玲、舒群的名义，在1985年申办的刊物，但因丁玲、舒群年事已高，实际主事的是副主编、诗人牛汉。《中国》因此迅速集结了一批年轻编辑，北岛也因严文井帮忙，安排了进去。于是，本是为老作家提供园地，到1986年变成最前卫作品的阵地。结果，丁玲于1986年3月去世，9月这本刊物就被明确要求停刊，10月编辑部不顾阻拦出了终刊号。刘心武在政治上是极不敏感的，《中国》停刊其实已经是一种清晰预示，如果他敏感一些，1987年《人民文学》一、二期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而我当时一心钻在“纯文学”可拓展的幅度中，还在为这些小说能集中在一起而兴奋不已呢。■（未完待续）



1. 1986年第1期《收获》开了刘心武的“私人照相簿”专栏，发表了第一篇《影子大叔》。这一期摆在目录页第一位的是张辛欣的纪实小说《在路上》

2. 刘心武在1986年《人民文学》第9期以推出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预热，但这一期目录页是以高行健的《给我老爷买鱼竿》为头条

3. 《中国》终刊号。刊首的编辑部文章写于1986年10月10日

我的奶奶

文 / 方政（北京） 图 / 陈曦



我的奶奶是个白白胖胖的老太太，喜欢盘腿坐在自家床上。她经常戴一顶洗得十分干净的白布圆帽，两鬓和脑后露出银色的发丝。她面色白皙，脸上的皱纹长而深刻，沟壑和回曲中藏着历经的岁月。奶奶脸上最有特色的，要数她的耳朵。她的耳垂大，一副耳环戴得时间久了，将耳洞坠得扁长。童年时，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缠着奶奶，让她背对光线坐着，我站在她面前，穿过耳环和耳洞间的缝隙，去看另一侧透过来的阳光。

奶奶干活是把好手，洗衣服、包饺子、炒菜样样做得，拿手的是擀鸡黄面。奶奶有肺心病，干活时会喘粗气，但手底下不含糊，擀面杖往复滚动，面皮和面板之间因着面粉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和着奶奶喘气的节奏，自有一番韵律。

有一年冬天，奶奶在家里炒菜，一边炒菜一边喘气，动作迟缓。爸爸从外面进来，到厨房看到奶奶，于是接过铲子炒菜。爸爸对奶奶说：“娘啊，以后你就别炒了。”于是，从那天开始，姑姑们和爸爸开始轮流照顾爷爷奶奶，每顿饭前，奶奶就盘坐在床上，等着儿女们把饭菜端上来。

饭菜端过来，奶奶总是会很耐心地吃完。如果身体不好或者心情不佳，那就慢点儿吃，分多次吃，但一定会吃完。这是奶奶一条很朴素的智慧，不吃饭，身体不会好，吃不饱，心情会更差。

有一年冬天，奶奶突然昏迷，送当地医院急救，输液、打针、吸痰，大家都以为奶奶不行了。爷爷在家里坐着不断叹气，那时他腿脚不好，眼睛也已经看不见，他坐在沙发上，对着一侧的床说：“你走就走吧。”二姨姥姥也从她住的地方赶来，给奶奶带来一个黑色的包袱，里面装着为奶奶做好的寿衣。

奶奶竟然从生死线上挺了过来，渐渐康复。只是腰部因为长期卧床生了褥疮，治疗期间只能侧身躺着，为此我专门给她买了个奶瓶喝水。奶奶出院那天，全家一片欢腾。

没想到，过了几年，爷爷竟然走在了奶奶前面。奶奶没怎么掉眼泪，盘腿坐在床上，接待各路客人。

在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她很少下床，也不怎么出门。这时，她被姑姑们津津乐道的另一个优点也显现出来，就是超强的记忆力。比如今年过年时，一个小辈的亲戚从外地赶来看她，和她讲谁家的谁生了个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长得像谁。来年或者隔年，这位客人再来时，奶奶就会问他，你们谁家的谁生的那个孩子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是长得像谁等等，几乎与当年所言相差无几。

2007年，我在单位工作的第二个冬天，爸爸来电话说奶奶身体不太好，让我回来看看。我坐火车赶回家，那时奶奶已经有些昏迷，我问要送医院不，家里人说不行。我说：“上回奶奶送医院不是好了吗？”家人说，这次和上次不一样，奶奶这回是已经撑了一段时间了，恐怕时日无多。我不太信服，又找出当年给奶奶用的奶瓶。

我希望奇迹能够再次发生。但没想到，我再次踏入奶奶家门，就听到姑姑们在呼喊“娘，娘”。我赶紧跑进屋里，奶奶又一次不省人事，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温热的，她的人已经走了。我看了一下表，是17点36分。

二姨姥姥拿来的寿衣派上了用场。各路亲戚来吊唁，奶奶躺在自己家床上，面容还是那么白皙，脸上的皱纹长而深。说到死人，我会害怕，但对奶奶我不会。我当时数度去握她的手，后来在爸爸离世时我也是这样。火化之后，爷爷的墓被小心地打开，奶奶与他合葬在一起。我为他们写了一段祭文，念了，烧了。

奶奶走后，我们大家也曾家庭聚餐和聚会过，但没有奶奶在床上坐着，总感觉少了些什么。一个老人，经常是家庭的枢纽所在，有她家就有灵魂，没她家就缺少味道。于是，在饭桌上，姑姑们会经常讲起奶奶在世时的细节，即便是已经重复了很多遍，说和听的都会很认真地进行下去。大家的神情，就好像奶奶就盘腿坐在旁边，接受着我们的表扬一样。■

| 本栏目投稿邮箱 MENSULA@SINA.COM |